

我对祖国的职责

[伊朗]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商务印书馆

译者的话

《我对祖国的职责》是现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一部比较重要的著述。

这本书在介绍国王自己的生平事迹的同时，还讲述了伊朗的概况，巴列维王朝的建立，礼萨王的改革，近几十年来伊朗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并阐明了国王治理国家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对我们了解巴列维王朝的历史，伊朗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了解国王的政治思想、对内对外方针政策等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本书是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统治伊朗近二十年之后写成的。其目的是想总结近百年来，特别是从他父亲礼萨王执政（一九二五年）以来的历史经验，以便得出“行之有效”的治国之策，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比如，在对内政策方面，他实行了所谓“土地所有制改革”和那种小恩小惠的社会福利，以博取人民的“信任”。在对外政策上，他接受了伊朗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推行“中立政策”的失败教训，得出坚决倒向西方的结论，从而制定了联合美国，联合西欧各国，支持联合国宪章，加强区域性集体安全防御的外交政策；他认为，伊朗一直

一 遭受俄国侵略和颠覆，从这一点出发，决定采取反对他所说的“共产帝国主义”苏联的立场，认为必须加强国防以求自卫，才能确保国家的安全。由此看来，书中提出的有关内政外交的各项方针政策绝不是国王的权宜之计，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

伊朗国王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他的政治观点是反共的，这是他在这本著作中公开声明的。由于这本书脱稿于一九六〇年初，亦即在伊朗和中国建交之前，书中也有攻击我国的话，希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分析和批判。

一九七七年三月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古代和现在的伊朗疆域	4
第二章 父王的改革	27
第三章 我的童年	50
第四章 登基之前	67
第五章 动荡不安的岁月	97
第六章 我的积极的民族主义	137
第七章 借鉴新文化问题	169
第八章 我的民主观	209
第九章 充满希望的农业前景	257
第十章 社会中的伊朗妇女	292
第十一章 教育与伊朗的未来	321
第十二章 伊朗石油	359
第十三章 伊朗与世界和平	392
第十四章 国王与国家	430

序 言

本书是为满足人们多年来的需求而写成的。据我所知，从二千五百年前伊朗王国奠基以来，第一个完整地、按历史发展顺序编撰个人传略的国王便是我。

当然，公元十六世纪，即伊朗王国开国两千年后，达黑玛斯普一世编写过自己的简历。尔后二百年，达黑玛斯普二世在位期间，一位法国神甫为了论证这位国王是法国人的后裔，曾出版过他的小传。

十九世纪，纳赛尔丁王也写过一部饶有风趣的欧洲旅行记，书中描述了他的所见所闻和他对西方国家发展诀窍的看法。然而，从未有一位国君系统地编撰过个人传记。我是在执政约十四年后，才决心着手这项工作的。其目的不仅为了在国王编写传略方面开个先例，而且我感到，写这样一部书对了解伊朗的过去和指导它的未来是非常必需的。我们生活在当代的中东地区，可是对自己存在的真正价值缺乏认识，对正确地拟定本国的长远发展规划总是漫不经心。对国家完成的事业有时心中无数，而对阻碍发展的组织等方面的困难则估计不足，在必须明确我们未来的目标、理想和目的时又踌躇不定。因

此,我认为是伊朗国王弥补这些基本缺陷的时候了。

此书写作始于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一年初完稿。这段时间里,尽管有许多重大事情需要我处理,可是为了写书,每周都要花费几小时,即使外出旅行也不例外。旅途中,为编排此书的内容而进行的构思,也从未中断过。

读者面前的这部书与其他的传记或回忆录迥然不同,它实际上不只记录了我个人的生平,也记录了一个国家的历史。

本书第一章涉及伊朗的光辉灿烂的历史和令人赞叹的遗产。次章谈到中东近代变革中的伟人之一——我父亲的鲜明个性及其卓越功绩。接着叙述我的幼年生活和在欧洲留学的情况,以及父亲为使我能胜任今天的繁重任务,给予我的特殊关怀和培育。然后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危机,伊朗遭受侵略和我于二十一岁替代父王执掌朝政。

书中叙述了摩萨台以其特有的方式管理伊朗政府期间发生的众多事件:石油工业的停滞、国家经济的瘫痪、自由火炬的暗淡乃至趋于熄灭。还叙述了我国怎样重新获得自由,怎样被选中为实际上的冷战场地,又怎样由于痛苦的教训使我产生了积极民族主义的思想。

书中扼要地谈及西方文明与我们要创造一种东西方新型关系的信念和愿望之间存在的某些隔阂;提到国家经济的发展规划、我的民主观的三项原则,以及为了履行真正的民主在我国采取的各项措施;简明地叙述了土地所有制改革和为帮助在五万个村庄里居住的伊朗农民而

采取的其他步骤，以及伊朗妇女在现代社会中负有的职责；说明了我关于伊朗教育事业的完整观点，还从政治、经济和技术等方面探讨了伊朗的石油问题。伊朗在中东的战略地位，我对巩固该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所持有的主张，也得到阐述。最后一章，略谈我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日常工作，指明伊朗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赋予国王的现实任务。

我在本书各章节叙述问题时，总是不满足于只用三言两语指出困难之所在。象工作人员的忠实可靠问题，无论在国家机关、私人企业，还是在各种联合会都是一个麻烦问题。近年来国家行政机关总的情况较之以往有很大改善，可是在许多方面仍然十分落后。在我国愚昧无知、贫穷和疾病并未根除。然而，应当记住，我们要在几年时间里实现某些先进国家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所取得的进展。

今天，世界各国对于多种矛盾的焦点中东地区，都深表关注，因为这个地区既对世界文明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又总是动乱的中心和制造事端的策源地。我认为，形势对于中东的复兴是有利的。既然伊朗已被历史多次证明是这种复兴的缔造者，那么对它说来，再次促进复兴的实现则是责无旁贷的了。

第一章 古代和现在的伊朗疆域

记得小时候,我作为王储在瑞士学习。一天清晨,那个象往日一样推着装满奶瓶的小车到学校叫卖的小贩问我:“你是从哪个国家来这儿的?”我说:“从波斯(伊朗)来的。”他说:“噢,我很熟悉波斯,它是美国的一个城市!”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最近有位从美国旅行回来的年青的皇宫官员,讲了一件在美国遇到的事。他说:“去美国旅行之前,我总想亲眼看看美国的红种人。到了那个国家后,就把这个愿望告诉了一位美国的接待员,他答复说,这件事好办,只要安排一次去红种人居住区的访问,就可以如愿以偿了。到达预定地点后,我起初感到很遗憾,因为那儿的红种人并没有戴着“好莱坞”电影向人们展示的那种羽毛冠。后来,接待员安排了一位红种人与我见面。他身穿当地土著衣饰,头戴羽毛冠,脸上涂抹着五颜六色。他用道地的英语问我:“您是哪国人啊?”我答道:“我是从遥远的地方,一个叫做波斯或叫做伊朗的国家来的。”听到说伊朗,红种人立刻绽开笑脸,用流利的波斯语说:“萨拉姆阿利空,好来叔毛切图拉斯特!”^①这种

^① 伊朗人见面打招呼的话,意即您好。——译者

情景使我大为惊愕,但很快就真相大白了。原来,这位红种人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时被派到波斯湾的美国士兵,当时美国军队曾把七百万吨的军火物资经伊朗运到苏联,加速了希特勒军队的失败和同盟国的胜利。这位红种人不仅自己掌握了波斯文,知道不少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而且还教本族的一些人学习这些文化遗产。

多数西方人,若能象这位红种人似的了解我国,知道伊朗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过何等的贡献,知道伊朗将来也会如我所坚信的那样,对世界文化和科学做出何等的贡献,那该多么好啊!每当想到伊朗未能在中东各国中享有比这更好的声誉,我就感到诧异。因为不管怎么说,伊朗在中东文化中是占有显著地位的,它将美学、艺术、文学和哲学的巨大财富贡献给西方世界。自古以来,我们给人类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和艺术,恰如今天的美国通过“四点计划”给别国以技术援助一样。

近年来,中东各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世界各地人民对了解伊朗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的兴趣与日俱增。在世界或中东地图上,伊朗是非常醒目的,它比阿拉斯加还大,其面积是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两倍,超过法国、瑞士、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和卢森堡面积的总和。伊朗的地理位置几千年来一直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和枢纽。这一点无论是在骆驼商队旅行的年代还是在有喷气式飞机和导弹的今天都是如此。

伊朗的人口按每平方公里的平均数算不算多,但它的总人口却有两千万,是澳大利亚的两倍。首都德黑兰

是世界上高速度发展的城市之一，它的人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五十万人到今天猛增两倍，达到一百五十万人。显然，大批人背井离乡迁居城市是德黑兰人口激增的原因之一，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里也是屡见不鲜的。然而，一般说来，我国首都人口增加的速度还是相当惊人的。

我国大部分地区干燥缺水，但也有不少地区年降雨量充足，那里森林茂密，稻田广阔。而较干旱地区的用水，则全靠山顶积雪的溶化。伊朗中部高原被群山环绕，水源丰富。在伊朗，除卡维尔荒漠地区之外，大都邻近山岭。从山上泻下的水经地下水渠流进农田。近来我们还挖了不少深井，据专家们估计，即使伊朗人口再增加三倍，用水也是绰绰有余的。

伊朗气候差异悬殊，四季变化因地而易，依我看这正是一个有利因素。我国人民身强体壮，酷爱举重、摔跤等体育项目。我国运动员在这些项目的国际比赛中经常名列前茅，按人口比例算能荣获更多的冠军奖，这大概不是偶然的。伊朗人民的聪明才智，则更是有口皆碑的。随着全国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可以期待伊朗人民在科学、艺术、农业、工业和商业诸方面，做出显著的成绩和宝贵的贡献。

我国的矿藏资源丰富，是举世闻名的大规模的石油生产国之一，是中东石油工业的先驱。据最近的科研调查证明，我国宛如一条漂浮在石油海上的大船。我国还拥有其他宝贵矿藏，象煤、铁、铜、锰、铬、宝石，以及硼酸

盐、硫酸盐和晶体盐等大量的化学盐。这些矿物可供大量出口，而对它们的开发和经营至今尚处于初级阶段。

我国各地的土壤肥沃。只有中部高原的卡维尔荒漠区象澳大利亚一样是盐碱地。凡是有水灌溉农田的地方，都种植着小麦、大麦、玉米、水稻、棉花、土豆、豆角、苜蓿、甜菜、甘蔗、烟草、茶叶等各种农作物，生产着白菜、萝卜、大葱、茄子、黄瓜等多种蔬菜。到伊朗来过的人，都品尝过它香甜多汁的水果，其中尤以苹果、桃、杏、葡萄、甜樱桃、李子、梨和石榴，以及柠檬、柑橘、枣和橄榄为佳。伊朗还出产哈密瓜、阿月浑子果、榛子、扁桃等各种瓜果，牲畜饲养业在伊朗极为兴盛，农民们和穿着独特的部族服装的游牧民族，在祖国的山坡、草原上放牧着成群的牛、羊、骆驼。近年来广大农村开始实行农业机械化。在后面的章节里，我将叙述在农民中业已实行的土地分配计划。

通常我们需要进口少量的食品，而我国食品的出口量却是相当可观的。特别是水果、阿月浑子果和扁桃的出口量极大。在国际市场上畅销的俄国鱼籽，主要产自伊朗，尔后运至苏联、美国和其他国家。（一位有见识的学者说过，持不同观点的人都认为哈维亚尔鱼是从里海北岸迁徙到南岸的。可是实际上这种鱼早在俄国革命以前多年，就把里海南岸即伊朗沿海一带的热水区作为它们迁徙、产卵和繁殖的更适宜的场所了。）我国丰富的渔业资源至今还远未充分利用起来。

上述情况表明，尽管我们正在为本国和世界各国人

民生产着极为有用的、有价值的产品，然而这只不过是利用伊朗人力和自然资源的开端。英国最近发来的官方报告说得好：“伊朗可能是唯一拥有最优越发展条件的中东国家。”

很多世纪以来，伊朗就是西方与中东的联结点（即使不少人忘记我国地处亚洲），来往于中国与欧洲之间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商队，常把伊朗作为交易中心。这些商队把从远东购买的丝绸、宝石和其他货物，在富足的伊朗推销，或者转而运往欧洲或其他国家。

远在发现新大陆以前几百年，欧洲人把饭撒在地上用手抓食的时候，伊朗人已经用勺和刀在雅致的绘有图案的器皿里用餐了。除中国而外，伊朗文化不愧是世界上最古老而悠久的文化。即使说我国文化在某些方面比中国更胜一筹，恐怕也不算夸口。这种文化上的优胜达到何种地步暂且不论，它和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相比，与西方文化的亲缘关系更加密切，则是肯定无疑的。伊朗曾是古代雅利安人居住过的一个地方，雅利安人是美洲和欧洲很多民族的祖先。从种族看，我们和起源于闪族的阿拉伯人截然不同。就波斯语来看也是如此，我们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英语、法语、德语和西方国家其他重要语种的渊源。

虽然在几世纪的延续中，伊朗人曾和其他种族的人结下姻缘，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后，大量的阿拉伯词汇渗入到我们的语言中来，可是我们种族的纯洁性和语言的特征都始终如一，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我在得知郁金香和风力磨原来是从伊朗传到荷兰的时候曾大吃一惊。这是一位荷兰文化随员（他是一个学者）告诉我的，所谈的事出自一位荷兰人之口，当然是无可怀疑的了。这位学者经过精细的调查研究，发现荷兰的郁金香是在伊朗生长的一种野郁金香的变种；荷兰的风力磨与在伊朗南部风行一时的那种磨别无二致。原来是荷兰首批到伊朗来的商人，见到这种风力磨，进行了仿制。

伊朗人发明了掷骰子的游戏。打马球也最先在伊朗兴起，旧时的帝王们酷爱这种运动。阿月浑子果是伊朗的著名产品。作为伊朗纯种马饲料的苜蓿也是最早在伊朗种植的。桃子是古代伊朗人从中国的天然森林里择取回来，加以培育而成的水果之一，后来他们逐渐地将桃树苗移植到地中海沿岸和欧洲。几千年来在我国的花园里争芳斗艳的各种红花，其老家也是伊朗。据说，青茉莉花、白茉莉花和水仙，也是从伊朗传到外国去的，而且现今在世界各种语言中仍保持着它们的伊朗名字。那种在伊朗是液体状态，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象冰淇淋似的成凝固状态的果子汁，几百年来一直是我国人民清凉可口的饮料之一。以“希拉”而著称的酒名，来源于设拉子^①这个词，在中世纪阿拉伯人将它推销到西班牙，并传授了酿造这种酒的方法。

伊朗人民在科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是有目共睹的。譬如，太阳钟是伊朗人创造的，第一座天文台是在我国建

^① 设拉子：伊朗南部的名城，是著名大诗人萨迪的故乡。——译者

成的，今天世界闻名的计时表盘也是伊朗人发明的。大量的史料证明，早在一千年前，伊朗的著名医生和学者伊本·辛纳就已经了解到盘尼西林的特性，并在自己的医疗中加以运用，这似乎难以令人置信。但这位学者在其名著《医典》里——在中世纪的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被公认为最有权威的一部医书，书中的药方流传至今——记载着把覆盖在面包上的霉用来作为一种药剂，治疗创伤。他叮嘱医生要在潮湿的面包上培植这种霉，然后再小心地从面包上收集起来，敷在伤口上。此后几百年，英国学者亚历山大·菲尔明柯爵士才给这种霉起名叫青霉菌，并重新研究和试验这种霉的医学特性，最后才制作出名叫盘尼西林的药品。目前这种药畅销国际市场，使千百万生命垂危的人获得新生。

伊朗更大的声誉在于向世界展示了施政治国的原则和方法。对此许多西方人则一无所知。把整个国家分成若干省份，每个省由一名省长(总督)负责管理，这种制度是伊朗首创的。没有这样一种体制，管理幅员辽阔的国家是不堪设想的。在全国修筑四通八达的驿道，也是首先在伊朗实施的。早在罗马帝国建立以前很久，我们就使用公差把各地区相互联系起来，每隔一定距离设置一个驿站，王室的公差骑着每到一站调换一次的快马，十五天内即可把信件从辽阔祖国的一端送到另一端。通过在山顶修建的瞭望塔点燃篝火或发出其他信号，可以把信息更迅速地传达到几百法尔森^①以外。

^① 法尔森：伊朗的度量单位，一法尔森相当于六公里。——译者

伊朗是最早铸造硬币的国家之一。大流士大帝^①铸造的达利克金币是古代各国的流通货币。有趣的是达利克金币的重量与英国金币镑相当；而大流士银币又和英国的硬币先令重量一样。在统一度量衡方面我们也走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前面。这种度量衡简单易行，促进了波斯帝国的内外贸易。同时我们还推行了完整的、统一的会计制度，逐渐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楷模。第一个取得妥善治理幅员辽阔的大帝国经验的国家便是伊朗。本书的读者想必是读过罗马帝国历史的。然而远在罗马帝国问世前几百年，辽阔的伊朗王国就十分强大兴盛了。它在征收赋税、兴办公共福利事业、组建军队和设立国家机构等方面——后者是当今世界大国国家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与政策。

我国是琐罗亚斯德教^②的摇篮，是包括十叶教在内的其他宗教的发源地。十叶教是伊斯兰教的一大分支，我本人对它笃信不移，书中我将多次提及它。公元前六世纪，琐罗亚斯德在伊朗创立了琐罗亚斯德教。正如知名的神学教授威廉·杰克逊所说的：“在古代，除犹太教和基督教之外，再也找不出象琐罗亚斯德教那样正确、那样高尚、伟大的宗教了。在琐罗亚斯德教圣经《阿吠斯塔》里记载的有关肉体的复活、灵魂的存在、救世主的降临以及对永生灵魂善行的奖赏和犯罪的惩罚等等，给人

① 大流士大帝（公元前522—458年），古代伊朗奴隶社会时期的著名皇帝。——译者

② 琐罗亚斯德教：又译祆教，即拜火教。——译者

类精神的慰藉是绝无仅有的。”

在伊朗盛行的另一个宗教是摩尼教，其开山祖师是公元三世纪的摩尼。摩尼有志从以往流行的所有教派中抽出一般的普遍的真理，结果创立了建筑在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和基督教信仰原则基础上的一种特殊宗教。他大概是综合各教派的理论，创立宗教法典的第一人。

伊朗神学家们在传播宗教教义方面的贡献自不待言，伊朗人对神秘文学、尤其对在伊斯兰教出现后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苏菲主义的解说，更是尽人皆知的。苏菲流派的作品，引起西方各国著名的东方学者的重视，对他们在作品中表达出来的和在故事、格言里用优美的文学语言述说的那种对世界人民的热爱和善良愿望倍加称颂。不言而喻，我们的诗歌文学，特别是菲尔多西、哈菲兹、萨迪、姆拉维和哈亚姆等著名大诗人和其他文学大师的杰作，早已名扬四海。剑桥大学的一位学者说得好：“波斯文中文学作品之丰富，是任何其他语言文学作品所无法比拟的。”读过伊朗文学作品原著的其他西方学者，无不赞同这种观点。

这里略微回顾一下我国悠久的历史是理所当然的。远在石器时代，里海南岸和相当今天伊朗所处的地域就有人类居住了。在首都德黑兰附近发现的古代村镇的遗址，经考古学家验证，是公元前二千年的村镇废墟。在我国的重要城市之一卡善近郊出土的名叫西尔克村的古迹，据考古专家们推断，是公元前五千年遗留下来的。显然，在很古的时代，伊朗高原的人类就已摆脱了游牧生活

和为猎取野兽、食物而东迁西移的状态，定居在村子里从事农田耕作和牲畜饲养。

一九五八年，伊朗和美国的考古学家在我国西北的阿塞拜疆省哈斯鲁村附近，挖掘出一只异常雅致、图案优美的金杯。据说这是考古学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发现之一。这只金杯和那个从中发现杯子的古老城堡的遗址，揭示了一个国家存在的秘密，它的历史至今还是个谜，只知道这个国家在公元前九世纪遭到毗邻部族的侵略而消亡了。这件事说明，我们对于原始时期伊朗文明的了解只是管见所及罢了。

约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前，新兴的雅利安族人与定居在伊朗高原的其他部族相汇合，成为我们的老祖先。雅利安人是否从中央俄罗斯的南部地区迁徙到伊朗的，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定论。可是不管怎样，雅利安人的名字确实与我国融为一体了。世人皆把伊朗称为雅利安人的家园。伊朗的雅利安人后来分为两个主要的部落，即米底和帕尔斯。在《陀拉特》^①里提到过这两个部落。米底人大部分居住在现今伊朗的西北部，而帕尔斯人则生活在靠南一带的地区。在雅利安人这两个分支中，起初是米底人较为开明，他们拥有马匹、牲畜、羊群、轮车、战车和警犬，还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公元前六世纪，即罗马城奠基大约一百五十年之后，米底人征服了帕尔斯和其他部族，创建了庞大的帝国，定都在西北部的哈克姆塔纳，

① 《陀拉特》：先知摩西著的犹太人的经典，世称摩西五经，包括圣经中的最早五篇：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译者

即今天的哈马丹附近，读者可参看书中的附图。帕尔斯虽说是米底的藩属，但它也有自己的君主，其中出身哈赫曼内什族的塞路斯一世、即居鲁士建立了哈赫曼内什王朝^①。从公元前五五九年至五二九年，在位执政的居鲁士大帝，是一位世界史上精明强干的伟人。他攻占王都，推翻了米底朝廷。这样，他就把相当现今伊朗整个疆域的大片领土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建成了世界上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按照某些人的看法，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这样的国家。）在完全控制伊朗全境之后，他便决心创建一个广袤的大帝国。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在居鲁士和其子冈布吉^②执政时期，伊朗王国成为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最昌盛的大帝国。正象柯恩博士在《商队》一书里所描述的那样：哈赫曼内什帝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名副其实的大帝国，因为在这个大帝国里，各藩属国的朝廷是在独一无二的国王统治下管理着各自的国家。虽然青铜器时代的埃及、苏美尔·巴比伦和中国等也有中央朝廷，可是这些国家缺乏伊朗人用以加快通讯联络的那种行政机构。而具有这样一种完整的行政机构，对于管理幅员辽阔的疆土是必不可少的。在中国类似上述机构的出现，乃是哈赫曼内什王朝开国三百年之后的事了。

居鲁士大帝所创建的伊朗王国，不仅建立在武力征讨的基础上，而且是以国际正义和信守礼义为治国之本

^① 哈赫曼内什王朝：又译阿契美尼德王朝，或译阿黑门尼德王朝。
——译者

^② 冈布吉：又译冈比斯，或译冈比西斯。——译者

的。它治下的藩属国的规章制度，人民的权利和风俗习惯均得到尊重。由此看来，第一个伊朗大帝国，岂不有点象二千五百年后的今天，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联合国组织吗？

继冈布吉之后的伟大国王中，应该提及大流士一世和赫萨亚尔萨^①。两位君主在治理庞大的国家中所表现出的卓绝才干、豁达明智，被文明世界誉为我国人民的表率。在公元前五百年当中，即伊朗王国的全盛时期，我国的疆域包括今天中东地区的大部分（除阿拉伯半岛之外）和其他广大的地域。它东临印度的桑德河，北接俄罗斯南端，西至地中海沿岸一带，即今天希腊的大部和整个土耳其、塞浦路斯和埃及。

伊朗王国同公元前一一五年达到全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一样，其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可是在大约连续二百年中，文明世界的绝大部分统统在它的版图之内。人们从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公元前五二一至四五八年在位执政的大流士一世的陵墓碑文中，可以看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帝国究竟意味着什么。碑文是这样的：“我，大流士，伟大伊朗的国王，和各藩属国的王中之王，长期以来统治着一个辽阔无边的世界。”

公元前三三一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伊朗，可是八年后他便与世长辞了，希腊人未能维护住自己的王权统治。亚历山大手下的将领塞琉古^②权势增大，在帝国

① 赫萨亚尔萨：又译阿塔薛西斯一世，或译阿塔罗斯一世。——译者

② 塞琉古：又译塞流卡斯。——译者

的一隅建立起一个国家，持续了一百年，伊朗也在其管辖之内。虽然塞琉古王朝可算作希腊人占领伊朗的产物，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这些希腊的入侵者承袭了伊朗传统的风俗习惯。他们和伊朗妇女通婚，并起用伊朗人参与朝政，结果到头来被伊朗的文明完全同化了。

大约在公元前二四八年，伊朗东北部雅利安族的一个开明部落帕提亚人，推翻了塞琉古王朝，建立帕提亚王国^①，统治伊朗达四百多年之久。同以前一样，发达的伊朗文化对帕提亚人影响极深，以至使他们欣然接受伊朗人的风俗习惯，皈依伊朗人信仰的宗教，因袭了哈赫曼内什王朝的传统礼仪。帕提亚王朝时期，伊朗民族主义精神发扬光大。在这段历史时期内，伊朗和罗马之间连年战争，历时约三百年。罗马帝国竭力向东方扩展，遇到帕提亚王国的坚决反击。帕提亚人因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骑兵队——堪称中世纪欧洲骑士的先驱，所以长时期内，在军事技术上遥遥领先。罗马军队望尘莫及，只好抄袭帕提亚人的军事创造。应当指出，罗马人抄袭伊朗的军事技术，这并非第一次。早先，赫萨亚尔萨与希腊人作战时，使用过架在船上的浮桥。四百年后，这种发明成为恺撒和汉尼拔的拿手好戏。一般说来，当时伊朗和罗马两个帝国之间的边界线维持在今天流经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斯河一带。伊朗是当时能够在长时间里抵挡住罗马军队东征的唯一国家。穷兵黩武的罗马人，尽管发动了连年战争，但始终未能实现征服别国的野心。

^① 帕提亚王国：即我国历史书上记载的安息国。——译者

约在公元二二四年，伊朗的一位首领阿尔达西尔，他是伊朗南部诸省即法尔斯的君主，帕提亚的藩属国王，举兵起义，他与帕提亚人大战三次，最后于公元二二六年的浴血战斗中，杀死帕提亚国王阿尔达旺，建立了新的王朝，即萨珊王朝。萨珊王朝的统治历时四百余年，即相当于美利坚合众国历史的两倍（从基督教徒登上新大陆至今，或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执政起到现在）。萨珊王朝的繁荣昌盛比起哈赫曼内什时代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的文化艺术再次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的发明创造给伊朗人增添了无上荣光。琐罗亚斯德教，这个在哈赫曼内什朝代生气勃勃、影响深远的宗教，再次广为流传，发展成伊朗的国教。萨珊时代的建筑异常坚固，当时修建的富丽堂皇的宫殿、寺庙和城堡的遗迹，至今尚在。

萨珊王朝最伟大的国王之一，胡斯鲁·阿奴希尔旺^①（公元五三一——五七九年）在全国乃至边境以外，修路架桥，开设供商队夜间住宿的旅店。他修建大型水坝，开凿地下水渠，引高山之水浇灌农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萨珊王朝在与罗马帝国的战争中多次取胜。沙普尔一世曾在战场上俘获罗马皇帝瓦列里安。可是一般说来，两国的边界线变动不大，仍保持帕提亚王朝时的状况。北面和东面的国境线则不然，阿奴希尔旺将伊朗版图向北扩展到俄罗斯境内，向东推进到今天阿富汗境内。

^① 胡斯鲁·阿奴希尔旺：又译库斯老·奴细尔汪，欧洲人称他为霍斯罗斯。——译者

他进军阿拉伯半岛，击溃阿拉伯军队，长驱直入到阿拉伯半岛底端的也门。

自从罗马人于公元四世纪皈依基督教之后，伊朗与东罗马帝国之间的战争则具有圣战的性质，致使亚美尼亚一带成为两国互相争夺的地区。

这期间，日益强大起来的土耳其人，时而与伊朗搞联合，时而和罗马结盟，战争的结果使三国都精疲力尽，元气大伤。伊朗的国家机关和琐罗亚斯德教的神职机构里，充斥着骄奢淫佚。由于他们腐败无能，结果招致了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进攻，伊朗王国军队被彻底击溃了。

阿拉伯人比以往的入侵者更快地领悟到，伊朗人的民族精神坚如磐石，是不可征服的。在琐罗亚斯德教趋于消亡，其皈依者所剩无几之时，伊朗文明却俨然是胜利者。正如阿拉伯学者伊本·赫尔东和玛斯乌迪承认的那样，伊朗文明优于阿拉伯文明，所以，看到伊朗的官吏、科学家和工业家掌管当时阿拉伯朝廷的机要工作，就值不得大惊小怪了。

伊朗人在宗教信仰上，也未曾完全屈服于阿拉伯人正统教的淫威，他们从民族感情出发，逐渐皈依十叶教。十叶教从不承认逊尼教崇仰的、继伊斯兰教始祖穆罕默德先知之后的头三个哈里法，却认为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本·艾比塔里布是伊斯兰教先知的继承人，阿里的儿子，即十叶教第三任教长，是在与阿拉伯人作战时被杀戮的伊朗国王女儿的丈夫。总之，今天大部分伊朗人信

奉十叶教,然而我们并不看重伊斯兰教内部的派系纠纷。反之,我们自认为是拥有四亿多信徒的伊斯兰教大家庭中的一员。伊斯兰教是仅次于基督教的世界第二大宗教。

在从公元六五一年到一二五八年的六百年中,阿拉伯只是伊朗名义上的统治者。随着伊朗人民反抗斗争的逐步展开,在各地涌现出一批对阿拉伯哈里法政权^①阳奉阴违的伊朗总督。他们日甚一日地增加自己的独立性,因此,阿拉伯对伊朗的统治,其实不过二百年而已。这当中在伊朗出现过几个王朝,其中有的繁荣而昌盛,如伽色尼王朝,它的版图曾延伸到印度的大部分地区。这六百年,在伊朗执政的国王中,赞助波斯文学的不乏其人,正是在他们的支持与鼓励下,波斯语言和文学获得了新的发展。伊朗著名的大诗人菲尔多西,就是这个时期伊朗文坛上一颗光彩夺目的明星。

公元十一、十二世纪,塞尔柱(中亚细亚人)王朝时期,伊朗再次成为统一的大帝国。塞尔柱人远征叙利亚和埃及,其强大兴盛与古代伊朗相比毫不逊色。塞尔柱人推崇文化艺术,这时期伊朗的科学技术兴盛发达。著名的诗人、数学家、星象学家奥姆尔·哈亚姆是受到塞尔柱君王爱护和垂青的无数学者之一。该王朝的末期,伊朗遭到蒙古人的入侵,这对我国和我们的中东邻国来说,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历史事件。有时我感到诧异,为什

^① 哈里法政权:哈里法含有代理人、先知的继承人和教长等意。古代伊斯兰教国家“政教合一”,执政者也是宗教首领,所以被称为哈里法政权。
——译者

么人们总是把蒙古人首领成吉思汗（他约在公元一二二〇年侵占伊朗）描绘成神话般的人物？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烧杀掠夺、疯狂残忍。正是他和他的士兵把我国繁华的城镇夷为平地，惨绝人寰地屠杀了我们千百万无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

蒙古人在伊朗的统治历百年之久。随之而来的是跛子帖木儿的入侵。帖木儿是中亚细亚土耳其族的一个首领，他的祖先原是蒙古人。他虽被认为是历史上传奇式人物之一，可是他罪恶昭著不亚于成吉思汗。帖木儿及其继承者在伊朗的政权，一直维持到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为止。这个掠夺成性的民族残酷无比，我国数百万人丧生于他们的屠刀之下。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文明却奇迹般地得以继续，科学和艺术获得了发展。当时在伊朗兴建了不少天文台；数学科学极为发达；伟大的诗人萨迪和哈菲兹创作出流芳百世的文学作品。总之，我们的文明再次战胜了侵略者的淫威。在我国文明的熏陶下，他们对过去的胡作非为感到后悔，转而采取赞助与支持科学研究活动的态度，并修建了雄伟壮观的建筑物，某些建筑物的遗迹一直保存到现在。我们的语言和文学传播到印度，在五百年的时间里，波斯语被公认为印度的文学语言，人们兴致勃勃地阅读伊朗的文学杰作。在印度执政的蒙古君主把波斯语作为宫廷和办公用的官方语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英国人统治印度时为止。目前，印度半岛数百万人使用的乌尔都语与波斯语关系密切，它吸收了大量的波斯语汇。

公元一四九九年^①英雄的伊朗人民驱逐了外国侵略者，伊朗王国的另一个重要朝代、即沙发维王朝诞生了。有些学者认为沙发维国王是先知阿克拉姆的后裔，然而实际上沙发维王朝从执政之初就把十叶教奉为国教，极力予以巩固和推广。

公元一五八七年至一六二九年在位执政的阿巴斯大帝，是沙发维王朝最著名的帝王。阿巴斯大帝执政期间，伊朗人民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强，是几百年当中绝无仅有的升平景象。他的豪华都城伊斯法罕，驰誉整个文明世界。至今在这座城市里，仍可看到当时富丽堂皇的建筑。他招募国内外熟练的精工巧匠，推动了我国地毯编织业的发展。沙发维时期的丝织地毯、天鹅绒锦缎、金属冶炼、制陶工艺、画砖彩瓦，特别是沙发维时期的建筑，至今是无与伦比的。阿巴斯王热衷于兴修驿道。他象过去的居鲁士大帝和后来我父亲那样，在全国肃清了盗匪的拦路抢劫和肆意骚扰。在英国歇尔利兄弟的帮助下，他首创伊朗的新式军队，摧毁了封建割据的基础。

阿巴斯王是一位坚强有力的君王，遗憾的是，他容不得人，即使对王室家族也百般嫉恨，对待他们的手段毒辣而残暴，致使他的子孙后裔不能成材，担负不起执掌国家和确保王位的重任。公元一七二二年，伊朗终于被阿富汗军队攻占。虽然入侵者没过多久即被赶出国境，可是在一段时期内使伊朗陷入民穷财尽的困难境地。

^① 此处作者用伊斯兰教纪元(即回历)，回历八七七年相当于公历一四九九年。为方便读者，一律把回历换算成公历，下同。——译者

公元一七三五年，平民出身的伊朗首领那狄推翻摇摇欲坠的萨法维朝廷，建立了阿弗沙尔王朝。以伊朗的拿破仑而著称的那狄王一举将阿富汗人、土耳其人和俄罗斯人从他们所占领的地方赶了出去，创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再次巩固了伊朗的统一。他出兵远征印度，进军德里城下，然后凯旋而归。

此后的一个时期，即桑德王朝时期，伊朗默默无闻，没发生什么大事。到一七九四年，一个出身于里海东部土耳其族家庭的伊朗人建立了恺加王朝。恺加王朝在一九二五年被我父亲推翻之前，虽然一直统治着伊朗，然而它毕竟是我国历史上最腐败无能的朝廷之一。恺加的帝王们一筹莫展地眼看着外国势力在伊朗渗透。他们政治上的懦弱助长了外国人干涉我国内政的气焰。他们不加限制地放手让神职人员干预国事，又无力弹压盗匪和部族的叛乱。恺加王朝的最后几位国王，骄奢淫佚，昏庸无能，一味追求耗资巨大的国外旅行，致使国家一贫如洗。为了维持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只好伸手向外国人借债，成为寄人篱下的可怜食客。

我并不想过分尖刻地对恺加的帝王们评头品足，以致使人看来我似乎在偏袒我父亲对他们采取的态度和行动。我认为，恺加王朝的某几位国王，还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例如恺加王朝的奠基人阿加·穆罕默德王，就是一位勇敢卓绝的豪杰。尽管他以残忍奸险而著称，但终究是他再次实现了伊朗的统一。纳赛尔丁王是第一位旅行欧洲，写出饶有风趣的游记的伊朗国王。当他第一次看

到奔驰在铁轨上的火车时，便暗自想道：大概是马匹藏在里面拉着它跑的吧？而当他了解到其中的奥妙之后，遂对火车产生极大兴趣。他邀请比利时人在德黑兰和列依城之间修筑了一条长九公里的铁路。他还下令让宫廷贵妇穿上芭蕾舞演员的衣裙，只是这种优雅的兴致未能如愿以偿。

我知道，东西方的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恺加王朝算不上伊朗的一个显赫朝代。然而，不可忽视，第一个与俄国和英国所推行的殖民政策相周旋的伊朗王朝正是这个王朝。诚然，不能否认我父亲礼萨王在对付帝国主义威胁时表现得更加精明强干。

应该指出，在恺加王朝统治的漫长岁月里，欧美一些国家正飞速地向前发展，而伊朗却在原地踏步，甚至于走了下坡路。正当需要跟上文明世界的前进步伐，促进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时候，恺加的帝王们却身在其位而不谋其政，是极大的失职。

我父亲是当今巴列维王朝（巴列维是古代帕提亚王国一个朝代的名称，也是波斯语的古代名称）的创始人。他深切地感受到国家要发展的必要性，因此在伊朗的经济和社会诸方面进行了彻底的变革。我在一九四一年继承王位之后，坚持推行父王的改革方针，使伊朗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我将在以后的章节里给予叙述。

今天，我国是东西方文明相结合的体现者。公元前三三〇年，亚历山大的军队占领伊朗，将我们豪华壮丽的

都城塔赫特加姆希德^①毁之一炬之时，伊朗王国的第一个王朝已经过去几百年了。目睹过罗马和塔赫特加姆希德废墟的人，无不赞叹比罗马更为古老的塔赫特加姆希德的雄伟壮观。而今天就在这废墟的近旁，标志着现代伊朗巨大发展的事物比比皆是。

伊朗中南部的美丽城市设拉子就座落在塔赫特加姆希德的附近，在那里人们可以坐在长满红色蔷薇和橙树的花园旁，欣赏着生活在六百年前的哈菲兹的永恒诗篇。这些诗篇至今仍是那样的甜美清新，散发出沁人肺腑的芬香。在设拉子碧蓝的天空下，聆听着诗人们为之倾倒的、也是他们描述不尽的夜莺的悦耳啼鸣，给人以心旷神怡之感。在这片令人陶醉的自然景色中，人们可以看到设拉子的一座医院。它是中东最现代化的医院之一，那里有加工消毒水的设备。（应该说，建成这座医院，要感谢一位心地善良的伊朗人，他将自己在纽约挣来的钱，用于国家的社会福利事业。）还准备在设拉子按照古代的建筑风格修建一所新的大学。它的教学方法要和美国各大学的教学方法一样。

在阿巴斯国王的繁华都城伊斯法罕，至今还在用牲口磨面粉。（按照旧的传统习惯，磨面时把牲口的眼睛蒙上，以免它在转圈推磨时头晕。）在市內可以观赏到古代银器工匠的杰作。人们会向矗立在著名的国王广场四周

^① 塔赫特加姆希德：又称波斯波利斯，是哈赫曼内什王朝的著名都城之一。——译者

高大而精巧的建筑物，投以惊愕的目光。以往阿巴斯大帝就在那里观赏打马球的游戏。今天的伊斯法罕，已拥有许多新式的由外国工程师和专家管理的纺织工厂。为了繁荣城市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举目皆是。在德黑兰城外，仍然可以看到骆驼商队，他们把各种货物从遥远的地方运到城市。月光明媚之夜，商队远道而来，骆驼铃声响起，展示出一种令人神往的诗一般的境界。人们可以坐在百花盛开、果实累累的德黑兰周围的公园里，于潺潺流水之旁，倾听鸟儿美妙的歌唱和瀑布的澎湃之声，悠然远眺篠悬树林那一边白雪皑皑的厄尔布尔士山峦。人们还可以到市内我父亲建造的现有一万一千名学生的德黑兰大学去，和医学系学生们一道在电视机的屏幕前，清楚地观看大学附属医院里正在进行的外科手术。当你到具有国际水平的崭新而巨大的德黑兰机场去迎接客人时，会经过宽敞的大街，两旁有繁华的商店和新式的展览馆，会遇到衣饰打扮各不相同的女士，她们或身穿巴黎最摩登的衣裙，或披着黑纱斗蓬。

在后面的章节里，将述说我努力创造一个把古老昌明的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的国家的理想和愿望。

如上所述，我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在种族和语言上与西方各国关系密切，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伊朗是西方新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今天我们应该谨慎地吸取西方文明的新成果，以便促进我国的发展。我们将东、西方的文明相结合，创造一个崭新的国家，这并

不是荒诞的梦幻。伊朗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是东西方的汇合点，在东西方文明的结合上，也应该具有同样的地位。

第二章 父王的改革

当回顾我国悠久而宝贵的历史时，某些特点引起了我的重视。譬如伊朗人的个性自由就十分鲜明突出。有些人把德黑兰出租汽车司机的倜傥不羁看作是这种个性自由的体现，不是没有道理的。（出租汽车司机罢工的那天，德黑兰陷入死一般的沉寂。）毫无疑问，在我国上千年的历史中，这种个性自由极其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出来。外族的历史性入侵和短暂的统治以及其他重大事件，从来未能阻止一个伊朗人表达自己内心的愿望。可以说伊朗人的这种天性与法国人极其相似（法国出租汽车司机的个性自由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伊朗号称“亚洲的法兰西”，便不足为怪了。在这方面我们与美国也是大同小异。正是这个缘故，使得伊、美两国人民能够和谐相处。每年去美国的上千名伊朗学生，都对在那里居住和求学感到心满意足。在伊朗工作的美国人，同样自由自在地参加我国人民的社会生活。

伊朗人的好客是久有盛名的。凡是想了解我国人民道德品行的人，只要到藏有关于伊朗的各种书籍的世界著名的大图书馆去（例如大英帝国博物馆图书馆，美国

国会图书馆), 查阅游览过伊朗的外国旅行家们所写的游记, 便可一目了然。今天我们感到自豪的是, 伊朗人这种可贵的好客品德, 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反而比以前更突出了, 甚至在我国的乡村都显现出来。

美国和伊朗另一个相似的地方是几百年以来它就摆脱了流行于某些国家的阶级矛盾和种族冲突。在我国确实有些人享有特权, 而另一些人则没有, 两者之间的差距极大。然而, 正象在美国那样, 伊朗社会中、下层阶级的出类拔萃者总有可能登上显赫地位。在这方面我父亲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此外, 伊朗历史上的无数事例都表明, 许多大名鼎鼎的帝王将相、学者、诗人和作家, 皆出身于社会的下层阶级。

我们从不主张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 恰恰相反, 一贯赞助不同种族和宗教之间的亲善友好, 并存共荣, 并把自己的国家作为其他国家被压迫者的庇护所。往日, 居鲁士大帝就是这么做的。他于公元前五九七年战胜巴比伦后, 释放了从耶路撒冷俘获的犹太基督教徒。这些基督教徒携带自己的圣物返回巴勒斯坦, 重建耶稣教堂。正如圣书《陀拉特》所记载的那样, 这些被释放和得救的犹太人用居鲁士国王馈赠的金银财宝重新修复了他们的礼拜堂。

伊朗国王叶兹吉格德一世曾于公元四〇九年颁发了一个敕令, 准许基督教徒在整个伊朗王国管辖范围内, 公开地作礼拜。后来, 当罗马人进军亚美尼亚时, 我国成为亚美尼亚移民的避难所。在近代,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

革命前后，也有成千上万的俄国基督教徒，不堪布尔什维克的恐怖和残暴统治而离乡背井逃至伊朗，受到我国人民的殷勤接待。

虽然过去有些不负责任的宗教狂热者，曾加害于弱小的宗教，然而总的来说，我们对弱小宗教和少数民族还是以礼相待的。在这方面与许多西方国家比较，我们问心无愧。对此，西方的历史学家大概不会持异议吧。我认为，对不同宗教和民族采取友好和睦政策，乃是发展文明事业的基础。

如前所述，伊朗在历史上不仅以骁勇善战著称，而且更善于发挥文明的作用和影响。我们以文明为武器常常打败入侵者，就是说，用文明影响他们，进而开化之。即使我们有时在军事上受挫，但在文化上却永操胜券。

如前所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我们在行政管理、军队组建、贸易、经济、科学、文学、手工艺和建筑等诸方面都遥遥领先。不少伟大的伊朗国王，既是庞大帝国的统治者，又是科学、艺术和工业发展的鼓舞者和支持者。

当然不应忘记，我们这种领先地位是建立在宗教信仰、道德和精神力量的基础上的。正如第一章里指出的，在伊斯兰教问世之前，伊朗伟大的先知琐罗亚斯德在谈到灵魂的永生、善与恶的不断搏斗时，就传播了某些基督教的信条。他指示自己的门徒要严守三条神圣的箴言——善良的思想、善良的言论和善良的行为。大流士大帝经常地强调要诚实，反对撒谎。公元前五二一年，他说出了永恒的真理：“我热爱正义，厌恶犯罪，也不满意社会上

的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压迫。”前面提到的萨珊王朝的开国皇帝阿尔德希尔一世说过：“没有军队不会有力量，没有金钱就没有军队，没有农业得不到金钱，没有正义就没有发达的农业。”萨珊王朝的伟大国王胡思鲁·阿奴希尔旺，虽说为人过于严厉，但在司法方面铁面无私，历史上号称“主持公道者”。至于他为了使受欺凌者申诉方便，在皇宫外边设置公正铃的故事，以及一头牲畜不堪其主人的虐待而敲响公正铃上诉的传说，早已家喻户晓了。这位国王对基督教徒亲善异常。他在宫廷里盛情款待一批遭受罗马皇帝迫害的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派的学者，让他们长期侨居伊朗，直到他从罗马皇帝那里获得绝不加害这些哲学家的许诺，才把他们平安地遣返本国。阿奴希尔旺对基督教徒的态度，真可谓和蔼可亲之极。

综上所述，充分说明，我们伊朗人在长时期内，清晰地展示出那种为世界所必需的优良道德品质。

尽管如此，应该说在我父亲执政前的伊朗，正经历着十分艰难和动荡不安的岁月。我们以往在国家管理、行政组织、科学、文学和艺术等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我们对于社会的特权阶级对下层阶级的欺压不再感到忧虑不安，从我们身上已看不到那种爱国、勇敢和虔诚的品德，人们不再崇尚诚实和忌讳谎言。因此为了理解我父亲所遇到的并且极其成功地改变了的那种社会状况，必须简略地回顾他执政前的一段时期。在那段时期，外国对我国内政的干涉日甚一日。国家的统治者昏庸无能、优柔寡断，政策摇摆不定，朝政管理

无方。

公元一八〇七年，恺加国王法特赫·阿里与法国政府签订了一个条约。当时法国皇帝拿破仑企图利用签订条约之便经伊朗染指印度。该条约规定，法国政府向我们提供弹药和装备，并负责训练我们的军队，以便与六年前侵夺我国格鲁吉亚省的沙皇俄国相对抗。从一六八二年至一七二五年间统治俄国的彼得大帝时候起，俄国政府总是竭力向南方扩张，妄图取得波斯湾的热水带和沿岸港口。后来，拿破仑与俄国修好，放弃征服印度的计划。这期间，我们为了从俄国手中收复格鲁吉亚省，遂调兵遣将，征讨俄军，结果遭到惨败。根据一八一三年签订的古利斯坦和约，俄国不仅强制我们割让格鲁吉亚省，还把另外八个省抢走，甚至连我们在里海沿岸配备军舰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俄国人对印度垂涎三尺，这引起了英国人对具有战略地位的伊朗、这个俄国天然通道的注意。因此，一八一四年，英国人同我们签订孟买条约，实际上是针对俄国人缔结了一个防御同盟。据此条约，联合王国政府在俄国贸然进犯伊朗时，有义务向我们提供军事援助或财政援助。

一八二六年伊朗与俄国再次宣战。英国政府拒绝提供必要的援助，只在伊俄之间斡旋调解。由于军火物资不足，又缺乏战争准备，伊朗被迫停战言和，与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土库曼恰伊协定。根据一八二八年缔结的这个协定，伊朗的部分领土划归俄国版图，并规定伊方支

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出让贸易特权等。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人表面上愿意帮助我们恢复与阿富汗接壤的东部各省的统治，实则是蛊惑我们与阿富汗宣战。结果，在我们和把阿富汗视为确保印度的盾牌的英国之间于一八五六年产生了为期不长的敌对行动。这时的俄国人，借助土库曼恰伊协定，不仅攫取了我国北部地区，而且越来越加强它在我国东部地区的渗透和控制。

我国日甚一日地成为俄国和英国经济和政治竞争的牺牲品。应该说，这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恺加的帝王们为应付皇宫挥金如土的巨大开销，不惜把各种贸易特权租让给外国人。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一八七二年给予英国臣民尤里乌斯·D·路透男爵的租让权。根据该租让权，路透男爵获得了在伊朗铺设铁路、开办电车的专利权长达七十年，同时还取得了建筑公路、兴修水利、开采矿藏、开设工厂、敷设电报线和征收关税等专利权。后来国王慑于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俄国人的压力，只好废除给路透的租让权。为了抚慰路透，允许他用英国人的资本创办银行。这个银行拥有长期发行伊朗钞票的垄断权。此外，还给路透各种矿藏其中包括石油矿的勘探权，虽然他事实上并未从石油开采权中捞取什么物质利益。

英国人在伊朗铺设了电报线，把它控制在手中。并独占了伊朗唯一通航的河流——卡伦河——的航行权。烟草的垄断权也出让给一个英国臣民。只是迫于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的强烈反对才予以废除。

在此期间，俄国人在我国的势力有增无减。纳赛尔丁王允许他们组建一个由俄国军官指挥的伊朗哥萨克旅。在外国政府操纵下的这个旅，不久即成为伊朗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一八八八年，一位俄国臣民取得了里海伊朗沿岸的渔业租借权。一八九〇年，俄国银行在德黑兰开张，如同上述的英国银行一样，它也拥有钞票发行权。然而俄国人贪婪无止，一再向国王发放贷款，借以扩大影响。就是说，他们以贷款为诱饵，伺机牟取更多的商业租让权。就在这时，俄国人和稍后的其他西方列强，迫使伊朗接受了领事裁判权。对在伊朗境内犯罪的外国人，伊朗政府无权过问。

恺加帝王们的胡作非为，终于激怒了人民，他们行动起来。民主立宪派应运而生。一九〇六年六、七月间，近万名商人和立宪主义者在英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花园里举行避难集会。事实上就是以罢工的形式组织起来，反对恺加王朝及其腐败的统治。与此同时，德黑兰部分开明的宗教人士离开首都到古姆城举行避难集会。国王迫不得已承诺改革内政。两个月之后，他颁布了立宪命令。

民主立宪派除了要求内政改革之外，还要求国王阻止俄国人的渗透和煽动。有些人借题发挥，说什么英国人鉴于民主立宪派是反俄的，所以才给他们撑腰打气。然而依我之见，英国人确是真心实意地赞助在伊朗建立宪制政权。没过多久，即在一九〇七年，俄国和英国签订了关于在伊朗、阿富汗和西藏等地划分各自势力范围的

协定。这使伊朗民主立宪派大为沮丧。在这个协定中，虽然双方允诺尊重伊朗的领土完整和独立，但它却把伊朗划分为它们的势力范围。英国人保证在完全属于俄国人势力范围的我国北部地区不企求任何商业租借权，并阻止其他国家在上述地区取得这种权利；俄国则相应地在实际上属于英国人势力范围的面积较小的我国东南部地区，承担同样的义务。对于两国势力范围之间的中间地带，协定没有具体地明确各自的活动界限。两国在中间地带所拥有的租借权（其中包括一九〇一年给予名叫达尔赛的一个澳大利亚籍英国臣民的重要的石油租借权）任其自然保留下来。而实际上，英国人在该地区的活动比俄国人积极得多。

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结成同盟的英俄两国，当时就已感到新兴的强大的德国的威胁，都希望通过一九〇七年的协定，减缓它们之间的激烈竞争，以便有助于它们携起手来对付共同的敌人。然而就伊朗人看来，上述协定则是鲸吞伊朗的前奏。总之，上述协定并未使它们如愿以偿。英俄两国一如既往地在我国争权夺利。这期间伊朗的民族主义者相互倾轧，无力支持于一九〇六年召开的国民议会。如果说穆扎法尔丁王对伊朗的立宪运动态度消极，那么他的儿子穆罕默德·阿里·米尔扎则是立宪运动的死敌。后者决心借助于俄国的一臂之力，重建专制独裁政权。为达此目的，他采取了三次重大行动。第一次行动由于民主立宪派的武装抵抗而失败；第二次行动在一九〇八年六月，伊朗哥萨克旅的俄国指挥

官奉令炮击议会大厦，国王乘机解散了议会。穆罕默德王及其俄国代理人，视伊朗人民的力量如草芥，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翌年，民主立宪派就击溃了哥萨克旅的武装力量。穆罕默德·阿里·米尔扎逃往俄国，他十一岁的幼子艾哈迈德继承王位。穆罕默德·阿里·米尔扎的最后一次挣扎是在一九一一年。他的追随者取道俄国经里海沿岸登陆，妄图一举拿下德黑兰。可是事与愿违，他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挣扎也归于失败。

民主立宪派暂时胜利了。可是俄国人正象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做的那样，拒绝从我国北方各省撤军。

一九一一年，为了整顿国家紊乱的财政状况，伊朗政府聘请美国人摩根·苏斯杰尔出任国库总监。苏斯杰尔威信很高，他实施的财政改革计划眼看大功告成。这时，即一九一一年底，俄国人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提出很多要求，其中一条是罢免苏斯杰尔。显而易见，俄国人不愿意伊朗的内政事务安排得井然有序，以致不再求助于他们。俄国出兵攻打伊朗北部的几个城市，百姓惨遭杀害。国民议会毅然拒绝俄国人的最后通牒，可是内阁却接受了它。这一事件在苏斯杰尔著的《伊朗的窒息》一书中有详尽的描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伊朗宣布中立。可是德国人、土耳其人、俄国人和英国人却充耳不闻，仍在我国开展活动。土耳其为支援德国向德黑兰方向进军，结果被俄军击溃。在我国的德国代理人和间谍四处奔走，在伊朗各部落民族中大肆煽惑，甚至企图在邻国阿富汗装备一支武

装力量,但是未能得逞。在伊朗南部,英国人珀西·塞克斯少校,后称珀西·塞克斯爵士,组建了南方警察部队,成为南部伊朗的霸王。此人写过有关伊朗的两卷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伊朗的国内形势更加动荡混乱。当时俄国一九一七年爆发革命,而大批俄国军队仍驻扎在伊朗北部各省,英国派遣一支军队去攻打未能获胜。一九一九年英国建议和我们缔结协定。其主要内容是给伊朗一笔贷款,派遣行政和财政顾问,提供军火物资,修筑公路和铁路。执行这个协定的结果,导致外国对伊朗控制的加剧,因此遭到公众舆论的激烈反对。当时的伊朗政府,批准了上述协定,但伊朗国民议会却始终不予通过。

恺加朝廷的懦弱腐败,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父亲和大批爱国者,为我们古老文明的国家竟落得如此悲惨的境地,而深感焦虑和愤慨。

我父亲于一八七七年出生在靠近黑海的马赞德兰省。与我说过的恺加皇帝出身土耳其族不同,他是纯粹的伊朗人。我的祖父和曾祖父全是军官,在军队中效忠祖国。我的曾祖父在伊朗与阿富汗的一次战争中,表现出非凡的英勇刚毅;我祖父担任驻防马赞德兰省警卫团团团长。我父亲礼萨汗诞生不过四十天,祖父便与世长辞了。祖母决定把小孩子带到德黑兰。旅途中天气酷寒,她幼小的孩子险些丧了性命。

父亲十四岁时,就在他出世后头一年成立的哥萨克旅服兵役。那时候他根本不识字,因为只有达官显贵和

宗教人士的子女才能够受教育。他们有权有势，把科学知识据为私有，不让普通老百姓的子女进学校念书，想用这种愚民政策保持他们高官厚禄、为所欲为的地位。

我父亲即位加冕那天，根据伊朗古老的传统，授予他“上帝使者”、“得神之助者”和“世界之主”等封号。然而他无论是接见外国使臣或头面人物，还是跟我谈话，总是以普通人自居，没有半点装腔作势。由于我父亲天资过人，所以进步极快。那时的伊朗军队不设下级军官，军队中没有逐级提升一说。在服役期间由士兵一下子擢升为军官的现象是极为罕见的。而我父亲之所以能青云直上，正是因为他有非凡的才干和突出的个性。他肩宽体壮，身材挺拔，有一副男子汉大丈夫的刚毅面孔。在那张脸盘上最惹人注目的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这双眼睛能入木三分地透视对方的内心活动，那怕是刚强的人在他面前也会不寒而栗。听说伊朗哥萨克旅的俄国指挥官都规避他，实际上是有点怕他。

使我父亲迅速提高的关键所在，是他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虽说已不年轻，但他并不因为刚开始学文化而感到羞愧。每天军事操练结束之后，他就在营房里极其耐心地读书写字，向他的朋友请教。他在营房的微弱灯光下刻苦攻读，累了便走出小屋，观赏远方德黑兰的灯火。

那时候，士兵的生活根本无人过问。政府软弱无能，国家税收锐减，连工作人员的薪津也不能按时发放。士兵们只好去卖鸡蛋，上山打柴，做些零星杂活，借以养家

餬口，打发日子。偶尔政府发些实物薪饷，也只是有限的砖瓦或其他建筑材料而已。总之，现钱是没有的，因为国库里通常是空空如也。我父亲讲过一件事：一天，外交部决定举行晚宴，招待一位贵宾，但因部里没钱，只好向几位富贾借贷，这才安置好宴会。军队编制陈旧落后，武器装备破烂不堪（全军只有几门旧式大炮），军威不振，士气低落。最使我父亲感到痛心的是，他所在的部队完全由外国军官操纵指挥。可以想见，当我父亲看到向他发号施令的不是伊朗首都而是俄国首都时，他心里又是什么滋味呢？我父亲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依我之见，这恐怕与他亲身体验过外国奴役的苦楚不无关系。

我父亲从士兵擢升到军官，经历过无数次的战斗，主要是同在伊朗各地打家劫舍的骠悍的游牧部落作战。我国历史表明，中央政府软弱无能之时，便是游牧部落气焰嚣张之日；反之，只要中央政府坚强有力，他们便称臣纳贡，对国家的复兴作出重要的贡献。我父亲不仅平定了游牧部落的暴乱，还同成群结伙、扰乱治安、欺压百姓的盗匪多次交锋，并同俄国革命后侵犯我国的布尔什维克交过战。

父亲讲述的关于他在同一伙匪徒作战时产生悲观念头的故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在战斗进行中，他突然产生一种对国内混乱局面极度厌烦的情绪。受这种情绪的驱使，他真想丧生于强盗们的子弹之下。当时我父亲骑着一匹白马，目标明显，看来枪举人倒，必死无疑

了。可是敌人的子弹却没能射中他。我父亲怎么会产生这种悲观念头呢？想到这里，他往日的形象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骑着一匹白马，坚强而刚毅的脸上流露着忧国忧民的神色。确实，那时的伊朗不配称作一个国家。因为在这块光荣的土地上，没有象征着国家的中央政府。伊朗的广大地区处于部落诸汗和地方酋长的统治之下。他们表面上效忠朝廷，给国王留点面子，实际上都独霸一方，僭主称王。在其管辖的范围内横征暴敛，肆意妄为，百姓遭难。那时的军队没有现代化的装备和编制，有的武装部队根本不服从政府调遣，社会秩序与安宁毫无保障。司法机关名存实亡，一切法制皆由宗教法官和游牧部落诸汗行施。全国各地到处是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哪里有公道可言？动辄敲诈勒索，稍有违抗则以武力相威胁。治安情况糟糕透顶，甚至在首都德黑兰，黄昏之后人们也不敢外出，除非家里有急事，如请医生急诊等，因为夜间赶路多半会遭到流氓暴徒的抢劫和袭击。交通设施每况愈下，远不如大流士时期。旅途上盗贼出没，极不安全。从德黑兰动身去马什哈德的旅客，为逃避沿途盗贼的困扰，不得不绕道俄国；想去伊朗南方的胡泽斯坦省则需转经土耳其和伊拉克。

前面谈到，由于领事裁判权的存在，伊朗司法机关无权过问犯法的外国公民（包括大批进入伊朗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实际上，伊朗根本就没有能审理案件的权威性的法院。而缺少这种权威性的法院，则成为外国列强保持领事裁判权的正当口实之一。经济上我国也没有独立

可言。恺加的帝王们把各种经济特权拱手出让给外国人。外国军队和国内凶恶的强盗到处横行无忌。百姓在贫穷、愚昧和疾病中挣扎度日，绝望、愤懑随时可见，天灾人祸遍布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可是国王一心只想着去欧洲观光旅行，游山玩水，过花天酒地的生活。面对这种情况，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除了感到耻辱之外，还能怎样呢？

显然，一位拯救人民的“能人”的出现，已成为时代的要求、事业的需要和民族的愿望。这位“能人”将改变国家的命运，扭转历史的潮流。当时许多迹象表明，我父亲能成为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九一八年俄国军官仍掌握着伊朗哥萨克旅的指挥权。他们名义上完全是白俄军官，而其中某些人早已卖身投效布尔什维克。当该旅奉命攻打占据北方诸省的俄国红军时，这些布尔什维克军官便公开背叛伊朗。民族主义思想促使我父亲下定决心，迟早要把全部俄国军官从这个旅里清除出去。

一九一九年八月，我父亲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他辞退了哥萨克旅的俄国军官，担负起指挥该旅的重任，伊朗政府当即予以批准。我父亲毫不隐讳自己的主张：最后要把在伊朗的外国势力压缩到最低限度。

此后，我父亲加快掌握权力的步伐，一跃而成为国家的实权人物。为达此目的，他曾和活跃的新闻记者赛义德·焦尔丁·塔巴塔巴依密切合作。这位神职人员的儿子具有革命思想，他非常大胆地发表文章，激烈抨击政府各部门的腐败状况。在我父亲进军首都德黑兰之时，他

的政治宣传鼓动对政府各级官员影响颇大。

我父亲从伊朗西北部的加兹温派出军队向德黑兰方向进发，并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发动不流血政变，推翻了伊朗摇摇欲坠的政权。赛义德·焦尔丁出任内阁首相，我父亲担任国防大臣兼武装部队总司令。

此后不久，作为激进改良主义者的赛义德·焦尔丁采取了某些矛头指向国内富有阶级和保守主义者的措施。依我之见，无论在政治信仰和经济观点方面，还是在局势的分析判断和采取什么行动方面，我父亲都不赞同赛义德·焦尔丁的主张。因此，政变三个月之后，艾哈迈德王任命别人作首相时，我父亲并未表示反对。

我父亲历任各届内阁的国防大臣，不言而喻，他是内阁中最有影响的实权人物。他于一九二三年出任首相。缺乏主见、动摇不定的艾哈迈德王遂不定期地出走欧洲。

我父亲出任首相的前一年，土耳其老朽不堪的哈里法政权被废除。不久，在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英明领导下，建立了共和国政权。在土耳其这一事件的影响下，伊朗各界人士也酝酿在我国建立民主共和国。可以肯定，我父亲在一定时间里也是倾向于此的。但是与这种意见针锋相对的公众舆论，却强烈拥护拥有几千年传统历史的伊朗君主政体。而伊朗许多省份的民主立宪派则一贯支持君主立宪制。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伊朗议会废黜了去欧洲旅行、而后死于那里的艾哈迈德王，并宣布我父亲为伊朗国王。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举行正式加冕典礼，在这

个仪式上，我被选定为王位继承人。

我父亲曾于一九三四年出访土耳其，为的是亲眼看看那个国家取得的巨大进展，同时借以加强两国之间的政治和文化联系。这里我想把当时的伊朗和土耳其的状况比较一下。哈里法政权瓦解之后，土耳其政府与西方各国交往甚密，在学习西方文明方面遥遥领先于我们。他们仿照德国组建的军队十分严整，并有设备良好的军事院校、军火工厂和训练有素的军官骨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土军英勇善战，经常挫败最精锐的协约国军。与我父亲执政以前伊朗的封建割据政权相反，土耳其拥有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管理国家。并修建了许多铁路、港口和工厂，显示出学习西方国家的成效。而我们几乎根本没有着手做这些事。显然，为了赶上西方的先进文明，伊朗要走的道路比土耳其漫长得多。

选择方向、道路，事关大局。我父亲决不草率从事。每当作出重大决定时，他总是把迅速果断与对问题的周密思索结合起来，极其谨慎、沉着而不为感情所左右。比如，发动政变五天后，伊朗和苏联政府签订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友好条约。这个条约曾酝酿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定下来，我父亲象调度部队时所做的那样，当机立断，迅速作出抉择，签署了这个条约。

依据这个条约，苏联放弃以往的各项要求，废除在伊朗的全部特权，并把在伊朗的许多企业，诸如以前的俄国信贷银行、从苏联边境卓勒法到大不里士的铁路、里海岸边恩泽里（现名巴列维港）的港口设施，以及公路和电报

线等等全部交还伊朗。还准许伊朗享有平等的在里海的商业航行权。伊朗的这种权利，自从签订土库曼恰依协定之后，就被剥夺了。此外，还宣布废除了伊朗人民所厌恶的领事裁判权。那时候我国人民把这个条约的缔结，看成是沙皇俄国政策和后来苏联奉行的政策彻底改变的标志。

与此同时，我父亲及其政府宣布取消一九一九年的伊英协定。如前所述，此协定虽然签署了，但伊朗国民议会始终没有批准。根据此协定的条款，英国的军事顾问和其他顾问纷纷来到伊朗，还派了一批英国工程师来设计需要修筑的铁路。然而这个协定遭到伊朗爱国者的激烈反对，最终宣告作废。

最后一批英国军队于一九二一年从伊朗撤走。部分苏联军队未征得我们同意，擅自决定留驻伊朗，所以说他们的军事干涉并没有完全终止。关于这个重要问题，我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详细叙述。

在完成上述工作的同时，我父亲大力进行伊朗的内部改革。他决心要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将四分五裂的伊朗重新完全统一起来。这也是他多年的夙愿。为实现这个愿望，必须有强大的军队。早在担任国防大臣和武装部队总司令时，他便着手合并伊朗哥萨克旅、南方警察部队、宪兵队和其他杂牌军，以图组建一支正规统一的军队。他特别关心改善士兵的伙食，按时发给军饷和采用新式军事训练法。在提高军士士气方面，他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他使战士们懂得，作为一个效忠祖国的伊朗

军人，应该感到光荣而自豪。

伊朗军队在一九二五年编成五个基干师、一个独立团和一个护路宪兵队。后者负责维护交通要道的安全和制止武装匪徒的骚扰破坏。（我父亲在伊朗商道的险要地段设置了瞭望哨，派出宪兵常年驻守，确保交通和旅客的安全。）不久之后，又增添了小规模的海军和空军部队。一九二六年，通过了义务兵役制，并于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二年作了若干修改。还创办了两所军事学校，派出一批青年军官去法国受训，并聘请一批法国军事顾问编练伊朗军队。

父亲的一位挚友讲过一件事：在我父亲率领军队开进德黑兰之后不久，一天他喃喃自语地说着什么，突然放声叹道：“唉！要是我有成千支相同类型的步枪该多好啊！”显然，他正在想建立秩序与安宁的事。可是，从他嘴里说出的话，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军队装备的可悲状况。事过不久，我父亲办起了一个步枪制造厂、一个机枪制造厂和一个子弹工厂。他一手承办的这些工厂和其他军火工厂一样，至今未停止生产。在做这些重要事情的同时，我父亲为了建立国家的秩序和安宁，进行了多次的军事征讨。他派遣军队征剿米尔扎·库切克汗。此人拥护共产党，多年来在里海沿岸诸省肆意抢掠，独霸一方。苏联人在一九二一年条约签署之前，公开地庇护他。被派出去的军队击溃了米尔扎·库切克，其部下如鸟兽散。在英国人的支持和庇护下，盘踞在法尔斯、胡泽斯坦和俾路支斯坦等省公开与政府分庭抗礼的其他游牧部落诸

汗，也遭到同样的下场。

在我父亲担任哥萨克旅军官的时候，一次他率领一个团从德黑兰开往哈马丹。该团仅有一匹马，专为驮伤病员用。那时的道路长年失修，不堪通行，部队行军如牛负重，十分艰难。象我父亲那样从军多年能吃苦耐劳的人走完这段路程，因为脚部受伤，疲劳过度，也只好卧床休息。想到此便不会奇怪，登上王位的我父亲，为什么在建立秩序和安宁之后，便急于修筑道路，便利交通。因为他很明白，没有畅通的道路，巩固安全也只是一句空话。

众所周知，我父亲一九二八年开始修建的贯穿全国的大铁路，于一九三八年竣工。经工程师验收，被认为是最快速度建成的世界瞩目的大铁路。从工程技术方面看，这条铁路比著名的瑞士铁路还精湛高超。该铁路线经过四千一百座铁桥，穿越总长度为四十五英里的二百二十四条隧道。其中的一条隧道长达两英里。这些隧道在高山峻岭间曲折蛇行，爬过一个又一个陡坡，从山岩峭壁中钻出来。

长达九百英里的铁路干线（今天又增加了其他线路，延伸到国内更多的地区）的建筑经费是用糖块、砂糖和茶叶的税款筹备的。这笔款项多是农民们缴纳的，因为正是他们用大部分现金收入购买糖块和茶叶。我父亲对外国贷款抱有戒心。他拒不向外国借贷，但却一视同仁地聘请了几个国家的工程师，以加快铁路的建设。

我父亲在全国各地修筑重要的公路，在里海、波斯湾沿岸修建主要港口，还开辟了国内航线和伊朗与外国之

间的第一条国际航空线。一九三一年，他将英属印欧电报公司在伊朗的设施收归国有。

为确保伊朗金融财政的独立，实行了纸币发行国有化，创办了由称职的伊朗职员管理的伊朗国家银行。并下令为该银行职工修建设备优良的俱乐部、餐厅、游泳池、体育馆、医院和印刷厂。不久，伊朗国家银行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许多分行。国家第一个收支预算表也制定出来了。为了改善财政状况，我父亲聘请了美国财政专家阿尔特·C·米尔索普博士。此人先在伊朗工作了五年，后来又一次被聘请。在这两次任职期间，他出版了两本书，描述自己在伊朗的经历和见闻。

在我父亲执掌大权之初，伊朗除了几家发电厂、火柴厂和外国人开办的石油净化厂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工业。我父亲的方针是努力使伊朗工业做到自给自足，不再乞求外国。在他执政期间，棉纺厂、毛纺厂、丝织厂、制革厂、制鞋厂、钮扣厂、碾米厂、制糖厂、制茶厂、制烟厂、植物油加工厂、罐头厂、造纸厂、水泥厂、砖厂、玻璃厂、制药厂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兴建起来。如前所述，军火器械厂也建成投产。这些工厂中，有的是政府投资开办的，有的是由国营公司和本国资本家合伙筹建的，有的则完全是由伊朗资本家建设的。为了使苏联政府不能够用进口类似的商品——它们的价格由于工厂得到政府给予的财政帮助而比伊朗商品便宜——控制伊朗的市场，我父亲特别采取了一系列垄断国家对外贸易的措施。并在全中国首次推行统一市场、统一货币单位和统一度量标准，废

除了连会计人员都感到头痛的那种陈旧的度量衡制。

我父亲下令在与外国政府来往的信件中，一律把“波斯”一词换写成伊朗。可是当时外国的信件在提到我国时，一直使用“波斯”这个词。记得二次世界大战时，温斯顿·邱吉尔摆出一副不快的样子，闪动着他那狡黠的眼神说过，任何人也不能强迫他在谈到“波斯”时用别的词儿。最近，在几位知名人士和学者的请求下，我同意“波斯”和“伊朗”这两个同义词，可在不同的场合加以使用。

考虑到我父亲青年时代所经历的那种环境，或许你以为，他大概对社会改革和文化改革不感兴趣。然而实际上恰恰相反。一九二七年他建立了伊朗崭新的司法制度，这种制度基本上与欧洲各国、特别是与法国的法制相似。他设置了新的司法机关，并从宗教人士掌管的法院手里夺回了审理民事诉讼的裁判权。翌年，废除了领事裁判权。

尽管国家师资不足，他还是仿照欧洲先进国家实行义务教育，在全国各地大力兴办小学和中学。一九三四年，占地面积很大的德黑兰大学落成了，它是一座式样新颖的堂皇建筑。他执政之前，到国外求学的伊朗人为数甚少。而他在位期间，去欧洲留学的经费改由国家负担，每年都选派上千的伊朗青年去欧洲深造。

综上所述，只不过是父亲在国家各方面进行基本而广泛的变革中的点滴而已。他为我继他之后进行的社会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并不是说我父亲执政期间没有任何缺点和错误。人总是难免犯错误的，一个伟

大的政治家，特别是一个象我父亲那样重于实践的人，就更难免做出某些错事来。譬如一些尊重和敬仰我父亲的人感到，他对改善和发展国家的农业，不如对加强工业那样关注。此外，自从登基加冕以来，他总是控制和限制国民议会，虽然并没有解散它。

在评价我父亲对国家的贡献时，首先应该看到进步的一面。旧日的伊朗与现在的伊朗有天壤之别。倘若他对发展工业比对农业更重视，那是因为旧时的伊朗几乎没有有什么工业，而我国农民种植农田却有几千年的历史。倘若他没有充分利用民主议会制，那是因为有文化的选举人寥寥无几。而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和建立行之有效的立法机关，则必须有大批的有文化的选举人。实际上，我父亲发展文化事业，注重普及教育，正是为真正民主的成长扫清了前进的障碍。

还应该看到，我父亲的为人与我迥然不同，他的天赋秉性对于其决心完成的伟大业绩说来是再适合没有了，但却不符合今天形势的要求。假如让我去做父亲的那份工作，我肯定不如他，可是我或许比父亲更适合做今天的工作。

总之，应当承认：时代的需要和历史环境为每一个特定时期造就出适合于那个时期的人物。虽然人物不单纯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其他的因素在他的生活中也产生影响。下一章将要谈到父亲为我提供的那种生活环境。其中他的道德品质和为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对我的思想影响极为深刻，但我们两人的性格却并不相同。假

如我和父亲同时降临人间（即我和他是孪生兄弟），生活条件和环境也完全一样，我们两个人的性格特征也肯定会截然不同。应该说，历史的偶然性在我们两人的生活中起了很大作用。我父亲的天赋秉性，对服务于那时的伊朗比我优越，而我的性格——怀着对父亲的尊敬和崇拜——对于今天的伊朗更加合适。我深信，假如他老人家在世的话，会对此表示赞同的。

总而言之，我父亲没有使伊朗脱离世界文明而最后落得默默无闻。相反，他使我们注意到西方世界和它的文明。正是他引导伊朗人民走向民族生活的新时期。我父亲进行的变革，使具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伊朗王国意识到它的新职责。

第三章 我的童年

世界上作父亲的总是影响着儿子思想品德的形成，这是天经地义的，对我也不例外。我父亲便是影响我道德发育的最重要因素。正如我说过和将要说的那样，我决不是反映父亲全部道德品质的一面镜子，然而在很多方面他确实对我有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在本章的开头，应该谈谈他的为人和道德品质。

毋庸置疑，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父亲的仇敌都承认，他具有非凡独特的个性。他或许是世界上最有道德而又最威严的人。不少刚强坚毅的铁汉在他的一瞥之下也要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他很善于识别人，能以一面之晤断定对方的长短优劣，仿佛他那神奇莫测的目光能透视人们的内心世界。因此许多人不敢正视他那双炯炯发光的眼睛。其实我父亲与人们的想象不同，也有温和、慈祥的一面。他特别热爱家庭，每当和亲人相处时，便一点也不粗暴严厉，反而非常温顺柔和，尤其是对被选为王储的我，更是爱抚备至，有时甚至很随和地同我玩耍，慢悠悠地哼着小曲，使我喜出望外。

崇尚简朴而厌恶奢侈，是他的优良品德之一。许多

靠个人奋斗而飞黄腾达的人，总爱以荣华富贵炫耀于人。一般说来，东方的帝王也不推崇简朴，但是我父亲却光明磊落，不屑于与恺加国王们的奢侈豪华为伍。他身为一国之主，衣着却十分朴素。普通的军服、半新不旧的矮腰皮靴和一般的伊朗袜子，衣袋里只不过有一块手帕和一个盛伊朗香烟用的银制烟盒，显得特别干净整洁。

他有胃病，所以饭菜极其简单。早饭就是饮茶，什么面包、奶酪、鸡蛋和水果等一般伊朗人的早点，他一点也不沾，中午他只吃米饭和清燉鸡。工作时每隔一定时间使用普通水杯喝点茶。他办公室的摆设极其简单，一张精巧雅致的桌子（如今我在使用它）、一张椅子、一个宽坐椅、一条地毯和一张详细的伊朗地图。在家里他通常是在地毯上休息，而从来不用床。我也非常喜欢他这种休息方法。父亲的日程安排也很简单。一般早晨五点起床，洗浴和敏捷地刮完胡子之后，到桌边用早餐（如果可以叫早餐的话），边喝茶边翻阅刚呈报上来的公文和重要消息。七点半准时到办公室去。先听取国王办公室主任的汇报，然后接见要求朝觐的人。接着与大臣和官员们一起处理政务，到十一点半结束工作。午饭后，两点又开始工作。下午多用来巡视军队驻地或者研究开发规划和行政计划。内阁会议一般在下午由他主持召开。从六点至八点批阅白天送来的公文。八点整吃晚饭。晚上十点休息。据父亲说，他躺在床上还要考虑制定计划和如何实施等问题。总之，可以说他什么时候也不得清闲。

上述的日程表充分说明，井然有序和准确无误是我

父亲的优良工作作风之一。当我去欧洲学习的时候，父亲命令我把在老师监督下进修波斯文的情况，每周向他写出汇报，以便他了解我的学习进度。偶然有一次邮局给耽误了，他非常生气，立即打电报给我的老师，批评他不该疏忽大意，造成拖延。

平常除了与家里人相处的时间而外，他再沒有其他的休息、娱乐时间。一年內也仅有一、两次几个小时的野外狩猎。他锻炼身体的方法是走路。记得他经常在办公室里踱步，或者步行到军队和政府机关视察。黄昏之际，偶尔漫步于皇宫花园。经常是召见朝覲者，边走边商谈国事。礼萨王常在散步时思考某个问题。

我父亲是宗教信仰的笃信者，他主张内心精诚，反对华而不实。因为他曾通缉过某些宗教界人士，所以有人认为他蔑视宗教法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他是对宗教势力渗透到政界极为不满，才竭力阻挠宗教界人士介入政治事务。他坚信，舍此便不能按时代的要求，大刀阔斧地行施改革计划，只会使社会改革拖延下来。

但是，决不可以此为借口，说我父亲蔑视宗教界人士，或者说他亵渎宗教信仰。恰恰相反，他十分尊敬有文化修养的进步的宗教界人士。我父亲对第八任教长礼萨先知的敬佩，就是他笃信神明的铁证。正因如此，他给孩子们取名时，选用了“礼萨”这个词。一旦有机会，他便去朝覲第八任教长的圣墓。每当他心里想实行一项改革计划时，总是祷念至高无上的真主或一位圣洁先知的名字，祈求万能的神助。

我父亲热爱祖国的情感极为深厚，在这方面没有人能和他相比。他坚定不移地认为，伊朗文化在各方面都优于文明世界。有时他会轻蔑其他国家取得的进步，可是他也欢迎新的教育制度。没有人象他那样热心致力于伊朗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他为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所倾倒，他兴致勃勃地维护过去的传统习俗。同时他认为，要确保国家领土的完整和独立，保障人民的幸福生活，伊朗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走完西方世界的发展道路。

他很少到国外访问，心里总是筹划着开办新式工厂、兴修水利、建筑水坝、铺设铁路、修筑公路、修建城市和创立强大的军队。

我父亲从哪里得知有关世界各国的科学、工业发展的情报，至今尚不清楚，但他确实对世界各国的工业、经济和军事发展的最新成就了如指掌。他所以能如此，显然是对精细的技术问题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刻苦的钻研精神。

我父亲不仅是一位勤劳能干的人，而且头脑灵活，机敏过人。他很少讲话而勤于思考，讲话则言简意赅。他的讲话有理有据，非常切题。他虽然没有系统学习过各种文化知识，但对复杂问题的理解能力却是相当惊人的。无论是修筑贯穿伊朗全国的大铁路中的技术难题，还是有关外交政策的重大事务，他都能抓住其症结所在，予以解决。他的讲话坚强有力，明确果断，充满了自信心。因此，他发自肺腑的演说总能扣住听众的心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他能驾驭自己的感情。与某些人的想象相反，在执政期间，他从未真正暴怒过。即使有时显得恼火，那也是必要而适宜的，一般说来，他总能克制自己。

我父亲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能恰当地选择政治时机，象伟大的政治家那样，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他能在一瞬间当机立断，作出重大抉择。也能在必要时，为实行一项决定而耐心等待十年。他时常仔细地琢磨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慎重地考虑问题的各个方面，然后才付诸实践。为贯彻自己的意图，他总是正确无误地抓住适当的时机。这种达到炉火纯青地步的判断力为人们所啧啧称赞。

我父亲精力充沛，能吃大苦耐大劳。他对工作孜孜不倦，非一般人所能比拟。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毫无保留地贡献给国家的建设事业，期望别人也做出同样的努力。他将整个国家机关建立在崭新的基础之上。他纪律严明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在整个国家机关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经常采取这样的作法：不事先通知，突如其来地抽查国家机关各部门。这种抽查多在上班时间内进行，以便了解工作人员的出勤情况。凡是迟到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比如有一天，他在上班后不久，来到财政部，下令关闭该部的大门。几个工作人员，其中包括该部大臣因迟到被关在门外，结果他们全被撤免了。这只是我父亲与消极怠工、敷衍塞责行为进行持续而广泛的斗争中的一例。

礼萨王不仅为伊朗修筑了铁路，还制定了列车时刻

表，火车误点是不允许的。有一张我非常喜欢的父亲的照片，那是他在客车上正看表的时候拍摄的，父亲的脸上流露出明显的满意神情，因为他看到火车正点到达车站。

在新伊朗的历史上，我父亲是教诲人民遵守时间的第一个人，他总是强调这样做的意义。在处罚和奖励的问题上，我父亲更注重于处罚而不是奖励。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是尽到了他的责任；反之有人工作敷衍了事，或者做了错事，那就该看作是一生中值得遗憾的事。基于对东方人特性的了解，我父亲对于必须完成的工作，采取强制命令的方法。近些年来，我们的社会对民主原则熟悉多了，采取不同于我父亲的另外的方法，以促使人们完成各项任务，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为激励人们忘我地进行工作，我父亲求助于精神道德的力量，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伊朗人民正是出于对我父亲的尊敬和对他的威严的惧怕，而遵循着他制定的计划和目标前进。

我父亲在执政之初，深受人民的爱戴，而在执政末期，当他为了事业的发展而不得不采取强制压服手段时，人们的这种爱戴逐渐变成了尊敬和屈服。总而言之，他在位期间给全国人民以巨大的精神影响。

我父亲为恢复国家旧日的荣光和昌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谆谆教导人民要维护祖国的骄傲和尊严，使之无愧于过去的伟大和光荣。他要求人民跟他一起为恢复伊朗固有的繁荣昌盛而阔步向前。他没有象今天的第

二个七年计划或者正在制定的第三个七年计划那样完整的建设计划，他总是在实现一个改革方案之后，接着进行另一个方案，一刻也不停顿自己的努力。于是，这种持续不断的努力，便形成一个可观的改革计划。既然在他一系列的措施中，某些方案是较为精细而有成效的，既然他激励人民完成改革计划的方法不单是靠行政命令，那么就应该承认：我父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总结他的工作和对国家做出的贡献时，我们就会发现：他执政总共不过十六年，而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竟能取得在前一章里指出的那些成就，确实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我父亲的性格诙谐而幽默。一些对他在位执政还有印象的人，可能会否定这一点，但事实确是如此。在家里，特别是跟我，他经常朴素而亲切地开玩笑。在家庭圈子之外，也常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我想更多地引起他发笑的，大概是那些伪君子的滑稽态度。他们在谒见时，极力掩饰自己的本相，不自然地装出一付稳重正派的架式。如前所述，我父亲善于观察人，他能透过对方的眼睛和面部表情，看出他们的内心活动，从不轻易受骗。每当他看到，皇宫和政府的官吏低声下气，谄媚取宠的时候，便拿他们寻开心。依我看，父亲厌恶当时宫廷和政府官吏的虚伪和阿谀奉承是完全应该的。因为他们用华而不实的词藻和空洞无物的吹嘘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用粉饰过的华丽外壳，掩盖了事物的本质。在伊朗，“善意的谎言胜过害人的诚实”这句名言害人匪浅，流毒实深。这对于语言坦率、说话朴实的我父亲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

的。所以他每看到周围的人有这种行为时，便无不给予嘲弄与耻笑。

有些人会想，由于长年的部队生活，我父亲讲话或开玩笑时，大概爱用粗俗的字眼，这纯粹是无端的臆想。我从未听他说过粗俗话。除我之外，他根本不和任何人过分亲昵。到他面前的人，要么内心恐惧，不寒而栗；要么深表敬仰之意。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和打浑逗趣毫不相干。即使对于多年的亲朋好友，也是如此。记得他和我的一位叔叔非常要好，两人相处，互相敬重，从不失于检点。我父亲的杰出个性和他老成持重的态度，不可能有任何失礼的举动和说没教养的庸俗话。

我曾想，父亲待人处世的态度，一定会使他感到孤寂，但不久我发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自有高尚的品德，无须乎与人们交往过密。而亲属们也不敢与他过分亲昵。他整日沉浸在自己的思索和想要完成的重大工作之中，把思索与工作视为自己的真正朋友和忠实伴侣。虽然在他执政的后期，身边的顾问和亲信已寥寥无几，但仍有几位密友使他同外界保持着联系。

大约五年前，我写了一篇专门论述我父亲的短文。后被印成小册子，用世界上几种流行语言翻译出版了。在那本书里，谈及我父亲道德品行时，是这样写的：“我希望这种叙述，能使伊朗人民和热爱这块土地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想一想这位为了同胞们的幸福、进步和富足而毫不吝嗇地贡献出自己一生的伟大人物。以他热爱祖国、效忠人民的优良品德为表率，象他那样出色地完成自

己的任务。须知，伟大而艰巨的任务要求他们以勤劳和勇敢去战胜畏惧与懦弱，以真理去代替谬误。他们应该摒弃不良的恶习和道德的败坏，以好逸恶劳为羞耻，以崇高的事业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荣誉的象征。他们应该懂得，勤恳的工作乃是一个人的骄傲和最大的灵魂美。”

综上所述，只是挂一漏万地谈了我父亲的为人和道德品质，它们对于我的影响极为深刻。在讲述我的童年时期之前提到这些，为的是让读者能从以上的叙述中，对影响我精神品质的诸因素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我出生在德黑兰旧市区的一间简陋的小屋里。那时的德黑兰有城墙和已经干涸的护城河，进城要经过好几道大门。晚上，为了免遭歹徒和武装盗匪的侵扰，大门全都关得牢牢的。我父亲在位期间，决心使伊朗的面貌焕然一新，下令拆毁了这些城门。

因为没过多久我们就搬家了，所以，对那间破旧小屋的印象十分淡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只记得那环绕德黑兰市、高耸入云的厄尔布尔士山脉的迷人景色，观赏它给我带来无限的乐趣和巨大的鼓舞力量。晴空万里之日，远眺城市的东北方，观赏德马万德山的雄壮挺拔的英姿和那白雪皑皑的山顶，令我心旷神怡。后来我才知道此山高达五千六百七十一公尺，比“门伯朗”山峰还高，几乎是著名的弗吉亚玛山峰的一倍半。

父亲刚毅的面孔和高大的身躯，在我幼年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他是国防大臣，每天按时乘四轮马

车上下班。爱好文学比喻的人们会说，在耸立天际的群峰激动我心弦的那些日子里，准备接任首相和伊朗国王重担的我父亲，却正胸怀壮志，决心克服国家遇到的高山一般的巨大困难。

小时候，我体质虚弱。记得有一天在洗澡时晕倒了，我的头猛烈地撞在地上。我不会忘记哈希姆先生——一位忠实的爱国者，不久前才去世——当时不安的眼神和惶恐的样子，他的形象比肉体的痛楚更深刻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幼年时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在极其隆重的仪式上，以“礼萨·巴列维王”的封号加冕登基和我被选定为王位继承人的那一天。豪华无比的加冕典礼是在古利斯坦皇宫的大殿里，华丽的孔雀御座前，按照传统的隆重仪式举行的。那种威严壮观的场面，给不过六岁的我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

被选定为王位继承人以前，我、母亲和兄弟姐妹们一起生活。加冕之后，遵照父亲的旨令，我与他们分居了。父亲旨令我接受他所谓的“大人物的教育”，即一种对王储的特殊教育，以便将来能胜任伟大的职责。于是，我便成为军事小学的学生。其实这所学校是专门为我和我的四个弟弟开办的。我们总共二十一个学生，全是被精心挑选出来的政府官吏和军官们的孩子。我的四个弟弟在年龄更小的班级里。该校学生身着军装，课业异常繁重。我的童年生活就是在这种军事环境里、即在军事学习和训练之中度过的。除小学的课业之外，我父亲还聘请了

一位法国女教员教授我法文，并兼管我的生活杂务。由于阿尔法女士——为纪念同一位伊朗人结婚而取的名字——的努力，我能讲一口非常流利的法语，就象使用本国语言那样。这就为我窥视西方的思想文化打开了一个窗口。这位使我感到有负于她的女士，一九五九年在巴黎逝世。

虽说我童年时期体质不强，但却十分机灵活泼。总是跑啊，跳啊，爬树啊，其他的游戏啊，一刻也安静不下来。那时我非常喜欢摔跤这项我国的主要运动。记得有一天，因饭后摔跤而受到斥责。隆冬季节我玩起雪来，根本不知道疲劳。那时我的另一种游戏是沿着萨德·阿巴德行宫的溪流，和小朋友们一起用花和石头垒筑小坝。那些水坝真可说是今天在各地兴建的堤坝和水利发电厂的小模型。我还在溪流的旁边堆砌小木房和石头房，或者用我的玩具铁铲修筑小桥和大楼。

在军事小学，每天有两小时课外活动。这是我和小朋友玩耍和做游戏的好时候。伊朗人有个习惯，就是大人和小孩午间都小憩。我却不喜欢这个习惯，就是现在我也不愿睡午觉。记得那时午休时，我和小同学们一起兴高采烈地做集体游戏，吵得大人也无法入睡。我那时喜欢做“小偷和警察”的游戏，把小朋友们分成两拨儿，分别作小偷和警察。做这种游戏时，我们几乎跑遍了皇宫所有隐蔽的仓库和地下室。应该承认，那时我们的侦察机关千疮百孔，极不健全。在我发育成人的时候，爱好骑马和狩猎。现在的御猎官阿塔巴依先生，那时是我的好伙

伴。我对足球、拳击等也非常感兴趣。记得我的拳术教练总戴着一副眼镜，一天在拳击练习时，他的眼镜被打掉了，我从地上拾起来交给他，他戴上后又继续练习。那时我和朋友们还常骑着自行车打马球，这是一种非常精彩而惊险的运动。我们称得起是骑自行车打马球的先驱。

按照常规来看，作王储的总有些自命不凡，不太合群儿。但我身为王储，似不曾有这种癖病，但愿今天也不要如此。那时我有位挚友，名叫侯赛因·菲尔杜斯特。他父亲是个尉官。侯赛因在瑞士学习期间也是我的同学。后来擢升为团长，担任军官学校的教官，目前在皇宫卫队任职。

王储时期，我每天都和父亲相处一、两个小时。九岁开始，我便和他一起吃午饭。他这样安排是想亲自掌握我的情况，我也可借此机会了解些国家大事。父亲登基加冕后不久，我患了一场伤寒病，卧床不起，与死神搏斗了好几个星期，使我慈爱的父亲异常焦虑不安。重病期间我曾超升到奇特的精神世界，对此我一直守口如瓶。在病危的一天夜里，我梦见了上帝的仆人——伊斯兰十叶教的阿里教长，他腰间佩带着著名的斩妖宝剑，在我身旁坐下，在他祝福的手里端着一只杯子，命令我喝下杯中的液汁，我遵命照办了。翌日，我的烧退了，病情迅速好转。那时候我才七岁，心想：病好得这么快，大概和那次梦幻没什么关系。可是同一年，又发生了另外两件事，使我在精神上受到深刻的影响。

童年时期，几乎每年夏天我都随着亲属一起到伊玛

姆扎迪·达乌德去。它位于厄尔布尔士山脚下，是一个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避暑胜地。到那里去须徒步或骑马经过一段弯曲陡峭的小路。一次我和一位当军官的亲戚骑马同行，我坐马鞍的前端，突然马蹄打滑，我们被摔下马来。我年小体轻被甩出去，猛撞在坚硬嶙峋的山石上，晕厥过去。醒来时同伴们看到我身上没有任何损伤，都大为惊愕。我只好向他们吐露真情：原来在我从马上摔下的刹那间，伊斯兰十叶教首领阿里的骄傲之子阿布·法兹尔教长突然出现，就势将我抓住，才使我得免惨祸，没有受伤。事情发生的当时，父亲并不在场，后来他听我讲述经过情景，却并不以为然。我了解他的性情，也不愿与之争辩。但我对此事的真实性以及阿巴斯·本·阿里教长的幻象从没有任何怀疑。启示我更加注意精神世界的第三件事是这样的：一天，我和老师在萨德·阿巴德宫附近的一条石子路上散步，忽然我看到一个神奇的男子，脸庞象天使一般，有光环围绕，宛如西方画家笔下圣耶稣的肖像。在一瞬间，我恍然大悟，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最后一位圣洁的教长依玛姆·高埃姆！我同先知的相会只持续了一会儿，他顿时隐匿不见了，这使我万分惊愕，赶忙问老师：“看见他了吗？”老师惊异地答道：“看见谁啊？这儿根本没人！”我对见到的一切深信无疑，年迈老师的回答丝毫也不能动摇我的信念。今天我谈起这件事，可能有些人、特别是西方人会以为我在编造荒诞无稽的神话，或者认为我所见到的一切，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精神作用而已。但是应该知道，信仰超脱尘世的光明的精神世

界是东方人的一种特性。后来我了解到很多西方人与我们一样也有这种信仰。昔日，我没有必要编造这类谎话去哄骗我的老师，今天我也无意把这类事说得天花乱坠以便从中谋利。这件事，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位亲友之外，没有别人知晓，连与我朝夕相处的父亲也一概不知。

此事过后，我又患过百日咳、白喉和其他几种重病，但没有发生以前那种事。八岁时我得了凶险的恶性疟疾，在没有现代化医疗设备的条件下，好不容易才摆脱了病魔的折磨。在疾病缠身的那些日子里，上述的幻影也未再现。

总之，在六岁和七岁时，我便产生了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即伟大的真主总在保佑我。这种信念使我满心欢喜和产生一种安全感。但是，当我在崇高的真主面前权衡自己的意志时，又感到极度不安。令人迷惑不解的是，我的意志究竟是被驱使着，还是完全独立的呢？不错，真主的神威和永恒意志每时每刻都在保佑着我。然而这种保佑毕竟是事出有因的。或许这种信念在那些自以为聪明和有独到见解的人看来是不能令人信服的，然而我却认为，伟大的真主在危险和灾难之中保佑着我，使我虔诚地信仰那正义的化身，独一无二的真主。世界其他先进国家也无不承认这种神的意志。英国人的有名口头禅是：“上帝保佑，一切如意。”他们并不以此感到羞耻。同样美国人在钱币上铭刻着这样的句子：“我们信仰上帝。”

童年的那些事过去很久，又发生了四件非同小可的事，使我小时候对真主产生的虔诚和信仰越发坚定不移

了。第一件事的经过如下：一天，我去伊斯法罕郊区库赫兰格视察正在筹建的水坝，返回的时候，我同当地的一位师长登上了停留在狭窄平地上的一架小型专机。我有飞行执照，又特别喜欢驾驶各种类型的飞机，便坐到驾驶员的位置上。这是一架单引擎的小型飞机。飞行十分钟后，引擎突然发生故障，我被迫在一个山石林立的谷地降落。凡是懂得飞行技术的人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减低飞行速度超过了一定限度，飞机就要打转儿。当时发动机已熄灭，我无法使飞机在这样狭窄的谷地正常地降落，只好保持一定的速度就地降落。在飞机着陆的瞬间，我急忙拉动操纵杆，使机头朝上，以免与正前方的一块巨石相撞。飞机的速度锐减，即使越过面前的巨石，也要撞到后面一块更大的石头上。飞机终于撞上第一块石头，机轮脱落下来，飞机飞不动了，机身在乱石成堆的地上滑行，螺旋桨触到一大块平滑的石头上，飞机被翻倒，仰面朝天地停下来。我们腰系安全带，仰卧在敞开的驾驶仓里，没受一点伤，奇迹般地得救了。这种情景如此出乎意外，令人难以置信，又非常有趣，我竟情不自禁地笑起来。而和我作伴的那位军官却心有余悸，怎么也笑不出来。试问，这究竟是我们的幸运呢，还是某种神秘的力量安排了这种结局呢？或许读者能比我更好地判断这件事。这里应该补充一句，现在，库赫兰格水坝业已竣工，正灌溉着那儿的农田。

第二件事是从外国铁蹄下解放富饶的阿塞拜疆省。关于借助真主的力量和伊朗人的民族主义精神解放这

个省份的伟大事件，在后面的章节里我将详细地予以叙述。

在我执政期间，第三件令人惊异和心痛的事件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当时我去参加德黑兰大学的校庆。那天我穿着军服，从汽车上下来后，正准备到法律系的礼堂去开会。突然响起枪声，子弹向我射来。说也奇怪，三颗子弹都打在我的军帽上，而没有伤着我的头部。第四颗子弹击中我的右额，从鼻下和上唇之间穿出。谋杀我的人乔扮成摄影师混进现场，与我只有两米之隔，他的手枪瞄准了我的胸部。他和我面对面地站着，身边没有任何人妨碍他的视线，显然击中目标是有绝对把握的。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我做出的反映至今还记忆犹新。我想向他猛扑过去，可是马上意识到，这样做会使对方更容易瞄准；倘若我逃跑，将被他从背后击中。急中生智，我迅速做出象蛇一样的扭动，根据格斗技巧，这样做会使对方难以瞄准。凶手再次举枪射击，打伤我的肩部，最后一颗子弹卡在他的枪筒里，未能射出。此时我才感到大难已过，化危为安。凶手惊慌失措，气急败坏地把枪摔到地上，拔腿就跑。但是已经迟了，他被警官和人们团团围住，活活打死了。遗憾的是此事的主谋者未能查清。后来才知道他和某些宗教狂徒有瓜葛，同时还查获他与已被解散的人民党有联系的证据。有趣的是，他的女友是英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园丁的女儿。

鲜血如泉水般从伤口中涌出，我却坚持要出席那天的集会，侍从武官不肯，把我送进医院，包扎好伤口。此

后不久，那件血迹斑斑的军衣送到德黑兰军官俱乐部展出，今天到俱乐部去的人仍可看到它。这件事越发坚定了我对独一无二的真主及其万能的神力的信仰，使我与伟大的真主永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第四件事是从摩萨台手中解救我的国家。这件发生在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日的奇迹，书中将有详细的记载。摩萨台博士本来有希望成为优秀的国家领导人，但在他当权的后期，由于过激思想作怪，堕落成他身边的一批左倾激进分子的傀儡，间接地受到一个外国政府的操纵和驱使。我始终不渝地坚信，心中闪烁着真主光芒的我国普通人民，必将推翻摩萨台政府。

勿庸赘言，我执政期间所完成的事业，全靠着一种神奇力量的支持和帮助。我并不为表白自己对宗教信条的内心敬仰而感到羞耻；但是也不要认为，我会不自量力地以此标榜自己是真主的使者，或执行真主命令的代言人。不妨坦率地承认，我并没有这种职责。

童年时期我便知道，我将成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令人赞叹的文明的国家的君主，我必须为改善人民、特别是普通百姓的生活而奋斗终生，此乃真主的意旨。我感到对真主的笃信，将有助于实现这个神圣的目标。这样说并不是自命不凡地认为，在唯一的真主的保佑之外，我还能够在这方面取得什么其他成就。

第四章 登基之前

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在伊朗加以运用，是父亲久有的夙志，因此派我去欧洲留学，是不奇怪的。不言而喻，他是要王储熟悉西方文明，以便了解西方各国成功的秘诀。为了选择我留学的国家，父亲反复思考，迟疑不决。因为他虽然称赞西方文明的发达，但总对外国持有戒心。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终于决定派我去瑞士。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有意让我在一个政治色彩淡薄的国家就学。而瑞士这个欧洲小国，在西方的政治纠纷中，一贯奉行中立政策，便被他看中了。他的顾问们也认为瑞士是专心治学的好地方。

一九三一年五月，我读完了军事小学，同年九月暑假过后即准备动身去瑞士。遵照父亲的命令，童年时多次治愈我的重病的名医穆瓦达布·纳菲斯博士被确定为我的监护人和私人医生，责成他全面负责我在瑞士的学业和生活。并决定我过去的语文老师穆斯塔沙尔先生与我同去瑞士，在那里继续教我波斯语文课。根据父亲的意见，还让一个弟弟和我在军事小学的两位朋友与我结伴前往。挑选朋友的事由我来做。我推荐了侯赛因·菲尔

杜斯特(前面我曾提到过他的名字)和迈赫尔普尔·帖木尔塔什,后者是宫廷大臣的儿子。获准后,我们便一同起程了。(数年后,宫廷大臣与我父亲交恶,迈赫尔普尔遂中途返国。)

在巴列维港,我和父亲、母亲、其他来送行的亲友依依告别后,便同纳菲斯博士、穆斯塔沙尔先生、弟弟和两位朋友一起登上开往苏联巴库的轮船,再经波兰、德国,到达日内瓦。这次旅行对于我们从未出过国的四个少年人来说来是格外有趣的。我们在日内瓦的伊朗领事馆住了两星期后,转到洛桑,进入当地一所私立学校。在洛桑我和弟弟住在一位叫迈尔西的瑞士人家里, he有三个男孩和两个女孩,一家人生活得很和睦,我也感到心满意足。我的两位伊朗朋友在学校寄宿,不和我们住在一起。这样生活了一年后,根据监护人的意见和我父亲的命令,我们搬到位于洛桑和日内瓦之间的列鲁扎寄宿学校。迁居的原因是,父亲希望我的学业走上正轨,并用寄宿学校的校规约束自己。原先的私立学校约有一百五十名男女学生,而这所学校不招收女生,男生人数是上述学校的一倍半。另外,还做好了四个弟弟明年到达这所学校就读的安排。

侨居瑞士的四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瑞士典型的西方民主式的环境,继我父亲之后,给我的思想品德以莫大的影响。

在瑞士我的身体发育很快,连我自己都感到惊奇。前面提到,童年时期我体质虚弱,而在瑞士我却变得身强力

壮。在掷铁饼、投标枪、跳高、跳远和二百米赛跑等体育项目中，我都在学校名列前茅，荣获奖章。我还被选为学校足球队和网球队的队长。正是在这段时期，我完全懂得了体育在少年教育中的意义和重要性。身体发育这样好，并不是因为学校的饭菜可口。在伊朗，我的法国女教员早已使我习惯于法国的膳食，它和瑞士的饭菜相差无几。瑞士的气候清新宜人，而德黑兰的天气也并不比瑞士逊色。看来，这种身体的发育与我在新环境中的思想成长有密切的关系。

在德黑兰我的学业成绩总是最优等的，这是因为我才智过人，还是由于我的显赫地位在打分数时起了作用，我不得而知。在瑞士，学生的社会地位对他的学业成绩并没有多大影响，我仍然得到优秀的分数，只有我不喜欢的平面几何课成绩不佳。我酷爱代数、三角、立体几何和物理、化学等课目，就是讨厌平面几何，不知是什么缘故。总之，我的大多数功课成绩优良，获得奖励。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等课程使我产生浓厚的兴趣。我的法语进步很快，阅读法国的文学名著，使我得到极大的乐趣。

该校的老师工作认真负责，非常出色。但他们当中没有人与我深交，对我的影响也不大，个别老师甚至令我产生畏惧。而同学们却与我来往密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倒不是因为我的社会地位如何，而是他们喜欢我的性格。记得那时我房间里经常聚满了人，从中使我了解到，体现西方民主的真诚而自由的社交是多么可贵，正是这种社交活动激励我发奋认真读书。在研究学问、

体育锻炼和选择益友的过程中，我懂得了自由和纪律相结合的重要性，即没有民主自由的纪律会导致专政，而没有纪律的民主则会产生无政府主义的紊乱。虽如此说，我在学校的生活仍与众不同，受到的监督比其他学生严格得多。第一，我的课业负担比他们重，除学校的一般课程外，穆斯塔沙尔先生还为我开设了详细的波斯文学课。这是父亲授意做的，他非常重视提高我的波斯语言文学水平。另外，监护人纳菲斯博士对我的言行举止十分留意。今天他已不在世了，而我却至今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那样严格地监督我，是遵从我父亲的旨令，还是出于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总之，我的状况简直象个囚徒，除偶尔能和监护人一起外出外，其余时间一概不准离校。空闲时，朋友们兴高采烈地到市内去游玩，却不准我与他们同往。圣诞节和新年休假，朋友们成群结队、喜气洋洋地去参加跳舞晚会，欢庆新年佳节，而我却一个人孤独地呆在屋子里。朋友们唱歌跳舞，纵情欢乐之际，我只能听听唱片和收音机，相形之下，我的娱乐条件不是太差了吗？依我看，这种做法委实不妥，倘若我有孩子的话，决不采用这种方法管教他。我认为，正是这种强制摆脱消遣娱乐的做法，使我变得很严肃，甚至过分地严肃，以致使我今天的性格还有些孤癖。这也使我在紧要关头和危急时刻能沉着冷静，不易为感情所左右。这并不是说，我从来不开玩笑，但在开玩笑时要比别人慎重些。我喜欢恰如其分的玩笑和政治漫画，与普通老百姓谈话使我感到兴奋。我尤其喜爱儿童，去小学视察，与天真活泼的孩子们谈笑，

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

留学瑞士的时候，我经常考虑自己将来的职责。我每周都和父亲有书信来往谈及此事，但却很少给母亲和弟妹们写信。那时有一种在将来要出色地执掌政权的愿望在我胸中激荡。大概正是这种愿望，促使我付出比期待于一个青年学生更多的努力去发愤读书，刻苦钻研，掌握科学知识。正是从这种愿望出发，我十分注意选择进修科目。我认为学好自然科学诸科目，将有利于我理解将来在建设国家时遇到的复杂的工业问题。

在前一章，我曾谈到自己的思想发育和宗教信仰。侨居欧洲的头两年，由于忙于熟悉新的环境，我无暇顾及宗教信仰的事。但不久我便热衷于此，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瑞士的后三年，每天我都按时祈祷，以纯洁的心灵，虔诚地向至高无上的真主祷告。但愿在我执政期间，信仰之灯能照亮前进的道路，使我万事如意。

那时候，我反复思考着登基之后将要采取的治国之策。我虽然年纪不大，可是已对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对伊朗农民产生了感情。那时我产生过这样的念头：一旦我执政，将免除耕种皇家土地的农民两年或三年的租税。使每个农户积存点钱，添置房屋，购买农具，或做些其他必要的事。年轻时的这些想法，导致了今天在农民中分配皇家土地的计划。在后边的章节里，我将详尽地予以阐述。

那时候我心中反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在执政期间设立一个庶民控告处，使受害者解除顾虑，大胆上诉。

我将亲自管理这个控告处，以便及时了解人民大众的要求、愿望和烦恼。使我产生这种念头的，大概就是前面叙述过的那个阿奴希尔旺正义钟的故事吧。

在我上台执政后，学生时代的那些想法便活跃起来。起初我打算用大部分时间亲自听取百姓的申诉和控告，但我注意到，这样做是不现实的。我每天的日常工作和正式的官方接见需用八小时，睡觉、吃饭和私事用八小时，下余的八小时里，倘若不使申告人感到扫兴和失望的话，充其量不过能接见十至十五个人。因此我决定采取另外的作法，即每个人不论其职位高低，皆可写信给我的私人办公室，通过这个办公室与我取得联系。这种作法延续至今，上至首相，下至农民，写来的每封信和诉状我都收到了。每月寄来的书信和诉状约有数百件，我审阅全文，或者批阅经办公室秘书整理出来的附有重点说明的摘要。如果有问题需要我或政府机关协助解决，我一律予以处理。政府机关负责向我汇报处理的结果，并力所能及地满足诉讼人的要求。为了保证这些措施的效力，我专门成立了皇家调查组织，其任务之一便是审理庶民的上诉。在其他章节里，我将详细地介绍有关这个组织的情况。

一九三六年春，我取得了中学文凭。回国的时刻即将来临。在巴列维港，几年前送别我的亲人又来接他们的孩子了。我长得高大粗壮，会面之际，父亲都有点不敢相认了。巴列维港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面貌焕然一新，远非我去欧洲时那副样子了。往日的一个伊朗村镇，如今

俨然成为一个欧洲式样的城市。不久我发现，巴列维港的变化只是在全国广泛推行开发计划的一个缩影。

与家人团聚，度过暑假之后，我便进入德黑兰军官学校深造。父亲想让我在军校接受高等教育，同时耳提面命使我掌握治国的奥妙。他的计划正合我的心愿，因为我早就想学会各种军事技术；另外，为了解和熟悉父亲的职责，我必须经常与他接触才行。因此，他的决定是非常英明的。

那时的军校由法国军事顾问担任教官，它是仿照法国著名的圣西尔军官学校建立的，学制也与其相同。如今我们聘请美国军事顾问，采用了美国西点军校的教学方法，学制也由两年增加到三年。在军校除规定的一般课程外，我还专攻战略战术课。一九三八年春我毕业后，取得中尉军衔，随后以视察员身分在皇家武装部队就职视事。我必须每天早晚两次到各军事单位去视察军情，参加军事演习，查看各种军事训练、甚至战士的操练。有时还要去观看夜间军事演习，我四处奔走，忙得不可开交。任务十分繁重，生活极为单调，但因我热爱军队，又是为重建新军而效劳，便也不觉得劳累和乏味。就在那时，我到了结婚年龄，遂与一位埃及公主（芙吉雅殿下）结为夫妻，后面我将详细地说及此事。

除视察部队而外，我每天都要和父亲会面。有时在早晨，通常是在午前半小时拜见父王，并与他共进午餐。若能整个下午和他在一起，那该多么好啊！会面时我们就目前局势和国内外政策进行交谈。父亲到外地视察时，也

要我陪伴。他喜欢带着我到全国各地走走看看，使我了解人民的生活，熟悉国家的地理，掌握各地区的情况。在视察过程中，他就各种具体问题与我磋商。这里用“磋商”，显然有些词不达意。因为几乎所有的政府要员和地方官吏在与他交谈时，总是担惊受怕，毕恭毕敬，不会有什么磋商可言的。我跟他谈话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只是简明扼要地说明自己的观点罢了。我虽然只有十九岁，但却时常对各种问题坦率地发表意见。令人奇怪的是，他总是仔细而耐心地听我讲话，很少拒绝我的建议。比如在我的多次请求下，他释放了大批在押的政治犯。或许应该感到遗憾，因为在获释的政治犯中，有摩萨台博士。此人后来在掌管政府期间使国库贫穷如洗，并险些葬送了我父亲创建的巴列维王朝。摩萨台不厌其烦地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可是人们已看到，他是何等荒唐地偿还这笔债务的，又是怎样感恩报德的！我父亲以里通外国、密谋反对政府的罪名逮捕了摩萨台。不知因何缘故，他竟宣判摩萨台等人与外国、特别是英国秘密勾结，狼狈为奸。摩萨台将被放逐到气候恶劣的边远地区，因他年迈多病，去则凶多吉少，可能丧身于流放之地。只因我竭力说情，他才在几个月后获释。下一章我将述说他出狱后干了些什么勾当。有时想到这里，我会对设法搭救他一举是否明智产生怀疑。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多数因我的请求和努力而出狱的人并不象摩萨台那样忘恩负义。

那时，在我和父亲的亲密相处中，发生过一次小误会，至今没有忘怀。今天看来，父亲是对的，而我误解了

他的意思。一天，我陪同他走访卡拉尔·达什特地区。我们有些劳累，便到临时准备好的帐篷里去歇脚。这时父亲边走边若有所思地说道：“我想这样来改造国家机关，使它在我一旦离开人世时，无需政府首脑的监督，仍能照常工作。”父亲的话对思想敏感而尚不成熟的我来说压力甚大。我从消极方面理解了他的意思，认为他不相信我能继承他的事业，这种想法使我十分懊丧，虽然我并未公开表露出来。

一九四一年九月事件发生后，我父亲被迫逊位，流亡国外，他出走后国家机关马上陷于一片混乱。这时我回想起他在这方面的忧虑和远见，不禁为他未能实现改革国家机关的宿愿而深感惋惜。

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占领伊朗一事，世间流传着不少蛊惑人心的错误说法。为澄清事实真相，我应该作些说明。我父亲曾与德国政府建立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一九三八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开始的前一年，德国在伊朗的对外贸易中占首位，苏联居第二位。德国主要购买我国的羊毛和棉花，而相应地出售工业机械和技术设备。同时大批的德国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到伊朗来，帮助我们修筑铁路，兴建港埠，开办工厂，发展工业技术。因此我国大部分工矿企业多使用德国出产的技术设备和机器。象德黑兰电台安装的便是德国造的无线电发射台。在工厂建成并投产后，德国专家仍留在伊朗一段时间，以便管理机器设备；许多德国的工厂主和商业机构，在伊朗都设有代办处。每年都有不少伊朗青年去德

国留学,而有的德国教授则在德黑兰大学任教,担任农业系和畜牧业系的系主任。

纳粹分子把大量的宣传印刷品和各种图书捐赠给伊朗国家图书馆,并为伊朗电台编排详细的广播节目;他们在伊朗的官方记者向我们的报刊提供消息报道。一言以蔽之,他们在我国开辟了一个宣传中心。我父亲与德国建立极为密切的经济关系一事毫不足怪,因为德国货的质地优良,德国专家技术高超,是世界有名的。他们的商业协定也极为简单易行。此外,这个国家从未压迫、奴役过伊朗,极少干涉我国的内政。这与长期以来使我们遭受痛苦的两个帝国主义大国比较起来,是截然不同的。

另外,德国人还利用伊朗和德国同属于雅利安族这一点,大事宣扬,鼓吹两国合作联盟。伊朗人民对于强权政治司空见惯,以至于忽略了希特勒在践踏人类自由方面不亚于斯大林这一点。

⑤

再者,我父亲为了建设国家、发展工业和强化军队,迫切需要德国的技术设备和经验丰富的专家。当盟国一手控制了海上交通后,输入伊朗的德国货急剧地下降。此时英国向伊朗建议,由它提供基本贷款,并用这笔贷款向盟国购买伊朗所需要的物资。这项建议遭到伊朗财政部的拒绝,因为我们所需要的物资,盟国也同样需要。因此,在盟国占领我国之前,德国便经陆路向伊朗运送货物。

与某些历史学家的观点相反,我父亲对希特勒并无好感。早在一九三四年访问土耳其时,他就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土耳其结盟的德国人盛气凌人、不可一世

的态度有所耳闻。一九三〇年以来，希特勒及其追随者的飞扬跋扈则是有目共睹的。此外，希特勒野心勃勃地要征服欧洲，这使我父亲百般警惕，以免伊朗受制于德国。总之，因为我父亲爱好强权，所以象希特勒这样一个铁腕人物的存在，对他说来是不会自在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欧洲点燃，伊朗当即宣布中立。我父亲不愿意看到他的国家陷入战争的深渊，因此宣称伊朗不参与轴心国和盟国任何一方的军事行动，它有能力和军事实力相结合。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向苏联发起进攻后，伊朗政府再次重申严守中立。

在德国的猛烈进攻下，除非迅速得到英国和美国的援助，否则苏联必然灭亡，这是毫无疑问的。只要仔细查看一下世界地图，盟国在选择援助通道上的困境便一目了然。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苏联远东的其他港口，皆处于日本海军的严密监视之下。日本事实上在一九四〇年九月已与德国携手结盟，只是尚未直接参战。而且这些港口远离苏联的西部战线。盟国若通过位于北冰洋沿岸的摩尔曼斯克港向苏联提供援助则非常危险，因为满载军火的船只很容易受到埋伏在挪威海沿岸一带的德国潜水艇的攻击。再者，摩尔曼斯克港条件甚差，铁路运输不便，不能满足要求，待要从速扩建港口，亦是临渴掘井，无济于事。即使地中海和黑海对援助苏联是可取的水道（从理论角度看），盟国的船只在地中海航行也是很危险的。首先，象伊朗一样极力维护中立政策的土耳其关闭

了达达尼尔海峡,此海峡的某些地段,宽度甚至少于一海里,如要强行通过,势必遇到土耳其军队的激烈抵抗。同时还可能引起已占领希腊和保加利亚的德军的干涉。在这种困难形势下,盟国为达到增援苏联的目的,唯一现实可行的运输线,便是波斯湾和贯穿伊朗全国的大铁路。命运如此,只好听任真主安排了。于是,苏联和英国出兵占领了我父亲可爱的祖国,并将刚竣工的、他非常喜爱的伊朗大铁路攫为己有,专运军火,这使他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

那时,英国和苏联的宣传机器说什么盟军之所以进驻伊朗,是因为我父亲背弃了中立政策,拒绝驱逐侨居伊朗的德国人。这种说法显然是十分荒唐可笑的。首先,当时在伊朗不仅有德国的专家,而且还有大批的盟国侨民,他们均享有充分的法律保护;其次,在伊朗的为数有限的德国侨民,和上述构成盟国危险的问题相比只不过是区区小事而已。如今人们一致认为,假若盟国不需要经过伊朗运送军火的话,那么就绝不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兵占领我国了。应该指出,德军假若击溃苏联在高加索一带的防线——在一九四二年春季攻势中,德军几乎如愿以偿——他们肯定会长驱直入伊朗境内。众所周知,根据纳粹著名的卢森堡计划,他们会设想把在近东取得的胜利扩展到波斯湾,进而逼近印度。促使德军开进波斯湾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企图赶走苏军,以便独占高加索的石油;同时攫取伊朗的石油和炼油厂,排挤英国的势力。德国人很清楚,英国海军和盟国的陆军、空军全靠

伊朗石油保障燃料供应。他们竭力要切断盟国援助苏联的唯一通道。

这里应该看到事情的因果联系。如果盟国不是取道伊朗向苏联提供那么多的军火援助的话，那么德国军队一九四二年的进攻则可能大功告成，我国将沦为德国的附庸。或许有些伊朗人欢迎这种导致消除苏联与英国势力的胜利，但迟早他们会为生活在希特勒的铁蹄下而感到懊丧。事实证明，当苏联和德国签订秘密条约的消息四处流传，他们听说条约里规定苏联有权控制伊朗时，就完全改变了对德国的看法。因为这个条约比一九〇七年英俄协定更加阴险毒辣。一九四一年德军在苏联的胜利和他们经高加索向南挺进的可能性，使英国人坐卧不安，生怕危及印度、苏伊士运河和中东产油区的安全。

同年末，苏军展开大规模反攻，打乱了德军的进攻计划，并于数月后挫败德军的春季攻势，使之前进不得。然而盟国对战争的胜利仍无把握。正如邱吉尔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里所写的：“……甚至到一九四二年八月，即莫斯科之行和在那里开完会之后，与我同行的布鲁克元帅仍认为，德军将经过高加索山区，占领里海一带。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地做好在叙利亚进行防御战的准备。”

正确与否暂且不论，反正盟国有这样的看法：德国与伊朗建立和平友好关系是征服伊朗的前奏。因为德国根据在欧洲取得的成功经验，总是采取始则对各国进行渗透，继则使其内部削弱，最后以闪击战消灭之的策略。盟

国窥视着德国人在伊朗的大肆宣传，认为德国间谍能轻而易举地毁掉贯穿伊朗全国的大铁路，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能对铁路、桥梁和隧道进行灾难性的破坏。一座大桥或一条主要隧道的毁坏，意味着伊朗铁路几个月的瘫痪。此外，石油设施和炼油厂也是极好的轰炸目标。盟国感到伊朗南部的产油区对德军采取这类行动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还应指出，当时有八只德国和意大利货船停泊在沙赫普尔港。虽然这些船只始终处于两艘伊朗军舰的监视之下，但是货船上的水兵使盟国感到侷促不安，担心他们利用可乘之机，在夏台阿拉伯河将船炸沉，以堵塞阿巴丹大型炼油厂船坞的唯一入口。盟国的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假如其中的几只货船装有可燃物品，那么，做出这种事，岂不易如反掌？事实果然如此，当英国军队开进伊朗南部时，两只德国船上的水兵便开始炸船，其中一只遭到严重破坏而报废了。但炸船的位置选择不当，因此未能阻塞河道。

一九四〇年年中以后，英国对德国在伊朗的渗透越来越感到不安，几次就此事照会伊朗政府，建议限制在我国的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顾问和专家的名额。但我父亲指出，撤换德国专家有困难，因为德国会将此举看作是违犯中立政策的行动。同时我父亲保证，他的政府将有效地阻止德国人在伊朗的任何不适宜的举动。如今第二次世界大战业已结束，回顾过去，应该指出，战争期间在伊朗的铁路、石油企业中，一起重大的破坏事件也未曾发生。我并不是说，这应该归功于我父亲、我本人或者我国政

府的努力，这乃是历史的真实情况。同时还应该讲句公道话，即在盟军进驻伊朗之前，德国对于经高加索进军伊朗，然后占据我国的交通要道和石油设施始终抱有一线希望，所以没来得及实行它的破坏计划。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即希特勒出兵苏联之后的第四天，苏联便和英国勾结起来，向伊朗政府提出抗议。两国政府在对德国人侨居伊朗表示不安的同时声称，根据它们掌握的情报材料，德国政府官员正在伊朗策划政变。同年七月十九日，苏联和英国政府向伊朗政府递交了联合照会。八月十六日又发出措词更为强烈的照会。伊朗政府给予的答复在他们看来模棱两可，不够果断。很遗憾，当时与英国进行谈判的内阁官员不敢让我父亲知道盟国已决心动用武力，实践其警告。

八月二十五日英国和苏联政府再次照会伊朗政府，表示它们出于无奈只好采取更强烈和更直率的行动。于是，英军和苏军以南北夹击之势入侵我国。事件发生几小时后，我父亲迅即向苏、英两国驻伊朗的外交使节表示，准备答应两国政府的要求。然而他们却答复说，两国军队将继续向前挺进。

伊朗军队遭到突如其来的袭击，慌作一团，士兵们多被炸死在兵营里。规模不大的海上舰队，因事先毫无戒备，多被击沉。我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难怪我父亲和伊朗人民指责盟国愚弄和背叛了我国，因为盟军如此赤裸裸地侵犯我国的主权和独立，确实出乎我父亲的意料之外。他知道拥有强大兵力和装备的盟军要侵犯和奴役

他可爱的祖国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直至最后一刻，他仍认为出于道义上的考虑和对国际法、国际关系准则的尊重，盟军还不至于把事情做到如此地步。盟军迅猛的袭击打得伊军措手不及，除了几次小战役外，抵抗是微乎其微的。袭击第一阶段过后，盟军凶猛异常，我军显然不是敌手。在北线战场的我军战士只有教练枪与敌周旋，怎么能取胜呢？

三天后，原首相辞职，新首相下令伊军停止抵抗。实际上此令发布之前也没有认真地进行抵抗。九月九日新首相征得议会同意，答应了盟国提出的条件。盟军起初驻扎在远离首都的地区，未过几天，便借口伊朗政府食言，宣布盟军将于九月十七日午后开进德黑兰郊区。

九月十六日晨，伊朗国民议会宣布我父亲逊位，同一天我继位执掌朝政。盟国如愿以偿，推翻了我父亲的统治，打开了伊朗向苏联运送军火的通道。应该坦率地讲，它们亲手播下了将来矛盾冲突的孽种，实在令人遗憾。

回顾过去，我们不禁要问，盟国舍此有无其他办法呢？依我看答复这个问题很容易。首先让我引述邱吉尔先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概括地阐明了盟国的观点：“开辟经由伊朗的通道，对于同苏联的全面联系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一方面取道北冰洋向苏联输送武器和各种军火实在困难，另一方面必须考虑到未来的战略条件。我对调遣军队去中东并非没有疑虑，但是为此提出的论证却是令人信服的。伊朗产油区被认为是战争重要的和基本的因素。假若苏联失败的

话，我们应该准备占领它。”“威胁印度的问题也在议事日程上。英军对德军经过英勇奋战，作出重大牺牲，终于粉碎了伊拉克叛乱和占领了叙利亚，这就彻底打乱了希特勒在中东的军事部署。但是，苏联若吃了败仗，他就可能制定出新的计划。在德黑兰有一个人数众多、十分活跃的德国使团，它在伊朗的声望极高。在去波罗圣底亚之前（波罗圣底亚湾在纽芬兰，邱吉尔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九日在那里首次会晤罗斯福），我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以便制定进攻伊朗的军事计划，使之与整个战争相协调，并让他们在我外出期间用电报向我汇报工作的进展。事情这样办了。得到国防部批准的有关报告送到我手里。显然，伊朗政府不同意驱逐德国间谍和侨民，看来必须采取强硬措施。八月十三日英国首相艾登先生在外交部召见苏联大使马耶斯基先生，双方就两国政府向伊朗发出照会的内容要点达成了协议。八月十七日英国和苏联政府向伊朗递交了共同照会，因未得到肯定的答复，遂决定两国军队于八月二十五日开进伊朗。”

我不同意邱吉尔先生称之为事实的某些论述。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即使邱吉尔说的全对，盟国所采取的作法在我看来也是错误的和不适当的。首先盟国应该开诚布公地对待我父亲。最近我翻阅了当时盟国递交伊朗政府的抗议照会，觉得十分荒唐可笑。照会所谈及的只是些枝节小事，不厌其烦地在伊朗的德国侨民问题上大作文章，而对于开辟向苏联输送军火的通道，阻止德军侵入中东石油区或印度等重大意图，却只字未提。

我父亲机敏过人，熟谙韬略，只要英国和苏联毫不隐讳自己的真实目的，他是不难理解问题之所在的。但盟国仅把驱逐德国侨民一事作为口实，喋喋不休地述说这个问题。如上所述，在伊朗的大部分德国人均在重要的工业部门工作。据统计，他们的人数连同其家属在内不超过四百七十人。即使几个德国侨民没有护照，那也无关大局。可想而知，我父亲对盟国施加于我国的压力，硬要把这些德国侨民驱逐出境，感到愤慨。盟国对此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可以断言，盟国的照会是一种伪善的外交手法，其真实目的并不是要取得伊朗政府的谅解，只不过是侵占我国制造藉口罢了。

礼萨王觉察到盟国的态度蹊跷，遂破例地指令伊朗驻伦敦公使探询盟国的真意和要求。但为时已晚，无济于事。我父亲已通知德国驻德黑兰公使，表示伊朗政府决定遣返尚未撤走的德国侨民。德侨经土耳其返国的安排业已就绪，可是未能成行，因为盟国迫不及待地采取了军事行动。

盟国不仅应该开诚布公地与我父亲打交道，而且应该郑重其事地向他提出政治结盟的建议。或许有人反驳说，礼萨王的政治观点与结盟是格格不入的。但假若盟国在侵犯我国主权和独立之前，为此作出必要的努力的话，我认为礼萨王会欣然接受盟国的建议，或者自己逊位让我做这件事的。

这里我想把一件至今无人知道的事公诸于众。我父亲在逊位前几年，就打算主动让位于我。当然，关于此事

他对我是守口如瓶的。后来，一位皇戚，也是他的顾问把这件事告诉我。我父亲计划把王权交给我，而自己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在必要时以他的经验和学识助我一臂之力。然而执政谈何容易，至今我尚感到吃力，那时就更不用提了，因此要我登基为王还为时过早。我想，他大概计划于一九四〇年或稍后的时间引退。

我不是说盟国应该洞察我父亲的隐情，我是说盟国在仿效希特勒侵犯伊朗领土而践踏它们为之而战的神圣原则之前，应该力争与礼萨王缔结相互尊重的盟约。

既然在盟军入侵几个月后，联盟可以成为事实，那么若在事件发生之前，就促成这种联盟的实现不是更好吗？那就不会造成流血，伊朗同苏联、英国之间也就不会产生怨恨和敌意了。

此外，盟国既然担心德军开进伊朗，那为什么不尽早同我国签订军事的或政治的同盟，以求得伊朗的军事合作呢？某些人会说，鉴于礼萨王奉行严守中立的政策，提出这种要求似乎是不现实的。我认为，我父亲是一位通情达理的人，他视国富民强为最高宗旨。假若盟国不是隐晦曲折地讲些模糊不清的话，而是直言不讳地向礼萨王表明其考虑到伊朗利益的真实战略意图，那么他肯定会理解盟国的要求。我的看法仍是这样：或者我父亲欣然接受盟国的建议，或者他采取规避态度，将这件事交给我完成。盟国大可不必急急忙忙地把其他地方的军队调遣到伊朗，我国也不至于遭受侵略和蹂躏，陷于极度的混乱和虚弱，而会尽快地与盟国一起参加反希特勒的战争。

提出政治和军事的联盟建议之后，不管是达成协议也罢，未取得任何成果也罢，盟国都应该把运输军火的问题同战争之初它们所宣称的有义务维护小国的自由和独立的崇高目标协调起来。

盟国的高级首脑理应同我父亲或者同继承王位的我进行磋商。他们可以说：“我们不得不把大量的战争物资运送到几乎陷于绝境的苏联。从地理位置和逻辑上看，伊朗皆是实现这个目的的唯一通道。我们准备作为使用贵国的港口、贯穿全国的大铁路和公路的代价，支付公平合理的费用。绝对不违反和侵犯伊朗的中立和独立，也不派遣军队进驻伊朗。假如你们同意的话，我们仅委派运输业专家到贵国，以帮助运送军火并确保道路的通畅。经伊朗运输军火，对我们说来是生命攸关的大事。我们认为，与贵国头号人物即国王缔结友好协定，以实现上述目的是适宜的。”

应该指出，希特勒为了过境运输军火，曾同瑞典和瑞士两国政府缔结过类似的协定。他的真实意图何在姑且不论，然而确实尊重了上述两国的中立。他甚至连派遣运输业专家和警卫人员的要求也未提出。难道盟国就不能这样尊重我们的中立吗？

假如当时我执政的话，我会象曾说过的那样，欣然接受盟国的建议。我想礼萨王若不逊位，他也会这样做的。从我父亲的道德为人来看，他可能会为接受这种建议的后果深感不安，但他会明白，与其伊朗被侵占，还不如接受盟国的建议。那样的话，我继承王位的日期将延迟，这

对我倒无所谓，重要的是我的国家将幸免一场巨大的灾难。盟国自然会得到更大的利益，也无须乎在伊朗留驻大量的军队。

可惜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有一种说法认为，我父亲之所以引退，是为了将王位传给他的儿子。这纯属无稽之谈。他十分关心对我的教育，这就足以证明，继承王位的事是他长期考虑的问题，绝非权宜之计。他逊位的根本原因，是不忍目睹外国军队侵占和蹂躏他的祖国，也不能对侵略者恣意干涉伊朗内政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他曾感情激动地向我倾述过这样一番话：“人民始终把我看作是独立自主、意志坚强的国君，是国家和他们利益的有力维护者。拥有人民如此的信任、敬仰和爱戴，我决不会作一个被占领国家的傀儡皇帝，而听命于英国和苏联的一名下级军官的驱使。”这里应当指出，我上台执政后，除了盟国的元首和他们的大使而外，我从未同其他代表商谈过，也没接见过任何人。

总之，外国人心里明白，要我父亲与他们携手合作是不可能的；我父亲也决不会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用强制手段逼迫他退位，流亡国外，乃势在必行。事有巧合，我父亲也愿意到外国去。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已故的父王陛下与盟国不谋而合，他的出走使双方各得其所。

我父亲挺立在一只英国船的甲板上，向他可爱的祖国投以最后的一瞥，遂动身去毛里求斯岛。本来他打算去南美洲，后来才改变计划，先到马达加斯加东部的英属

毛里求斯，再辗转到非洲的约翰内斯堡。三年后（即一九四七年）他以七十岁高龄薨于该城。

有人说，我父亲在流亡期间情绪沮丧，忧心忡忡。据我所知，这纯属谣言，不符合事实。那时我和他有定期书信来往，因此我比任何人更了解他的精神状况。父亲在书信中只字不谈国事，但每封信都鼓励我在前进的道路上要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我几次向他建议撰写个人回忆录，以便作为伊朗近代史的资料保留下来。但他总是固执地加以拒绝。他担心出于偶然或在爱国主义感情的驱使下叙述问题时，造成对祖国的不利影响。

我父亲知道，我和我的助手们在执掌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上并没有丝毫的疏忽大意，因此不必干涉我们走一条适宜的道路和损害我们成功的希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父亲的胸中始终沸腾着对祖国的热爱。除了国家的繁荣昌盛之外，他别无所求。

我于二十二岁^①继位执政时，面临的困难多如牛毛。我的首要施政措施是，重新制定伊朗的外交政策。因为我父亲采取的公开的中立政策效果不佳，被认为是一个失败的政策。我深切地感到，与盟国的合作是大势所趋，难以避免的，同时也是完全必要和有利于国家的。令人高兴的是，新任首相、伊朗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穆罕默德·阿里·弗鲁基完全赞助我的外交主张。在他的努力下，

^① 伊朗现国王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生，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六日即位。序言中提到他二十一岁上台执政，是指实岁。此处写二十二岁继位，是指虚岁。——译者

伊朗同英国、苏联就缔结三国同盟条约举行了会谈，并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共同签署了这个条约。在条约里，英、苏两国明确表示，它们的军队驻扎伊朗，决不意味着是军事占领（虽然全体伊朗人民都认为驻军本身就是军事占领）。同时，它们保证尊重我国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并保证在对德战争结束后六个月内从伊朗撤走各自的军队。英、苏两国答应帮助解决由于战争给伊朗带来的经济困难。当然，我们也要为盟军过境和经伊朗向苏联运输战争物资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奉行新的外交政策后，我们遂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断绝了外交关系，并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九日对纳粹德国宣战。

盟国对伊朗的侵占，我父亲中央集权体制的突然崩溃，使我国陷入新的危机和动乱之中。盟国明目张胆地削弱我的权力，以为这样就可以控制我国。盟国肆无忌惮地干涉我国内政，引起我国人民和我的极大愤慨。这里仅举一例即可说明问题。盟国无视当时严重的通货膨胀，竭力主张大量发行纸币，以满足驻伊盟军经费开销。这项主张为伊朗国家法律所不容，盟国遂求助于当时的首相戈旺姆，要他不必顾及法律条文，尽可能地满足它们的要求。因得到答复说，这样做是行不通的，盟国即对首相施加压力，企图迫使议会通过新立法。戈旺姆表示，国民议会恐怕不愿意批准这样的法案。紧接着这些谈判，一天英国大使来见我，说他代表本国政府、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有必要指出：戈旺姆得到它们的信任，但他却不能与现议会共事，因此请求我解散议会。这是由一个驻外

使节向我提出的荒诞的建议。我对他说，“对伊朗政府表示信任的应该是我和伊朗人民，而不应该不是你。虽然我们是盟友，但只有我和伊朗人民才有权决定是否解散议会。我不允许外国人在这件事上向我们发号施令。”我断然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事过不久，一些暴徒开始在德黑兰闹事捣乱，制造事端。英国遂以平息暴乱之名将撤出德黑兰的军队重新派回首都，以此要挟议会，答应盟国的要求。

与此同时，早先被我父亲缴械了的一些游牧部落，用从散兵游勇和军火库走私来的武器重新装备起来，又开始打家劫舍，搜刮民财。当时大米、砂糖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业已实行定量配给。盟国将分配的票证交给各部落酋长，让他们发放给当地居民；这些酋长乘机大作票证交易，牟取暴利，作为他们武装叛乱的资金。我父亲在位时业已销声匿迹的宗教狂，于是死灰复燃。某些英国的政客似乎认为，上述几种人能够阻止共产主义的渗透，因此英国人支持他们也有一定的道理。另一方面，苏联则大力扶植由共产党人指挥的、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的政党和工会，向他们提供活动经费。其中最危险的政党是人民党。

在伊朗北部诸省的苏联人，拒绝同我们的官员合作，将该地区完全置于自己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控制之下，致使苏占区几乎成为“国中之国”。正如后来的事件所表明的，苏联的企图正是在上述地区维持这样一种局面。

国民议会变成了诽谤、争吵、谩骂的场所，毫无秩序，

乱作一团。立法机关干预司法机构和法院的事务，妨碍法律的贯彻执行。国家工作人员消极怠工，无所事事。

执政之初，我的首要工作之一是重新恢复民主立宪制。那时国内政治极度混乱，糟糕透顶，即使我对建立民主制完全丧失信心也无可非议。然而幸运的是，我的政治信仰坚如磐石，以至危机四伏的形势也未能使我抛弃为杰斐逊^①等世界伟人肯定下来的、我所决心捍卫过的民主原则。

从经济方面看，物价暴涨，令人瞠目；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二年间，通货膨胀达到惊人的程度，生活费用猛涨百分之四百。盟国在伊朗的花销，加速了货币流通，使缺货商品的价格扶摇直上。伊朗北方各省生产的小麦和稻米，本来可以满足其他地区的需求，可是苏联人极力阻挠农产品的外运。他们大量抢购，运回国内。卡车和货车车皮被盟国征用，妨碍了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运输，造成物价飞涨；某些不道德的伊朗资本家趁火打劫，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放高利贷，剥削平民，大发横财。盟国甚至企图征用我们的军火工厂，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是事实。苏联人坚持要把我父亲创办的弹药厂迁移到苏联去；英国人则要征用伊朗军队拥有的一百零五毫米口径的大炮。但均遭到我的拒绝。

在伊朗被占领期间，我沉浸在悲痛之中，一刻也不得安宁，过分的忧虑使我夜不成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我都反对盟国侵占伊朗，我认为这是对我国独立和主权的

^① 杰斐逊：美国第二任总统，《独立宣言》的主要撰写人。——译者

粗暴侵犯。举目四顾，看到的尽是人民的不幸和灾难。这一切全是盟国的政治和经济入侵造成的。最令人痛心的是，某些伊朗财主贪得无厌，他们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和国家的利益，一心只想发国难财。

在这种情况下，盟国顺利地通过我的国家，把军火和战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苏联。物资的运输是这样安排的：英国人将物资从波斯湾各港口运至德黑兰，交付苏联人，由他们自己转运到苏联。

一九四二年末，陆续到达波斯湾的三万美军与英军汇合。英美两国将大量崭新的火车头和车皮，以及成千上万辆卡车开进伊朗，以便运输重型武器和物资。因此一九四三年五月份的伊朗铁路和公路的货运量竟达到一九四一年货运量的十倍。盟国几乎向苏联运去总数为五百五十万吨的货物和军火。这个货运量相当于美国和加拿大战争期间总货运量的一半。运往苏联货物中有一半是通过贯穿伊朗全国的大铁路完成的，其余的货物是用卡车经公路陆续运去的。令人诧异的是，英、苏、美三国自己拥有数目可观的军用卡车，仍然动用了四千余辆伊朗卡车，由为数不多的英国军官指挥调度。它们运输的战争物资比三个盟国的卡车运输的还多。虽然战争期间对伊朗的铁路和公路进行过维修，但由于盟国日以继夜地忙着运输军火，铁路设施和公路受到严重损坏，破旧不堪，难以使用。

运输军火和战争物资的工作异常艰难困苦。货船要在船舱温度高达华氏一百四十度的情况下，在南方诸港

卸货；铁路隧道里闷热异常，令人窒息，司机不得不下车到外边来透口气；山高路险不说，火车和卡车还得冒着冬天的严寒，在风雪弥漫中行驶。在这种艰苦条件下，三国、有时是四国人民密切地合作，正是这种合作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希望。与此同时，英国和美国大力支持我国风雨飘摇中的经济。英国于结盟的第一年，运给我们七万吨粮食，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我国的粮食匮乏，消除了饥馑的威胁。由英国创建、美国后来加入的中东互助组织，慷慨大方地向伊朗提供物资和技术援助。美国根据贷款租借计划，给我们运来了数量可观的食品和大批军事物资，并派出各种顾问到我国财政、市政、卫生和农业部门任职。

一九四二年夏天，我首次会晤了取道伊朗去莫斯科与斯大林相会的温斯顿·邱吉尔。他在德黑兰逗留两天。在我为他举行的午宴上，我们进行了有趣的交谈。双方讨论的问题之一是盟军开进欧洲，彻底粉碎希特勒德军的攻势问题。我向邱吉尔建议，盟军首先进攻意大利，在那里站稳脚跟后，再经巴尔干半岛展开强大的攻势。当时邱吉尔一边倾听我的建议，一边思索着这个问题。我注意到他的眼睛闪烁了一下。当时他对我的建议缄口不语，可是后来他关于从“柔软的腹部”即意大利入手，攻占欧洲的计划，却与我的建议相差无几。我们两人的战略观点一致是偶然的巧合，但假若上述计划付诸实现的话，那么中欧各国的历史就要重新撰写了。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历史性的德黑兰会议在罗斯福、

斯大林和邱吉尔的亲自参加下召开了。会议期间，罗斯福不知为什么下榻在斯大林居住的苏联大使馆内。邱吉尔住在英国公使馆（会议召开之后晋升为大使馆）。罗斯福身体欠佳，不能离开住所，于是发生了这样奇怪的事：我到苏联使馆去会晤罗斯福，而出来接见我的却是斯大林。全部会谈都是在苏联大使馆进行的。只有一次例外是邱吉尔为纪念自己的诞辰在英国使馆举行了宴会。

伊朗虽然没有正式参加三国会议，但我却分别与英、苏、美三国首脑举行了会谈。斯大林与我会晤时，表现得温文尔雅，老成持重，似乎想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他甚至建议赠送能装备一个团的T—30型坦克和一批战斗机。因为伊朗十分缺乏新式武器，我准备接受他的馈赠。可是几星期后，从情报部门获悉，这批赠品附带有苛刻的条件，即苏联军官和士官生将与赠品一起来伊朗；坦克只能安置在加兹温，战斗机必须停放在马什哈德；训练时间结束之前（日期尚未确定），这些坦克和飞机要由设在莫斯科的苏军司令部直接指挥。这里好有一比：就象目前到伊朗来帮助我们加强军事力量的美国军事顾问提出要求说，伊朗军队要由他们指挥，否则的话就不提供援助。不仅斯大林的这种有附带条件的赠品我不能接受，就是其他国家提出类似的建议，我也要断然拒绝。正因如此，我婉言谢绝了斯大林的馈赠。罗斯福在与我会谈时表示，在总统任职期满之后，他想以森林开发专家的名义再度到伊朗来。他对这方面的爱好是尽人皆知的，在有关这个问题的谈话中，他所流露出来的兴趣与热情足以说

明他的愿望是真诚的。在我眼里，罗斯福是西方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按照学者们的传统说法，他乃是伊朗和伊朗文化的崇拜者。虽然我不同意罗斯福在某些方面的外交政策，但在其他方面我对他还是十分钦佩的。很遗憾，突然的逝世使他未能实现这种对我们说来极为宝贵的宿愿。

当伊朗人民得悉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签署了德黑兰宣言的消息时，精神振奋，欣喜若狂。千百万伊朗人民由于国家经济状况的恶化，长期以来过着难以忍受的生活，心里十分惶恐不安，他们不知道战争灾难结束之后，是否能重新获得失去的自由。

十二月一日发表的德黑兰宣言，从以后发生的事件来看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有必要引述一下它的某些基本段落：“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合王国政府肯定了伊朗在促进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中，特别是对大洋彼岸国家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运输军火提供便利条件方面所给予的援助。上述三国确认战争给伊朗造成的特殊困难，同意向伊朗政府提供各种可能的经济援助……”“美利坚合众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合王国政府同伊朗政府在维护伊朗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观点完全一致。对伊朗政府遵照四国政府一致同意的大西洋宪章，与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参与巩固国际和平和战后安全与繁荣一事表示赞许。”

人们读着这令人振奋的字句，期待着盟国胜利时刻

的来临，对我的祖国艰难时刻的即将结束满怀信心。然而，过去的事情比起将要发生的事情来总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且不谈我受教育时期的结束，而着眼于即将谈到的更加困难的阶段。

第五章 动荡不安的岁月

几年前，穆罕默德·摩萨台博士声名大震，红极一时，成为伊朗近代史上被美英报刊议论最多的人物。有些外国人竟然把他当作评判伊朗和伊朗人民的标尺。在这本书里我要使读者相信，摩萨台决不是伊朗的象征，也不是我国人民的楷模。

前一章谈到，我父亲曾于一九四〇年拘捕过摩萨台，因我的说项他才得以获释。

一九五三年，他因参与背叛祖国的颠覆活动，被判处死刑。我当时写信给法院，表示宽宥他对我犯下的罪行。正是由于这封信发挥了效用，加之他已年迈，他才幸免于死；而通常在伊朗和其他国家这种人是难逃死罪的。这样，摩萨台再次因我的干预得以死里逃生。他仅仅坐了三年单独禁闭。

一九五六年出狱后，他回到德黑兰郊区的私人庄园。在这本书出版的今天，他正象富翁一样在庄园里享受天伦之乐，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十分留意观察摩萨台的为人，对照他的言论和行动，了解他的道德品质，切实掌握他

的言行在国家生活中发生的影响。特别在他担任首相期间，我更加注意观察、研究他。我发现他在社会活动中的言论，还是冠冕堂皇的。摩萨台于一八八一年（不少人认为还应该往前推几年）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大地主家庭。他曾在法国和瑞士攻读法律学及其有关科目，以后进入政界，分别在财政部、司法部和外交部供职。英国人协助他出任法尔斯省省长，后来却被任命为阿塞拜疆省省长。一九一五年他首次当选为议会议员，到他彻底垮台为止，始终保持着这个头衔。摩萨台从一九五一年四月至一九五三年八月担任内阁首相。在此期间，他的精神面貌和道德品质得到充分的表露。多数人认为他是个正派人（然而，下面会谈到的，他的正派只是口头上的），从来不是共产党。表面看来，他似乎是回避共产党，但实际上他却离不开共产党，他把共产党当作自己往上爬的阶梯。据说，年轻的摩萨台在恺加王朝时期曾作过霍腊散省的财政局长，那时他用伪造的证件强占了别人的土地。根据至今仍在沙特阿拉伯实行的伊斯兰教法规，他犯了诈骗罪，应被砍掉双手。这种说法是否确实我不得而知，但他显然并未受到这种惩罚，因为他在慷慨陈词地发表演说时，两只手总是不停地挥动。年青的时候他很可能干出这种贪财的丑事来，可是我怀疑他从中吸取了必要的教训。

现在让我们看看，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摩萨台还缺少哪些必要的品德和才干。

首先，他的社会知识极其贫乏，这使我感到十分诧异

异。他虽然在国外学习多年，可是并不了解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特别在经济方面，他的知识实在少得可怜。我对经济学也没有什么专门研究，但总还知道些国内外的经济状况和一般的经济规律。作为国王，我经常接触许多具有不同经历和各种政治、经济观点的政府官员。坦率地讲，象摩萨台那样对于生产、贸易和其他经济事务一窍不通的官员，真是所见无几。这种情况确实令人费解，因为摩萨台并不愚笨，而且是比较喜欢钻研的人。他之所以对经济事务这样无知，恐怕是因为受到自己过激思想的扰乱，以致不暇深入具体地研究任何经济问题。

比这种情况更严重，危害也更大的，是他的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态度。我们不妨拿希特勒同摩萨台比较一下。希特勒疯狂，蛮不讲理，总是攻击和咒骂已达成的协议；然而他的纲领却是明确而具体的。摩萨台的政治主张和他提出的种种目标，暂时也可能受到民众的欢迎，但充其量不过是虚无飘渺的海市蜃楼。

事实上摩萨台所奉行的原则，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消极的均衡政策”。

摩萨台的讲话似乎很有逻辑性。他开始总是讲伊朗长期以来处于外国势力的束缚和压力之下，从这一前提出发，马上得出结论说，伊朗应该遵循的路线是不向外国人出让任何特权，也不接受他们的任何援助。乍一看，这种主张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流行于美洲某些国家的“不干涉政策”有些类似。可是摩萨台的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方针远远不止于此，它不仅反映在对外政策上，而且还

渗透到国内政策中来。

竭力反对在伊朗修筑铁路，是他这种思想的明显例证。记得有一天，他明目张胆地向我表示：礼萨王修筑铁路是别有用心的。当我问及其理由时，他回答说，礼萨王纯粹为了博得蓄意进攻苏联的英国人的欢心，才修建了贯穿伊朗全国的大铁路。我问他，礼萨王是否应该选择另外的线路修筑铁路呢？他回答说，我父亲压根就不应该修铁路，因为伊朗根本不需要铁路。以前没有铁路时，人民生活反倒过得更富裕些。他喋喋不休地论述这种观点，说什么礼萨王执政之前，伊朗没有铁路，也没有值得一提的港口，那时的街道不是柏油路和人行道，而是泥泞不堪、不象样子的土路，但我们的国家却是独立的。为了批驳这些胡言乱语，我提醒他不要忘记：在礼萨王执政前的伊朗，外国列强享有“领事裁判权”，它们可以独自审理本国侨民的法律诉讼；那时我国被列强瓜分，一半在俄国的统治下，另一半被英国侵占；国内治安和司法情况糟糕透顶，以至日落之后，德黑兰街头行人稀少，生怕遇见拦路抢劫的强盗，凡此种种，难道可以称之为独立吗？摩萨台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无言以对，只好作罢。可是，我发现，我的话犹如对牛弹琴，丝毫也没有改变他的偏见。

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摩萨台虚无主义的思想方法。某天，他问一位到拉姆萨尔出差回来的医学院院长旅途情况如何。院长回答说，整个出差还算愉快，只是道路太不好走，应该彻底予以整修。摩萨台听后，勃然大怒，回答说，这类出差根本没有必要，最好还是呆在家里休息，

不要东跑西颠的!

知道摩萨台诸如此类不合情理的思想的人也许会说，他可能太迷恋美妙的过去以及西方科技尚未改变世界面貌的那段时期了；他大概象个富于幻想的思想家，总希望伊朗的时针倒转。但是，这些说法都不能令人信服。摩萨台的这种思想，假如表现在一位深居简出、埋头读书的哲学家身上还情有可原，可是一个管理国家大事的政治官员若有了这种思想，那就相当危险而有害了。应该指出，摩萨台不仅对西方的科学发明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且对一切事物均采取这种消极态度。譬如，在他出任首相时，中断了我关于在贫苦农民中分配皇家土地的计划，而实行这种计划恰恰是提高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摩萨台不能容忍采取这种积极而有利于国民的措施，他也不喜欢我为了社会的发展和繁荣而制定的各项计划。我想，大概因为土地分配计划深受人民的欢迎，所以才引起他的嫉恨吧。摩萨台本人是大地主，爱财如命，实行土地分配自然会刺痛他的心。值得庆幸的是，在摩萨台采取反动措施之前，便垮台了。后面的章节里，我将叙述在他下台后，这项计划如何重新贯彻执行，并获得了成功。

摩萨台还从虚无主义的立场出发，看待国防和国内治安问题。他多次对我说，伊朗人由于列强的多次入侵遭受了极大的痛苦，看来无须乎徒劳地加强国防建设了。他甚至想在国内确立这样一种思想，可又不愿意将其传到国外去，即一旦遭到外国的入侵，伊朗将不进行任何

抵抗！

对于国内的骚乱，他不仅宣扬类似的观点，而且见诸于行动。

担任首相的摩萨台在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当人民党成员和其他骚乱分子破坏首都和其他大城市的秩序和安宁时，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加以制止。在骚乱面前，他的做法是派出几辆坦克和满载武装士兵的卡车，守卫德黑兰的几处地方，但是不许他们采取任何有效的举动。这样，街头上的骚乱、抢夺和格斗便在警察和治安人员面前发生和继续，而他们却遵照摩萨台的命令不予干涉，袖手旁观。

摩萨台的一些追随者再不能容忍他对这种日益扩大的骚乱所采取的放任态度了。他们觉悟到，摩萨台出于无知或者有意地正在把国家拱手交给共产党。

有些人认为，摩萨台在国防和维持治安问题上的虚无主义态度，可能来源于他以热爱和平为基础的哲学观点和宗教信仰。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也不符合事实。因为他并不支持确保和平安定的生活，也不具备“甘地”的道德品质。反之，摩萨台及其一伙总是控制和利用一批流氓分子和冒险分子，在城市里横行霸道，欺压平民。此外，应该看到，甘地的追随者在印度解放之后，并没有把争取和平同维持国家的治安对立起来。印度拥有强大的陆、海、空三军，当孟买和其他城市发生暴乱时，警察部队立即出动，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迅速稳定了社会

秩序。

摩萨台性情乖戾，经常做出些荒诞不经的事来。我第一次注意到他这种怪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朗被盟军占领的时候。那时，我对于盟国干预我国的议员选举一事十分恼火。盟国官员将事先拟定好的议会议员候选人名单交给当时的首相，对之施加压力，硬要让他们指定的候选人当选。这种做法对我来说是难以容忍的。我打算与摩萨台商量一下，以便阻止这种强人所难的作法。那时摩萨台是个受人尊敬的国务活动家，他反对在伊朗的各种外国势力，与我的关系也不错。因此我想，假如根据宪法的规定，指派他出任首相负责组阁的话，他大概会要求在全国举行完全摆脱外国影响的大选。于是，我召见他，向他说明了我的意图。摩萨台在答复时表示，要他出面组阁需要两个条件。我问是两个什么条件。他说，第一要派武装人员保卫他的个人安全。对此我立即应允了。他的第二个条件是要求事先征得英国人对这项计划的同意。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便问道：“那么俄国人呢？”他回答说：“他们无关紧要，唯独英国人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每一件事。”听到此话，我声色俱厉地告诉他，我父亲在执行决定时，从来没有征求英国人同意的习惯。摩萨台对我的话置若罔闻，聒不知耻地说他这是经验之谈，顽固坚持只有在英国人同意的条件下，才与我进行合作。

他这种危险思想和态度使我很不安。可是我觉得，应该以大局为重，首先看到国家陷于侵略者魔掌之中

的严重形势。在这危急的时刻，摩萨台的爱国精神和他在人民中享有的威望对国家还是有用的。有鉴于此，我勉强答应了他的要求，派人去英国驻德黑兰公使馆，把我的意图通知大使。但是，我并不同意摩萨台提出的仅与英国大使进行磋商的意见，我告诉他，还要派人到另一个占领国——苏联的使馆去，让苏联人也知道这件事。翌日，派去的官员向我汇报了同两位大使会晤的结果。英国大使利德尔·布劳德爵士不同意这项计划，声称若举行大选势必引起混乱。苏联大使却未提出任何异议。应该说，苏联大使的这种态度与苏联人后来采取的作法相比还是令人满意的。

得知两位大使的看法后，我打电话给摩萨台，将商谈的经过告诉他。他除了表示感谢以外，未给我任何答复。摩萨台对举行大选的兴趣全没了，我也打消了指派他出任首相的想法。

数月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表明，摩萨台反对外国势力的主张与他的实际行动完全对不上口径。那时，根据规定，要有三分之二的议员出席，才能举行议会会议；要有四分之三的议员投赞成票，才能通过法令。约有四十人组成的议会少数派利用这项规定，经常抵制议会会议，使议会得不到足够的多数票，无法行使权力。这个议会少数派的领头人便是摩萨台。他们一伙这种违背爱国主义原则的行径，实在令人难以容忍。我召见摩萨台及其亲信，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为什么要使国家的工作陷入瘫痪？他回答说，因为苏联人不满意首相。这使我大

为惊讶。我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取悦于苏联人，难道某个小国反对我们的首相，他也采取同样的作法吗？摩萨台拒不回答这个问题。

在此期间，美国和英国石油公司希望更多地获得我国南部石油的开采权，苏联则要求伊朗北部的石油租借权。一九四四年议会通过了摩萨台的一项提案，根据这项提案，不经议会批准，政府无权出让任何石油特权。这件事使摩萨台的名声大振。

应该说这项提案非常及时，但同时也是摩萨台消极虚无主义方针的突出表现。战争结束后，摩萨台竭力要把一伙自诩为民族主义者的过激分子纠集起来，组成“民族阵线”。于是，宗教狂热者、大学生、商人和社会主义者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便逐渐地聚拢在他的周围。表面看来，似乎是厌恶外国人和反对外国势力的渗透这个共同因素把他们聚集到一起。而实际上，他们一伙狼狈为奸，执行的是盲目排外的消极政策。事后不久，因为否定不了伊朗对外国援助的需要，这个组织遂土崩瓦解了。

如前所述，一九四八年我曾遭到刺杀。我国人民知道这件事后，义愤填膺，全力以赴地声援我。随后，人民党被宣布为非法。正是由于伊朗人民对我的拥戴，我执行宪法的权力得以加强。

一九〇六年通过的伊朗宪法规定，除众议院外，还将成立参议院。可是，由于议会的反对，参议院未能成立。直到一九五〇年参议院方始宣告成立，并召开了首次会议。大约就在这时候，根据议会的决定，我象其他君主立

宪国家的首脑一样，获得了解散议会和举行大选的权力。一九四九年末，为了争取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我访问了美国。在那里，我受到极其热烈友好的欢迎，可是并未达到访问目的。因为杜鲁门总统虽然于一九四七年发表了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著名原则^①，而且美国政府在推行这些原则的过程中给予土耳其和希腊的援助成功地维护了这两个国家的独立，但是对于中东地区，美国政府尚未制定出明确的政策。另外，这次出访的不完全成功，显然还有我们本身的原因，即我们没有付出极大努力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对此美国人是心里有数的。中华民国政府(国民党反动派的政府。——译者)在一九四九年的溃败使美国人极为不安和懊丧，美国政府决定以后仅向那些有志整治内政的国家提供援助。有鉴于此，回国后我便不遗余力地推行国内改革。作为第一步，我清洗了一批腐化堕落的官员，并将经过长期研究的皇家土地分配计划付诸实施。

在这期间，美国正在世界各地推行杜鲁门的“四点计划”。一九五〇年六月，我指派拉兹马拉将军出任内阁首相。他与美国人签订了一个协定，根据这个协定美国政府开始向伊朗提供少量援助。与此同时，我组织了“反腐化堕落委员会”。由于委员们之间意见分歧，委员会的工作进展不大。一九四八年，经过同美国专家协商和征得议会的批准，我实行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七年

^①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杜鲁门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新殖民主义纲领，世人称其为杜鲁门主义。——译者

计划。其目的在于向美国和世界表明，伊朗将把所得的外援用于正当的事业。

虽然如此，我们关于得到大量外援的要求并未能如愿以偿。美国政府没有向我们提供足够的贷款，而只是从“四点计划”组织的贷款中拨出一小部分来给我们。华盛顿进出口银行答应提供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可是这笔钱比起我们为恢复因战争期间被军事占领而陷入混乱状态的国民经济所需要的资金来说，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争取美援的希望破灭了。我国广大人民认为美国在遏抑伊朗，因此逐渐产生了反美情绪。这使“人民阵线”得到发展壮大机会。资金的贫乏大大削弱了“七年计划”组织的活动，美国经济顾问相继离开伊朗返国。这期间，我国和英伊石油公司正在谈判增加伊朗在英属南方石油公司的股份问题，双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下。我们出于无奈，只好于一九五〇年同苏联政府签订了一个贷款为两千万美元的贸易协定，以弥补由于美援不足而出现的资金匮乏。而这样做正中摩萨台的下怀，对他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大为有利。下面就叙述这件事。

在实现石油工业国有化前的许多年中，英伊石油公司一直对伊朗的公众舆论置若罔闻。事实证明，这种态度是完全与该公司的利益背道而驰的。同样，摩萨台在担任首相期间的所作所为也以损国害己而告终。

英伊石油公司完全知道，西方各大石油公司为取得在沙特阿拉伯和中、南美洲各国开采石油的租借权而答

应支付的特许稅，较比伊朗同它缔结的协定中规定的特许稅额公平得多。英伊石油公司也完全知道，对于它从石油收益中拨出巨款上交英国政府，而交给伊朗政府的特许稅却少得可怜这一点，我们是极为不满的。此外，英伊石油公司还清楚地知道，我们对于它把在伊朗获取的大部分收入当作到世界其他地区扩大开采石油之用的经费这种作法十分恼火。可是，英伊石油公司根本不把我们的抗议放在眼里，这就使它在伊朗拥有的巨大财产陷入危险的境地。英国政府本来可以力促该公司采取比较明智的作法，但它并没有这样做。结果，英伊石油公司和英国政府触怒了伊朗人民。“民族阵线”乘机壮大势力，摩萨台大肆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蓄意掀起所谓石油工业国有化的热潮。当时的首相拉兹马拉不同意这种过激的作法，他希望能在友好的气氛中与英伊石油公司协商解决。但是摩萨台及其一伙反其道而行之，举行了反对内阁和英国人的示威游行。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七日，支持摩萨台的伊斯兰教费达依集团的一个宗教狂徒，在拉兹拉马首相去国王清真寺参加一位宗教界首领的追悼会时，卑鄙地杀害了他。几天后，议会通过了我完全赞成的石油工业国有化法令。我任命德高望重的老资格政治家侯赛因·阿拉担任内阁首相。侯赛因·阿拉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爭端，以便在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同时，仍能取得外国专家的帮助，使企业管理和石油开采工作得以继续。可是过激分子不同意这样做，一些破坏捣乱分子窜到南方产油区，在工人中间煽风点火，制造事端。处于

非法状态的人民党死灰复燃，重新拉起队伍，与这些破坏捣乱分子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结果，使若干伊朗人和三名英国臣民惨遭杀害。英伊石油公司的工作陷于瘫痪，不再向伊朗政府缴纳特许税。摩萨台向工人许诺说，只要把理应归伊朗所有的石油收入拿到手，即每天向公司征收三十万英镑的石油特许税，我国人民繁荣富裕的日子就会到来。他保证每个伊朗人每年可拿到按人口平均计算而应得的份额；并发誓与外国势力进行斗争，维护伊朗的主权。既然如此，谁还会再反对他呢？因此，大学生、商人、小贩、工人等不同阶层的人便汇集到摩萨台的周围，接受他的领导。

摩萨台以诸如此类的诺言，骗取了极高的声望。上台执政不足两个月的阿拉为形势所迫自动辞职，我遂任命摩萨台出任首相。当时，在争取首相职位方面确实没有人能与摩萨台相匹敌。摩萨台及其一伙喜出望外，得意忘形。他们认为，千载难逢的好时机终于到来了。摩萨台至少有两年的时间可以行施首相职权，并享有我的庇护与支持，尽管这种庇护与支持对我来说不是心甘情愿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摩萨台在首相任内究竟干了些什么，他使伊朗人民遭受了多大的苦难。那时，英国政府宣布，将把其伞兵部队运到塞浦路斯。有消息说，这支部队已做好开赴伊朗的准备。据传英国莫利托斯号巡洋舰已在阿巴丹港海面抛锚，另一支英国舰队正驶向伊朗海面。

我召见英国大使，向他严正指出：假如英国政府敢于

侵犯伊朗主权，我将亲自统率伊朗军队，进行坚决的抵抗。由于我的明确表态，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英国对伊朗的入侵并未成为事实。

为了寻找解决石油纠纷问题的有效办法，摩萨台完全可以采取同样明确而坚定的态度。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主动权让给了英伊石油公司。摩萨台把时间浪费在同石油公司的无谓争吵上，而这样做可能对国家产生什么影响，他却毫不顾及。直到他被解除首相职务，石油纠纷依然如故，没有一点松动。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国际银行、国际法庭、杜鲁门总统和其后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几家世界性大企业的负责人，都尽力寻求解决石油纠纷的办法，也都没有成功。摩萨台在其顾问们的煽惑下，一味固执己见，采取虚无主义的消极态度，使任何达成谅解的可能性俱皆化为泡影。他不把精力用在国家的改革和建设上，只会用争吵和漫骂浪费光阴。下面我们将谈到，摩萨台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采取了哪些措施和手段。

摩萨台对英国政府和英伊石油公司采取的政策，犯了两个大错误：

一个是，他固执地认为，没有伊朗的石油供给，世界经济和工业将陷入瘫痪。他由此得出结论说，石油公司及其庇护人迟早要向他下跪求饶。然而，当伊朗停止了石油生产时，其他产油国却提高了它们的油产量，以弥补石油的欠缺。当今世界上产油国很多，其中任何一国也不能垄断石油生产。事实上，世界石油生产的状况与

摩萨台及其一伙的想象恰好相反。摩萨台下野，伊朗石油生产重新恢复后，国际市场上随即出现了石油供应过剩的现象。为了使国际石油市场的供求关系得以平衡，几个国家被迫减少了本国的产油量。摩萨台及其一伙所以如此盲目地蛮干，就是因为他们错误地以为伊朗一国可以垄断整个石油生产。

摩萨台的另一个错误是，他认为没有外国的支援和帮助，伊朗也能把石油产品提供给国际市场。而那时的伊朗既没有一艘运油船，也没有石油外贸机构。我和伊朗政府为了创建油船队和在国外建立石油销售点所采取的措施，在后面的章节里将予以叙述。摩萨台与所有的外国大石油公司断绝了关系，可是又没有建立运输和销售石油的必要机构，以使我们能不再依赖外国公司。这就使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在摩萨台出任首相，伊朗宣布石油工业国有化时，英国政府和英伊石油公司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后果，改变了原先的主意，正式承认了伊朗的石油国有化原则。此后不久，还派遣石油股分协商团到伊朗。英国政府当时已同意在英、伊两国间平均分配石油总收入。假如摩萨台赞成进行公平合理的认真谈判，那么我国就不致于遭受经济拮据带来的危害了。我至今认为，摩萨台本人虽然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希望双方能够达成谅解的。而他的顾问们却很值得怀疑。我总觉得某些顾问对于能找到任何微小的解决办法都存心阻挠，以使国家经济遭受破坏，而最终沦于外国的奴役之下。对

这种荒谬绝伦的民族主义，我在下一章将给予剖析。

在摩萨台拒绝石油股分协商团的建议后，英伊石油公司和英国政府遂分别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申诉。两者在自己的诉状中都援引了我父亲的政府与当时的石油公司缔结的、直到石油国有化前一直按照它行事的一九三三年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当伊朗和石油公司之间发生争执时，应该找仲裁人处理。因此英国人要求海牙国际法庭依据上述协定的有关条款，确定一位法官解决争端。

但是摩萨台并不认为国际法庭有权过问此事。于是英国政府又把申诉转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安理会经过多次磋商后，于一九五一年十月作出决定，即在国际法庭对这项诉讼案作出胜诉与败诉的裁定之前，它将不予审理。在摩萨台携带伊朗提交安理会的诉状去纽约的途中，我特发一电以资鼓励，下面是他给我的复电：

德黑兰

国王陛下：

今奉无上尊贵而幸福的我王陛下电谕，不胜光荣之至，臣感荷实深。愿上帝保佑我王陛下健康、长寿、万事如意。卑臣所见，无论何时何地凡属成功者，率应归功于圣上对政府的无微不至的关照和强有力的领导。前不久已托宫廷大臣先生阁下禀奏陛下：臣等拟于星期一到达费城，星期二晨至华盛顿，一俟抵达即向陛下作出报告。恭请俯允卑臣对尊贵的国王陛下的特殊关照再次申表衷心的感谢。

摩萨台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于纽约

这份电报中表示的态度真诚与否，请读者根据以后

发生的事件自行判断，这里勿庸赘述。

一九五二年三月间，国际开发和发展银行作为友好的调解人，为消除英、伊双方的争执而积极活动。起初工作进展顺利，谈判似有可能成功。摩萨台对上述银行提出的建议，亦表同意。可是他的顾问们却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使他改变了主意，谈判因之告吹。就在这时，摩萨台内阁下令封闭英国在伊朗的所有领事馆。第十七届议会开幕后，仍享有声望的摩萨台再次成为首相候选人。他于一九五二年夏初宣称：除非拥有极大的权力，否则他将不能履行其职责。摩萨台担心议会和人民反对他的政策，遂要求授权他在六个月内不必征求议会的同意，自由地进行工作；并要求由他接管国防部，妄图以此来解除宪法赋予我的伊朗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权。

我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显然，交出这些权力将导致共产党人更猖獗地干预国家事务。正如读者将要看到的，未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我的这种看法。摩萨台曾于七月十六日辞去首相职务。我不太情愿地挑选了先前曾出任过首相的艾哈迈德·戈旺姆来代替他。据说戈旺姆有办法来对付左倾分子。

戈旺姆内阁组成之后，人民党旋即与摩萨台的拥护者勾结起来，举行游行示威，进行破坏捣乱，使国家陷入一片混乱。戈旺姆内阁对捣乱分子和过激分子的猖狂活动束手无策。这时戈旺姆在电台发表演说，反对民众在石油国有化问题上表现出的激昂情绪，致使局势变得更加险恶。年迈的戈旺姆身体羸弱，常在讨论重大的政治

问题时打瞌睡。他虽然竭力主张动用武力解决问题，但我却不忍心让一个极其虚弱的人去干这种事。我出于无奈，只好在他出任首相四天之后，把他解职了。看来当时没有人能够与摩萨台相匹敌。七月二十一日为防止发生内战，我被迫接受摩萨台的条件，重新起用他担任首相。此时，海牙国际法庭就英国对伊朗提出的诉讼案做出不利于英国的仲裁。法庭的英国法官站到伊朗一边，而苏联代表却抵制法庭的裁判会议，拒不参加表决。

从海牙国际法庭传出的好消息，使伊朗人民欣喜逾常。可是法庭的裁定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充其量不过是摩萨台鼓吹的排外主义的一次胜利罢了。人民由于兴奋而情绪激昂，摩萨台则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排外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

美国政府对伊朗政治、经济局势的混乱极为不安。八月三十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英国首相邱吉尔向摩萨台发出联名照会，提出了解决石油纠纷的新方案，可是摩萨台拒不接受这个新方案，并于十月二十二日与英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这期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炼油厂之一、阿巴丹炼油厂生产完全停止，没给国家增加一点收入。

摩萨台想方设法把伊朗石油出售给一些外国的小公司，这些小公司为了侵夺石油财富，不惜与原英伊石油公司闹翻脸。然而出售石油的总额还抵不上阿巴丹炼油厂过去一天生产的收入所得。

在此期间，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和邱吉尔

先生为了解决石油纠纷,恢复伊朗的石油生产,保障伊朗的财政收入,共同向我国政府提出了一项建议。这项建议象以往的建议一样,也被摩萨台拒绝了。上述几件事皆成为摩萨台排外主义政策成功的纪录。随之而来的是摩萨台虚无主义的“胜利”。得到我支持的参议院成立不过两周,摩萨台便迫使议会将它解散了,但却丝毫不触动完全成为他的傀儡工具的众议院。一九五二年年初,议会在我的同意下,以多数票通过了延长摩萨台首相任期的决定。我之所以表示同意,是为了提供一种机会,让他能在石油问题上执行积极有效的政策。可是遗憾得很,摩萨台为了达到私人目的愈加肆无忌惮地滥用职权。他查封出版物,拘捕报馆经理。他因为遭到某些议员的反对,便怀恨在心,想方设法削弱议会的权力。他命令其党羽抵制会议,使议会徒具虚名,无法开展工作。他还指使歹徒、打手闯入反对他的议员的住宅,或在马路上公开威胁、刁难他们。

一个总是告诫人们要提防货币贬值的人,自己却亲手干出了这种事。摩萨台在沒有增加黄金储备和外汇收入的情况下,盲目地发行纸币约达数百亿里亚尔^①。他物色亲信,指派他们充当军队和警察的指挥官,并允许和鼓励人民党的共产分子渗透到军队中去。他赞助延长军事管制,还迫使议会成立了一个七人委员会,其成员全是他的心腹。这个委员会准备好一个旨在削弱我作为全国武

^① 里亚尔:伊朗的货币单位,现在三十三三个里亚尔约合人民币一元。
——译者

装部队总司令权力的详细报告，摩萨台要求将它提交议会审议，但遭到议会的拒绝。在议会的摩萨台的追随者，包括卡尚尼在内，都不赞成他的这种作法。

摩萨台解散了国家最高法院。他竭力阻挠破坏议会的选举，遭到某些议员的坚决反对。于是，他宣布应该征求国民的意见，以全民投票的方式解决解散议会的问题。

议员们大概会记得，就是这个摩萨台在本届议会的开幕式上发表的简单讲话中曾说过，这届议会的议员百分之八十是真正由人民大众选举出来的。可是没过多久，他便出尔反尔，又要解散议会。在全民投票中，一向自诩为捍卫自由选举的英雄的摩萨台却大耍政治手腕。请看他“精心”安排的选举丑剧：凡是赞成解散议会的人，在一个色彩鲜明的票箱中投票，而反对解散议会的人则在另一个票箱中投票。经过这样安排后，投票反对解散议会的人无疑将受到摩萨台操纵的流氓、歹徒的刁难、辱骂和殴打。在场的群众分辨不清两边的人，只好袖手旁观。摩萨台步希特勒的后尘搞虚假的全民投票，结果当然是完全符合他的心愿，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投票赞成解散议会。一个人口仅有三千人的城市，赞成解散议会的票数竟达一万八千张。大概这个城市里的死尸也从坟墓中破土而出，把票投进了票箱！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死尸确实参加了这次投票和摩萨台其他类似的选举，因为真有成千上万按照自己的意愿参加投票的人惨遭杀害，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摩萨台身为议会议员已有多年，他一贯标榜自己是

立宪原则和得到大多数议员拥护的政府的坚决支持者，是国家法律的忠实执行人。他自我吹嘘说一贯反对军事管制，赞助自由选举和出版自由。

然而，就是这个摩萨台，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一手取消了参议院和国家最高法院；是他为了解散议会，极尽煽惑人心之能事；是他查禁了报纸刊物，扼杀了自由选举，延长了军事管制；是他不遗余力地削弱宪法赋予我的各种权力，践踏了好不容易获得的已有五十多年历史的国家宪法。摩萨台这样胡作非为，目的无非是要创造推翻国王的条件，以实现他大权独揽的野心。

我虽然几次拯救过他，并在其执政初期给予了大力帮助与支持，可是他从出任首相的第一天起，就心怀鬼胎，妄图推翻我的王朝，这一点我是心中有数。后来的无数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摩萨台是恺加王族的亲属，对我父亲登基执政自然是深恶痛绝的。他采取的策略是尽可能地败坏巴列维王室的声誉，逐步地创造摧毁巴列维王朝的条件。也许有人会问，既然知道摩萨台对巴列维王室怀有刻骨仇恨，为什么还不及早采取措施处置他呢？因为我总希望他能利用得到的机会，在实现伊朗人民的愿望和理想的事业中作出自己的贡献。尽管摩萨台对巴列维王朝的威胁与日俱增，然而我却始终认为他不过是屈从于一种来自国外的势力。因此我为他感到深为惋惜。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摩萨台劝告我最好暂时离开伊朗。为了让他放手地执行自己的政策，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规避他的阴谋诡计，我接受了他的劝

告。摩萨台叮咛我要对这个旅行计划严加保密。他表示将命令当时的外交大臣法台米亲自签发我的、我妻子的和随行人员的出国护照和其他证件。

令人注目的是，摩萨台神情紧张地叮嘱我千万不要乘飞机出国。他大概猜想反对这项决定的伊朗人民会集聚在机场，阻止我起飞。

摩萨台建议我不声不响地经伊拉克边境，去贝鲁特。我欣然采纳了他的建议。可是摩萨台的“天机”终于被泄露了。得到消息的广大人民群众立即举行了效忠国王的示威游行，场面热烈，感情真挚，振奋人心，我遂改变主意，放弃了出国念头。这时，人民党认为篡权窃国的时机已到，便迅速与摩萨台分子组成了反君主政体的统一阵线。然而，与他们的愿望相反，这样做的结果反倒使英勇的伊朗人民更加万众一心地团结在保卫我和我的国王地位的旗帜之下。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出国的决定未免太草率匆忙了，假如真的出走的话，确实是非常危险的。只是得助于至高无上的伟大的真主，我才化险为夷，幸免于难。

一九五三年夏，伊朗人民对摩萨台的胡作非为越发不满了；摩萨台集团也开始分崩离析，他的许多心腹和追随者相继走散。人们注意到，摩萨台的排外政策是有倾向性的，它的宗旨是驱逐英国人，而把共产党人引进伊朗。事情的发展促使人民觉醒过来，他们深切地感到自己的国家正在迅速地滑向政治毁灭和经济崩溃的深渊。摩萨台虽能解散议会，但却不能窒息反对他的公众舆论。

报社的记者面对摩萨台操纵的流氓打手的威胁和人民党的恫吓，勇敢地站出来抨击他的政策。

许多过去拥护摩萨台的宗教界人士、大学生和商人不再听从他的指挥，举起了反抗的旗帜。形势可谓大好，但要彻底打垮他，显然非动用武力不可。

美国政府对摩萨台执政期间的伊朗的局势日益感到不安，可是它对于采取有效的措施以稳定伊朗的政局和发展它的经济又莫衷一是。

在一九四九年——一九五〇年财政年度中，美国政府根据杜鲁门总统的“四点计划”原则，向伊朗提供了价值五十万美元的技术援助，在一九五〇——一九五一年财政年度，该项援助额增至一百六十万美元，而在摩萨台执政后，该项援助额提高到二千三百四十万美元，其中大部分金额被用来弥补由于石油事件而造成的国家外汇的匮乏。

一九五三年六、七月间，艾森豪威尔总统警告摩萨台，若不迅速解决石油争端，美国政府将不再增加向伊朗提供的财经援助，最多只能维持上一年度的援助额。

艾森豪威尔总统坚持认为，伊朗应该迅速改变对本国巨大的石油资源不加利用的状况。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财政年度美国的援助额略有减少，总数为二千二百一十万美元。不难看出，美国人尽管不大情愿提供援助以弥补摩萨台的错误作法给伊朗带来的经济损失，可是又担心完全停止援助，会将伊朗推到共产党集团一边。

摩萨台接受美援的作法十分离奇古怪。一九五一年他违反国际惯例，拒绝与美国大使签订有关的援助协定，而别出心裁地写信给美国驻伊朗的技术援助局局长，要求对方继续提供技术援助。只是在得到对方的书面同意后，每年的财经援助才得以继续。

一九五三年，陷入众叛亲离境地的摩萨台喋喋不休地吹嘘说，美国政府是支持他的政策的。他一方面向美国人施加压力，扬言若不给他更多的援助，伊朗就要转而求助于共产党集团；另一方面又对人民党的活动采取漠然置之的态度，任凭它的势力一天天地扩张。依我看，美国政府对摩萨台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是了如指掌的，但它认为应该由伊朗人民自己去解决本国的重大政治问题。后来，我们也确实这样做了。

摩萨台执政的后期，加强了守卫其宅邸的装甲力量和警卫人员，但却减少了守护我和索拉亚王后居住的萨德·阿巴德宫的坦克数量。有十二辆美制中型坦克警卫着摩萨台宅邸，而规模宏大的萨德·阿巴德皇宫却只配备了四辆坦克。显然，在群众闹事时这点守卫力量是无济于事的。

有鉴于此，我便和妻子迁居到位于拉姆萨尔的行宫去。我们在礼萨王时期修建的海滨大楼度过一段时间后，移至风景如画的卡拉尔·达什特区，住在一座小巧玲珑的别墅里。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三日，我签发了撤销摩萨台首相职务和任命萨希迪中将接替他工作的命令，国王卫队长

内玛托拉·纳赛利上校受命传达这项圣旨。

描述纳赛利上校完成这项使命的经过，使我想起了亚力山大·杜马时期三个步枪手的故事。所不同的是，步枪手的故事只不过是传说，而纳赛利上校所做的却是我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

纳赛利上校从拉姆萨尔动身，到达萨德·阿巴德皇宫后，首先要把我的命令传达给萨希迪将军。萨希迪曾是摩萨台的亲密助手，担任过其内阁的内政大臣。在拉兹马拉首相执政初期，他还出任过警察总监。为摩萨台再度当选议员，他立下了汗马功劳。萨希迪当时隐匿在德黑兰郊区，经常更换居住地点，所以除了几位密友之外，谁也不知道他的准确住处。后来，萨希迪将军不畏强暴，大胆地批评摩萨台的胡作非为，曾被逮捕过一次。出狱后，因没有人身保障，便躲在议会避难，此后又不得已过着隐居生活。

纳赛利上校在几个中间人的帮助和指引下，费了好大劲才找到萨希迪将军，向他传达了 my 命令。萨希迪当即表示保证做好执行命令的一切准备。

把撤职的命令通知摩萨台的时候到了。遵照萨希迪中将的指令，纳赛利上校首先拘捕了摩萨台的三个心腹顾问，从他们嘴里探听出摩萨台可能做出什么样的反映。

萨希迪中将指示纳赛利上校，尽可能地将命令直接传达给摩萨台，并向他索取收据，以防将来他矢口否认接到过圣旨。我事前叮嘱过纳赛利，要他留意，不要伤害摩萨台。

八月十六日夜十一点钟左右，纳赛利上校和另外两位军官一起从萨德·阿巴德宫出发去摩萨台宅邸。因为当天亲共产党的报纸在醒目的大号字社论中，要人们注意纳赛利上校的行动，说他可能发动政变，所以三位军官这时格外小心谨慎。

临近摩萨台宅邸时，他们发现四周有士兵和重型坦克守护。卫兵们奉命不准任何人、特别是国王卫队成员入内。纳赛利上校等三人毫不理会不准入内的禁令，镇静自若地从坦克车的炮口前面走过去，来到摩萨台宅邸的大门前。正如纳赛利上校所估计的那样，警卫人员和坦克兵因为认识他，出于尊敬，是不会开火的。纳赛利上校多次向宅邸的警卫官要求进见摩萨台，均遭拒绝。纳赛利万般无奈，只好委托一个他信得过的警卫官，将圣旨传达给摩萨台，并索取收据。足足等了一个半小时，警卫官才出来。后来才知道，所以耽搁这么久，是因为摩萨台同他的顾问和心腹们进行了紧急的电话磋商。纳赛利上校接到摩萨台签字的回执，辨认出是摩萨台的手迹便决定返回。这时已是半夜一点多钟。

纳赛利上校正要离开宅邸时，警卫人员上前来告诉他，奉军事司令部主任利亚赫少将的命令，请他立即到司令部去一趟。纳赛利暗自思忖道，利亚赫是摩萨台的人，此去恐怕凶多吉少。但又转念一想，也罢，乘与利亚赫会面之机，正好可以当面把撤销他司令部主任之职的圣旨告诉他。于是，纳赛利上校答应马上去国防部。不一会儿，便到了军事司令部主任的办公室。门刚一打开，他就

觉察到利亚赫已从抽屉里拿出手枪，正要藏到背后去。显然这是防备他下毒手。

利亚赫责骂纳赛利上校卑鄙无耻，图谋不轨，妄想发动政变。纳赛利上校不甘示弱，反唇相讥，说他只是受命传达圣旨并无政变可言，并展示摩萨台的回执给他看。利亚赫怒喝道：“深更半夜下达圣旨，那有这样的惯例？”纳赛利反问道：“深更半夜打电话密谋磋商，是根据那条军事纪律和礼仪原则呢？”利亚赫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只好说，“不管怎么说，也不能原谅你这种粗卤的作法。”当即下令扒去纳赛利上校的军服，将其押送监狱。

事过不久，纳赛利上校的兄弟得知此事，他机智地用刊登有我关于撤销摩萨台首相职务的命令的报纸，将睡衣和其他日用品包好，送进狱中。次日上午，摩萨台操纵的军事法庭审讯纳赛利上校，法官宣称有关罢黜摩萨台首相职务的命令不是国王签发的，而是纳赛利自己为了发动政变而伪造的。这时纳赛利上校把他兄弟送来的报纸展示出来，法官们看了无可奈何，审讯也只好作罢，将他重又押回狱中。

翌日，纳赛利上校从别人秘密送进来的微型收音机里得悉德黑兰市民正纷纷起来反对摩萨台，一场革命在进行中。监狱外面响起的呐喊声和大炮的轰鸣证实了这则消息。不一会儿，典狱长进来，命令纳赛利上校穿好军服，准备出发。这说明他们想放弃监狱。

纳赛利上校走出囚室，发现市民们手持棍棒向监狱蜂拥而来。监狱的卫兵虽然发出了停止前进的命令，但

人们还是一个劲地朝前冲。一瞬间，枪声四起，一位老妇人和几个年轻小伙子应声倒在血泊中，还有不少人身负重伤。可是后边的人仍然无所畏惧地向前猛冲，卫兵们招架不住，仓惶逃遁，人民终于占领了监狱。

这时，监狱的庭院变成了欢乐的海洋。数百名效忠国王、被摩萨台关押已久的囚犯获得了自由。当由我任命的而被摩萨台投入狱中的原军事司令部主任出现在人群中时，欢呼声鼎沸，大家把他抬在肩上，拥向司令部办公室。

就这样，人民表达了对于我的鲜明而热烈的爱戴之情，也反映出他们在摆脱了人民党的恐怖和摩萨台的黑暗统治之后的欢快心情。摩萨台的忠实走卒利亚赫见大势已去，遂逃之夭夭。纳赛利上校、其他军官和获释的囚犯们成群结队地拥向关押着国王卫队队员的德黑兰东郊的军事据点。他们途中所见，尽是爱国人民情绪激昂的游行队伍。与摩萨台时期的强制作法相反，这次示威游行没有人下命令，也没有事先计划，是人们自愿拥上街头的。时值盛夏，天气炎热，妇女们敞开家门，向游行示威的人供应清凉的饮料和面包。

当天早晨，军官学校发生了一桩不寻常的事情。胡斯鲁·达德少校——当时是中尉军衔的军校教官，现在是国王卫队长纳赛利中将的副官——亲眼目睹了事情的经过，他是这样描述的：那天早晨他象往常一样去军校上班，听说利亚赫少将有命令，要全体教官和学生，以及另外一些军官于上午十点钟到学校大礼堂集合，听取他关

于当前形势和国王动向的报告。命令下达后，引起了全体学生和教官的骚动和不安。该校师生中约有百分之九十是反摩萨台的，他们决定：假如司令部长官在演说中污蔑攻击国王的话，就起来造反，把他打倒。他们坚定地认为，军队只有在不干预政治，不支持任何政治派别，完全效忠国王的前提下，才能完成其任务；也只有这样的军队，才称得起是纯洁而优秀的军队。

利亚赫还算走运，他在获悉首都发生流血事件和军校学生的决定之后，便打消了去军校的念头。学生们等不到司令部长官来作报告，就纷纷走上街头，军校自动放假。

胡斯鲁·达德少校离开军校回家。途中，经过市内一个大广场的时候，他看到摩萨台的武装士兵正用机关枪扫射从四面八方围上来的人群。手无寸铁的群众面无惧色，奋勇向前，大批的人惨遭杀害。胡斯鲁·达德少校急忙乘出租汽车跑回家取武器。在返回的路上，他发现有一个营的坦克停在大街上。待他走近看时，营指挥官正和一个从坦克上下来的上尉争吵得面红耳赤。原来这个上尉是胡斯鲁·达德少校的朋友，一个反摩萨台的军官。上尉竭力主张攻击摩萨台部队控制的坦克，但他的顶头上司却下令返回驻地去。两个人争吵得越来越凶，营指挥官怒不可遏地拔出手枪，扬言要枪毙上尉。正在这时，手无寸铁的德黑兰市民突然蜂拥而至，缴了营指挥官的械，吓得他屁滚尿流地逃走了。上尉旋即指挥他的坦克连投入反击摩萨台部队的战斗。

骚动和战斗逐渐地集中到摩萨台宅邸的四周。这座宅邸戒备森严，有坦克和配备着火箭筒、反坦克炮的步兵严加守卫。它附近的建筑物全由摩萨台的部队据守着，士兵们从窗口射击毫无防备的群众。这时摩萨台宅邸的周围聚集了多不胜数的人们，有大学生、工匠、工人、手工业者、警察、宪兵、士兵和军官等。

其中的军人多是不怕坐牢受刑、不怕杀头处死、勇敢地奋起与摩萨台及其走卒进行斗争的造反者。他们大都同老百姓一样，只有木棍和石块作为武器。人群中还有一部分妇女和儿童。效忠摩萨台的军队以为国王卫队的队员已全部被缴械和关进监狱，他们那里知道国王卫队的一个班却被忽略了。这个班得知国王已撤销摩萨台的首相职务之后，便同市民一起参加了起义。国王卫队队员只有轻武器，但他们却英勇地向摩萨台宅邸四周的坦克发动冲击。被纳赛利上校等人从狱中解救出来的部分国王卫队队员也冲向摩萨台宅邸，他们投掷手榴弹，迫使坦克车把顶盖关上。国王卫队对坦克群的冲击非常英勇而及时。正因为如此，守卫的坦克无暇顾及人们在摩萨台宅邸背面展开的进攻。守护摩萨台宅邸的指挥官为了阻止潮水般涌来的人群，已把坦克和反坦克武器集中配置在宅邸前面的大街上。而对宅邸后面的街道，和一条把摩萨台宅邸与另外一座建筑物分开的狭窄胡同，只派了步兵去把守。守卫东边这条街道的士兵突然遭到人群的袭击，只见一位勇敢的妇女冒着生命危险，鼓舞大家奋勇前进。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马上跟上来，战斗

进行得十分激烈。卫兵们渐渐不支，人民的胜利在望。

此时，一辆坦克开进了这条狭窄的死胡同，给摩萨台宅邸的卫兵以最后的致命打击。这辆坦克的指挥员原是一位效忠摩萨台的下级军官，他同成千上万的伊朗人一样，当看到摩萨台向共产党屈膝投降，图谋推翻王室时，便立刻回心转意，反戈一击，把自己指挥的坦克开进了这条小巷。这辆坦克在枪林弹雨之中向摩萨台宅邸发起迅猛冲击，使卫兵们猝不及防，顾不得使用反坦克炮。坦克顺利地向前挺进，它瞄准了摩萨台宅邸，只听一声炮响，整个事件便宣告结束了。摩萨台宅邸被轰塌一半，摩萨台本人乘乱越过花园的院墙逃走了。十八小时之后，他被缉拿归案。

萨希迪将军原来计划去伊斯法罕，以使驻防该地区的师做好开赴德黑兰的准备，并计划将驻防基尔曼沙的一个忠于我的师调到首都来。可是，由于伊朗人民首先在腊什特、然后在其他城市纷纷起来支持我，所以，萨希迪将军决定改变原计划，在德黑兰采取行动。他乘上革命者事先准备好的坦克，驰向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的德黑兰广播电台。摩萨台分子于逃跑之前部分地毁坏了这座电台，但很快便修复了。新上任的首相从电台发出通告，宣布了历史性的人民革命的成功。

我和王后早在革命成功之前，就已经离开德黑兰。依照原先制定的计划是这样安排的：假如摩萨台拒不接受要他辞职的命令，而动用武力的话，我和妻子就暂时离开伊朗。

我之所以同意这样做有两个原因。其一，我的外出将使摩萨台及其一伙的真正企图暴露无遗，这样，他们就会遭到公众舆论的强烈谴责。这恰似一场全民投票，然而与摩萨台式的全民投票迥然不同，它不会有“死尸”参加。其二，这样做可以减少爆发国内战争的危险，人民也可以减少伤亡——这乃是我的最高愿望。为了执行这项计划，在萨德·阿巴德皇宫和拉姆萨尔之间建立了无线电通讯联络。当纳赛利上校被拘捕时，他的汽车司机立即向萨德·阿巴德皇宫作了汇报，并从那里向卡拉尔·达什特发报。但不知为什么我很晚才收到这个消息。我记得很清楚，连续两个晚上我都没有合眼。清晨，我从摩萨台控制的电台里获悉，推翻摩萨台的计划未能实现。几分钟后，我才收到有关纳赛利上校被捕下狱的电报。

卡拉尔·达什特机场是专为单引擎的轻型飞机修建的。我和索拉娅王后飞行二十分钟后到达拉姆萨尔。在那里转乘双引擎的专机，由我本人驾驶，飞往巴格达。伊拉克官员虽然对于我们的意外降临感到迷惑不解，但对我们的欢迎还是热情而友好的。而伊朗驻巴格达大使的态度却十分恶劣，他甚至想拘留我。几天之后，当我返国途中路过伊拉克时，就是这个人竟厚颜无耻地第一个跑到巴格达机场来迎接我！

在巴格达逗留两天后，我们遂飞往罗马。在罗马，当我要使用自己在使馆的私人汽车时，使馆的参赞竟然不想给我汽车钥匙。可是，一位忠诚老实、有资历的使馆人员却悄悄地把汽车钥匙交给了我。

我们在罗马停留的时间也不长，八月二十一日，即萨希迪上台执政三天之后，我回到伊朗，受到各阶层人民极其热烈的欢迎。那一天，人们欣喜若狂，欢乐的情景难以用语言形容。这种发自内心的强烈感情，与摩萨台和人民党搞的那种强制游行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对摩萨台及其同谋者的审讯，揭开了他在掌权期间进行的阴谋活动的内幕。

摩萨台开始主持国防部时，军队里仅有一百名人民党的军官，而在他垮台的前一年，人民党的军官已增至六百，甚至得到我信任的国王卫队的营指挥官也是共产党安插进来的奸细。

这些军官在审讯过程中承认，他们确实有这样的计划：待摩萨台推翻巴列维王朝之后，即发动军事政变，将其杀死，然后在伊朗建立象有些国家那样的共产党政权。

效忠于我的伊朗国民粉碎了人民党军官的迷梦。他们在人民革命的洪流面前惊慌失措，无所施其计。摩萨台所依靠的最后一批亲信（由于明显的原因，摩萨台拒不承认与他们有什么瓜葛）也未能挽回他失败的命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遭到人民大众的激烈反对，摩萨台才没有死于人民党之手。

我们除了准备好送交法院的有关摩萨台及其一伙的罪证材料之外，还对其他的犯罪活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人民党为实现其最终的卑鄙目的而秘密建立的几个军火库。国内外记者转发

了这些武器的照片以及有关的详细报道，使人民党的阴谋活动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同时，我们还获得了大量的有关人民党操纵和利用伊朗人民的民族主义运动，为他们及其外国主子的目的服务的罪证材料。

摩萨台内阁的外交大臣侯赛因·法台米畏罪潜逃，他靠着人民党党员的帮助，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达七个月之久，最后还是被缉拿归案。逮捕他时，若不是我在场说情，恐怕早就一命呜呼了。法台米经审讯后，根据法院的判决，被处死刑。

摩萨台及其他内阁成员一一被传讯，其中多数阁员被判刑下狱，如今全部获释了。

那些曾对人施以酷刑或有血债的人民党成员和军官，或被处死刑，或被关进监狱。他们当中很多人诚恳地表示要洗面革心，重新做人，愿意为祖国和立宪政权效劳，从而得到我的宽宥。这些人不能继续在国家机关工作，但政府将尽力为他们安排适当的职业。比如，其中有些人可以在政府机关的附属机构“计划组织”从事工作。

摩萨台和人民党垮台之前，自由世界各国曾对我国的政治危机表示深切的不安。因此或许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八月十九日发生的推翻摩萨台的历史性起义中，美国和英国政府是否提供了财经援助呢？众所周知，伊朗人民党是在一个外国政府的支持下拼凑起来的，并在那个政府的资助下进行活动。这件事自然会引起人们的猜想，以为摩萨台和人民党的对立派大概也是在外国人的资助下组建起来的。在谣言流行的我国确实有这样

一种说法：参加八月十九日起义的人获得了一笔数目可观的美元(或英镑)。

起义期间我虽然在国外，但我对整个事件却了如指掌，知道它的全部细节；回国之后，就更是如此了。想来，为了推进这场全民起义，我国同胞也许花费了些钱。但应该指出，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证明材料。

忠实于我的同胞们在那天所做的事情，绝不是金钱所能买得到的。打倒摩萨台和人民党的革命，乃是伊朗人民的爱国主义感情和特有的民族主义精神大发扬的结果，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如前所述，手无寸铁的百姓向守护摩萨台宅邸的坦克群和手持机枪的卫兵发动英勇的冲击，不少妇女和儿童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怎么能设想表现出如此爱国热情的人民会期望得到什么报酬呢？难道鼓励他们采取如此果敢行动的，除了光辉而崇高的理想之外，还能是别的什么吗？

那些比谁都热衷于“外援”的人，似乎并不反对来自共产党集团的援助。他们在外援问题上大作文章，其卑鄙目的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了，奉劝他们还是收起这套鬼把戏吧！

萨希迪上台后，立即着手整顿伊朗混乱不堪的局面。当时国家的经济糟糕透顶，确实难以收拾。但随着摩萨台的垮台，我先前关于争取美元的悲观情绪也烟消云散了。我们坚信美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绝不会袖手旁观，冷淡我们。

一九五三年八、九月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同意拨

款四千五百万美元（当然是在“四点计划”的技术援助额之外），作为对伊朗的应急援助，以弥补我国的预算赤字。在摩萨台下野后的三年当中，美国政府将不断地向我们提供这种援助，每月给我们五百万美元左右。此外，“四点计划”的技术援助将沿用摩萨台时期采用的方法继续提供两年。只是到一九五六年以后，由于伊朗石油收入的增加，美国的援助总额才大大地缩减了。在另外章节里我将详细地阐述美国对伊朗的援助，及其对伊朗的影响。

毋庸置疑，国家财政状况的恶化是摩萨台时期石油生产停滞所造成的。萨希迪首相为了恢复石油生产，不顾某些过激分子的反对，首先与英国政府重新修好，继而由政府出面洽商由国际石油财团取代原英伊石油公司的问题。结果，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国的石油公司同意组成国际石油财团。伊朗政府于一九五三年九月间与该财团达成了开采和销售石油的协定。同年十月，议会批准了这项协定，经我签署后已付诸实施。于是，石油生产重新上马，输油船开始在南方各港口装运阿巴丹大型炼油厂出产的石油。随着石油收益的恢复，加上美国政府提供的经济技术援助，国家的开发事业再次蓬勃地开展起来。我认为，比执行开发计划更为重要的，是革新伊朗人民的政治和精神生活。

议会中尔虞我诈的宣传把戏收场了，议会制度重新恢复了活力。伊朗开诚布公地宣布，它热爱和绝对信任自由世界国家。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摩萨台在其

首相任内究竟做了哪些有益于人民的事呢？为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确实绞尽了脑汁。在我看来，唯一的一件好事，大概是他所大肆宣扬的地租法了。该地租法规定，除增加农民的收获所得外，地主还须交出地租的百分之二十。其中百分之十分配给农民，另外百分之十上缴农民协会，作为农村的福利事业经费。应该指出，该地租法是一九四六年艾哈迈德·戈旺姆内阁制定的类似法令的翻版。在伊朗，地主和农民的契约多是口头的，没有文字记载，因此要切实执行摩萨台的地租法是极为困难的。事实上，地租法的实行情况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另外，在地租法实行之前的一九五〇年九、十月间，已故首相拉兹马拉就曾凭借“四点计划”的援助，制定了一个对农民生活有直接影响的农村开发计划，提出了采用新式农业耕作法和改善农村卫生设施的各项建议。实际上，“四点计划”组织到目前为止在伊朗农业方面所作的事情，大都是根据这个计划进行的。

从摩萨台执政之初到他下台后不久，一直担任“四点计划”组织在伊朗的负责人的威廉·瓦兰曾讲过一件事，可以充分说明摩萨台的道德和为人。据他说，摩萨台在执政初期，不准备接受“四点计划”组织与前内阁缔结的有关开发伊朗农村的协定。显然，他不愿意看到各项有益的农业措施以他的先辈的名义加以完成。结果，“四点计划”组织出于无奈，只好另外与摩萨台缔结一个类似的协定。这样，开发农村的计划才得以实行，直至萨希迪将军出任首相。萨希迪首相尊重历届内阁签订的各项协定，

上述拉兹马拉内阁与“四点计划”组织达成的协定也不例外。它们全部得到贯彻执行。

只要冷静地加以思索，人们是不难对摩萨台的工作作出恰当而公正的评价的。

摩萨台身居要职，利令智昏，忘乎所以，办了不少蠢事。他称得起是一个出色的演员，台词背得滚瓜烂熟，声音宏亮，语调感人；可是，他并不确切地知道自己说的是些什么。恰似一台没有灵魂的机器，由发动机带动运转，发出声响，然而并不理解发动机的原理。

虽说如此，摩萨台总算填补了我国政治上的一段空白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伊朗遭受外国奴役，国内无政府主义泛滥，这种形势要求一个理智不甚健全、但感情却异常丰富的人物出来执政。二次大战后国内的混乱和列强的入侵，使我深感有必要发动一场民族主义运动。那时，伊朗的民族主义运动需要强烈的感情甚于健全的理智。我国所渡过的那个阶段，正是当前一些国家所经历的阶段。因此，注意研究摩萨台执政期间的伊朗状况，对理解今天在某些国家发生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实质，会有极大的启示和帮助。

摩萨台敢于承担历史的发展所赋予他的责任，并在其登上首相宝座之后，为胜任自己扮演的角色而施展出浑身解数：夸夸其谈、悲伤哭泣和奸诈欺骗。有时他穿着睡衣出现在公众集会上，还经常托辞有病而卧床不起。记得有一天，摩萨台在议会演讲时突然晕厥过去，当医生要给他解开衣服作检查时，摩萨台却用手按住自己的上

衣口袋。显然他并非不省人事，而是故意装成这副样子，借以笼络人心。

摩萨台诸如此类的丑事发生过多次，说明这个人很虚伪、不诚实。应该讲，摩萨台并未取得真正了解他的人们信任，因为不诚实的人在人们眼里是卑鄙无耻的人。那些跟我一样常跟他打交道的人，想起来无不感到憎恶。这个人没有坚定的信念和良好的品德，缺乏男子汉大丈夫气概；他的主要特点是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恼人的虚伪、夸夸其谈和自我炫耀。

此人在工作之初对国家还算有点贡献，他以自己所特有的否定一切的态度和作法，在国内煽起了排外情绪。虽说其中有他私人的目的，但就事而论，对国家还是有一定好处的。奇妙的是，一俟他成为首相，这种好处便不翼而飞了。

无论在哪个国家，内阁首相若想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就必须采取积极进取的政策。摩萨台也许是出于无意而背叛祖国和人民的。他在执政之初确曾向人民许诺伊朗会有更加美好、更加富足的未来，然而从未能兑现自己的诺言。人们起初还相信他的承诺，可是逐渐地便灰心丧气了，因为光靠骗人的诺言并不能填饱大人、孩子的肚皮。此外，人们看到自己可爱的祖国由于政治腐败而日趋削弱，感到无比的痛心。正是这些普通老百姓忍无可忍，奋起造反，把他赶下了台。

摩萨台担任首相期间，其他国家的当政者都把本国的石油收入用来促进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政治改革，而摩

萨台却什么事都没有做成。摩萨台那个臭名远扬的固执癖，以及他严重的名利欲望，终于导致他走上祸国殃民的道路。

摩萨台倒台后，为解决石油纠纷而达成的协定，完全符合工业国有化法令的精神。

某些摩萨台的支持者矢口否认我们同国际石油财团缔结的协定，是以摩萨台执政前得到议会批准和我签署的石油工业国有化法案为依据的，然而这是事实，事实胜于雄辩。

在那以后，我们又签订了其他一系列协定，在石油生产国和石油消费国的关系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在其他章节里，对此将有详尽的叙述。

掌握权力对一个人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有的人获得了权力，并能深切地理解掌权人所应尽的道德职责，变得越发崇高和伟大；也有的人，由于攫取政权而变得更加卑鄙和渺小。当我们权衡摩萨台的政绩时，就会发现此人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侏儒。

每个国家在其漫长的发展道路上，总难免犯错误。假如从摩萨台当政中吸取的经验教训，能使我们正确地治理好国家，那么应该说，我们花费的代价还是值得的。

我国人民每年八月十九日都隆重纪念这个历史性胜利的日子，欢庆摩萨台的下台，以及几乎使伊朗独立之明灯归入熄灭的那些外国势力的惨败。我希望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那历史性的日子给予伊朗人民的经验和教训。

第六章 我的积极的民族主义

摩萨台倒台之后，特别是从一九五七年我访问莫斯科以来，苏联对我国的态度在一段时间里还是令人满意的；然而，一九五八年之后又相继发生了一系列的误会。此时，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希望上述误会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世界人民的意愿得以解决。

过去经常干涉我国内政的另一个大国——英国——对我国的态度，自一九五四年以来是良好的。

近五、六十年来，上述两个帝国主义大国给我们伊朗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同时也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使我们认清了什么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什么是虚假的民族主义，使我国的知识分子学会了识别真假爱国主义者。我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和应该采取的与之作斗争的方法对伊朗人民说来，已不是陌生的了。前几章中我扼要地叙述了英、苏两国对伊朗的经济侵略和政治渗透，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我父亲为阻止列强干涉我国内政所采取的坚定而卓有成效的措施。我父亲以他的实践证明：外国的侵略和阴谋诡计之所以能得逞，外国的势力和影响之所以能在伊朗发展和扩大，主要是

伊朗人自己的过错。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假如伊朗人民具有钢铁般的意志的话，那么任何因素和力量都不能迫使他们去做违背自己意愿和利益的事。英国在政治、军事和济经诸方面对伊朗的渗透和侵略，实际上随着一九一九年英伊协定的破产而宣告结束。此后一个短时期内，英国和其他国家仍在伊朗享有领事裁判权和其他商业特权。直到最后，由我父亲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并将各种商业特权或者加以废止，或者置于伊朗政府的严格监督之下。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再次插手我国内政。后来根据一九四二年达成的三方同盟条约，英国政府按规定日期从伊朗撤走了自己的军队。这样，它便终止了对伊朗内政的直接干涉。若说英国在伊朗还进行过什么不适当的渗透的话，那便是具有政治和经济性质的石油问题了。如前所述，一九三三年我父亲同原英伊石油公司签订了新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伊朗政府在石油企业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和更广泛的监督权力。一九五一年议会通过的石油国有化法令使伊朗政府更牢固地把石油工业的主权控制在自己手中。

说也奇怪，摩萨台执政时，经常声色俱厉地发表反对外国势力渗透的演说，并采取排外主义的政策。然而，与摩萨台的愿望相反，英国人在我国的影响却空前地增长了。原因恐怕是他的笨拙的排外政策使自己失掉了主动权。摩萨台从出任首相起到下台为止，所做的事情只是慷慨激昂地抨击英国政府的各项建议。此外，就没有什

么其他的作为。这正象一个蹩脚的拳击手，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或者由于胆怯，只会把握紧的拳头盲目地在对手面前晃来晃去，而根本不去触及对方的致命弱点。

英国人有意无意地迫使摩萨台只能在他们完成的事情面前慷慨激昂地表示一通反对。

摩萨台的政策遭到失败，被赶下台之后，伊朗同英国于一九五四年签订了新的石油协定，在两国关系史上打开了崭新的一页。根据这个协定，伊朗政府在石油企业中的权力大为增加。最重要的是，这个协定终止了英国对伊朗石油的垄断权。英国大的私人公司和得到英国政府庇护的其他公司，再也不能象以往那样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了。上述协定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伊朗和英国的相互贸易应该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从那以后，发展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道路确实比以前更加广阔了。

难以预料的麻烦还可能在我国和英国之间再次出现，但只要双方根据平等的原则，采取明智而合理的政策，就可能避免发生这种情况。

在历史上，我国同法国的关系始终有良好的。法国政府从来没有入侵和奴役伊朗的野心，它对我国的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许多伊朗的著名政治家曾在法国求学，不少伊朗学者通晓法文。我国还出版一种法文报纸，在我们的图书馆里藏有丰富的法文书籍。在德黑兰成立的伊法文化协会，为增进伊朗人民对法国绚丽多采的文化的了解，正在积极地从事活动。一九五

九年，法国工业技术展览会在德黑兰开幕，闭馆后，法国政府将该展览会的建筑和大量的技术设备赠送给德黑兰大学。法国工程师以及与我们有合同关系的法国公司工作十分出色，总是提前完成我们订购的各种货物。

我们与许多自由世界国家同样有着良好的关系和密切的文化交往。美国对伊朗的技术援助方面很广，在许多章节里都会谈到。在第十二章，我将叙述意大利公司在伊朗石油工业中的活动情况。一九五八年意大利在德黑兰举办了一个工业展览会，同年我正式访问了意大利。

我们同美国、英国、意大利、瑞士等许多国家的贸易正在日益扩大。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是曲折而复杂的。当一九一七年苏联革命成功时，很多人以为俄国的帝国主义阶段行将结束。伊朗是正式承认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国家。列宁曾经宣布，世界上所有的小国应该享有完全的独立。正如前一章指出的，一九二一年伊朗与苏联缔结了友好条约。看来苏联政府似乎是“言而有信”的，但后来，它的所作所为却使我们大失所望。

多年来一直对伊朗垂涎三尺的苏联因为同伊朗是邻居，所以很容易把我国选为推行其方针政策的适宜的试验场所。如前所述，从一九二〇年以来，为缔结伊苏友好互助条约而进行的谈判一直未曾中断，直到我父亲发动政变后的一年双方终于签订了这个条约。正当我们同苏联谈判缔结友好互助条约之际，却发生了令人吃惊的苏军入侵事件。为了支援伊朗的一个叛乱头子米尔扎·库切克汗·将戈利，苏军开进恩泽里港（后来根据我父亲的

命令改称巴列维港),库切克汗在苏军的援助下明目张胆地成立了吉朗苏维埃共和国。

这乃是共产帝国主义在我国进行的首次尝试。我们对此提出了抗议,但毫无结果。尽管发生这类极端卑鄙的事情,然而我们并未中断同苏联进行的有关缔结友好互助条约的谈判。条约签署后,苏联人旋即停止了对米尔扎·库切克汗的支持。我父亲遂轻而易举地平定了米尔扎·库切克汗的叛乱,使苏联侵占邻国领土的首次努力归于失败。

共产党人的拿手好戏是,他们能很快地判断出自己采取的方针、政策所遭到的失败。因此,列宁和他之后的斯大林得出这样的明确结论:扶植吉朗共和国作为他们的傀儡,是一种愚蠢的作法,而通过缔结友好互助条约来确保自己的利益才是上策。在我父亲当政时期,苏联人从来没有违反上述条约,也没有任何旨在侵占我国领土的公开活动。

尔后二十五年,直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才重操旧业,开始了新的这类尝试。苏联人的势力再次渗入伊朗,他们一手拼凑起人民党,妄图以此动摇我国的社会基础。一九四五年,苏联在我国领土上建立了两个傀儡政府:一个是在西北部库尔迪斯坦的首府美哈巴德建立的库尔迪斯坦共和国政府;另一个是在与苏联毗邻的阿塞拜疆省建立的阿塞拜疆自治政府。这两个政府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宣告成立,寿命都不长,只维持了一年,便倒台了。虽然如此,应该讲这是伊朗现代史上最惊心动魄、

也最危险的时期之一。通过这两个事件我们领教了共产党人的策略手法，确实受益非浅。

所谓“成立库尔迪斯坦共和国”，本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煽动库尔德部落闹分裂、搞独立时提出来的口号。后来，苏联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接过这个口号，大肆煽惑，于是闹得更凶了。库尔德人散居在伊朗和同伊朗接壤的其他几个国家，从种族和语言方面看，纯属于伊朗人。苏联人渗透到我国境内的库尔德部落中去，煽风点火，大肆活动，妄图把伊朗的西北边区变成他们的附庸国家。这就是成立库尔迪斯坦共和国的政治背景。苏联的如意算盘是，逐渐地扩展这个共和国，使之囊括伊拉克和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部落，然后再把手伸进非洲阿拉伯各国。

库尔迪斯坦叛乱者明火执仗地顶撞中央政府，唯外国政府下达的命令是瞻。他们根据苏联政府的意旨组建政权机关和管理机构。许多库尔德人对那个政权是怀疑和不信任的，但慑于外国军队的镇压，只好忍气吞声。后来政府军一到，他们便纷纷揭竿而起，协助中央政府恢复了对库尔迪斯坦的统治。

对我们来说，平定阿塞拜疆的叛乱，推翻苏联在该省建立的傀儡政权，是更加必要，也是更加困难的。如前所述，苏联是英伊苏三国同盟条约的缔约国之一。据该条约规定，它有义务在战争结束后的六个月内将自己的全部军队撤离伊朗。在德黑兰宣言——在前一章我引述了它的部分内容——里明文规定，美国、苏联和英国有

义务尊重伊朗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当时伊朗人民以为斯大林不会食言，他会尊重条约和宣言的条款的。一九四六年三月二日，是战后六个月限期的最后一天，所有的盟国军队应该全部撤出伊朗。英国和美国的军队业已提前从我国撤走。我们惊讶而不安地看到，唯独斯大林违背自己的多次承诺，他非但没有撤军，反而以他采取的行动震撼了整个自由世界。

一九四五年七、八月间，人民党的走卒在阿塞拜疆省的首府大不里士以武力夺取了几座政府机关的办公大楼。与此同时，苏联军队把我们的士兵阻止在兵营里，不准出来。当我们派出支援部队到阿塞拜疆省平定叛乱时，苏联军队却在加兹温离大不里士四百公里远的地方挡住我军的去路，不准向大不里士方向挺进。

这时，人民党改头换面，以民主党的名义再次恢复活动。它于同年十一月控制了整个阿塞拜疆地区，成立了民族议会，接着于十二月十二日宣布成立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民族议会推选共产党的走卒、在苏联生活多年的嘉法尔·比雪瓦里出任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政府总理。此人仰仗苏联士兵和军火武器的淫威建立了“革命政权”——实际上是阴森可怖的统治机器。

苏军明目张胆地阻止我们为平定阿塞拜疆叛乱而派往该地区的军队，这就公开地侵犯了我国的主权。我们提出的强烈抗议通过美国和英国传达给莫斯科。我们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外长会议上又提出这个问题。后来，我们又向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安全理事

会提出了起诉——这是安理会受理的第一件诉讼案。可是苏联政府对我们的抗议置若罔闻，在它看来，好象国际上没有人理会这件事似的。一九四六年三月三日下午，苏军撤出大不里士。但这支军队并未撤回苏联境内，而是兵分三路，分别开往德黑兰、伊拉克边境和土耳其边界。在后来几周内，约有数百辆苏式坦克在步兵的密切配合下，越过苏联边界开进伊朗，在上述三个方向上展开，尾随在前头部队之后。与此同时，另一个师的苏军沿土耳其与欧洲接壤的边界线集结。苏联政府还进行频繁的政治活动和大张旗鼓的宣传，妄图以此威胁和恫吓土耳其。

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下，当时的伊朗首相戈旺姆应允，只要苏联肯从我国撤军，伊朗将向它出让某些商业特权。戈旺姆还答应，劝说国民议会同意成立旨在开采经营伊朗北部石油资源的苏伊联合石油公司（苏方占有该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准许三名人民党成员入阁，正式承认阿塞拜疆革命政权，并从联合国安理会撤回伊朗对苏联提出的起诉。

现任宫廷大臣阿拉先生，当时是伊朗王国政府驻华盛顿的特命全权大使和伊朗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他不同意首相的意见，拒不执行首相要他从安理会撤回伊朗控告的命令。阿拉先生知道，我本人不会同意从安理会议事日程上撤销这项起诉，戈旺姆也是迫于苏联人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在三月二十一日举行的安理会首次会议上，阿拉先生以令人信服的雄辩演说——据称这

是安理会有史以来最精采的演说之一——提出了伊朗对苏联的控告。

五天之后，在安理会的另一次会议上，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先生出乎人们意料地宣布，只要不发生什么不测事件，苏军将在五至六周内全部撤出伊朗领土。苏军终于在五月九日撤出了伊朗。

这时，戈旺姆的态度有些反常，令人不解。他似乎受到苏联人情绪的影响。有一天，他莫名其妙地对我说，要么国王陛下亲自决定一切事情，要么就让首相无所拘束地管理国家大事。他说话的用意当然是后者。然而人民并不满意他对共产党采取的软弱政策和和平方针。伊朗南部各部落由不满逐渐发展到反抗，他们要求从戈旺姆内阁中革除人民党的大臣。

戈旺姆有意重新起用曾逃跑到比雪瓦里那里去的叛变军官，甚至想任用比雪瓦里部下的军官，让他们到伊朗军队中服务。他跪倒在我的脚下，乞求我同意这种作法。我告诉他，纵然砍断我的双手，也不能签署这样的命令。戈旺姆极其幼稚地以为只要采取这种绥靖政策，便既可保住自己的官职，又能维护伊朗的领土完整。鉴于戈旺姆的上述表现，我召见了她，命令他解散内阁，重新组织没有人民党成员参加的新内阁。与此同时，我发布了重新选举议会的法令。这项法令适用于全国各地，当然也包括阿塞拜疆省在内。显然，这是不合阿塞拜疆自治政府的心愿的。这时，苏联的处境十分尴尬，因为它既想支持自己的傀儡政权，又希望与德黑兰保持良好的关系，以

便能把伊朗北部的石油资源抓到手。

这时，良心驱使着我下令政府军队开赴阿塞拜疆，毫不留情地镇压叛乱者。同时，我亲自驾飞机到叛匪构筑的工事上空，侦察他们的军队实力。苏联政府迫于形势，不再向傀儡政府提供任何援助。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政府军胜利地开进大不里士，叛乱者的政权被推翻，叛匪头目和自治政府的官员们纷纷逃往苏联。

在我国历史上以热爱自由出名的大不里士和雷扎耶的 시민，在推翻阿塞拜疆腐朽统治的事业中堪称是真正的英雄。这两个城市的人民消灭了大量的共产党士兵，若不是政府军加以阻拦，他们就会冲进监狱，把关押在里面的共产党人全部处死。与此同时，政府军在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斯坦居民的声援下，一举摧毁了库尔德斯坦的傀儡政府。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多事的年月里发生的一件事情：一天苏联驻德黑兰大使紧急要求晋见国王，我答应了，他便来到皇宫。苏联大使以威胁的口吻抗议我们派军队去阿塞拜疆，他煞有介事地说，伊朗这种做法已危及到世界和平。他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要求我作为伊朗国王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立即撤回派出的军队。我反驳他说，问题恰恰相反，正是我们出兵前的阿塞拜疆的那种局势才使世界和平陷入危险的境地。我拒绝接受他的要求，并把刚刚从阿塞拜疆伪政权省长那里收到的、有关叛乱分子业已准备接受无条件投降的电报递给他看。苏联大使看过电报后，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匆忙地告辞

而去。

苏联政府仍然希望伊朗议会能批准戈旺姆提议签订的石油协定。但开幕不久的国民会议并不急于这样做。后来，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伊朗议会一致否决了上述协定。

阿塞拜疆事件算得上是中东现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战后斯大林治下的苏联的扩张野心第一次在伊朗阿塞拜疆得到暴露。苏联在我国阿塞拜疆省的所作所为均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各次会议上予以详细的讨论。这一事件震动了自由世界，第一次提醒世界各国人民要警惕共产帝国主义的扩张阴谋。

我认为，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将会论证这一点：冷战实际上是从伊朗开始的。虽然冷战的迹象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存在，但是冷战的形式及其影响却首先在伊朗清晰地展现出来。在阿塞拜疆事件过程中，美国政府初露头角，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东地区显示了自己的领导力量。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使曾导致希腊和土耳其摆脱共产帝国主义灾难的杜鲁门主义在伊朗的阿塞拜疆得以贯彻，并为实现艾森豪威尔主义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勿容置疑，阿塞拜疆事件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此，伊朗人民把结束这场叛乱的那一天定为阿塞拜疆日，把它看作全国性的节日。从一九四六年以来，我们每年都隆重纪念阿塞拜疆的新生和我们对该地区主权的恢复。我认为，不仅伊朗人民应该永远记住这个值得缅怀的日子，自由世界各国也应该牢记这个历史性的

事件。

在阿塞拜疆问题上的斗争取得胜利之后，伊朗人民的民族主义精神空前地高涨起来。全国各阶级和各阶层都从这个事件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他们在全国各地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我的极大的忠诚和爱戴。而各地的共产党人则在忍耐中妄图重生，他们期待着动荡、混乱局面的再现，以便见机行事，煽风点火，以求一逞。他们的期望并没有落空，摩萨台的上台执政给了他们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前所述，我们在唯一的万能的真主庇护下，得助于无与伦比的神意，奇迹般地摆脱了险境和巨大的灾难。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去世，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九日摩萨台下台。斯大林的去世，揭开了苏联历史的新篇章，随着摩萨台的下台，伊朗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前面提到，我们和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苏联的宣传机构不再替非法的人民党作宣传，苏联政府对与我和我的政府进行合作表现出更大的兴趣。

一九五六年，应苏联政府的邀请，索拉亚王后偕同我正式访问了苏联。在那里，我们受到主人的盛情款待，参观了许多地方，并有幸同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党政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米高扬、谢皮洛夫等进行了诚挚而坦率的会谈。苏联人说，他们的政策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础上的。他们问我，苏联既然是这样的政策，伊朗为什么还要参加巴格达条约呢？我回答说，原因应该从研究伊俄两国间的关系中去寻找。

我提醒主人不要忘记：在过去几百年中，俄国人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通过伊朗向南推进。一九〇七年，俄国军队开进伊朗境内，镇压了我国人民的立宪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再次侵犯伊朗；二次世界大战时，虽说苏伊两国签订了友好条约，但伊朗仍遭到苏联的入侵。一九四五年苏联又在伊朗境内扶植傀儡政府，妄想把富饶的阿塞拜疆省从伊朗分割出去，置于它的统治之下。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认为这些事发生在他们执政之前，因此他们没有任何责任。

赫鲁晓夫承认苏联政府曾做过错事，他表示希望伊朗人民相信他及其他在场的苏联领导人的良好愿望。我请赫鲁晓夫放心，我们伊朗人民对他和苏联人民的友好感情是极其深厚的。同时，我还指出，假如一个人不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的话，那他就是个十足的傻瓜。赫鲁晓夫想知道伊朗政府怎么会同意参加英国也是其成员国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因为英国对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侵略伊朗一事也是有责任的，况且入侵的建议还是它首先提出来的。我回答说，英国至少是遵守诺言的，它按时从伊朗撤走了自己的军队，而苏联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

赫鲁晓夫还谈到巴格达条约具有军事侵略性质的问题。他说，起初他认为巴格达条约不具备军事性质，可是后来，他发觉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我在回答时解释说，在巴格达条约组织的会议上，确实曾研究过有关厄尔布尔士山脉和埃勒万德山脉一带的防御问题，但这两座山全在伊朗境内，并没有座落在苏联。

赫鲁晓夫最后不得不承认伊朗对苏联没有侵略意图,但他表示某个大国可能迫使伊朗违背自己的意愿,作出同意提供本国领土为侵犯苏联所用的决定。他指出,伊朗可能正因为如此才被迫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我义正词严地回答说,伊朗是按照自己的意志,作为平等的一员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的,任何人都没有强迫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倘若有人向我们施加这种压力的话,我们也会坚决地顶住。我还表示,伊朗绝不允许利用它的领土去侵犯苏联。我斩钉截铁地向赫鲁晓夫保证:只要我在伊朗国王的御座上,我的国家就不会答应旨在侵犯苏联的任何要求;伊朗绝不参加到这类行动中去。

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喜形于色地说,他们完全信任我的友好态度。根据他们的提议,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中谈到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苏、伊双方决定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

我与苏联领导人进行的会谈,为后来缔结一系列的具体协定扫清了障碍。我国同苏联的边界纠纷通过协商得到了公平合理的解决。为了取道苏联向欧洲等地运输货物,我们同苏联达成了免除过境税的协定。苏、伊两国还同意共同使用位于两国边界线上的阿拉斯河和阿特腊克河的水力资源;利用这两条河的水可以灌溉二十余万加利波^①荒芜贫瘠的土地。伊朗同苏联的贸易得到发展。两国之间的体育往来得以加强。两国的国民议会代表团进行了互访。为了加强两国的文化交往,双方都作出了

^① 加利波:伊朗的度量单位,一加利波相当于一万平方米。——译者

努力。自从一九一七年苏联革命成功以来，两国之间的关系还从来没有这样融洽过。与此同时，伊朗还加强了与其他共产党集团国家的联系。然而好景不长，两年之后，苏联便开始推行无理的挑衅政策。譬如，苏联元帅维尔希宁公开发表谈话，对土耳其和伊朗进行威胁。他扬言在必要的时候，苏联将用火箭摧毁伊、土两国。维尔希宁的叫嚣，使赫鲁晓夫有关苏联和平外交政策的演说，以及他的“从今后，苏联的对外关系将打开新的一页”的许诺蒙上一层令人生疑的阴影。

试问，当苏联政府允许有相当地位的官员发表诸如此类的讲话时，又怎么能期待我们相信他们关于和平共处的甜言蜜语呢？

苏联人的放肆愈演愈烈，竟然对我们建成从德黑兰到马什哈德的铁路一事提出抗议，说什么我们修建这条铁路是有军事战略意图的。他们俨然以世界的主宰自居，对我们修建机场也横加指责，说这是为战斗机提供的。他们还抗议我们修建港口，说这是在修建海军基地。

苏联这种蛮横无礼的态度和作法，是对我国主权和独立的肆意干涉。众所周知，苏联在国内外修建了很多铁路、机场和港口，难道我们就此向他们提出过什么抗议吗？难道苏联人真的以为在世界这个地区只有他们才能拥有现代化的交通设施吗？难道他们想让我们倒退到中世纪的状态去吗？应该承认，他们的说法并不全错，在必要的时候，我们的铁路机场和港口是要用于军事目的。这对苏联何尝不是如此呢？难道对一方适用的原则，对

另一方就不适用了吗？

一九五八年伊拉克发生政变后，巴格达条约组织成员国举行了会议，极力要求美国参加该条约组织。美国虽然是该条约组织很多委员会的成员，但它暂时不同意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美国另外建议与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伊朗三国分别签订双边防御条约。根据这些防御条约，上述三国中的任何一国若遭到共产党集团的军事进攻，美国有义务给予援助。

我们同友好国家土耳其、巴基斯坦商定，接受美国的建议，签署上述条约。

苏联得知此消息后，便向我们发出照会，提出了强烈抗议。苏联政府违反外交上的惯例，在正式向我们提出抗议之前，抢先在电台予以广播。苏联政府指令其驻德黑兰大使，要他亲自将上述抗议的内容通知伊朗国民议会的议员们。当时，我们十分坦率地对苏联人讲，他们的这种作法会重蹈过去使两国关系恶化的覆辙。我们指出：苏联拥有巨大的军事力量，却被一个小小的防御组织吓成这副样子，是不太正常的。我们表示，苏、伊两国继续奉行过去的友好互助政策，才是双方利益之所在。

苏联人阻挠我们在双边防御条约上签字所采取的另一个作法是，通过中间人向我们作出缔结长期互不侵犯条约和提供巨额经济贷款的许诺。就在这时，我们发现双边防御条约草案并没有按原来议定的那样，包含我们要求的全部内容，而且缺乏必要的保证措施；提供给伊朗的战争物质，数量也不充分。我们认为，伊朗的军事力量

十分薄弱，又没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所享有的那种保障，因此，决定同苏联就缔结互不侵犯条约问题进行磋商。

苏联人这时犯了个错误，他们迟迟不派遣谈判代表，因而耽搁了两周时间。就在这段时间里，双边防御条约草案的内容作了使我们满意的修改。苏联谈判代表到达后，又犯了另一个错误，他们要求把伊朗退出巴格达条约作为开始谈判的先决条件。当他们看到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无理要求时，才勉强改变主意，可是仍坚持要我们拒绝在双边防御条约上签字。我们这时恍然大悟，原来苏联之所以要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是想让我们同自己的盟国分道扬镳。苏联人不仅坚持要我们放弃与美国缔结双边防御条约的主张，而且还在他们提议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草案里，塞进了旨在大力削弱我们同盟国之间关系的条文。

于是，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办了。虽然我们的军事力量和军火储备还嫌不足，也不满意盟国提供的援助，但最好还是不要与友好国家断绝关系，不能作那种有损于我国独立和主权的蠢事。由于上述原因，苏联同我国有关缔约的谈判未能成功。苏方谈判代表不辞而别，离开伊朗返国。

苏联继续奉行敌视伊朗和损害我们自由的政策。没过多久，他们展开了反对伊朗的广播战。苏联的官方广播电台频繁地播送波斯文节目，对伊朗政府和我的家庭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几个月后，一家自称是“伊朗人民

之声”的广播电台用更加恶毒的语言肆意攻击我们。我们很清楚，这家电台就设在苏联南部地区，苏联人也知道我们对此是了如指掌的。这家电台并不以庸俗下流、恶毒而无耻的宣传为满足，它甚至煽惑伊朗人民起来颠覆我国政府。有些悲观怯懦的人以为，这种敌对宣传会搞乱人们的思想，使民心思变。但事实恰恰相反，这种敌对宣传使我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团结得就象一个人一样。正是这种坚强的团结，促使我下令在伊朗广播电台重新播放苏联人的宣传文章，以便使我国广大人民都能听到这些显然是伪造的、旨在反对我国的恶毒宣传。

苏联人在边界城市朱尔法采用了进行挑衅性宣传的新手法。他们在苏联境内一边安置了高音喇叭，大肆进行敌对宣传。他们这样做，结果并不美妙。我们作为回敬，也在自己境内一边安置了同样的高音喇叭，向苏联边境居民广播苏联人民难以忍受的痛苦生活的真相。众所周知，苏联的统治者是禁止人民收听外国电台广播的，他们为了干扰无线电波花费了大量资金，想方设法使普通老百姓收听不到苏联以外的国家的广播。但是我们的高音喇叭的声音响彻四方，使一生中从未享受过自由乐趣的人民收听到了我们的广播，这是苏联领导人所深恶痛绝的。事过不久，苏方拆除了高音喇叭，停止了广播战，我们也关闭了自己的高音喇叭。

苏联人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手法反对我们呢？

苏联人知道，他们的作法是违背两国过去签定的各种协定精神的。他们也知道，即使有允许他们这样做的

协定,那也是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应该予以取缔的。因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条款,凡是与联合国宪章某一条规定相违背的国际条约和协定皆应宣布无效,予以取缔。

应该提醒苏联人,正是他们自己在一九四七年向联合国提议应该禁止一切威胁世界和平的宣传活动。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决议规定,凡是可能造成威胁和破坏世界和平或者造成侵略前提的宣传,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也不管来自何方,皆应予以禁止。难道苏联人忘记了他们当初是这些条款的支持者吗?难道他们不应该规避一下禁止别人做的事情吗?

苏伊两国之间出现的这些不必要的麻烦,使我感到很遗憾。我对苏联人民确实有深厚的感情,但我的职责是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我并不认为有什么正当的理由非要破坏两国关系不可。倘若苏联能象对待土耳其那样地对待我们,那么伊朗与这个北方邻国的关系就绝不会恶化。

全世界人民、包括我们的苏联朋友应该理解,当今的世界绝不容忍来自任何一方的侵略。目前的世界局势同我们极力挽救阿塞拜疆的一九四六年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时候,阿塞拜疆事件并没有象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得到联合国的重视。当时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坦率地向我表示,他的政府不愿意为拯救伊朗而冒卷入战争的风险。

在那危急的时刻,我反复地思考过,假如我们不争取

主动，发起进攻，那么分裂分子的气焰就会更加嚣张，他们必然会首先向我们发动进攻。当时进军阿塞拜疆成功的把握不大，我不知道事情会有怎样的结局；但我有这样的信念：与其丧失祖国的独立，还不如光荣地战死。伟大的真主再次赐福于我，使我获得了成功。

与一九四六年的危机时期相比，今天的伊朗人民和我更不会感到孤立无援了。

采取紧急的严厉措施以制止对世界和平造成的任何威胁，乃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在今天的原子时代，世界人民都知道，对任何国家发动侵略，必将使其他国家陷入危险的境地。今天的联合国比过去更加强大，联合国警察部队的建立得到世界人民原则上和事实上的认可，受到普遍的欢迎。伊朗由于同明智而强大的朋友缔结了一系列双边防御协定，而取得了比以前更多的援助和支持；所有这些协定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各项具体规定。

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建立在极为现实的基础之上。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我们亲眼看到，具有战略地位的伊朗采取中立政策是不现实的。在这两次战争中，我们的中立政策并未能阻止列强对伊朗的入侵，每次战争之后，我国都成为外国势力争斗的场所。

摩萨台执政时期采取的消极排外政策，反倒使外国势力加强了对我国的渗透，使来自伊朗边界另一边的蛊惑宣传有增无已。因此，我们逐渐地倾向于采取一种新政策。这种新政策要能体现我国生气勃勃的精神面貌，

我把它称之为积极的民族主义。

因为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谈论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词，所以有必要正确理解这两个术语的含义。在一般常用的词典里，对民族主义这个词的解释是“热爱和维护民族利益，或曰热爱和维护民族的团结和独立”；对帝国主义一词的解释是“赞助并实行发展和扩大一个国家或一个帝国的统治”。

现在让我们根据上述的解释，来探讨一下积极的民族主义究竟包含哪些意思。我认为，积极的民族主义就是以符合国家利益为原则，最大可能地保障本国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积极的民族主义绝不是与世隔绝的孤家寡人政策。对我们伊朗人来说，它的含义只能是，不管其他国家的愿望和政策如何，我们将签订有利于伊朗的条约和协定，而不惧怕干涉我们选择朋友的那些人的威胁。

我们并不是糊里糊涂地就与别人结盟，也不是为了结盟而结盟。我们结盟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保障我国的利益。我们愿意接受每个国家的友谊，并准备学习和借鉴别国的科学技术经验，条件是这些友谊和互助不能损害我们的利益和国家的独立。这种政策给予我们的行动自由，比起那些受各种条件限制的国家所享有的自由要多得多。与此同时，我们坚决地拥护联合国的原则和目标。

我们不主张消极中立的软弱政策。我们同友好国家打交道时诚恳而坦率，因此希望对方对我们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假如有的国家对我们的作法感到恼火，进而诽谤

和威胁我们，那我们也不对之采取全盘否认的态度，而是一如既往地对待它们。因为我们并不是一只只在废墟上空发出凄惨叫声的猫头鹰。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是那种坐在塔形建筑物或广播大厦里唾沫四溅，咒骂别人全是罪犯，而自己却穷愁潦倒，过着悲惨生活的那种人。与此相反，我们的生活日益繁荣，我们的力量日益壮大，在为建设新国家而努力奋斗的同时，我们保持着真正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感。

帝国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如前所述，伊朗王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大帝国。民族主义虽然很时兴，在当今世界上形成一支雄厚的力量，但它也算不上新颖的思想。早在居鲁士大帝时期，伊朗人民的民族主义精神就十分强烈。在许多世纪之后，正是这种民族主义精神激励美洲的殖民者创建了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

近几年来，民族主义的狂澜席卷中东各国和一些政治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同帝国主义一样，民族主义也是种类繁多，不一而足。真正的民族主义引导着国家在发展的道路上突飞猛进。譬如，美国人民在建设事业中取得的成就，就应该主要归功于这种真正的民族主义精神。同样，我父亲之所以能完成光辉的业绩，也是因为他 在伊朗人民的心中唤起了真正的民族主义情感。从另一方面讲，假如民族主义精神被叛国者或外国政府加以巧妙地利用，则会变成掩盖帝国主义入侵和国家名存实亡的一块遮羞布。

当摩萨台及其一伙象女人一样哭哭啼啼，发疯似地

发表激动的反英演说时，很多真正的爱国者还以为他的演说体现着民族主义精神呢。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爱国者们逐渐地醒悟过来，认识到摩萨台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的入侵打开了国家的大门。摩萨台采取的排外政策造成了国家政治、经济的严重混乱，这给外国代理人提供了实现其野心的极为有利的时机。正当我父亲致力于根除帝国主义在伊朗的势力影响时，摩萨台却在为帝国主义势力的滋长准备适宜的土壤，而在他执政时则竭尽全力地耕耘这块土地了。

感情冲动，忘乎所以，对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说来是最危险的了。只要稍加思索就不难理解，我比摩萨台有更充分的理由敌视和仇恨英国人。难道不正是英国人逼迫我父亲退位，使他流亡国外的吗？难道不正是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苏联狼狈为奸，侵略我国的吗？

然而，在摩萨台感情冲动，忘乎所以的时候，我却在冷静地思考怎样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如前所述，摩萨台推行消极的民族主义不仅为共产党人提供了他们梦寐以求的良机，而且与摩萨台的愿望相反，使英国人加深了对我国政策的影响。

假如摩萨台的作法被称为民族主义的话，那么就必須给真正的民族主义选择一个新的术语。毋庸置疑，摩萨台的政策是彻头彻尾的消极政策，它与积极的民族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因此我认为，为了将摩萨台的消极政策和真正爱国者的民族主义加以区别，使用积极的民族主义这个术语是非常恰当的。

目前,在许多民族主义感情旺盛的国家里,人民应该将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和那些以伪装出现的假民族主义者区分开来。当然,各国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不能一概而论。而且我从来也不想对别的国家指东道西。但我认为,近年来我们取得的经验或许对其他国家有些用处。其他国家的爱国者通过研究伊朗的近代史将会明白一些重要的道理,这或许对他们的民族主义运动有所裨益,使他们能明辨是非,区别真伪。近年来我们取得的一个经验教训是,应该对宣扬消极民族主义思想的人持怀疑态度。因为搞破坏谁都会干,而搞建设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人们对梦幻中魔鬼的吼叫十分警觉,但对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却熟视无睹,这是世界上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的一种怪诞的思想。其原因恐怕是,大厦一瞬间的倾倒令人惊叹,而一座楼房的建设却是极其缓慢的,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有些虚无主义的蛊惑家自诩为人民大众的忠实代言人,另外一些蛊惑家则心甘情愿地充当外国人的傀儡,这两种人所主张的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奸诈与欺骗而已。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反对正常的批评。可是,合情合理的批评与虚无主义的蛊惑宣传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从摩萨台事件中得到的第二个经验教训是,应该毫不迟疑地怀疑那些在民族主义的招牌下专门攻击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的人。譬如摩萨台声嘶力竭的叫喊,就专门针对英帝国主义这个可怕的魔鬼。而在他执政的后期,与人民党党员打得火热的时候,却从不指责另

一个更加危险的帝国主义，即赤色帝国主义。他有意无意地把群众的视线转向危险较小的帝国主义，而使人们忽略了危险更大的帝国主义。

我们取得的第三个经验教训是，应该将宣扬民族主义的人的言行同国内社会舆论及外国政府的反映加以对照，借以衡量他们有关民族主义的说教。从中我们将会发现某些共同点。譬如，若看到世界各地上百种报纸所发的消息大致相同，而且观点和爱憎感情一样，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这是在按照一个统一的中心发布的命令行事。假如发现这类报纸在国内发行，那么自然应该将其看作是虚伪的民族主义者活动的迹象，把它同本国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严格地区分开来。

我们取得的第四个经验教训是，为了区别真假民族主义，应该严格地要求各组织负责人表明他们旨在促进国家发展和进步的纲领。假如他们没有这种积极的纲领，或者纲领里尽是一些骗人的、模棱两可的、没有深刻内容的词句，或者有适当的纲领但缺乏实现纲领的具体措施，那么就要对他们的民族主义打个问号。反之，假如他们提出了正确而积极的纲领，又有实现纲领的有效措施，并决心在开发国家的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他们宣扬的民族主义才能得到充分的信任。

众所周知，今天在自由世界各国都有虚伪的民族主义集团在秘密地从事颠覆活动。他们利用自由国家给予人民的权利，不遗余力地干着破坏自由社会基础的勾当。他们带着民族主义的面纱，打着为实现民族主义的神圣

目的而奋斗的旗号，实际上却用从外国的特务学校里学来的鬼蜮伎俩，从事捣毁国家机器的罪恶活动。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应该怎样与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应该再次声明，我决不是想对有关其他国家的问题发表什么意见和看法。我只是觉得应该指出，我们近年来被迫对这类问题进行过广泛的调查和研究，这些调查研究的结果或许对其他人有些用处，至少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国家进行独立研究所得到的成果。

我们的一点体会是，政府一方面应该严密地监视破坏性组织的活动，另一方面应该尽可能地保障人们的言论和行动自由。鉴于今天的世界形势，美国和许多自由国家都知道，必须禁止那些企图以非法手段破坏民主秩序和摧毁民主基础的集团的活动，或者至少应该限制它们的行动自由。

摩萨台垮台后，在审讯过程中——其细节在上一章已有叙述——发现了有关人民党迫使忠于它的军官们进行宣誓的有趣材料。这些军官必须宣誓反对伊朗国王和西方各国政府，而对苏联采取友好态度。不言而喻，建立在这类誓言基础上的组织，绝不会拥护和支持伊朗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特别是在与苏联毗邻的国家里，假如任凭这类组织发展壮大，那么这个国家的领导者岂不是在玩忽职守，拿着国家的命运当儿戏吗？

很多国家严令禁止成立这类破坏组织，或者将这类组织置于严密的监督与控制之下，甚至剥夺与这类组织有瓜葛的人的某些社会权利。譬如在美国和伊朗，凡是

公开拥护共产主义纲领的人不准在政府部门任职。

另一方面我认为，保证一般国民享有发表意见的充分自由，不受任何压力和限制，使之能够畅所欲言，乃是应该采取的明智作法。因为这样做，不仅能使国家摆脱腐化堕落而保持其纯洁，而且能使那些应该加以纠正的缺点和错误暴露出来。有些人可能忘记了，在摩萨台执政期间，伊朗是军事管制，这件事本身就是对国民的压制。我一向不主张实行军事管制，因此在摩萨台下野之后，军事管制便逐渐削弱，最后被彻底废除了。

今天，在我国出版发行的书籍报刊里经常可以看到对政府某些作法的严厉批评。我们之所以允许发表这类批评文章，是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在民主国家里自由发表意见和进行批评对国家是有利无弊的。在伊朗，人们可以自由地出席群众集会和大学的演讲会，经常对政府的工作提出直截了当的批评。有时可能听到某个人或者某个大学生叫喊说“在伊朗没有自由”，然而，恰恰是这种不怕受到惩罚而自由发表讲话的本身，就是存在自由的不可辩驳的证据。假如一个人以公正的态度，而不是别有用心地去调查一下伊朗的大学情况，那他就会证明，校园里洋溢着一片讨论、研究和各抒己见的自由气氛。

外国人大概有兴趣了解我们如何对待那些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吧。在我国，凡是杀过人，或者背叛祖国，向外国人泄露过国家重要机密的共产党人，都受到应有的惩罚。有许多过去的共产党人表示痛改前非，重新作人，希

望给他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以便能为祖国和国王效劳。我们认为应该毫不吝嗇地向他们提供这种机会。假如他们真正幡然悔过，加入到有正确信仰、忠诚老实的国家公民的行列中来，岂不是很好吗？假如他们撒谎骗人，那也无损于我们一根毫毛。因为他们的底细我们是了如指掌的，这一点他们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目前，他们当中许多人为国家的发展和建设正在从事着有益的工作；其中有几个人创办了一种杂志，专门发表有关他们与共产党打交道，以及从中得到的经验教训等方面的文章，向国民述说他们摒弃共产党纲领的原因，并阐述他们现在享有的崭新生活的意义。总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使伊朗人民享有除了背叛祖国以外的一切自由。

依我之见，越是对破坏性组织采取严厉的措施，就越是要对那些赞助自由的人采取温和友善的态度。我深信，在自由的国度里，采取这样一种政策必将日益造福于全体国民。

我们在对付阴谋破坏活动方面的第二点体会是，取缔这类活动时，与其采取报复手段和严加禁止的方法，不如求助于社会正义。

当然不应该忽略，在象我国这样具有战略地位的国家里，为了对付旨在颠覆政府的非法活动（特别是受到外国势力鼓动的非法活动），可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果断措施。今天自由世界各国都需要健全治安保卫机构，以便在政府其他部门的协助下能及时发现和镇压这类破坏活动。勿庸置疑，在当前的形势下，不这样做就是十分

轻率和不谨慎的。但是，假如以为仅仅依靠警察机关就能取缔阴谋破坏活动，那也是鼠目寸光的匹夫之见。为了同共产党人的破坏活动和其他腐败行为作斗争，政府需要得到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历史多次证明，人民所拥戴的政府正是使社会正义得到充分发展的政府。下一章我将叙述社会正义所包含的内容。就其广义而言，便是人民参预国家管理，法律对全民一视同仁，丰富的经济物质可以满足全民的需要，国家的社会问题以我将阐述的合理方式得到解决。警察的治安措施可以暂时地平息破坏捣乱活动一个月或几个月，最多不过两年；而社会正义的存在才是根除腐败现象的根本保证。假如一个国家采取严厉措施在国内取缔了所有的共产党人及其活动，现实的社会状况仍然会在国内迅速地培植出新的这类人物来取代过去的那些捣乱分子。因此，我坚定不移地相信，同国内共产党人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唯一有效工具便是社会正义，仅此而已。

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同外国帝国主义频繁地打交道，所以，如果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懂得如何同它们进行斗争，恐怕并不言过其实。我国确实从未成为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真正的殖民地，然而在某些方面，我国的困难处境较之殖民地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知道，帝国主义国家一般总是千方百计地限制其他的竞争者插手自己的殖民地，并极力维护该地区的局面。此外，帝国主义国家虽然剥削自己的殖民地，但为了发展该地区的经济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我国则是帝国主义列强互相争夺的场

所，它们都力图压倒对方以加强自己对我国的控制和剥削。它们时常为了瓜分我国的宝贵资源和加强其统治而施展各种阴谋诡计。譬如英俄两国签订的一九〇七年协定，就把我国分割成两个势力范围区。在许多情况下，它们都把我国的民族利益置之脑后，根本不予考虑。

如前所述，英帝国主义在我国的势力业已消失殆尽。这是因为英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缘故。众所周知，近十五年来，英国政府让亿万人民获得了独立，但其中多数新独立的国家仍心甘情愿地留在英联邦内。古老的法兰西帝国适应形势的变化，迅速采取了类似联邦制的作法。放眼全球即可发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过去那种剥削不发达国家的陈旧作法，已被以联合国技术援助和“科伦坡计划”为象征的新型合作关系所代替了。

有些过激分子叫嚷，美国继承了昔日帝国主义经济剥削的衣钵。他们胡说，美国的军事顾问、“四点计划”组织的工作人员及其商业机构在许多国家大肆活动，这恐怕是不吉之兆。还有人说什么美国向国外派人和提供援助的目的不纯，是为了建立军事基地和剥削其他国家的人民。

应该坦率地讲，从美国人在伊朗的活动来看，完全不是这样。我们要求美国人在与我们合作共事时，以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为原则，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我们之所以欢迎美国的“四点计划”援助和军事援助，原因是这些援助使我们在发展伊朗经济和保障世界自由的事业

中取得了成功。当我们发现美国的商业机构有助于我们实现上述目标的时候，当然应该对之采取欢迎态度了。

美国与昔日的帝国主义国家迥然不同，它从来没有侵略和奴役我国的企图。不然的话，我们是不会欢迎美国人的。伊朗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一贯奉行同样的方针。

在与帝国主义恶魔作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两个基本方法：第一个方法并不新鲜，然而应该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不发达国家里加以强调。这个方法就是要认清“巨大的危险”。根据我们的经验，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应该特别小心提防新型的共产帝国主义，因为这种新型的帝国主义打着骗人的旗号，把自己打扮成发展中国家的真正的民族主义的盟友，混进那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去，进行破坏和捣乱。这种帝国主义把自己的活动建筑在消极的破坏性的民族主义的基础上，一旦出现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它便加以利用。这种帝国主义就象贪婪的食客那样，事前将猎获的野味捣烂，以便更好地加以消化。摩萨台执政时期，我们目睹了在我们可爱的祖国所发生的这种情景，我们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那时我国的命运一度落入了新型帝国主义的手中。这种情形在其他几个国家里也发生过，遗憾的是，竟然扼杀了它们的独立与自由。

我们的第二个方法是：坚决地与新老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不要有丝毫的怯懦和奴颜媚骨。我们和其他人在这方面取得的经验证明，在帝国主义面前，必须始终表现

得坚强不屈，要在社会和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展示出这种坚不可摧的意志来。今天，小国应该有胆量和勇气在自己的强大邻国面前巍然屹立，对于它的强大一点也用不着惧怕。小国还应该再前进一步，为了保障集体安全，按照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同自己的朋友携起手来。

在另外章节里，我将详细地阐述自己有关如何保卫伊朗和中东的观点。这里，我只想表述一下自己的坚强信念：在帝国主义面前，永远要表现得有力量，这种力量只能来源于团结，即民族的团结和与友好国家的国际团结。

今天，世界上爱好自由的人民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凡是勇敢的民族就不怕与自己的朋友一起担当风险，它可以与朋友共患难，并从中吸取力量。我们伊朗人奉行积极的民族主义政策——它实际上渊源于我国光辉灿烂的古代时期——在国内外取得了一片大好形势。

我们为伊朗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建立起友好关系而感到无比的喜悦。正象一个普通人在困难时依靠自己的忠实朋友那样，我们也期待着朋友们的援助。我们始终准备扩大忠实可靠的朋友的队伍，也始终高度警惕地准备同朋友们一道为抵抗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战斗。

第七章 借鉴新文化问题

在去远东旅行的一九五八年，我记起加拿大前外交部长莱斯特·皮尔逊先生的一句名言，他说：“可口可乐取代不了孔夫子。”这句优雅的俏皮话，是许多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因学习和运用西方的文明成就而陷入困境的写照。伊朗是个典型的文明古国，它有绚丽多彩的文化遗产，在许多方面超过了西方各国。若说西方国家可以传授我们某些新文化的成就，那么伊朗或许能使它们了解更为古老而深奥的文明的真谛。

在伊朗，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工厂，以及诸如此类的干净整洁的饮料加工厂，遍地皆是，我看这不过是表面热闹的西洋景而已。

借鉴欧洲文明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为了明确这个问题，谈谈以下几点还是必要的。

如前所述，我国的科学、文化和艺术位于世界的前列，历时长达几万年。但在漫长的恺加王朝时期，伊朗的科学技术发展缓慢，几乎陷入停顿，丰富的知识源泉濒临枯竭。这期间，西方国家兴起，在发展科学技术和传播文化知识方面快马加鞭，终于超过了我们。今天对我们说

来，要学习和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尚须走一段很长的路。然而，伊朗不仅应该迎头赶上世界文化的先进水平，而且应该超过它。

不可忘记，我国的现实状况与西方各国相差很大。我们所借鉴的只能是那些符合我国需要的西方科学与技术。为此必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本国的古老文化结合起来，同时将本国的古老文化同本国目前的科学技术结合起来。这是一件新奇而绝妙的工作。伊朗在科技上有悠久的历史，又有成千上万男女知识分子的勤奋努力，定能在东、西方文明和古今成就的结合方面跃居世界的首位。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伊朗与西方各国的文化交往古即有之，并不新鲜。早在公元前三百三十一年，在马其顿——它包括今天欧洲几个国家的部分疆域——兴起的亚历山大大帝便征服过伊朗。我们则于公元二百六十年在战争中俘虏过罗马皇帝瓦列里安。此人手艺精湛，是位富有经验的技师，曾长年在伊朗从事土木业，为我们提供了称得起是西方文明的建筑。当时的伊朗国王沙普尔将他和大批的罗马战俘安置在胡泽斯坦。他们遂在胡泽斯坦的河流上修筑了不少堤坝，其遗迹至今犹存；有些堤坝前不久还在使用。

近几百年来，西方的军官、探险家、旅行家、商人和传教士接踵来到伊朗，有关他们的故事在我们历史书上有详细的记载。公元一二七一年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人们称他为新地理科学之父——来到伊朗，在我国度过一

段时间，学会了波斯语。他在自己的游记中是这样记述我国的：“伊朗是个大国，在古代曾名扬四海，威震八方。可是现在却遭受着鞑靼人的蹂躏和破坏。”关于霍尔木兹岛他写道“印度商人的货船，满载着粮食、宝石、珍珠、丝绸、锦缎、象牙和药品等航行至该岛，将货物推销给霍尔木兹的商人。”毋庸置疑，马可波罗在伊朗的所见所闻，及其在游记中描绘的奇异景色，使其他威尼斯人向往伊朗，巴不得能早日成行，来我国一游。十四世纪，征服了伊朗的蒙古皇帝帖木儿想打开与英国国王亨利四世交往的大门，遂派侨居大不里士的英国传教士让·格林劳作为使臣，到英国的王宫去游说。就在这个世纪，卡斯蒂尔^①王亨利三世曾派遣一个名叫路易·宫泽鲁·迪克莱维胡的人作使臣到阿弥米·帖木儿的宫殿来。这位使臣看到阿弥米·帖木儿宫中豪华艳丽的帷幕不禁大为惊愕，赞叹道：“这无比珍贵而壮观的帷幕，远看恰似一座巍然屹立的城堡。”关于阿弥米·帖木儿的司法制度，他写道：“被判处死刑的贵族施以绞刑，而一般的罪犯则予以斩首。”

霍尔木兹岛上贸易的兴隆和市场的繁荣，使葡萄牙人垂涎三尺。于是，他们在一五〇七年出兵攻占了该岛。一五六一年英国商人安东尼取道波罗的海来到伊朗，以求打开英伊之间经上述通道的贸易大门。他对吉兰省的蚕丝尤感兴趣，曾做过一些买卖，但因货物的运输费昂贵，加上俄国人从中作梗，只好作罢。

十六世纪末，另一个英国商人罗伯特·纽波利进入

① 卡斯蒂尔，西班牙中部的古王国。——译者

波斯湾沿岸的阿巴斯港,后经伊朗、小亚细亚去君士坦丁堡。关于歇尔利兄弟(安东尼爵士和罗伯特爵士)及其对阿巴斯王的协助,在前面已有叙述。阿巴斯王给热衷于加强同伊朗贸易往来的基督教商人很多特权。伊朗政府对外国商人的这种友好态度至今仍是有口皆碑的。

一六一七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设拉子市着手兴建工厂——当时称作贸易基地。一六二二年,我们同英国人一起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回霍尔木兹岛,这给葡萄牙人以沉重的打击,使他们在波斯湾的威信扫地以尽;而英国人的商业活动却在那里蓬勃开展起来。第二年,阿巴斯王允许荷兰人在阿巴斯港建立贸易基地;法国人后于一六六四年获准在阿巴斯港和伊斯法罕兴建这种贸易基地。但不久,由于英国人商业霸权的日益增长,荷兰和法国的势力遂被排挤殆尽。

十七世纪,英国人托马斯·赫伯特爵士和效忠英国政府的法国人让·绍尔顿爵士先后到伊朗旅游,事后撰写了颇有价值的游记。第一个俄国的外交使团于一六六四年奉阿历克赛皇帝之命到达伊朗,该使团由两名使臣和八百个随员组成。一七〇八年,彼得大帝派遣使者到伊朗宫廷所在地伊斯法罕,七年后,又派来另一个使团。

关于俄国人在伊朗的征战劫掠,以及苏伊两国目前的关系状况,前面已有详细的叙述,兹不赘言。

十九世纪初叶,到伊朗来的欧洲学者和政治家络绎不绝,其中有《伊斯法罕的哈吉老爷》一书的作者詹姆斯·穆利耶爵士和《伊朗历史》的编撰者约翰·莫勒卡姆爵

士,正是这两位学者将伊朗文学介绍和传播到欧洲,由于他们的辛勤努力,西方各国对伊朗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喜爱。

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早在伊美两国建交之前就已来到我国。约在一八二八年,第一批美国传教士踏上伊朗的国土。不久他们创办了一所学校,后又逐渐地兴建起几所学校和医院,其中有著名的德黑兰厄尔布尔士中学,我国当今许多政治家曾在那里就读。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传教士也曾长期侨居我国,进行传教活动。比如前面提到的让·格林劳早在十四世纪、其他的西方传教士则于十七世纪相继来到我国,他们都有一定的影响。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于一八八三年开馆,首任美国公使是G.V.本杰明爵士,他著有两部关于伊朗的书。从十九世纪至今,我国与美国的关系不断改善,日益发展,愈来愈加密切。这里应该指出,一九〇九年在德黑兰美国中学任教的哈瓦尔德·巴斯克鲁伊尔,在立宪派同保守派的斗争中为捍卫伊朗的宪政而光荣捐躯。

为了正确理解西方文明在伊朗的影响和作用,必须记住: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工业与科技的革新对于西方各国也是需要解决的新课题。拿美国来说,它目前的状况与五十年前相比乃有天壤之别,近十年来它的变化也非同小可。我于一九四九、一九五五和一九五八年三次走访美国,在后两次的访问中,看到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和新的改革。促成这种迅速而巨大变化的因素是显而易见的,那便是美国目前用于科学研究和发展工业技术的经

费是二次世界大战前该项经费的好几倍。正因为如此，它获得了空前的成就。新的文明在美国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向前发展，日臻完善。这种情形在我访问过的欧洲各国如英国、法国、德国、苏联及其他国家也或多或少、程度不一地呈现出来。

有些欧美的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对在经济上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传播与推广西方文明持有奇特的观点。他们认为，这类国家还不具备接受现代化科学技术的条件，它们应该从头做起，比方说首先采用美国国内战争时期流行的技术。他们当中有人以我国为例，说什么伊朗农民至今仍用带铁尖的木把犁耕地，所以就应当向他们提供美国人在国内战争初期使用的铁犁，而无须乎徒劳无益地向他们展示拖拉机等新式农具的操作方法，因为他们根本不会使用这些机械，也不知道怎样保养维修。这批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从这种观点出发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必使用象抗菌素、电子仪器和航空设备等精密复杂的机械和现代化的技术。对它们说来，还是先应用低级的生产工具，然后慢慢地熟悉庞大的机器为好。

这种观点，至少对伊朗来说是荒谬绝伦，不值一驳的。我有很多的论据，这里仅略举一二就足以说明问题。

在一九五八年竣工的德黑兰大型国际机场附近，今天仍有来自穷乡僻壤的骆驼商队将各种货物运至首都。然而这个机场，比我在美国和欧洲看到的机场，设备更完善，也更现代化。确实也应该如此，因为长期以来德黑兰就是欧洲与远东之间国际航线的一个重要中转站，也是

国内航线的枢纽。

如今，人们对乘飞机旅游的兴趣越来越大。一九五八年来往于德黑兰的飞机架次比一九五三年约增长十倍。出于经济、速度和安全的考虑，我们在部分航线上采用了最新式飞机。我国的空军也以喷气式飞机装备起来，因为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涡轮式战斗机现已被淘汰，不适用了。

今天德黑兰拥有中东独一无二的最新式的牛奶加工厂，就其规模而言，不愧为世界上最庞大的现代化工厂之一。当然，我们也可以修建老式的牛奶加工厂，但现在的这座工厂卫生设备好，工作效率高，更符合我们的福利开发计划的要求。

设拉子的纳玛兹医院，是最现代化的新型医院之一。据一位有医务专长的美国人说，它堪称是中东地区医院的楷模。伊朗是几百年前大名鼎鼎的医生伊本·辛纳的祖国，当然可以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设计和建筑古代式样的医院，但今天这种类型的医院已不大适合为人民服务的需要。同样我们也可以利用旧时的药物，但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是通过皇家社会服务组织将外国生产的最新药品和各种抗菌素分发到各大城市和边远的乡村。

俄式四轮马车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是德黑兰市流行的交通工具，而今天在首都街道上行驶的却是近万辆出租汽车。

一九五九年，德黑兰开始成批使用伦敦市街上的那种双层公共汽车。曾被人称为落后国家的伊朗的首都，如

今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正计划在这里修建地下铁道。

在我国农村，几百年来都是毛驴驮货，它是农村唯一的交通工具。我看到过一个人骑在驴背上，边走边聚精会神地看书，这种趣事在驾驶汽车时是办不到的。眼见农村的毛驴日益减少，我还感到有点惋惜；但不必发愁，因为农民们已对吉普车发生了兴趣。我们修建了大型工厂，以装配由外国进口的吉普车零件。现在已有上千辆吉普车奔驰在伊朗的大地上。将来我们要逐渐地在伊朗生产吉普车零件，并在国内出产最新式的吉普车；也许世界上几家大型的汽车制造厂会在伊朗开设这类工厂。

目前一座崭新的汽车轮胎生产修配厂业已在伊朗建成。

从前人们相互通信和政府机关发布公告是靠仆人或公差传递，如今自动电话准确而迅速地担负起这项使命。同样，我们可以象过去那样用电报把伊朗各城市联系起来，但我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将电话线蜘蛛网般地架设到田野和山区去。我们还计划采用最新式的电子设备，加强城市间通讯联络。假如你乘火车旅游，路经我国西南部的埃勒万德山脉，便会看到山坡上有许多无线电话的射电波指向塔，它们是伊朗庞大无线电话网的组成部分。钢筋混凝土的立柱和无线电站其他笨重的器械全是工人们费了好大力气，用牲口运到七、八千呎的高处安装起来的。伊朗的无线电话站不仅通畅而清晰地将声音由一个城市传送到另一个城市，而且使我们与国外的联系

更加简便了。

如果说我有意在伊朗推广最新的工业技术项目，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做那些从经济角度来看不适宜的工作。譬如，我不主张象某些国家那样，只是为了面子好看而兴建钢铁厂。一座钢铁厂需要大量的水，以及铁矿石、煤和石灰石等基本原料；为了使之投产，还需要许多技术管理员和有经验的工人；同时还要筹备大量的发电设备、运输工具，寻找工厂产品的销售市场等等。目前我们认为伊朗业已具备兴建现代化钢铁厂的客观条件，因此我们便从经济需要出发，而不是为了炫耀于人，制定了修建这类工厂的计划。

为了使伊朗这样的国家正确地运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必须富有远见和采取审慎的态度。前面说过，我们需要借鉴许多西方的新技术和新工艺，这项任务主要是由大学毕业后被选派到国外留学的我国年青人来承担。这些年青人在学习过程中和进行科学研究时，理所当然地应该学会如何将获得的知识与学问与伊朗的现实状况和实际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

许多西方的科技项目可以不加思考地、全盘地接受下来，但也有一些项目需要仔细地加以推敲。

一位伊朗有声望的商人的儿子，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论电视与伊朗需求的统一”。回国后，他成为伊朗电视业的奠基人。另一位伊朗青年，在研制农业机械方面首屈一指的英国呆了七年，专攻农业工程科目。他刻苦攻读，并注重将学到的知识

与伊朗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取得了一定成绩。他还娶了一个英国妻子。回国后，他将自己的学问应用于伊朗的农业，在德黑兰近郊开辟了一块长二十四公里的种植地，采用新技术，获得了长纤维棉花、各种水果和蔬菜的大丰收。他还以优良的技术培育出头等的美国雏鸡。

改造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就象布置一个大的战役那样，需要事先制定好行动计划。一九四八年，伊朗摆脱了战争带来的困难和紊乱状况后，即向一家著名的美国公司聘请技术顾问，以便调查我国发展经济的条件，向我们提出使用巨额的石油收入振兴伊朗工业、进行基本建设的途径和方法。同年，他们便就此草拟和呈交了一份初步报告。我们立即做出新的努力，又邀请美国几家著名的顾问公司与我们合作，以便完成这项重要工作。美国技术专家拟就一份极其详尽的书面报告，包括五个分册，详细地论述了应在七年內实现的一个计划方案。

这份报告对伊朗的国计民生和经济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提出了关于发展文教卫生、工农业、采矿和石油生产等方面的一揽子计划。议会十分重视外国顾问公司的这些建议，批准了有关七年计划的法案；随后，成立了“计划组织”这个相对独立的机构，负责贯彻执行上述计划。议会将全部石油收入统统分配给这个组织，作为实现七年计划的经费。这项庞大的计划所需要的经费高达四亿美元，七年內平均每年开支五千八百万美元。为保障这笔经费开支，计划拨出国家的石油租借稅年收入四千万美元；不足的款项准备通过国内外的借贷予以补齐。

结果，第一个七年计划几乎濒于失败。因为首先在管理方法上有漏洞。该报告的撰写人对于建立必要的组织机构，以使“计划组织”充分地发挥作用这一点，缺乏足够的重视。此外，政府其他部门得不到石油收益的资助难以开展工作的情形日益显著地表露出来。

“计划组织”从石油收入中得到的款项并未能达到议会设想的数目，比规定的要少得多。比如一九四九年国家石油收入是三千八百万美元，而“计划组织”仅得到一千五百万美元；翌年，石油收入达到四千五百万美元，而“计划组织”所得不过三千一百万美元。

虽说如此，第一个七年计划的失败仍应主要归罪于摩萨台。因为他实行的石油政策必然导致该计划的破产，使国民享受不到石油收入可能给国家带来的好处。

石油收入既然点滴未进（甚至还要额外支出，因为政府必须向石油公司的职工发薪，并承担倒闭企业的义务开销），国家的日常开支和实行开发计划的经费自然不能象以前那样得到保障。

一九五三年摩萨台下台后，石油收入开始回升。我们遂再次努力使“计划组织”重新展开活动。在“计划组织”内成立了新的机构，其活动范围逐渐扩大。“计划组织”和政府其他机关的工作人员思想逐渐稳定下来，不再三心二意。各项开发计划接二连三地付诸实施。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二个七年计划制订出来，获得议会批准。

我象父亲一样，在国家的开发和建设问题上从来不主张拖延和迟缓。我国的第二个七年计划到目前为止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有些基本项目成效还不甚显著，因为它们大都是在外国专家帮助下，经过精心设计制定出来的经济和技术项目，短时间内不易看出它们的效力。

还有些建设项目至今尚未完成，或者完成了还没有公诸于众。当然不该忽略，精心研究和制订开发计划所需要的时间，可能并不比施工建设，即打地基，修厂房，安装机器、钢铁支架和技术装备等所花费的时间少。

综上所述，仅是我对国家复兴和改造的一点粗浅看法而已，可算做是本章的开场白。我想开诚布公地叙述一下有关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还是必要的。

有些人、特别是报社的记者似乎对我的衣着服色、办公室的门面设计比对我的政治观点和处世态度更感兴趣。世界各大报社的著名记者曾多次受到我的接见，可是他们并未能理解我的政治主张的真谛，于是就只好随心所欲地在一些肤浅而平庸的题目上大做文章。

应该讲由于某种原因，美国人特别擅长撰写诸如此类的报道。我经常十分惊讶地看到一些粗浅而幼稚的报道，它们竟然出自穿着考究、名噪一时、有着善于思索的面孔的美国记者之手！有时我简直怀疑这些记者为胜任在国外的工作是否受过良好的训练。幸亏他们当中作为例外还有机敏而老练的记者。这种“例外”的记者若是多起来的话，对宣传自由世界的目标和愿望肯定将大有裨益。

毛病或许出在美国的电视宣传机关，它们象哄小孩似地对待美国的成年人，以为这样才能引起人们对某件事的注意和兴趣。但是若把这种想法与“四点计划”组织

和美国其他企业的责任感很强的工作人员在伊朗的活动对照一下，便会发现这是完全错误的。我听说，甚至在美国的小食品店里都摆列着廉价的有关历史、自然科学和哲学方面的重要著作，供人们选购。由此看来，美国人并不象到伊朗来走马观花的那些大名鼎鼎的记者们所描述的那样目光短浅和缺乏见识。有数千年历史传统的东方宫廷，自然有许多花天酒地、艳情轶事的传说和故事。但是要了解我，则不能单凭这些历史故事，而应该研究我在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执掌国家政权所持有的政治观点和见解。事实上，我总是乐于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和国家其他的麻烦事情。我是国王，同时也是一个热心于发展经济和繁荣文化的人。

处于我这种地位的人很难摆脱随着权力而来的各种诱惑，然而幸运的是，我在生活中追求的却是另外的东西。我的人生哲学自有它特殊的含义。我认为发展农业生产事关重大，探讨这个复杂的难题永远不会使我感到疲劳和厌倦。因为我知道，找到这类问题的任何微小的解决方法都将对我国千万人的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

我并不象某些英国人那样自命清高，认为躺在床上看经济杂志便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在我看来，无穷的乐趣在于跟困难进行斗争，当别人在困难面前手足无措时挺身而出，战而胜之。

老实讲，只有在复兴和改造国家的伟大事业中经过实践获得成功的时候，才能满足我的心愿。希望本书的读者能与我一样，有此同感。

对于刚走上发展道路的国家经济复兴，有不少泛泛之论和不着边际的设想，听起来实在令人感到枯燥无味。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单凭某个计划方案的庞大惊人 and 神乎其神去判断它的真实价值和意义，这乃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在今天为了管理好国家事务必须规定公平合理的赋税，并用适当的方法加以征收。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政府未能象应该做的或可能做的那样征收赋税，这种批评是完全正确的。财政机关的紊乱和管理不善，以及簿记制度的繁琐，确实给征税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

近来，财政部为了克服这种状况，在外国专家的帮助下编制出一本十分精彩的指导性手册。这本袖珍手册有四种颜色的塑料封皮，为了查阅方便，还附有许多照片和精确的图示，连外行人也能一目了然，看懂它的内容。

在这本指导手册中，有关土地税事宜的说明，使行政手续简化百分之四十，使税收簿记量减少了百分之六十。总而言之，这本小册子的指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样，我敢肯定那些对税收状况满腹牢骚的人，翻阅这本手册仍然会感到厌烦。

与其光对国家建设发表娓娓动听的演说，还不如孜孜不倦地埋头苦干。要解决刚走上发展道路的国家在前进中遇到的问题，就必须花费力气，用心思考。这种思考不仅谈不上枯燥，反而是饶有趣味的。

为了阐明我一贯主张的促进国家发展的方针政策，为了说明体现着我的观点的具体作法，有必要将一段时

间内国家完成的工作公诸于众。为此，这里特列表叙述一下我们最近半年来为发展经济和繁荣社会所做出的努力。

第一个月（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二十二日^①）——

新建的盲人学校落成；伊朗南部的三个城市开始使用电话；在小土地所有者中分配王室所有的三十四个村庄的土地，由我亲自向农民颁发土地证书。

在阿塞拜疆省成立巡回法庭；在腊什特市建立肺病防疫中心；在德黑兰南部挖掘一眼深井。

伊朗新的标准规格管理局宣告成立；伊朗和意大利之间建立无线电话通讯；伊朗第一口海底石油井在波斯湾开凿；在阿巴丹拨出专用地皮给五百八十六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修建住宅；伊朗工矿业开发银行正式开始营业；在耶兹德市郊开办一所小学；在卡腊季兴建一座新的水泥枕木厂；扩建马什哈德、伊斯法罕和巴博勒等市的肺病防疫中心；纺织工业学校落成并招收学生。

第二个月（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②）

在德黑兰市郊由我投资兴建的能容纳二千名儿童的幼儿园落成；由我妹妹投资建成一个诊疗所和一家商店。

我的生日那天，在全国各地开办了二十八所小学；在十五个城市新建的发电厂开始发电；在伊朗中南部的十

^① 公历九月二十三日至十月二十二日相当于伊朗的七月份。——译者

^② 公历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相当于伊朗的八月份。——译者

二个铁路站增设电讯设备；库尔迪斯坦农业机械化中心落成；从一个南部产油区通向设拉子市的天然气管道开始敷设，这些天然气将供应设拉子市和正在筹建中的化肥厂；扩建霍腊散的重油仓库，并开始向贮油库输油；一个城市的诊疗所和另一城市的肺病疗养院修缮完毕；以我女儿的名字命名的夏赫娜兹水坝破土动工。

第三个月（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二十一日^①）

库尔迪斯坦一家医院增设妇科和牙科；在法尔斯省和伊斯法罕省各城市之间建立无线电话通讯；扩建五个城市的石油贮藏库；一条大的灌溉运河竣工；在大小城市开办了五所小学和九所专业技术学校；建成另外五所小学；新建的第一家私营制糖厂开始试产；政府修缮了二百五十间农舍；一艘三万五千吨级运油船首次从欧洲驶抵伊朗，装运石油物资；一座橄榄油和芝麻油加工厂开始投产；一家德黑兰医院新建的附属诊所开始营业；某产油区的三眼新井开始出油，使该地区的石油产量增加两倍；在另外地区的一眼井钻出石油；机制面包厂和两个新的电话网在德黑兰落成；为塞菲德河水坝增修一条支干渠；试挖了十眼灌溉用深水井；以法拉赫王后命名的新医院竣工。

第四个月（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日^②）

① 公历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二十一日相当于伊朗的九月份。——译者

② 公历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来年一月二十日相当于伊朗的十月份。——译者

吉兰省的一个邮电分局开始营业；扩建伊斯法罕兽医站；在某市建成一个发电厂、一家诊疗所、两所小学和一座清真寺；在另一个城市兴建一座发电厂和两所小学，另外两个城市的两座发电厂落成；在基尔曼市开办法拉赫王后护士学校；在伊斯法罕新建一座无线电发射台；两个城市的基本管道修复完工；扩建阿巴丹试验所；由我投资修建的一家德黑兰医院竣工。

第五个月（一月二十一日至二月十九日^①）

建成一所诊疗所和一个兽医站；由法拉赫王后投资兴建的另一个诊疗所开始营业；大不里士大学的新建筑设计完毕；在基尔曼建成一座棉纺织厂；大不里士一家面粉厂开工投产；德黑兰国营卷烟厂开始使用新式制厚纸机；在五个地震区安装了无线电收音机；由我和王后向农民颁发一千六百零七张皇家土地所有证。

第六个月（二月二十日至三月二十日^②）

在德黑兰贫民区建成一所拥有二百五十张床位的医院；在铁路沿线诸城市开设五个诊疗所和一所拥有一百张床位的医院；着手兴建一个肺病疗养院和一所诊疗所；另外两所幼儿园落成；建成一个小型试验室；在卡腊季市进行工业调查；在另外几个城市有三家新建发电厂开工；在一个城市开始安装水管；在扎黑丹和马什哈德、德黑兰和菲沙等市之间建立直接的无线电话通讯网；列伊市的

① 公历一月二十一日至二月十九日相当于伊朗的十一月份。——译者

② 公历二月二十日至三月二十日相当于伊朗的十二月份。——译者

水管安装完毕；在农民中颁发业已分配的国有土地所有证；由我投资在阿瓦士市新建一座蔗糖提炼厂；在霍拉姆沙赫尔新建一座大桥；在阿巴丹修成一座电视台；开辟伊朗与欧洲之间第一条海上客运航线。

除了上述方案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建设计划正在实行，胡泽斯坦省的开发计划便是其中之一。为了制定和实现这个省的开发计划，我们向美国一家大公司聘请了几位顾问，这家顾问公司是由戴维·L·亮塔尔和古尔登·克雷布两位先生开办的。这两个人出色地开发了美国田纳西流域，因而获得极大的声誉。在伊朗，他们为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广袤地区制定出各种不同而又互相联系的开发计划和方案，因此可以说他们在我国进行的工作与其在美国完成的事业大致相似。辽阔的胡泽斯坦省在几百年前非常富饶，为幅员广大的伊朗王国提供了大量的甘蔗、小麦等粮食作物。可是后来，由于外族的不断入侵和骚扰，那里的许多灌溉设施(少数例外)遭到严重破坏，被毁的遗迹至今犹在。

此外，该地区由于洪水泛滥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地盐碱化，不适宜种植庄稼和蔬菜。天长日久，那里的农业日趋衰落，几乎变成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

胡泽斯坦拥有高山大川、广阔的原野和丰富的石油资源。庞大的阿巴丹炼油厂及其所属的许多油井就座落在这个省。但是长期以来可用来发电的水力资源未被利用，从石油井中冒出的大量天然气在空中散失。因为这里没有使用天然气这种石油副产品的设备，也没有能力

储存和转运天然气，于是只好象美国产油区过去所做的那样，将天然气烧掉。我国一部分宝贵资源就这样白白丧失，岂不令人惋惜！

最近，为了充分开发和利用胡泽斯坦省的天然气和其他资源，拟定了五项基本计划，它们必将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第一项计划是，用煤气作原料，生产漂白剂和塑料。如今塑料制品深受家庭用户的欢迎，还被广泛应用于机动车、工业和其他行业。不久，一座塑料加工厂将开工投产，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它将引起国内外私人投资者对胡泽斯坦省经济潜力的注意，提高他们为开发该地区而进行投资的兴趣。

第二项计划是，在化肥生产中使用天然气。胡泽斯坦省的农业急需大批的化肥，但首先应该弄清楚，该省的土地适合使用哪种化肥。为了提供适当的化肥，我们在该省三百个村庄进行了试验，同时着手制定在该省兴建几座大型化肥厂的计划。

第三项计划是，在胡泽斯坦恢复甘蔗种植，并在当地生产食糖。为此特在几百年前伊朗王国的故都舒什市郊拨出面积为一万平方公里的专用地，作为种植甘蔗的样板田。甘蔗田的主灌溉渠是一家荷兰公司在开凿运河过程中挖掘出来的，运河中来往的船只可在灌溉渠里自由航行，这项工程的宏伟规模由此可想而知。该地正在筹建甘蔗碾压厂和制糖厂，估计每年约产白砂糖三万吨。

第四项计划是，将阿巴丹大型炼油厂的部分电力用于该省的开发事业。为此先要从阿巴丹到阿瓦士架设起

高压输电线，这样胡泽斯坦省中部就会有足够的电力使用。

第五项计划最重要，是在伊朗全国大铁路经过的迪兹河上（位于安迪姆沙克市附近）修建一座大水坝。我们想把这座水坝建成为世界上最高大的水坝之一，其高度将超过一百八十米，或者说相当于巴黎艾菲尔铁塔高度的三分之二。这座水坝的坝址选在一个非常理想的峡谷当中，可以说世界上再没有其他地方比它更适宜修水坝了。该峡谷的两侧高耸、陡直，相互对称而靠近。正如专家们所说，在那里修建水坝，乃是圣洁而至高无上的真主的意志。

修筑水坝的主要工程是在峡谷两侧坚硬的岩石中开凿隧道。为此在与岩壁相接的脚手架上安置了载重卡车，上面装有带动隧道挖凿机的电动机。当挖凿机开动时，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隆声，宛如几门高射炮连珠般的发射。

当询问该工程的总工程师——一位经验丰富、饱经风霜的瑞典人——使用隧道挖凿机的工人是从哪里招募来的时候，他指了指座落在山谷间的沉寂而遥远的村庄，以此作为回答。当问及这些山区农民对于那种震撼山岳的响声和艰苦的工作环境是否满意时，他微微一笑，作出了我永生难忘的回答：“他们喜欢听这种响声。”

预计迪兹河水坝将于一九六二年下半年竣工。到那时，新建大坝的水库里就会装满水，水流一泻千丈，带动安置在大坝背面底部的涡轮主机，便能发电五十二万千瓦。大坝水库贮存的水可灌溉约一亿六千万公顷的农田。迪

兹大坝落成后,该地的水情受到管制,不必再担心洪水泛滥成灾,每年也不会再因水灾而损失近百万美元。

另外,我们还计划在迪兹河注入其内的卡隆河上修筑堤坝。利用卡隆河,尤其是它上游的水力,可发电数百万瓩。这样丰富的水力资源不加利用,实在可惜!目前根据对这条大河的空中和地面的勘查,已发现几个适合修大坝的地点。试验结果表明,其地质条件和坚固性完全合乎规格要求。

胡泽斯坦省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其经济潜力巨大无比,世界上象这样富饶的地区还是不多见的。它既有丰富的电力资源,又有大量的石油和煤气,还能提供各种原料和丰盛的农产品。当然,我们要开发和利用该省巨大的自然财富还需要时间,但我希望能活着看到这一天的来临。如今我才四十一岁,想来是可以如愿以偿的。

我听说,几年前温斯顿·邱吉尔过生日时,给他照像的一位年轻摄影师表示祝贺说,但愿能在十年后再来庆贺他的生日,并照张纪念像。邱吉尔狡黠地打量了一下这位年轻人说道:

“看来你是个体格健壮的小伙子,大概不至于失望吧?”

在我国,不仅胡泽斯坦省有丰富的水力资源,在伊朗的群山峻岭中还有不少非常适宜的地点,可用来修筑蓄水、防洪、发电或者兼而有之的堤坝。伊朗很多地区山高坡陡,峡谷两侧峭壁坚实,可以修筑合乎理想高度的堤坝,储存必要的用水。有的地方形成天然的堤坝,坝后自

有巨大的水库，人们要做的事只是将自然界未完成的工作臻于完善而已。

伊朗（除了降雨量极其丰富的里海沿岸和阿塞拜疆省之外）在鼠目寸光的外国人看来，似乎是干燥而贫瘠的国家。因此当我们兴修堤坝时，他们便感到诧异，甚至讥讽我们是想开设大酒馆，可是又没有什么酒。美国一家刊物上发表的有关卡腊季水坝的文章就反映了这种思想。读之不禁使人哑然失笑。文章作者声称，修筑卡腊季水坝用以发电，是耗资巨大，得不偿失之举，而完全可以改用用费低廉的火力发电，满足所需的用电量。该文作者的信口雌黄与我们修筑这座水坝的基本意图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我们之所以在离德黑兰五十六公里远的地方修筑这座水坝，主要是为了用卡腊季的河水来保障面积日益扩大、人口与日俱增的首都供水。作者在文章中还胡说什么，夏季的卡腊季河只不过是一条细小的涓流而已，在这样缺水的河上修筑堤坝，纯粹是浪费时间和金钱。要是这位作者能亲眼看到下面这件事就好了：在卡腊季河水流量最小的季节里，我的一位擅长游泳的朋友想泅水过河，因水流湍急，被冲到河的下游很远的地方。

从山间流泻下来的这条河，到德黑兰附近流量甚大。退一步说，即使这条河的水量不足，那也丝毫无损于修筑河坝的正确性。因为伊朗的山区，即使地处热带也有大量的降雪，溶化的雪水则注入河川。在山间积雪迅速溶化的春季，用不了几周时间，河水就会暴涨形成可怕的洪流，裹挟着人畜一泻千里。春季的洪水白白流失且不待

言，而且时常造成巨大的灾难，使人的生命财产蒙受损失。再者，伊朗的田野多是光秃秃的，没有什么杂草树木，洪水奔腾而至，畅通无阻，流速加快，猛烈地冲刷着农田，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地力锐减。另外，还使我们不能蓄存足够的水，用以灌溉农田。基于上述的考虑，我们才决定修筑堤坝，以便蓄存山区溶化的雪水，保证一年四季农田的需要；同时防止洪水泛滥成灾，还可以用来发电。

卡腊季水坝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破土动工，当时我将一些铜钱撒进第一桶混凝土里，以祝愿这项造福国民的事业成功。高达一百八十米的卡腊季水坝到一九六一年下半年全面竣工，交付使用，将是指日可待的。

该坝的水库存水主要将满足德黑兰居民的饮食需要。但在流进德黑兰之前，水流将带动发电机发电。其发电能力将逐渐达到十二万千瓦。

腊什特市郊的赛菲德河大坝工程业已动工，坝高一百零五米以上。必要的水渠建成后，它将能灌溉十八万公顷的土地，生产六万四千瓩的电力。在另外几个地方，我们还修筑了一些小型水坝。比如在一九五七年下半年，位于伊朗沙赫尔市以西的班普尔河水坝竣工，现正灌溉着大约一千四百八十公顷的农田；我们还在锡斯坦省靠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的地方修筑了两个水坝，总共灌溉约二万公顷土地；还在古勒帕依冈附近建成一座水坝，使两千公顷的土地受益；在阿塞拜疆省东北地区还修筑了许多小水坝，总共灌溉着一万八千公顷的农田；我

们计划在全国各地再修建些堤坝。

比修筑水坝更重要的是在全国敷设新的交通运输线，为此我们掀起了一个扩建铁路网的热潮。如前所述，我父亲执政之前，伊朗几乎没什么铁路。在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帮助下，他满怀信心，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修成了贯穿全国的大铁路。这条骨干铁路可以算做敷设伊朗交通网的开端。目前我们正在大力修建其他铁路线，以便运输体积大、份量重的货物，这和在世界先进国家里司空见惯的情形别无二致。

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伊朗铁路取得了迅速发展，在两年时间里建成了两条新的铁路线：一条从德黑兰到大不里士，长达六百四十三点六公里；另一条从德黑兰到马什哈德，有九百零一点零四公里长。

我同父亲一样热衷于铁路建设。应该说，新铺设的铁路线具有重大的经济和文化意义，它使我国各地区空前紧密地相互连结起来。关于这一点，某前大臣的谈话是最好的证明。他说，在担任内务大臣时，曾竭力设法降低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但始终未能成功。最近新铁路建成后，有一天他路过德黑兰一家食品店，发现商品价格比在他任内规划的价格还要低得多。于是，向店主打听减价的原因，回答说，这显然是修建铁路的功劳。确实，在今天我们可以更加迅速和运费低廉地把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从遥远的地方运至人口稠密区；更有意义的是，铁路为一般国民提供了十分舒适、简便而又安全的旅行条件。比如，德黑兰至马什哈德线的铁路管理局

原来每天安排一列特快客车和一列普通客车往返于两站之间。但旅客人数与日俱增,为的需要,不得不增加车次。当我目睹从未到过德黑兰的许多伊朗人,由于乘车之便,终于实现了首都之行,而德黑兰市民也因交通便利得以了解遍布各省的、称得起是国家骄傲的宝贵文化遗产时,怎能不感到由衷的高兴呢?

伊朗最主要的工业城市伊斯法罕至今尚未同外地建立铁路联系。为弥补这一缺陷,现已开始修建把该市与首都连结起来的铁路。这条干线经伊斯法罕向南延伸至设拉子,其经济价值对国家来说相当重要;从文化方面看,也有巨大的意义。钢铁的链条将两座拥有丰富多彩的古代遗迹和文化建筑的城市与全国各地连结起来。

最近,为发展国家的铁路事业,我们购买了八十五万根水泥枕木,使用了四百节货车车皮。此外还订购了约一千节车厢供各铁路线使用。为加快邮件的传递,特增添了十五节邮寄车皮。并采用最新技术发展了铁路通讯信号系统。

在中东,伊朗是将全部蒸汽机车改为内燃机车的第一个国家,因此车辆的来往更加迅速而安全。

我十分留恋那些现已陈旧的蒸汽机车,是它们多年来一直拖着成千上万列火车奔驰在坡度甚大、崎岖不平的山间铁路上。但目前只好割爱,将其廉价拍卖。新式的内燃机车象过时的蒸汽机车一样也是在美国制造的。据说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在伊朗用过的部分内燃机车至今仍在阿拉斯加州使用,机车身上的波斯文记号隐约

可见。

现在我们打算延长伊朗的铁路线，使之和国际铁路相连结。一九五八年，从大不里士至苏联边界的卓勒法的轨道改建工程完工。过去俄国人修筑的这条铁路，轨道宽度比国际上流行的轨距大，我们按照国际铁路的通常标准一点四三五〇四三五米的宽度调整了轨距。目前用火车经苏联运往国外的伊朗货物，在卓勒法换成苏联的车皮，然后在苏联与欧洲的接界处再换成他国的车皮，转运到西欧。乘客去西方国家旅行也如法泡制。

为了增加与国际铁路相连接的国内铁路线，我们正在研究制定另外两个方案。尽人皆知，在伊斯坦布尔和伦敦之间早就有一条“东方快车”铁路线，乘车的旅客可以从伊斯坦布尔直达伦敦，在维多利亚车站下车。伊朗铁路的终点站与土耳其铁路的终点站之间相隔三百三十七点八九公里，我们计划将两国的铁路修通，以便旅客能够从我父亲时修建的德黑兰车站搭乘特快客车直达巴黎或伦敦。这样不仅方便了旅客，也给国家的货物运输带来极大的好处。从欧洲运往伊朗的货物，不必再走苏伊士运河，绕道阿拉伯半岛，经波斯湾到我国南方诸港，只须利用这条铁路线便可直达目的地。

我们的第二个方案是延长伊朗的铁路线，使之与印度半岛的铁路相汇合。目前我们在扎黑丹有一条铁路线通往巴基斯坦，在几年时间内我们可铺设一条从德黑兰到扎黑丹的铁路，到那时，旅客便能从加尔各答乘车直达伦敦（经由卡拉奇、德黑兰、伊斯坦布尔和巴黎），也可以

将各种货物运输到这条干线及其支线的任何地点去。

关于开辟伊朗的航空线问题，前面已有叙述。我本人是飞行员，热爱航空技术，因此我为国家航空业和航空运输业的发展感到无比的高兴。这一点，恐怕不至引起什么大惊小怪。

据我们的外国航空顾问估计，在今后五年内伊朗的航线将增加三倍，航空部门的工作人员将达到现有人数的两倍。他们经常对我说，德黑兰机场是世界上最美观大方的机场之一，这种说法逐渐得到了证实，因为我在国外的旅行中确实未曾见过如此漂亮的机场。在德黑兰机场竣工的一九五八年，仅有四条国际航线的飞机在此间起飞和降落，而今天它已有二十条国际航线。目前的德黑兰机场可供最大型的喷气飞机降落，但我们还要继续扩建机场，以供将来更大型的飞机使用。

开放使用阿巴丹国际机场，已有几年时间了，该机场占地面积近来有显著扩大。我们还扩建了伊斯法罕、设拉子、耶兹德和基尔曼沙等国内主要机场，以及一些较小的机场。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以及我国古老的文化历史遗迹所具有的特殊魅力，使得到伊朗来的外国商人、学者和旅行家与日俱增。随着伊朗航空事业的发展，外国朋友和我国人民到伊朗各地旅游便是轻而易举的事了。我们国家拥有成千上万个零散的、彼此相隔遥远的城镇，若在大部分城镇都修建机场当然不太经济，有鉴于此，我们决定采用直升飞机。

直升飞机可以从地面垂直地起飞，象一般飞机那样

地在空中飞翔。这种飞机应该有计划地在那些不需要修建普通机场的地方予以采用。我们虽然对修建各种机场兴趣浓厚，但却从未忘记海港的重要性。有关扩建波斯湾诸港口即霍拉姆沙赫尔港、赫普尔港、布什尔港和阿巴斯港，以及里海沿岸的巴列维港的计划正在实施当中。

自古以来，伊朗人就从事航海业，可是近些年来我们对海上贸易却有所疏忽。虽然外国船只频繁地出入我们的港口，担负着我国大部分进出口货物的运输工作，但我们并不愿意光用别人的船运输自己的货物。因此我于一九五四年成立了伊朗国家海运公司。目前这家公司拥有两艘三万二千吨级的货船和两艘向荷兰定购的不大的客轮。一批伊朗青年已被派往荷兰学习航海技术，回国后负责管理上述轮船的业务。

在伊朗的柏油路上奔驰着世界最大型的运油卡车和载货内燃卡车，身强力壮的司机们驾驶着这些满载沉重货物的卡车翻山岭、越荒原，跑遍全国各地。伊朗的铁路网虽然在扩展，但这些卡车自有其用处。

我国现有柏油路两万四千一百三十五公里，卡车十万辆，这对于幅员广大的我国来说肯定是不够用的。伊朗多山，地势起伏不平，因而增加了修路的困难和费用。为了加快公路的建设和维修，我们摈弃了陈旧过时的筑路方法，代之以机械施工。为了改善和加强运输能力，除了扩建铁路和公路网而外，我们还敷设管道，最近完成了从阿瓦士至德黑兰的长约九百六十五点四公里的石油管道工程。上述管道基本上埋设在地下，而在荒野和遥远

的山区则设有油泵站和油管检修所。山顶上无线电通讯塔巍然屹立，使人联想起古老的神话和传说。该管道每年运输两百万吨的原油，相当于几百辆卡车和火车车皮的运输量。除这条主要管道之外，我们还增设了许多分管道，其中一条分管道通往工业城市伊斯法罕；通往腊什特和马什哈德的石油管道正在修建中。

为便利石油的国际运输起见，我们同土耳其签订了协定，准备在古姆市和德黑兰南部的萨拉杰地区与土耳其地中海沿岸的某港口之间敷设一条石油管道。所以采取这项措施，是因为上述地区的石油产量呈现出令人振奋的贸易前景。此管道长度为二千一百五十六公里，建设费用约达五亿美元。该管道建成后，便无须乎象现在这样使用不能通过苏伊士运河的巨型油轮，绕道非洲将我国石油运往欧美各地。有了这条管道，将石油从伊朗运往地中海沿岸的巨额经费便可节省下来。

对于象伊朗这样刚走上发展道路的国家，应该在外观上和文化上表现出显著的变化，为此增加迅速的通讯设备便具有重大的意义。一九五七年全国约有五万架电话机，远远满足不了国民的需要，我们很快购置了另外十八万架电话机。关于架设无线电话网的情况前面已有叙述，它迟早会扩展到伊朗全国，取代上千公里的电报线和电话线。目前我国拥有大量的收报机（收录电报的机器），它们多由小姐女士们操纵使用。

我国与巴基斯坦、欧洲，通过欧洲又与美洲均有无线电话和无线电报联系。我们现正与北大西洋公约各成员

国一起,为建立国际无线电波通讯联络而努力,利用这种联系可以同时向安卡拉、德黑兰和卡拉奇发出一百二十种不同内容的电讯。最近我们还同英国、日本建立了能传送照片和文稿图像的传真电话通讯,并在德黑兰和全国多数省份设立了无线电发射台。

一九五八年我们在德黑兰安装了一台一百瓩的扬声器,目前这台用在短波上的扬声器发出的伊朗电台的声音,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能收听到。我们还计划安装一台更强的短波扬声器和另外四台中波扬声器。一九五八年德黑兰第一个电视台落成,我亲自为之剪彩。现在德黑兰有两个电视台,阿巴丹有一个,但愿有一天伊朗所有的乡村城镇都能看上电视。

后面我将谈及伊朗农业所发生的迅速变化,这里暂且不表。我国的商业和工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成效显著。前几章里,我曾详细地说到我父亲通过政府在振兴伊朗工业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我父亲执政时期专家和技术员人数甚微,伊朗的资本家也不敢向新兴工业部门投资,因此政府只好身先士卒,带头发展新工业。这种状况至今仍存在于某些工业部门,比如今天也只有政府经营新型的钢铁工业。目前国家大部分地区兴建的工业企业皆属于政府,并由政府负责管理。

为了生产建筑业所不可缺少的水泥,政府于最近修建了年产量为三十万吨的两个新水泥厂,因而国家的水泥产量达到一九五四年产量的四倍。私营水泥厂的产量

亦有所增加。同时还建成了其他私营和国营工业所需要的制砖和耐火粘土的工厂。

伊朗全国每年消耗的布匹约达三亿二千万米，其中近半数是从国外进口的。政府拥有几个大型的棉纺厂和毛纺厂，现已投产；另有几个纺织厂正在筹建中；此外还向私营纺织工厂主提供贷款，鼓励他们扩建旧厂，开办新厂。实行该项计划，将使一九六一年的产量增加到过去产量的两倍。为了支援农业和纺织业，政府在很多地区建成或正在兴建净棉厂。丝织厂（不久的将来，会按照科学的方法改建成人造丝厂）、麻袋厂、麻绳和绳缆厂等也由政府创办起来。

政府拥有一座炼铜厂、几座制造盐酸和重工业需要的其他化学原料的工厂，以及生产食油、肥皂和油糟——上等的牲畜饲料——的植物油厂。国营大型肥皂厂的产品畅销全国城乡各地。

在农业中心有些国营工厂生产肉类罐头、鱼类罐头、水果罐头和其他种类的罐头，并开办了两座洗刷和包装干果的工厂，供应国内外市场。在吉兰省和马赞德兰省总共有六十个茶叶厂，大都是在最近五年内建成的，它们或属于国家所有，或由国家负责管理。国家向种植园主征购全部的茶树叶；为提高茶叶质量，还向他们提供援助和技术指导，因而今天伊朗的茶叶市场生意兴隆。

全国各地有十二个以上国营制糖厂，它们大都用甜菜制糖。政府免费向农民提供甜菜籽，为他们购置必要的防灾用具，购买他们的产品，运到工厂去加工。

由国家经营的大型烟草厂收入可观。一九六〇年三月份又建成一座大型烟草厂，使烟草制品的产量翻了一番。目前每天约生产三千万支香烟、十二吨烟叶和其他烟草制品，供应国民消费。近来还生产出西方国家流行的那种带过滤嘴的香烟，用结实的硬纸盒加以包装。伊朗香烟的出口量相当大，新近出口一种用图案精致的洋铁盒盛装的香烟，使我们在波斯湾阿拉伯酋长国一带获得了新市场。

伊朗人的主食象大多数西方人一样是小麦和稻谷。为了储备足够的粮食，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在德黑兰、阿瓦士、伊斯法罕、基尔曼沙、马什哈德、设拉子、大不里士和其他省城，皆筑有机械化设备的大型谷仓，其数目每年都有增加。

国家铁路局拥有一座能生产几十万根枕木的工厂，如前所述，水泥枕木的生产业已上马。

在前面曾说过，我父亲决定在武器装备方面大体上不依赖国外进口，我的政府仍将继续遵循这个方针。目前步枪、轻机枪等军火武器均在伊朗兵工厂制造。

在德黑兰以西几公里远的地方，在宛如大学校园般优美的环境中，座落着国营拉兹血清制造所。这个所是以伊朗的伟大学者、德高望重的医生、卒于一二〇九年的阿布白柯尔·穆罕默德·扎卡里奥·拉兹命名的。该所制造出大量的供人和牲畜用的防疫血清，并在生物学方面进行不断的科学研究和试验。它拥有伊朗首屈一指的医疗卫生图书馆。该所每年约生产四千万 cc 的血清，供

医疗使用。我父亲在世时建成的隶属于政府的巴斯德研究所^①，是同拉兹血清制造所相仿的科研机构。这两个研究单位工作卓有成效，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因而名声大振，使伊朗在这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毫不逊色。

关于我国在石油工业的科技方面所做的工作，后面将予以阐述。为了促进伊朗工业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我们在一九五九年成立了“样品和标准规格管理局”，其任务是提高产品质量，检查出口货是否合乎质量要求和统一规格。令人遗憾的是，少数鼠目寸光的伊朗出口商违法乱纪，致使国家兴隆的出口业渐趋萧条。他们出口的不是精细结实的地毯，而是粗制滥造的廉价地毯；还把沾满沙土的脏干果抛到国际市场上出售；为了增加分量，他们竟在棉花包里装进碎砖石块，因而使我国的出口商品名誉扫地。我们一定要结束这种不体面的状况，想方设法使外国买主在接受伊朗商品时感到满意，而不再蹙眉头。

说也奇怪，许多在国内或国外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竟然对上述国营工厂和科研机构等一无所知。而要想了解中东各国的思想动向和总的形势，却看不到我国在科技和工业方面的进展情况，又怎么能行呢？

应该指出，除了国营工厂外，国内还有大量的私营和民间工厂，许多伊朗人和外国人对此并不知晓。譬如，我国私营公司和企业开采矿藏的情况，他们便一概不知。

据估计，伊朗全部工业中约有百分之六十是由民间

^① 巴斯德：法国科学家（一八二二——一八九五）。——译者

企业和私人公司经营的。虽然我手头上并没有关于伊朗非国营工厂的准确统计数字，但据悉许多私营公司和企业对各种工业生产均很重视，下述矿物便是由它们经手开采的。

锑(辉锑矿)—砷(信石)—铝(铝矾土)—铬 盐酸—煤—玉石—铜—石墨(黑铅)—赭石—高岭土—铅—锰—铁矿石—玻璃—石英—盐—硅土—硫磺—锡—钨—蓝宝石—锌。

私营工厂加工制造各种产品，种类繁多，现仅举五十种如下：

非酒精饮料—酒精饮料—干果—包装食品—面粉—米粉—糖块—茶叶—植物油—肉食—纺织品—服装—铬酸盐袋—金属冶炼—金属家什—木制家什—办公用具—金属箱—照明用汽灯—锅炉—炒菜锅—铁炉—电动机—水泵—砖头—瓦片—水泥—钉子—螺丝钉—工业酒精—化学原料—合成纤维—颜料—皮制胶—药品—油彩—玻璃—纸—塑料制品—鞋油—肥皂—皮革—冰块—厚木板—纤维板—火柴—电池—氧气筒—电器—塑料。

为了说明资本家在工业和工艺技术方面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和高超技巧，我要十分高兴地指出：两家私营公司合办的一座现代化工厂，已能生产存放重要文件用的铜匣、银行用的大铁柜，和各种金属家什。新式生产工具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我认为，发展的显著标志之一便是要看生产设备和生产工具是由本国制造呢还是由国外进口，目前这个问题在我国日益显露出来。

上述工厂的常务董事，几年前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铁匠，其上升之快可想而知。依我看他算是我国中产阶级发家致富的典型，而国家的进步和发展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努力奋斗。

有一天，这位常务董事谈到，至今还没有一个窃贼能撬开他们工厂制造的大铁柜。他满脸堆笑地说，“若论撬铁柜，伊朗人恐怕还远不如西方人干得巧妙！”

我想上面的一览表是引人注目的。应该说，私人公司经营的工厂将逐渐地超过国营工厂，其原因有二：

第一，我们的政策是将现有的国营工厂逐步地移交给私人 and 私营公司。为此我们聘请了一个在组织和管理工厂方面有专长的顾问团，以便调查研究国营工厂的情况，提出一个必要的有条不紊的改革方案，确定向私营公司出售工厂的办法。

第二，我们千方百计地鼓励国内外的投资家，希望他们将资本用于新兴的工业和商业中去。

伊朗宪法及其附录明确了伊朗工业发展的路线。宪法和最近修改过的矿山法确定了开采矿藏资源的方法，使公共利益得到保障。根据矿山法，全部矿藏资源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石灰石、大理石、建筑石料和石膏等。假如在私人土地上发现此类矿藏，土地所有者有权开采经营该矿，但要将出售其开采矿物所得的百分之五上交国家。

第二部分是各种金属、固体燃料、盐、贵重矿产和宝石等。土地所有者若要开采经营这类矿物，需事先得到

政府的特许证，并向国家缴纳出售其开采矿物所得的百分之四。

第三部分是石油、放射性物质，诸如铀等。土地所有者无权过问这类矿藏。国家拥有经营特权，或者将其出租给私人或私营公司，以收取租税。

伊朗的私营公司只要得到政府的正式许可，可以任意开采国家的矿藏。外国公司也可以勘探和采掘伊朗的石油及其他矿藏，但有关开采矿藏的协定必须分别经伊朗众议院和参议院批准。这方面的突出例证是我们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石油公司最近签订的一些协定，在后面面对此有详尽的叙述。在本章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国家在某些工业部门中规定了一些限制，但总算为发挥个人的主动性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基本的主要的工业部门，诸如铁路、电话、电报、电台和军火工厂等均掌握在国家手中。但私营公司可以建立各种商业机构，开办和经营与其他工业部门有关的工厂。实际上也是这样安排的。比如大型炼油厂虽然不属于他们所有，但炼油厂的主要生产车间却由他们经营管理。

今天在国家公路上运输货物的大部分卡车是由私人 and 私营企业出钱购买的。一条私营航线和一个称为“伊朗国家航空公司”的名义上的国家机构今天正在营业，活动日益扩大。私营企业还负责拍制影片和经营电影院。

一九五五年，一个争取与保护外国私人资本的法令得到议会两院的批准和我的签署。根据这项法令，外国公民可以将原先投入伊朗工业部门的资金，连本带利地

折合成本国货币从伊朗提走。这项法令还规定，一旦接受投资的工厂被收归国有时，将付给资本家以公平合理的赔偿费。

一九五七年，依据伊美两国政府签署的协定，美国人在伊朗的私人资本得到充分的保障，这使美国投资家受到极大的鼓舞。美国人和其他外国公民的实践证明：向伊朗蓬勃发展着的经济和工业部门投资，有百利而无一弊。

国内资本家对向工矿企业投资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业贷款计划可算是一服强烈的兴奋剂。伊朗有掌财理国的悠久历史，经验之丰富，令人赞叹不已。国家发行的纸币的储备是金块，通常王国宝库里的黄金储备总比作为纸币储备的黄金数量多。一九五七年为了促进国家的发展，我产生了重新评价纸币储备的想法。为实现这个目的，议会两院通过了一项法令。重新评价的结果，使纸币储备的价值增加了约一亿美元。我指令政府将这笔意外收入的一半用于发展工业，另一半用于农业生产。我的顾问当中有人曾担心这样做会引起通货膨胀。我向他们指出：假如这笔钱用到诸如土地买卖之类的非生产性事业中去，那肯定会招致通货膨胀；但我们用这笔钱却是为了加速实现发展工农业生产的计划，这样做本身就是阻止通货膨胀的有力因素。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工业贷款计划开始实行，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伊朗资本家有了贷款，如虎添翼，越发踊跃地将资本投入工矿业。很多过去把部分资本蓄存在国

外的人,重新将其转回国内,用于生产。

过去每年占国家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四以上的工业投资数,由于政府采取了上述措施而大幅度地下降。上述措施还鼓励外国资本家为发展伊朗的新型工业而与我们携手合作。

工矿部和伊朗国家银行共同负责执行工业贷款计划。工矿部从技术角度对所提出的方案进行调查和研究,伊朗国家银行则注重于贷款申请者的信誉。除了申请者的个人品德和专业职能之外,他们的每项请求都要经过负责协调经济工作的唯一机构——“高级经济委员会”——的研究和讨论,弄清其对于提高产量和增加国民收入有多大裨益。贷款申请人为证明自己确实做好了投资准备,事前至少要筹备齐实施所提方案的经费的百分之三十。工矿部将向他们提供上述经费的百分之五十作为资助,其余的百分之二十申请人以后设法筹划。这种作法现已普遍流行。这样,凡是有志投身于工业建设的人,只要有少量的资本便能够承办一个重要的工业项目,并可以放心,政府不仅不会干涉他们的企业管理,而且在各方面都将给他们以援助。申请人得到的国家贷款,根据企业的发展程度,经过政府官员的调查,分期分批地要求偿还。政府的这种调查对保障国家利益是需要的,对工作的顺利进展也有极大帮助。新建的工厂企业在头一个五年内免除纳税,该企业从国外进口的必要的技术设备也无需缴纳关税。

上述贷款的年利息为百分之四,最多不超过百分之

六。象纺织、制糖、采矿等大项目的贷款的年息是百分之四，其他项目的年息为百分之六。我决不允许重利盘剥，以致使国家经济陷入瘫痪；也不能容忍寄生成性的金融资本家投机取巧，攫取从事生产活动的人们的劳动成果。

执行工业贷款计划后的头一年內，便有纺织、制糖、建筑材料、化学原料、食品原料、塑料、厚纸板、薄板和其他矿山产品等约一百五十个新的工业建设项目付诸实施，并扩建了通过别的途径筹备资金、原先施工的几家工厂。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一年，实际上已有十五座工厂交付使用，其产品如小虾、植物油、线织品、针线、盘尼西林、各种药品、铝制品、铁管、混凝土、冰块和矿产原料等等业已上市。预计其他的工业产品将逐年陆续供应市场。这对改变国家的工业面貌大有裨益。同时也证明伊朗人民不仅善于将西方技术与本国的需要相结合，吸取那些于己有用的东西，而且能以高速度完成这项任务。

在本章里，我们展示出伊朗目前变革的前景。外国人有时会比伊朗人更清楚地注意到我国的发展和进步，因为他们更容易感受到明显的变化。

许多有经验的外国人走访了我国之后，常对我说，近年来象伊朗这样在外观上和精神上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国家还不多见。远离祖国五年、甚至一两年后回来的人，目睹国家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无不感到惊讶。他们表示赞叹绝不是吹牛皮，更不是阿谀奉承。我本人从国外旅行回来也有同样的感受，这足以证明他们的感情是真挚的。

在象我们伊朗这样具有极其悠久的历史 and 古老传统的国度里，要迅速地推行基本的社会变革，当然会遇到不少阻力和困难，但为了借鉴西方的新文明则应该忍受这种艰难困苦。然而，我从未有过摈弃祖国古老珍贵的历史遗产的念头，恰恰相反，我始终坚信伊朗古老的文明与知识的宝库将日益丰盛。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宗教、哲学、艺术、文学、科学和技术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普通的国民将享有繁荣与幸福，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这将使他们变成技艺高超的有才能的人。从此以后，少数几个人挥霍无度、穷奢极欲的现象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那几个人与美满幸福的大众一起，共享如花似锦的好日子。

当我们十分谨慎地借鉴新文化和新技术，选取那些为我国所需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接近于自己的最终目标——真正的民主与全民的幸福，为实现这个目标可以心甘情愿地忍受任何痛苦的折磨。

第八章 我的民主观

据说,有一天在铁幕后面的一个欧洲国家,大学生们在听一位著名的物理学教授关于宇宙旅行的演讲。他说,几年之后飞船将在月球降落,尔后不久,世界人民将能自由地到离地球非常遥远的其他星球去旅行。

一位大学生打断教授的话问道:

“请问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到维也纳去旅行呢?”

成千上万的人每年从共产党东德逃到铁幕的另一边——充满着自由的西德,这决不是偶然的。这些人理解自由的真正含义,为了得到自由,他们不惜冒丧失生命和财产的危险。其中有许多是学者和专家,失去自由对他们是难以忍受的。

当然,生活在西德的人也可以逃到共产党东德去,然而并没有发生这种事。

人们冒着丧失生命和财产的危险,越过边界哨所的严密封锁,投身到自由世界来的事件,在其他欧洲国家也是屡见不鲜的。

世界人民在痛苦的经历中深刻地理解到:个人的真正自由只有在民主政权,即在普通国民有权参与国家事

务的监督 and 管理的制度下才能实现。可是那些歪曲民主含义的人，却把这种制度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

要研究所谓工人和劳动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必须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应该明确：在这种政权中，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国家领导人果真象他们所宣传的那样，是来自于人民和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吗？他们果真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吗？

明显的事实是，世界各地工人专政的统治者只不过是一小撮特权人物，他们并不考虑人民的权利和幸福。

第二，应该明确：在这种制度下，人民有权议论国家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吗？据我了解，共产党专政制度下的人民不仅无权过问政事，甚至连生命和财产也得不到保障。

共产党专制者象法西斯一样对选举极感兴趣，其目的无非是要普通工人相信，在管理国家方面他们是有份的，他们的发言和表态是起作用的。实际上，共产党国家只允许一个政党存在，倘若有人想另建新党，或者反对执政党的话，肯定将遭到清洗和镇压。

在普选中（假如可以称其为普选的话），参加投票的人只是走走形式或者被迫去投票的，并没有真正的选举权。因为在代表候选人名单上只有执政党成员的名字。在最后唱票时，主持选举的人往往神气活现地宣布，执政党获得了百分之九十九的选票。我很奇怪，难道这种做法能够蒙骗社会上有文化的知识阶层吗？

历史上，自由的人们曾把民主看成一件政治大事。比如，十七世纪的大哲学家约翰·洛克^①对人权问题就很有见解，他的著作特别强调国民的政治民主；十八世纪美国的《自由宣言》也充分肯定了一般国民的政治民主。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只要享有自由与平等，就能以个人的自由和创造性的劳动，满足自己在社会、经济方面的需要。这种观点，在经济和技术不太发达的年代还是合情合理的，因为那时的生产单位是家庭，家庭成员用自己的双手便可保障基本的生活需要。

后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生活轨道和劳动方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大工厂相继建成，对农业的投资逐年增加，向农村提供了大量的农业机械，促使农业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时表面看来，个人的劳动权利和经济活动似乎丧失了。但我认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国民仍然应该享有个人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

科学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法，提高了社会的生产能力，而且使交通业和印刷业发生了巨大的革命性变化。电话、电报、报纸、收音机、铁路、汽车、飞机和电影等新的发明创造，促进了各大洲人民的思想交流。在人类历史上，向千百万人迅速传播闻所未闻的重要思想第一次成为现实。这种新的联系方式使新的社会动荡取代了往日十分稳定的局面。过去，贫穷和富足可以在几个世纪里稳固地并存，穷人和富人可以长期地和睦相处。而今天，随着新的交通工具的相继问世，

^① 约翰·洛克：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译者

人们对世界一边的充裕与富足和另一边的饥馑与匮乏的了解，便会导致不满与动荡的发生。

生活在贫穷国家里的人民，对数千法尔森以外过着美满幸福生活的人们羡慕不已。这种羡慕或者妒忌会使亿万人民产生一种新的期待，公开地表露出对高于他们本国生活水平的美好生活的向往。

勿庸置疑，人们产生这种焦躁心情是相当危险的，但同时也给他们以希望。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明白，获得政治独立对于陷入严重经济拮据的人们说来是没有真正意义的。生活在富足国家的人们懂得，为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着想，应该同邻国人民共同分享他们的繁荣与幸福。他们也知道，输送衣物和食品只能满足贫穷的受援国暂时的需要；经济上不发达国家所需要的，是那种能借以改善其生活状况的援助。

总而言之，发展中国家希望了解新型科学与工业的奥妙，以便借助于此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当杜鲁门总统首次提出著名的“四点计划”这个世界性技术援助方案的时候，可以说美国政府在援外方面迈出了勇敢而富有远见的一步。如前所述，伊朗是接受“四点计划”技术援助的第一个国家。联合国同样实行了广泛的技术援助计划。英联邦各国为开展技术援助制定并实行了“科伦坡计划”。

在后面的章节里，我将专门叙述“四点计划”组织、联合国和其他国家向伊朗提供的各项技术援助。

应该指出，我们从各国接受外援的过程中总结了必

要的反面教训，即沒有把保障经济需要与稳定本国政治联系起来。我们看到，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国在经济上停滞不前，但在政治上却比某些经济上获得迅速发展的国家稳定得多。反之，某些中东国家近年来经济上取得了惊人的发展，而在政治上却困难重重。这些国家采取的政治措施远不如它们的经济发展计划周全。我们从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是：应该使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相互协调起来，否则，国家将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

幸运的是，伊朗的民主事业并非沒有根基。目前我们发展民主事业的计划是与我国人民的思想觉悟相吻合的。在上千年的历史中，直至五十年前，我国都是专制统治。但是，早在遥远的古代，我国人民就对构成民主基础的人权非常尊重和珍惜。比如，居鲁士大帝每征服一个国家都不加害于当地人民，而总是宽大为怀，与他们友好相处。居鲁士大帝留用藩属国的各级官吏，挑选当地的贤士良才委以重任，从不视他们为自己的傀儡工具，而是鼓励他们维护本民族的传统风俗和宗教礼仪。因此，虽然当时在伊朗民主的含义并不清晰，然而，居鲁士大帝所表现出来的优良品质确实称得起是新民主原则的基础。

前面说过，伊朗许多杰出的帝、王、将、相出身于卑贱的阶级。在伊朗，人们向来不承认哪个阶级有什么特权。我们的社会是如此地宽宏大量，连出身卑贱的人也能够晋升为达官显贵。这些人虽然会因贫困而得不到良好的教育，但是整个社会并沒有遗忘和抛弃他们，不会使他们

停留在飞黄腾达的阶梯的底层。

在伊朗，纯朴的民主精神贯穿古今，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阐述它并不太容易。我们伊朗人一向热爱个性自由，并尊重别人的人格。

比如，在伊朗的家庭中，仆人总是把自己看成是家庭中的一员，主人也是这样来看待他。仆人经常就管理家务或经营土地问题与主人进行坦率的商量，有时甚至会发生善意的争吵。几百年来这种做法已经蔚然成风。

如前所述，在二十世纪初叶，伊朗人民决心为民主大厦打下坚实的基础。伊朗的立宪革命在维护帝国古老传统的同时还参照西方世界的流行做法，实行了某些民主改革，对人民选举出来的政权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虽然在立宪革命期间大部分伊朗人并不真正理解这种政权的含义，然而他们已经不能再容忍恺加王朝的存在，迫切要求实行变革。当时的国民看得很清楚：恺加王朝对于人民和国家的建设没有丝毫的道德责任感。正是恺加王朝将他们可爱的祖国变成了外国列强、特别是俄国垂涎三尺的猎获物，使伊朗人民成为这个封建王朝专制独裁和挥霍浪费的牺牲品。正因为如此，给恺加王朝的专制统治以沉重打击的立宪革命，受到社会上各阶层人民的欢迎。

立宪革命的领导人大多都是有文化教养的，他们在赞助革命的同时胸怀更远大的目标。他们一心想建立西方那样的国家政治机构，因为在他们看来，要维护伊朗的独立，促进经济和社会的繁荣，这是唯一的出路。

大多数革命者都认为，可以将西方流行的政治原则与伊斯兰教的宗教法典协调起来。比如，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革命先驱、虔诚的伊斯兰教徒赛义德·加玛尔丁就极力主张在伊斯兰教宗教法典的范畴内，在不损害诸如“政教合一”等伊斯兰教教规的情况下，确立西方式的民主原则。

在立宪派的伟大领导人中，有些是知识渊博、思想开明的神职人员，象赛义德·阿布杜勒·巴赫巴豪尼先生和赛义德·穆罕默德·塔巴塔巴依先生，都在伊斯兰教的神坛上发表过反对压迫与暴力的演说，极力开导人民的思想。

可是，当革命者胜利之后，要制定宪法的时候，他们之间却发生了道德观上的分歧。与压迫、强暴、腐化、堕落和犯罪这些专制统治的弊端相对立的博爱、民主、个人自由、立宪政体和爱国主义等理想，在知识界是有极大的诱惑力的。当激进的革命者要把这些理想写进宪法条款里去时，遭到了保守的学者和神职人员的反对。后者把这些理想统统描绘成异教徒的邪说，是与伊朗人民信仰的伊斯兰教水火不相容的。

斗争的结果，激进的知识分子、商人、大学生、手工业者等立宪派取得了胜利。一九〇六年十月十七日，召开了首次国民代表大会，莫扎法尔丁王也出席了。由会议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制定了伊朗宪法，并得到莫扎法尔丁王的签署。这就打开了伊朗政治史上崭新的一页。西方的议会民主第一次与这个国家所特有的古老的帝制传统

结合为一体。

前面曾谈到穆罕默德·阿里王在俄国人的支持下，为推翻立宪政体进行过徒劳无益的挣扎。一些保守的神职人员在他之后继续反对新生的民主政权所进行的各项社会改革。立宪派内部派系林立，相互攻讦，闹得乌烟瘴气。更糟糕的是恺加宫廷的昏庸无能、骄奢淫逸，以及恺加帝王们的玩忽职守、对外国人的卑躬屈膝，使得国家的形势日趋恶化，直到我父亲挺身而出，才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

如前所述，我父亲在担任首相期间和建立巴列维王朝之后，一方面削弱了议会的权力，另一方面又为巩固伊朗的民主基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有条不紊地使“政教分离”的元勋。

他并没有剥夺任何人的宗教职权。而且，他在位期间，还根据宪法的规定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然而他也依据宪法的规定，取消了神职人员的司法权，改由政府行使这种权力。

我父亲执政期间，基本上结束了神职人员对教育事业的干涉，他把教育人民的任务交给政府去完成。他还迫使保守的神职人员放弃反对妇女解放的斗争。这就使神职人员把全副精力完全用于真正属于其职权范围的宗教事业。

我已故的父王陛下通过国家机关的改革，加强了伊朗的民主基础。立宪政体建立之前，各项工作皆由宰相一人负责。宰相整天围着国王转，极尽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之

能事。假如国王问及军队的情况，宰相便会担保说：军队的力量十分强大，即使没有非军事人员的支援，也能打垮所有国家的联合进攻。但实际上，军队毫无战斗力，只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政府为了确保国境的安全，不得不求助于民夫和游牧部落的武装。军队的重要职务全是名誉的，没有薪水，而且是世袭的，一个新生的婴儿碰巧也可能得到少将旅长的头衔。整个朝廷只有几位大臣在宰相的领导下管理财政和外交等事务。大臣当然是有薪俸的，可是在他们得到这样的肥缺，穿上国王御赐的奖袍之前，却早已把超过他们年薪的厚礼奉献给国王了。

大臣的办公室就设在他们自己家里，有的大臣的办公室主任就是他的家庭厨师。其他大臣的办公人员也多是奴仆或亲属，办公人员的薪水由大臣自己掏腰包。

大臣们还不得不为来请示汇报的官员及其仆人提供膳食，这样一来，他们的伙食开支就相当可观了。

全国的省长和县长一般由国王选定。这些职位有的是世袭的，有的是国王接受重贿变相出卖的。有钱的人为了挣到肥缺是不惜破费的。因为他做了官之后，虽然要将相当的金额作为自己管辖地区的赋税上交国库，然而多余的税款却可以中饱私囊。这些贪官污吏对于开发自己的管辖地区决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即便有人慈心大发，拿出的款项也是微不足道的。省长县长们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搜括民脂民膏，以确保他们及其心腹过上骄奢淫逸、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们豢养着一群打手，专事敲诈勒索、欺压百姓。各级地方官吏也如法

泡制，横征暴敛，强占民田，无恶不作。

毋庸置疑，这种状况使得从上至下的腐败现象泛滥成灾。从农夫、小商贩到地主的社会各阶层，为了保障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少缴些赋税，只好采用贿赂手段讨好那些收税人和官家的打手。于是，本来已经腐败的国家机构就越发不堪收拾了。

伊朗宪法很少谈及行政方面的改革，然而，随着国民议会的成立，这方面的情况略有改善。比如，伊朗政府聘请的法国顾问就曾制定过重新组建中央各部的计划，并得到议会和恺加国王的批准。

根据向伊朗提供贷款而未得到按期偿还的外国政府的坚决要求，比利时海关人员接管了伊朗海关的税收业务，以扭转管理不善或被某些人用来中饱私囊的局面。与此同时，以苏斯杰尔为首的美国使团着手整顿伊朗的国库，调整和改革伊朗紊乱的财政事务。

我父亲在位期间，国家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机构空前地得到了改善，面目焕然一新，凡事秩序井然。他将全国置于统一的监督和管理之下，废止选定地方官吏的旧传统，免除省长的司法权，统一赋税的征收，取缔了以包工合同形式征收赋税的陈旧做法。

我父亲根据新的原则，按照工作性质的不同，重新调整了中央各部和国家机关，增添了新的部门。他委任忠诚老实的官员负责各项工作。贪官污吏被撤职，严加惩办；精明强干的官员受到提拔和重用。数百名大学生被派往欧洲各国留学。在这方面，我父亲最大的功绩是使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使他们对建设国家和发展经济满怀热情和富于责任感。

关于在礼萨王时期伊朗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前些章里已有叙述。应该指出，我父亲不仅结束了伊朗多少世纪以来的那种消极沉闷的状态，而且为我国今天所取得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的民主观是我父亲这方面思想的补充和发展。正是由于我父亲时期开始加速发展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所以今天我才能比他更有成效地加强我国的民主制和立宪政权，推广和普及新的科学技术和各种发明创造。新的科学技术为我们造福于国民打开了新的途径，使人们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方便条件。

比如，新科学不仅教会人们怎样治疗恶性疟疾，而且通过放映科教影片、广播、组织讲座等方法提倡预防这类疾病，保护大人、小孩的身体健康。因此，我宣传民主纲领的一个原则是充分利用新的科学和技术。

简言之，我认为，符合我国需要的新民主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政治和行政民主；

第二部分——经济民主；

第三部分——社会民主。

现在，就我所理解的这三部分内容，分别阐述如下：

关于伊朗的政治民主，首先应该指出，我国宪法借鉴了比利时的宪法，它将立宪政体与王国的古老传统结合起来，创立了君主立宪制。

今天我国的宪法是一九〇六年通过的第一个宪法及其附录，后于一九五七年进行若干修改之后形成的。

宪法规定要成立众议院和参议院。众议院有二百名代表，代表名额将随着国家人口的增长而相应地增加。代表任期四年。代表中包括信仰弱小宗教的代表（亚美尼亚人两名代表，信奉摩西教的犹太人一名代表，琐罗亚什德教一名代表，亚述人一名代表）。他们的名额也将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做相应的调整。

众议院代表来自七十八个选区。凡年满二十一岁的伊朗男性公民（除了皇室成员、军人和罪犯之外）皆可参加选举，自由投票。当然总有很大部分人放弃投票，但随着文化教育的普及，投票的人数肯定会逐渐增加。

参议院包括六十名议员，其中一半来自德黑兰，另一半由其他省市推选。每一半当中有十五人是内定的，即有三十名参议员由我指定。

参议员任期一般是六年。可是，每届参议院头三年结束时，总要有半数参议员的代表资格被终止，至于哪些人就不得而知了。取代他们的将是新选举出来的议员或由我指派的议员。此后，每过三年，那些任期满六年的议员将停止其代表资格。全部提案，除了有关预决算和赋税的提案（批准它们是众议院的特殊任务）之外，都要提交给两个议院批准，经我签署后即成为法令，在全国实行。根据宪法规定，对财政方面的提案，我可以行使否决权。这就是说，假如我认为有必要对某项财政提案进行修改，可以将其退回众议院重新审议。但是，议

员们也可以否决我的意见。当出席议会的四分之三的代表再次通过了我退回的提案时，我就必须原封不动地在上面签署。宪法赋予我的另一个职权是解散议会，但我必须公布解散议会的原因。解散议会的原因不得重复使用。我必须立即发布重新选举的法令，使议会两院能在三个月内重新组织起来。

首相及诸大臣组成国务院或内阁。伊朗的大臣，除了宫廷大臣外，全是政府系统的官员。

内阁负责管理政府事务。正如在其他立宪制国家常见的那样，内阁这个专用名词的含义是由政府这个词引伸出来的。我们的立宪制与那些操英语的国家的立宪制主要区别在于：伊朗内阁的诸大臣不是议会的成员。可是，首相和大臣对议会负有个人和集体的责任。为了答复议员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们必须列席议会会议。内阁除了执行法律之外，还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颁布不违背法律的各项政令。这些政令的效用与美国总统和英国女王的命令相似。

政府由下述机构组成：

首相办公室——外交部——财政部——内政部——农业部——工矿部——教育部——国防部——卫生部——司法部——劳动部——邮电部——商业部——专利事务部——交通部。有的部下设半独立性的办事机构。比如，内政部下设开发局，专利事务部下设烟草局，教育部兼管德黑兰大学等。此外，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机构。比如“计划组织”就不属于任何部管辖，而是内阁的直属

单位。

国家通过内政部和各省省长管理各省、县的政务，其他的部可在省会或县城设立附属机构。

伊朗的司法机构主要是仿效法国的司法机构建立起来的。我父亲执政之前，神职人员几乎独揽了司法大权。我父亲对司法机构和司法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很多有见识的专家认为，我国在司法方面的进展和对西方世界先进经验的借鉴，较比其他方面更加迅速而扎实。

我父亲剥夺了神职人员对司法的垄断权，制定了新的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商业诉讼法，以及审理民事犯罪和刑事犯罪的新程序。根据这些法律，初级法院和上诉法院有权处理民事纠纷。

目前，我国最低级的法院是区法院，它遍布全国各地，负责审理一般案件。较高级的法院是县初级法院。比它更高的是省法院或称上诉法院，一般设在各省省会。最高司法机构是国家的最高法院，设在首都。除了审判内阁大臣等极个别情况外，最高法院有权批准或否决省法院作出的裁定。

除了上述司法机构之外，还设有负责审理商业诉讼、行政和军事犯罪案件的专门法院，它们根据特定的法律行使职权。

宪法除了赋予我解散议会和否决财政提案的特权之外，还为我规定了其他一些特权，其中包括任命首相和各部大臣，后者通常是在与首相协商后由我任命。

省长、县长、驻外使节、各级军官等政府官员的委任，

也是由我同有关大臣协商后选定的。此外，我还监督国家各项开发计划的实施。后面的章节里将谈到我本人是执行各项开发计划的热心推动者和赞助者。从王国的角度看，我乃是伊朗完整、统一的体现和象征，这是我的最崇高的使命。对我来说，这个传统性的神圣职责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自从二千五百年前居鲁士大帝统一全国，创建伊朗王国以来，国王一直是伊朗民族和政治统一的最高体现。

我最近做的体现着民主精神的一件事是组建政党，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在伊朗组建政党不是没有先例的。第一届国民议会之后就曾出现过几个政党。但由于它们内部矛盾重重，一味投靠个别要人，不关心党的纲领和基本目标，所以被引入歧途，在政治上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我父亲在执政期间，曾试图组建一个能代表大多数国民利益的统一政党，可是未能成功。我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国民的社会政治觉悟还不够高，没有达到组织政党的程度。然而，由于我父亲对发展教育事业极为关心，因此作为民主象征的政党的成立，便由他在我国打下了基础。

在伊朗被军事占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出现了几个受外国势力操纵的政党，其中组织最严密的是伊朗人民党。在前面曾提到过的这个政党是由一小撮人于一九四一年成立的，他们大都因非法进行共产党活动被我父亲拘捕过。该党的几个成员得助于外国势力曾被

选为国民议会的代表，它的部分党员曾渗透到工会甚至军队里去。

议会中的人民党代表由于奉行消极的虚无主义政策而臭名昭著。遗憾的是，竟有些非共产党的消极派政治活动家也与他们相勾结，竭力阻挠批准各项极为重要的法律。引人注目的是，人民党及其追随者虽然支持废除英国人在伊朗南部产油区的石油特权，却反对伊朗石油国有化的计划。这个党的活动一直持续到摩萨台垮台为止。

从一九五七年以来，我国的政治局势渐趋稳定，国民经济在渡过摩萨台时期的一段停顿之后获得了发展。有鉴于此，我极力主张搞两党制^①——多数党和少数党，并将这种设想付诸实施。

当然应该指出，美国、英国及其他自由世界国家卓有成效地实行两党制，并不意味着在一国之中只准成立两个政党。其目的是为了两个大的政党（多数党和少数党）和若干力求发展成为大政党的较小政党能够竞相开展政党活动。

在两党制中，选举时获得多数代表席位的那个党将组成政府。少数党或称反对党在完全忠于立宪原则的前提下从事各项活动。少数党的批评可使多数党和由它组成的政府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避免走上违背人民利益和意愿的邪路。因此，这种批评是非常有益的和宝贵的。

^① 伊朗国王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二日宣布将成立全国统一的政党，取名复兴党，党的总书记是现首相阿巴斯·胡韦达。——译者

同时，较小的政党可以在不同的问题上与两个主要政党中的一个进行合作，但这种联合丝毫不能损害两党制的原则基础。

今天，我们在伊朗成功地组织了两个大党和若干小党。无论什么人，只要他愿意，便可自由地组建新党，条件是这个党不能充当外国人的傀儡工具。

伊朗的两大政党是民族党和国民党。它们在外交政策方面都不支持某个特定的集团；在国内问题及其解决的方法上，各持己见，相互对立，公开反对对方的主张和采取的工作方法。当然，发生意见分歧是实行两党制的必然结果。因为在一个按照民主原则实行管理的国家里，人民本来就有权对关系到自己命运的重大事情发表意见，何况选择明智的策略和路线的最好做法，正是展开争论，注意分析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呢。看到目前伊朗各政党正在逐渐地克服过去存在的缺点，不再过分注重其成员的个人地位，而是更加重视党的纲领和政策，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有些人指责说，我们这两个政党没有群众基础，是由国家高级官吏强行组织的。更有甚者，一些心怀叵测的人竟说什么，这些政党是王室和政府的御用工具。其实这些人根本不了解象伊朗这样刚走上发展道路的国家为什么要成立政党。

虽然我父亲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我执政后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我国至今仍有很多文盲；国民对于议会民主和组织政党的意义也

不十分了解。在一个民族传统对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有深刻影响的国度里，若以为可以在人民当中一下子把政党建立起来，使之迅速地发展、壮大和成熟，这未免有些过分天真幼稚了。我是一个立宪国家的国王，理应鼓励组织政党的活动，而没有任何理由象独裁者那样仅仅支持拥护自己的政党。我既然是民族统一的象征，就不应该将自己与某个政党或某个集团联系起来，而应该同时支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党。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伊朗新建的政党究竟是不是达官显贵们的傀儡。比方说，某些与王室或政府官员有联系的人在伊朗组建了一个政党，它拥有一万名党员。应该说，这个数字同全国人口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这个党的成员阅读党的纲领，听取领导人的演说。如果他们同意党的纲领，就会支持这个政党的活动；假如他们不赞成党的纲领，便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表示异议。譬如，他们可以说服党的领导人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也可以不参加党的活动甚至脱离该党，或者另选新的领导人。只要党员们有决心，是能够推翻党的创始人，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建党和推选领导人的。

有些天真幼稚的人以为，一个拥有一万或十万名党员的政党，即使没有英明而有远见的领导人，也能够一下子组织起来，这种想法在任何国家里都是不现实的。只须稍加思索，便可明白：自由国家里的政党是由得到群众拥护的领袖组织起来的。对党的领袖的需要与发展地方党组织的原则并不矛盾。事实上，凡是工作有成效的

政党，无不在日以继夜地工作，为把全国各地更多的国民吸引到自己的纲领旗帜下来而努力奋斗。目前，伊朗的大党皆在积极地发展组织，除了全国性的组织机构外，在省市，村镇都广设支部。我可以自豪地讲：对党的信念，确实在全国各地日益深入人心。不愧为先锋战士的男女党员们，正以极大的热情从事着体现民主精神的党务活动。

在知识阶层和文化水平低的国民中，有些人至今尚不理解组建政党的真正含义。他们自命清高，对政党活动不屑于过问。还有些人由于胆小怕事，或者消极虚无主义思想作怪，拒不参加这种与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生存休戚相关的政党活动。虽说如此，我仍看到许多伊朗的爱国者十分热心党务活动，他们在这方面的积极性日益提高。在他们看来，这样做对巩固和加强民主制度是完全必要的。

除了组建政党之外，我们还为巩固伊朗的政治民主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

从为人称道的政权统治中，我们得到的经验之一是，立法只有在付诸实施时才能发挥效用。过去，我国议会也通过了不少冠冕堂皇的法律，可是并未实行，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礼萨王为了按照西方流行的作法改革国家的行政状况，虽说花费了很大力气，然而，效果并不理想。国家机关没有得到应有的良好整顿，政府官员中行贿受贿、贪污腐化的现象也未根除。

一九五七年，我的政府在中央各部实行了固定的行

政助理制度。行政助理在更换大臣时保留原职，负责部里的行政改革，主持日常工作。几位常任助理及其助手均在海外学习过行政管理业务。

行政助理每周举行会议，商讨国家的日常行政事务，决定在全国各地推行行政改革的措施。

伊朗政府经过两年的研究，于一九五八年向议会呈交了一项有关增设国家机构的提案，就象当年胡佛总统为改组美国政府所做的那样。这项提案于一九五九年得到议会的批准和我的签署。它大体上规划了中央各部和政府机关的组织形式。与此同时，另一个专家小组为彻底改革在国家经济建设方面负有重任的“计划组织”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今天，我们的中央各部和政府机关基本上是按照美国国家机构的形式组建起来的。它们彼此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我们打算根据时代的要求和新的情况，不断地改革国家行政机构。勿庸置疑，越是按照科学方法改组政府，就越是不能任用那些思想落后、观点保守的人。

此外，年迈的国家工作人员若是终生占据自己的职位，那么年轻人就永远得不到工作和施展才能的机会。近年来，这种情况在我们政府机关里已有所表现。因此，一九五八年我们决定：凡年满六十岁或工龄已达三十年的国家工作人员（大臣、大使和各部助理除外）一律退休。到目前为止，已有数千名年迈的国家工作人员退職，他们领取的退休金比工作期间的工资还略多一点。退職之后，他们可在私营的开发机构和工矿企业找工作，而将

他们在政府中的职位让给在国内外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

另一项改革措施是权力下放，给各省市和县以更多的行动自由。我认为这样做很有好处。因为各省市和县若将难以处理的问题统统逐级上交德黑兰的话，那将带来两大害处：第一，使事情的处理非常迟缓；第二，地方官员因不能自作主张地解决问题，便会感到沮丧和泄气。有鉴于此，我们应该给地方官员以更多的权力，同时鼓励市恩楚明^①直接过问有关学校、医院、孤儿院等公共福利事业和有关市政府的各项工作。

伊朗各市的恩楚明在上述方面做出了巨大成绩。我们曾挑选伊斯法罕市作为建立第一个恩楚明的试点，该市恩楚明对城市各项事业的管理发挥了有效的监督作用。此外，为了学习和运用文明世界流行的新作法，使之与本国的需要相结合，我们还绞尽脑汁想了不少办法，其中之一是成立“地方民众演讲所”，通过这个办法，使市政府的官员们尽可能地多了解些西方的新经验。我们之所以将权力下放到县一级，是因为世界上所有强大的民主国家的经验都表明，政党的真正力量存在于县一级的基层组织之中。党的基层组织可以培养党员的社会服务精神，并能使党了解国民的普遍愿望。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若要在伊朗建立旨在促进国家发展的政党，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在地方上培养党员的社会服务精神，使他们

^① 恩楚明：伊朗城市中的一种非官方组织，名义上起监督市政府的作用。——译者

在这方面成为先锋战士。

如前所述，我们由于条件限制，不得不先成立政党，尔后再逐渐地使地方支部学会为社会服务的本领。勿庸置疑，得到各县人民和地方团体支持的政党，肯定会变得日益强大。这样的政党得到地方百姓的帮助，定能充分了解国民的各种要求，并根据这些要求做好各项社会服务工作。

另外，为了不使工作集中在德黑兰，还有使我感兴趣的其他方法。以前由于我们急于完成国家的各项开发计划，以致将过多的任务压在“计划组织”身上，把本来属于中央各部的工作任务交给了“计划组织”去完成。而且付给“计划组织”工作人员的薪金偏高，与中央各部工作人员的工资相比不够平衡。虽说交给“计划组织”的各项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但今后我们将不再把工作集中到“计划组织”去。执行开发计划和管理国家生产部门的任务将陆续移交给那些有关的中央各部及其他政府机构去完成。

为制止国家机关的腐化堕落，两年前我们采取了一些严厉措施。为此，议会还专门通过了两项法令，现已付诸实行。一项法令是，禁止政府官员和那些资本属于国家所有或向国家缴付利润的企业主为干预政府所进行的各项交易。上述法令还禁止议会议员私自为插手政府而进行的各项交易和包工合同。法令中虽然没有提到王室成员，但我还是特意告诫他们：此法令对他们也适用。违犯这项法令者，将被判处两年至四年的单独禁闭。

第二项法令，也叫“从那儿得来的”法令。它规定：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和国营工厂主及其他类似的企业主，每年必须将自己的流动资金和收入公之于众，若发现其中有可疑之处，将受到审查。凡是拒绝公布或者有意隐瞒者，将被永远开除出政府机关，其隐瞒的未报部分将由国家没收。

去年，我采取了另一项重要的、引人注目的措施，即成立“皇家调查组织”。

正如我在第一章里指出的，从青年时期，即从在瑞士学习的时候起，我就有这样一种志愿：一俟我登上王位，将亲自调查、审理国民的诉讼。在成立“皇家调查组织”之前，送到国王办公室的所有上告信我都亲自过目，然后委托有关的领导人处理。但后来我注意到，这种作法有其弊病。

譬如，有位农民写信来控告地方宪兵的恶劣行为，我自然会责成内政部去调查处理这件事。内政大臣便会逐级询问地方宪兵队的官员，以弄清事实真相。这些官员首先考虑的自然是为自已及其部下辩护，这样就会歪曲事实真相。有时，这位上告的农民还可能遭到地方宪兵的恫吓和刁难。

虽然宪兵队和其他政府机关会受到纪律和法律的约束，然而，经验告诉我们：有必要成立单独的调查机构。因此，我于去年成立了“皇家调查组织”。

这个组织的成员到全国各地巡回视察，大胆放手地调查、审理民间的诉讼，而不受任何组织程序的约束。地

方百姓可以无忧无虑地将自己的控告和各种要求通过这些官员直接上报给我。

在这里，有必要叙述一下在国家机关工作方法上出现的、对我国各地人民产生了良好影响的一个根本变化。不久之前，在伊朗象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手工业者和农民等普通老百姓都把政府看成是一个由税收官员、警察、宪兵和军队组成的机构。税收官员总是千方百计地敲诈勒索商人和农民，宪兵队和治安人员对于强取豪夺农民的金钱和粮食习以为常。这就难怪农民们以仇恨的眼光看待他们了。

可是近来，由于极为明显的原因，国民对于政府官员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政府机关在农民居住的村庄开办学校，免费教育他们的子女；为农民的住房喷洒消毒药剂，以防止发生恶性疟疾；在农村打深井，提供干净的饮用水；建立免费医疗站，为农民及其家属治病；国家工作人员在农田示范新耕作法，向农民推广新品种。在全国各地采取的这些措施，效果极好。普通农民自觉不自觉地都认为，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关系。国家工作人员也在与人民建立的新关系中理解到民主的含义，增强了对人民的责任感。

提拔年轻人到政府机关工作，按照前一章指出的原则培养教育下一代，使民主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我本人希望，人民和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这种新关系，将为议会民主开辟广阔的道路。在社会上实行政治民主，决不会象使用电冰箱那样容易，

什么时候想开就开，想关就关。要有效地实行政治民主，就必须审慎机智，具有远见。投票人在普选时应该了解候选人的资格和条件，应该知道议会所讨论和审议的问题。天才的思想、发达的智力和博爱仁慈的品德是候选人的重要条件。

有钱人应该满足于只有一次投票，这是宪法根据平等的原则为他们和穷苦人规定的权利。在选举中没有获得多数选票或仅以几票之差“名落孙山”的政党应该具有韧性，耐心地等待时机。一旦时机到来，便可对多数党政府进行适当的批评；在批评的时候切不可采取虚无主义的消极态度，以免危害社会。忠诚老实是民主制国家工作人员的重要条件，所有的人——从进入政界的人到政府一般工作人员——都必须克制自己的感情，不能忘乎所以，欺骗人民或把他们引入歧途。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我们应该时刻小心谨慎，任何政治上和行政上的疏忽、两面派行为或粗枝大叶都会受到无情的惩罚。

实现政治民主应该成为全体国民共同承担的职责，生气勃勃的人民力量定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使命。

实现政治民主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所强调的只是，对我们伊朗人来说，真正的政治民主是极为可贵的；为了得到它，我们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一下经济民主问题。我认为伊朗在经济民主方面象在政治民主方面一样，所采取的也是一条在中东从未有过的独特路线。我阐述这条路线并不是为了炫耀一番，而是想对热心于此事的人谈谈实际情

况而已。将我们建设国家的方针、路线同中东地区其他国家建设国家的方针、路线加以比较，是一件使我感到极为愉快的事。

在前几章已就国家经济发展的计划作了简单的介绍，这里我想只阐述发展经济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上美国生产的商品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年产值都比其他国家高。我认为，问题的意义并不在于劳动人民生产的东西多少，而在于这些产品按照民主原则进行分配的作法。我们在参观美国大型工矿企业时，总会看到上千辆小汽车停放在工厂的四周。这些小汽车大都属于工厂的普通工人，他们亲自驾驶这些汽车上下班。美国大多数工人的饭食丰盛可口，衣着体面大方，住宅设备新颖，生活舒适安逸。

当然，美国也有比较富足的人，但是这个国家生产的东西异常丰富，可以满足每个国民的需要而有剩余。这就是说，丰富的商品产量使美国不仅用不着为国内的供应发愁，而且还可以在世界各地实行援助计划。

然而，美国在经济民主方面成功的秘诀，并不仅仅在于纯粹的资本主义。从一八五六至一八六一年发生的南北战争开始，美国便逐渐放弃了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作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套作法彻底分家了。今天，在美国虽有成千上万个私营工商企业，以及几十万个私人农场，可是美国的经济制度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体。这就是说，国家通过提供贷款和进行技术指导等方式援助私营企业，使之成全

体国民谋利益。同时，国家还直接管理着医院、发电厂、军火工厂和大型图书出版机构等企业单位。在这方面有意义的是，所有社会产品均在全国人民当中进行分配。伊朗政府为了人民的利益也在调整和管理私营工商企业。譬如，根据法律确定工厂的工作条件，规定和稳定某些商品的价格等。象肉类和面包的最高零售价格就是由国家规定的。去年，国家还为人们降低了药品的零售价格，它甚至比生产国规定的零售价格还低。

除了调整和管理私营工商企业外，国家还根据国民利益的要求，直接从事某些工商业活动；同时为工业主、商人和农民提供广阔的活动天地。我认为，伊朗的经济民主是否成功将取决于独立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人们。

下一章我将谈到，比工商业更重要的、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的是农业生产问题。我们不希望伊朗象共产党中国等国那样，使千百万农民生活于强迫命令之下，甚至连家庭私人生活也受到侵犯。在农业问题上，经济民主的含义是使农业为自由的国民服务，为此，必须整顿和改善农业。伊朗虽然在经济民主方面尚未达到成熟的阶段，但是它正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象某些国家一样，确实已经离这个目标不很遥远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应该贯彻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努力使国家经济日益繁荣，并使我国人民充分地享有它。

第二个原则：适当地调整和安排国家经济，使工人、农民、工厂主、工程师和专家以及所有从事生产的人员的

工资得到保障。

我不能容忍这样一种社会的存在：它的生产效率极低，其国民过着愚昧无知的生活。当世界上各国都在奋发图强、努力上进之时，它却麻木不仁、无动于衷。

在我看来，还有一种社会状况更加令人不能容忍。它有生产能力，但其国民却是在压力和强迫之下从事工作的。我可以断定，绝大多数伊朗人都会赞成我的上述观点。我们伊朗人有决心发展国家的经济，但是由于个性自由是我们民族的固有传统，所以我们决不接受那种在压力和强迫之下牺牲个性自由而换来的经济发展。

现在让我们看看，究竟怎样才能在我国迅速地实现理想的经济民主。为此，首先必须制定规划，因为在现今世界上，若是没有全面完整的规划，国家经济不可能获得高速度的发展。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历史都有这样的惨痛教训：它们建立了不少大型工厂，但却忽视了工厂的生产力以及工厂对原料的需要，也没有为运输原料和产品铺设必要的公路和铁路。或者这些工厂生产的商品，可能并不是国民所急需的东西，因此出现了生产过剩现象。或者花费了许多钱建成一座现代化工厂，但因缺少厂长和专家而不能开工投产。我就知道一个国家，它用一百多万美元购买了一批挖掘机，但却忘了购买必要的备用零件。

有时，人们问我：怎样才能将个人主动性与发展国家经济的广泛计划结合起来？我想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比方说，某个私营公司愿意掏钱在伊朗兴建一座丝

织厂，政府当然不会反对这个计划。但是，假如该公司要求政府提供贷款，那就不一定得到肯定的答复。因为目前人造丝大量上市，排挤了真丝的市场；而且今天的真丝织品已属于奢侈商品。相比之下，国家对于制糖等其他工业更加感到需要。国家贷款当然首先要提供其产品对国民说来是迫切需要的工厂了。通过这种办法，我们便能引导私人企业从事有利于国家、同时也有利于他们自己的生产活动。

前面我曾谈到第一个七年计划和由于政治原因所造成的失败，以及比较成功地实行第二个七年计划的情况等。前一章提到的大部分建设成就就是执行第二个七年计划的结果。虽然我们取得了某些成就，但我还是不够满意。我们的工作方法还有待于改进，我们完全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工作。

为了推进我国的建设事业，成立一个健全的机构以便制定各项经济计划，并使它们相互协调起来，则是完全必要的了。有鉴于此，我成立了“高级经济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首相负责，其成员是与经济发展事业有关的各部大臣，“计划组织”的常务理事和伊朗国家银行总经理等。它的办公机构在委员会秘书长领导下完成各项工作。一九五八年，秘书长职务被提升到副首相一级。“高级经济委员会”通常是在我出席的情况下召开会议，研究经济发展规划，根据工作性质的不同责成有关各部和国家企业部门贯彻执行，并在执行过程中进行督促。

“高级经济委员会”在加速实行发展计划和协调发展

计划方面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与此同时，去年在外国专家的帮助下，我们还在“计划组织”内成立了一个经济办公室。由伊朗和外国专家组成的这个办公室，为顺利执行第二个七年计划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该办公室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制定我国的第三个七年计划。应该指出，我们现在执行的第二个七年计划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然而，它没有明确各项计划完成的具体期限，这是美中不足之处，应该加以克服。第二个七年计划象第一个七年计划一样，对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和矿业等做了全面的规划，并规定了投资金额。但是两个七年计划都没有明确规定完成某项计划的具体日期。不确定完成任务的期限，在发展计划执行的初级阶段还说得过去，可是在工作取得迅速进展的现阶段就不适宜了。我认为，应该确定完成各项计划（包括第二个七年计划）的期限的理由起码有三个：

第一，对于习惯了民主制度的人们说来，翻阅带有建成的水坝和出产的内燃机车照片的简明材料，总比研读有关财政事务和经费开支的繁琐报告更感兴趣，也觉得更加具有说服力。

第二，假如笼统地向某个聪明人说，准备拨出一笔钱进行某项建设事业，这并不会引起他的多大重视。可是，若向他说明某项计划怎样实行，什么时候竣工，却能给他以深刻的印象。因为在人们看来，投资可能造成浪费，也可能被某些人贪污一部分，也可能被滥用到其他不重要的项目中去；或者投了资，却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完工，

说不定永远也不能建设成功。聪明人总是想知道资金将用到什么地方去，什么时候才能从购买的设备中获得收益。

第三个理由最重要，即确定完成建设计划的具体日期，能鼓励人民积极地支持和帮助国家实现各项开发计划。

很遗憾，注重时间观念没有成为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然而，在完成与我们休戚相关的社会经济计划时，严格遵守时间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希望能看到这样一天：国内各政党、政府机关、教育机构和全体国民，都把全副注意力集中到国家的建设事业上来。各个政党在党的集会上经常不断地向党员说明发展经济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任务；国家工作人员开展竞赛，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交给自己的任务；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了解我前一章所说的、我们正在实行的各项建设计划，并学会对他们有益的、为祖国服务的各项本领；每个国民都懂得自己在发展国家经济的事业中有重要的责任，无论是哪行哪业的人，都努力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

如果说我的这种愿望近乎幻想的话，那么请记住：我国人民确实比前些年更加热衷于发展事业，对祖国的未来更加充满了信心，他们为在短期内改变国家面貌的干劲更加充沛了。

虽说我们有些开发计划的进展速度还不够理想。可是有些开发计划的进展速度之快，连西方国家的专家都

感得惊讶。今天，在德黑兰一夜之间就可铺设一条沥青街道，十一个月內即可建成一个能容纳二千名儿童的大型幼儿园。伊朗首都的人口不到十五年便从五十万猛增至一百五十万，它的各项建设工作当然应该迅速加以完成。令人高兴的是，我国各地的建设速度同首都一样，也是相当快的。

有些共产党国家大喊大叫催促人民增加生产。我认为，民主国家可以用其他方法发展经济事业。我愿意在民主的气氛中提出艰巨的任务，经过努力，提前完成它。我主张发表演说，放映电影，通过电视广播和其他宣传工具等，鼓舞国民的干劲，鼓励他们积极投入到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经济发展事业中去。我认为青年人是我们的骄傲与希望，应该给予他们特殊的关怀。要充分发扬青年们的爱国主义、年轻的活力、竞争精神以及为实现共同理想而相互帮助的热情，以便将他们培养成为国家的栋梁，最终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我们一定要使经济发展与民主改革相得益彰，在我国建立起完善的经济民主。

在经济民主中，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成立各行业的协会。这对共产党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而我国人民对此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完全可以接受它。我深信，这种行业协会是民主的重要因素，在当今世界上也是工业方面实现经济民主的保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一段时期內，各种工人协会犹如雨后春笋在伊朗各地纷纷宣告成立。可是，由于

种种原因,后果并不美妙。如前所述,大多数工人协会受到人民党的影响,误入歧途,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伊朗的工厂主对民主精神和工人协会采取了敌视态度。他们出于无知,或者故意地采用激烈的作法,反对一度流行于欧美、当时尚未得到法律和官方承认的工人协会。他们非但不以同情的眼光看待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和改善生活条件的要求,而且在工厂里雇用一批流氓打手威胁、恫吓工人。这批人拿的薪水比普通工人多得多。应该用于满足工人合理要求的资金,却发给了这批凶狠的恶棍。

那时的工人协会同我国的政党犯了同样的毛病,就是不关心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而只是依赖某些个人。有时,某协会的领导人暂时得到了工人的拥护,于是,他领导的协会便兴旺起来,人们蜂拥而至,集聚到他的周围。没过多久,他的威望衰减,或者变得飞扬跋扈起来,工人们对他的骄横态度和工作中缺乏目的性产生反感和不满,纷纷离去,投奔到另一个工作同样没有目标、也不关心解决工人痛痒的领导人那里去。显而易见,这样是不可能组织一个能正确理解自己职责的协会的。

明智的作法是,使工人协会同政党分开。工人协会的基本目标应该是改善工人的经济状况,而把大量的政治性事务交给政党去办。因为一部分协会会员支持某个政党,而其他会员可能支持另一个政党,这样便会引起工人协会内部的分裂。所以说与政党挂钩必将导致协会的削弱。

可是,从管理的角度看,工人协会同政党之间又有某

些共同点。两者都应该执行具体而明确的纲领和行动计划，都应该拥有值得信赖的优秀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应是根据民主原则自由选举出来的，并深切了解民主制度赋予他们的使命。

去年，南方一个港口的码头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罢工期间，工人们为了表示自己的爱国主义，不要任何报酬地卸下了一些货船的军火物资。我感到高兴的是，由于工人们的共同努力，他们微薄的工资终于得到了增加。

目前伊朗的工人协会尚处于初级阶段，上述行动可以成为这些协会行动方式的范例。

谈到社会民主，应该指出，早在我结束学业从瑞士回到伊朗之后，我国贫苦百姓的悲惨状况便引起我的极大关注。由于我父亲的努力，伊朗虽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然而在我国仍有人死于饥饿，有人没有住房，几乎过着衣不蔽体的生活。这种凄惨的景象折磨着我，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军官学校学习期间，有关公共福利的事虽然用不着我过问，可是我始终为国民的悲惨生活操心。我觉得百姓的生活如此的不幸和贫穷是极不公道的，也是不能容忍的。每当想到有些养尊处优、自私自利的人并不因此而感到不安，甚至认为这样下去也未尝不可的时候，我就越发感到忧虑和愤慨。

记得刚继位不久，一个严寒冬天的傍晚，我召见一批议员，开诚布公地对他们说：我不愿意看到象在座的某些议员那样的人，他们享有各种特权，他们的财富天天增

加,优越的物质享受使他们大腹便便,红光满面,而在他们身旁却有人生活于贫困和灾难之中,长期挣扎在死亡线上。

第二天,被召见的议员中有人放风说,国王有了共产党思想的苗头。假如我这样的话算是共产党人所说的话,那么我将不否认我是共产党人。其实,那些散布这类谣言的议员不仅看不到自己的长远利益,而且对国家的根本利益也缺乏深谋远虑。

自从我为了保障社会正义而宣布起码的五项条件以来,至今已过去十五个年头了。我想每个伊朗人,女人、男人和儿童都有权享受这五项满足人们最低生活需要的条件。这些条件是:食物——衣着——住宅——教育和卫生。当然,假如有人能以正当手段获得更优越的生活条件,那谁也不会妨碍他。然而,每个国民的收入起码应该能够保证自己及其家庭享有这五项条件。假如有人连这一点也做不到,那么政府或慈善机构就应该采取措施,向其提供必需的生活品。

有些富有的饶舌者煞有介事地说什么,我国大多数国民的贫穷是由自己懒惰造成的,这种说法实在令人气愤,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作为例子,我想谈谈一个农村小孩。他住的村子里没有学校,也没有老师,他就象我父亲所作的那样,完全靠自学掌握了波斯文,尔后又学会了英文。显然,这个孩子非常刻苦,而且天资过人。应该讲,刻苦、勤劳是我国大多数国民的传统美德,为此我感到光荣和骄傲。如果说有懒惰和懈怠这类不良品质的

话，那么在养尊处优的富人当中则更为多见。我从不吝啬资助慈善事业，因为我知道，我国大多数贫苦人只要得到微薄的资助，就将竭尽全力完成下余的工作。下一章将会谈到，为了改善我国人民，特别是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我们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多数农民是国家的优秀国民，而且也是收入最低的国民。第十一章我将叙述在全国人民、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当中普及教育的情况。这里我只叙述与保障社会民主有关的其他一些问题。

说也奇怪，在我父亲执政之前，除了富人之外很少有种牛痘的。我父亲是将这种必要的卫生措施推广到人民大众中去的第一个人。可是，他为了使人民免于天花病害所做的努力并未取得完全成功。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八年间，卫生部的工作人员给八百多万人注射了牛痘疫苗。在这期间，为了根除恶性疟疾我们用滴滴涕喷撒了一千多万间民宅；还采取了严厉措施，禁止种植鸦片，并为吸鸦片成瘾者建立了诊疗所。此外，对五万多人进行了沙眼检查，对一万九千名患者进行了治疗；三十七万有性病嫌疑者经过医生检查，其中一万九千名患者得到治疗。

我们在全国各个县都建立了医院，为当地人民治病。还有些医院、诊疗所、产院、孤儿院和肺病疗养院正在建设中。

使用不清洁的水，会造成各种疾病。因此在各县城铺设自来水管，以保证饮用水的清洁，是一项必要的卫生措施。

完成这项重要工作，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我国几千年来，乡村居民一向饮用河水或容易污染的浅井水；城市居民的饮用水多从街道旁边流过的小河中打取。今天，我国多数城市已安装了自来水管，我们计划在较小的城镇和乡村也这样做。

内政部除了自己修建了很多孤儿院和托儿所之外，还赞助私营企业或慈善机关建立这类机构，以便向贫穷的人家提供援助。

内政部领导下的国家警察总局努力改善监狱状况，修建了不少教养院，并加强了对囚犯、特别是年轻罪犯的道德教育。下面我将谈到内政部修建劳动营，进行开发事业的情况。

内政部在卡腊季修建了一个劳动基地，收容了数百名乞丐，在那里让他们学会木工、纺织和首饰工等专门技术。在掌握一项专门技术之后，他们就能够挣钱；若能得到其他资助，即可靠开办小店铺谋生。这样做，可以使不少社会寄生虫转变为有体面职业的工匠。

凡是有兴趣研究社会事物，愿意在提高人们的自尊心和启发人们的责任感方面进行科学调查的人，皆可以把这个劳动基地选作适宜的地点。

劳动部目前正在监督实行“工厂劳动法”和有关雇用女工、童工的特殊规定。这个部鼓励成立工人协会，对工人俱乐部特别关心。其中伊斯法罕工人俱乐部可算是个典范，它建设得非常漂亮，拥有图书馆、演讲厅、电影院、剧场和设备齐全的健身房。

“工人社会保险组织”在工人因年迈、疾病、工伤事故或家庭抚养者死亡而遇到困难时，负责妥善安排其生活。司法部有责任保护母亲与儿童，它在阻止离婚、保障社会正义、反对压迫和关怀少年罪犯等方面很有成绩。农业部同教育部合作，在向小学生提供食品的工作中作出了贡献。

上述措施是国家为了保障最低限度的社会民主应该做的工作。我本人同王室其他成员特别关心改善社会状况，这一点充分表现在与王室有关的下述五个组织上，它们的经费开支主要由政府、人民和王室承担。

这五个组织是“伊朗红狮与太阳协会”、“巴列维基金会”、“皇家社会服务组织”、“保护妇幼协会”和“皇家协调慈善机构委员会”。伊朗王后作我的代表是这些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我姐姐莎姆丝公主和妹妹阿什拉芙公主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些社会服务机构的各项重要事务上。我不想详细地叙述这些组织的活动，以免有自吹之嫌。我还命令这些组织，不要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完成的工作。

“红狮与太阳协会”在莎姆丝·巴列维公主领导下开展活动。该协会的名称来源于伊朗国旗。大家知道，伊朗国旗的正式标志是金黄色的狮子和太阳，而该协会旗帜上的图案却是红色的。协会的名称就是根据旗子上的图案起的。

该协会向地震灾区提供了宝贵的支援，因而博得了人们极大的尊敬和好评。近几十年来我国部分地区遭受

天灾，一些村镇被强烈的地震毁掉，数百人丧失了生命。“红狮与太阳协会”同国内外慈善机构合作向灾区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三十年前，我国的交通工具十分简陋，也没有现代化的社会服务组织，但却能提供那样的援助，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红狮与太阳协会”在德黑兰设有一个现代化的癌症防治中心，它拥有一所一百张床位的医院，以及包括射线照相术和放射线疗法在内的全套医疗设备。目前，它已发展成为一个完备的科研中心，与世界各国类似的机构建立起业务联系。

该协会建造了一所典型的“幼儿之家”和一个专业化的大型幼儿园——可以收容一千名无人照看的儿童；它还修建了一个肺病防治中心，每天有两百多位病人就诊。该协会所属的现代化“救护医院”，除免费治疗病人外，还随时接收德黑兰及其郊区的急诊病人，并允许住院。

该协会正在列依市修建一座设备齐全的现代化医院，不久即将交付使用。它还修了大型的妇幼保健中心和为住家服务的流动产院，每年为许多孕妇作定期检查、接生和照料新生婴儿。

培养有经验的技术熟练的医护人员是该协会另一项重要工作。为此，它在列依市修建了一座大型护士学校。近十年来，该校的大批毕业生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医院工作。该协会还在伊斯法罕和设拉子市设有卫生学校，为本协会、卫生部和其他医疗单位培训医护人员。据悉，该协

会在大不里士和腊什特市建设的卫生学校不久将竣工。看来，它培养医护人员的工作将逐渐普及到全国。

“伊朗红狮与太阳协会”开办的幼儿园、血浆公司、诊疗所、托儿所和肺病疗养院等机构总共约有二百九十四四个。该协会所属的救急仓库遍布全国。它还拥有自己的电话电报通讯网，可与全国各地直接取得联系。一旦发生不测事件，该协会便能最早获得消息，立即提供必要的援助。

该协会采取的另一项极为有益的措施是，教育青年人关心慈善事业。目前已有数千名青年和热心慈善事业者成为它的会员。他们为改善穷苦人的生活状况，兢兢业业地工作，极端热忱而又不计报酬，表现出高尚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互助精神。这些会员使“红狮与太阳协会”变成了一座为社会慈善事业服务的大学校，我相信这所学校的人员将与日俱增。

由该协会会员组成的“支援灾区委员会”除进行救援和提供住处之外，还进行开发建设事业。这个委员会为解决奥斯鲁、迪尔、孔岗等港口的用水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它协助“计划组织”解决了迪拉姆、兰格、乔赫巴豪尔等港口和伯斯托克市的饮用水问题。由它负责铺设的长约二十六公里的布什尔市自来水管道工程即将完成。该委员会还在纳豪万德地震区修建了三十三三个新村，并为拉尔市的灾民修建了一座新城，城里的必要设施明年将全部安装完毕。

为了协调受到我重视的各社会服务机构的工作，我

于一九五七年成立了一个纯公共福利性的、不获利的组织——“巴列维基金会”。它的前身是“巴列维皇家土地管理局”，但规模比过去大多了。它的资金来源是下述工厂、企业的股息或收入：主要由我父亲投资开办的几家旅馆、水泥厂、制糖厂、伊朗国家保险公司、银行、商船队、工业贸易机构以及霍拉姆沙赫尔和阿巴丹之间新建成的大桥。这座桥梁于一九六〇年三月份竣工，现已交付使用。在此之前，从霍拉姆沙赫尔到阿巴丹去的汽车不得不绕路二百四十公里经阿瓦士大桥才能抵达。根据美国的作法，修建这座桥梁的经费将由过桥的车辆缴付路税来补偿。

“巴列维基金会”从上述工厂、企业得到的收入全部用于慈善事业。

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一个慈善机构要从事经济和工业活动？为什么“巴列维基金会”不出让旅馆反而去经营？为什么它要开辟和经营海运线（见上一章）而且还向水泥厂和制糖厂投资？

现在就来回答这些问题。第一，因为过去是用出租皇家土地得到的租金来支付慈善事业的开支。而如今要在有计划地分配皇家土地，必须寻找新的收入来源。

下一章我将详细阐述皇家土地分配计划的进展情况，这里只需指出下面一点，即分到皇家土地的农民向“巴列维基金会”缴纳的租金比一般农民上缴的赋税少得多。把皇家土地分给勤劳正直的农民确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但同时我也不愿意其他的重要计划，如向大学

生提供奖学金等，因收入减少而中途停顿。因此，我积极支援“巴列维基金会”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以弥补土地税收入的减少。“巴列维基金会”的投资活动，同美国“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英国的“纳菲尔德基金会”等西方世界的著名慈善机构的作法大同小异。

第二，“巴列维基金会”进行经济和工业活动，不仅是为了获得开展慈善事业的经费，而且还想通过执行开发计划，为其他投资家作出榜样。譬如，该基金会悬挂伊朗国旗的商船队航行在世界各大洋上，这在我国近代史上还是头一次。该基金会开办的水泥厂，设备完善，经营有方，堪称是同类工厂的典范。同样，它经营的旅馆服务周到，受人欢迎，招揽了大批的外国旅游者。

为了解决德黑兰的住房困难，为了给低工资的人提供租金便宜的住宅，“巴列维基金会”在德黑兰郊区修筑了一百间房屋。它还在市内贫民区开办了廉价的饭馆，冬闲时工人们用不超过七个里亚尔的小钱即可饱餐一顿。

“法拉赫慈善协会”是“巴列维基金会”的附属机构，它开办的几所孤儿院和幼儿园，为那些无子女而想领孩子的人提供了方便，这对穷贫而多子女的家庭是直接的帮助。

一九六〇年春，这个协会在全国各地建造和修缮了四十所教养院，每一所可容纳一百到两千个儿童，并设有职工宿舍。在教养院里，孩子们的吃、住、卫生和学习，设备样样俱全；更重要的是温暖亲切的环境，使孩子们得以

健康地发育成长。

孩子们脸上流露出来的那种健康、愉快的神情,说明教养院的教育方法是完全正确的。当离开教养院的时候,孩子们身体健壮,纯朴老实,个个都会一门技术,并略有储蓄。这样,他们就能满怀信心地开始自己的社会生活,成为国家有责任感的服务者。

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在修造这些教养院和为它们提供设备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毫无疑问,这些善良人将来也不会吝惜这种必要的帮助。有些慈善的妇女自愿地在这些教养院工作。我相信,在伊朗行善的妇女的数量将逐年增加。

从上述教养院里领孩子的伊朗家庭为数不少,还有些外国人也这么做。

我对国家采取的这种培育孤儿身心健康的作法感到骄傲。我希望,外国旅行家和伊朗国民能花些时间去参观一下这些教养院,跟孩子们和热心培养他们的人相识交谈,以便增强自己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为全人类服务的信念。

我一贯主张向国民提供廉价的新药品。为此,我委托“巴列维基金会”和“皇家社会服务组织”共同在德黑兰郊区筹建一座经费达四百多万美元的制药厂。制造药品是一项技术性很高的工作,因此决定聘请一家外国公司经营这座制药厂,为期十年。在此期间,它将为伊朗方面培训技术专家和行政管理人员。

从一九五二年至今,根据我的命令,每年都召开一次

伊朗医生代表大会，以便交流医学、卫生情报和研究成果，制定有关防治常见病和公共卫生的必要决议。首次医生代表大会于一九五二年在拉姆萨尔由王后主持举行，此后每届代表大会都在拉姆萨尔召开。代表大会通过的很多决议皆由政府加以贯彻执行。

代表大会的一项决议是，婚前男方必须经过医院检查，得到医生证明，方可办理结婚手续。它的另一项决议是，所有儿童和中学生都要照 X 光透视，仔细检查是否患有肺结核；为了使肺病患者能安心治疗，特规定在其医治和住院期间工资照发。

由“巴列维基金会”出面，为医生代表大会组织了一个常务秘书处，负责印刷大会发言、医生的学术论文和报告，以及会议决议等，并负责将它们免费分发给所有医生和医学爱好者。

为了发展文教事业，推广科学，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巴列维基金会”组织翻译出版东、西方文学名著，以低价出售。它每年还向本年度出版的最优秀的文学、历史、自然科学等方面书籍的编著者和译者颁发巨额奖金。该基金会为了拍摄更多的有价值的影片和加强伊朗年轻的电影事业，还向电影制片商和新建的电影院提供财政援助，尽量减少影院上缴的税款，使教员、工人等能看到票价便宜的电影。

我已通知“巴列维基金会”将出版本书所得的稿酬，资助“图书翻译出版社”。

隶属于“巴列维基金会”的“夏赫娜兹青年俱乐部”大

力提倡青年人从事集体活动，经常组织夏令营和其他类似活动。

一九五六年在拉姆萨尔举办了第一届国际大学生夏令营，中东、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十三所大学的学生应邀参加。一九五七年举办了第一届德黑兰大学学生夏令营。

“巴列维基金会”还恢复了一度停顿下来的少先队活动。它成立了“旅游事务管理局”，以便帮助国内外游客了解伊朗伟大的古代文明。

下一章将谈到“巴列维基金会”在繁荣农业经济和改善农民生活方面的活动。我希望，“巴列维基金会”能很快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慈善机构之一。虽然它的活动经费远不如西方国家慈善机构充足，但它的活动范围每年都在扩大，服务项目也越来越多。

“皇家社会服务组织”是第三个大的公共福利事业机构。在阿什拉芙·巴列维公主领导下，它在公共卫生方面为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它与政府有关部门合作，到目前为止在全国各县城修建了七十三所诊疗所和医院，专门向贫苦百姓提供免费治疗。

一九四九年这个组织在迪兹富勒市展开了防治沙眼的广泛而卓有成效的斗争。该市各诊疗所在三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内，诊治了一百多万沙眼患者。这个组织所属的诊疗所建立之前，该市约有百分之九十的居民患有沙眼，其中百分之二十五的病人丧失了视力。

在展开斗争的第一年末，就治愈了百分之九十患沙眼的中学生和百分之三十五的其他患者。这种病在胡泽



斯坦省正在稳定地下降。“皇家社会服务组织”在盲人教育方面成绩显著，它在德黑兰成立的盲人学校采用流行的“布莱叶^①盲人教授法”教育学生。有个盲人乐队，由该校一名盲人学生担任指挥，能演奏东、西方的著名乐曲。“皇家社会服务组织”还是采用放射疗法免费治疗发癬病的第一个机构，到目前为止已有三万五千多病人通过电疗得到医治。

一九六〇年该组织采用英国最近生产的一种丸药医治发癬病，经过试验，其疗效甚佳。

提供廉价药品是“皇家社会服务组织”的另一个目标。它所属的各制药厂近年来把大批药品免费分发到医院、诊疗所和职业医生手里，并以市面价格的十分之一在自由市场出售部分药品。基本药品则是从国外购买，免费或低价提供给病人。该组织每年将储备的药品包装好，用飞机、火车和汽车输送到各省医疗机构，再转运到遥远的地区。它在提供药物方面持续不断的努力，使我感到十分满意。

该组织新建的制药厂投产之后，将以惊人的规模和速度向病人和穷苦人提供大量的廉价药品。

“皇家社会服务组织”备有必要的交通工具，免费把贫穷的病人送到诊疗所或医院。此外，它还派医生到病人家里出诊，免费给贫苦的孩子治病，甚至出钱资助贫穷病人及其家庭。该组织还成立了一个学习期限三年的护

^① 布莱叶：法国人，创制了用凸点符号供盲人书写、摸读的文字符号体系。——译者

士学校。并协助政府执行有关地毯厂、纺织厂使用童工的规定。它还开办了一些技工学校，使生活贫苦的人有机会学习木工、管道工、铁匠、铜匠、机械工、电工、鞋匠等各种专门技术。

“皇家社会服务组织”的另一项工作是，保护贫穷的母亲和婴儿，帮助没钱的学生。譬如，德黑兰大学就为地方上来的穷大学生提供膳宿。

探望监狱、安抚囚犯、帮助刑满出狱者、为吸鸦片和酗酒者设立专门治疗所等，也是“皇家社会服务组织”的工作内容。它除了直接帮助数千名吸毒者外，还将大批吸毒者转交政府所属的有关机构，以便得到必要的治疗。该组织通过广播节目、上演有益的影片，鼓励全体国民投身到社会服务中去。

“阿什拉芙殿下慈善机构”是“皇家社会服务组织”的附属单位。这个机构开办了一个托儿所、一个幼儿园、一所小学、一所中学、一所工艺学校、一个纺织厂和一个诊疗所，并想方设法帮助贫苦的儿童，特别是无力抚育孩子的母亲。“皇家社会服务组织”的另一个附属机构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伊朗分会”。这个分会在分配免费牛奶、帮助执行国立小学食品分配计划和培养卫生员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

“皇家社会服务组织”除完成本职工作外，还向下列慈善机构提供物质上和道义上的帮助：“保护孤儿和聋哑儿童协会”、“肺病和性病防治协会”、“精神病院”、“动物保护协会”等；并与它们合作，进行各项工作。

慷慨大方的人们和各企事业单位，为上述慈善事业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经费，在履行社会责任和为人类服务方面为其他国民和殷实人家树立了榜样，也使我感到光荣和骄傲。确实有些人不关心民主事业，也不注重道德原则，对于生活的乐趣在于帮助人类、特别是贫穷落后的阶层概无所知。假如这些人能做到助人为乐的话，那么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将充满无穷的乐趣。

“保护妇幼协会”是附属于王室的第四个社会服务组织。该协会主要负责保护贫穷的孕妇、抚养孤儿和为孤儿寻找家庭主顾。

在公共福利事业方面，我主张重视社会试验，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和开展适当的竞争。有人说，竞争只适用于商业，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不应该运用这个原则，这种说法我是不赞成的。假如王室所属的几个慈善组织在不阻碍彼此工作的前提下，能在帮助贫苦百姓方面开展竞争，那该多么好啊！因为我们的基本目的乃是帮助贫穷、可怜的同胞和儿童，所以，这种帮助提供得越多，我们的慈善工作就做得越好。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设身处地为那些渴望得到救助的孩子们的母亲着想。假如一位母亲能够得到几方面的帮助，那么她肯定会更加安心，因为即使某个官员不同情她，其他的官员和慈善机构还可能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随着我国慈善机构的日益增多，有必要使它们的活动相互协调起来。为此，我成立了“皇家协调慈善机构委员会”。该委员会每十五天由宫廷大臣主持召开一次会

议,努力实现上述意图。

这个委员会不仅研究解决王室所属的各慈善机构之间的协作问题,而且研究解决上述慈善机构与政府、个人和私营公司,以及那些后面将要谈到的、给予我们宝贵援助的外国慈善机构之间的协作问题。该委员会有权对王室向各慈善机构发放的拨款以及向新的社会服务计划发放的拨款数量发表意见。该委员会于一九五九年在德黑兰成立了社会服务学校,这是全国第一所这种类型的学校。

我希望,该委员会今后能更加重视鼓励心地善良的年轻妇女从事社会服务事业,出色地完成这项极端重要的任务。

我在本章阐述了自己对真正民主的看法,并着力说明了我的民主观具有非常广泛的含义,它包括丰富多采的活动。然而,民主不仅是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而且是一种生活哲学。获得这种哲学对于任何个人或社会来说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须知,这种包罗万象的哲学乃是一种人类向往的最好的社会制度。对于我们——在实现真正民主的道路上前进的伊朗人——说来,若把这一点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那么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忍受任何艰难困苦,也是在所不惜和完全值得的。目前,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已走过了一大段路程,因此,我认为大多数伊朗国民能理解民主的真正含义。我们伊朗人应该看到在实现民主方面取得的迅速进展,同时不要忘记:实现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民主,需要时间和国民智育的发展,还必须符合

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件工作需要培育国民和社会的道德品质和忠诚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全体国民必须相互合作,促进彼此的了解和信任。

为了使国家和人民能在自由的环境中继续前进,就必须有所克制。假如我们步子迈得太急了,或者我们缺乏耐心和悲观丧气,那么我们就不能达到全体国民梦寐以求的远大目标。然而,若将改革和进步的强烈愿望与耐心和韧性结合起来,我们的劳动肯定能结出丰硕的成果。我们的目标已经确定,前进的道路已经打开,只要我们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崇高理想。

第九章 充满希望的农业前景

首先应该说明，本章关于伊朗农业的叙述，并不涉及大自然的景色，而是对国计民生的一个重要方面的探讨。有关伊朗优美的农村风光和农民风俗习惯的精彩描述，在外国旅行家撰写的游记中比比皆是，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翻阅一下。那些书虽然写得饶有风趣，读之令人爱不释手，然而我认为它们却转移了读者的视线，使人们忽略了眼前的重大问题。

我们伊朗人在农业方面有所疏忽，对于国家农业的真正需要缺乏应有的重视。我们常常满足于对农业发表一般的消极议论，或在会议上说一番农民生活的悲惨状况。倘若有人问到消除这种悲惨状况的方法何在，得到的回答要么是沉默，要么是浅陋的皮毛之见，最多不过是提出些无关痛痒的建议。事实上，我们很少按照合理的计划作出切实有效的努力去发展农业生产。

令我感到喜悦的是，今天在伊朗人民中涌现出改革农业的热潮。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在本章我要提出一些观点和意见，或许有助于我们实现发展农业的总目标。

我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其石油产量十分可观,因此人们一般都认为伊朗基本上是一个石油生产国。然而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目前我国农业每年的产值约为石油每年产值的四倍;因为几千年来农业一直是伊朗人民最重要的生产部门,而且至今仍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还因为伊朗约有四分之三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除了不适于耕作的荒漠之外,他们散居在全国各地的农村,拥有辽阔的种植地。不了解我国农业状况的外国人每当听说伊朗约有四万五千个村庄,每个村庄约有二百到三百人时,便会感到惊奇。

农业生产不仅向伊朗人民提供了宝贵的农产品,而且使他们的生活别具一格。伊朗虽然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各种自然资源,但国家的大部分财富却掌握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手中。伊朗农民多是勤劳而有志向的人,他们的生产活动使国家充满了生气,他们的风俗习惯赋予生活以特色。

伊朗越是按照文明世界的现行方法向着工业复兴的方向发展,就越感到需要一支优秀的工人队伍,而农民则基本上可以满足这种需要。农民们加紧生产,提高产量,不仅能满足国家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同时可以增加国家的对外销售量。为了保障军队的质量,我们的希望也主要寄托在农民身上,因为他们既机智勇敢,又能吃苦耐劳。

我国地域广阔,其面积的百分之十是可耕地,百分之三十是草地,另有百分之十覆盖着森林,其余的则暂时

荒芜着。我希望随着广泛的开发计划的实施，能尽快增加可耕地的面积，而尽量减少荒凉的土地。

在本书的第一章我曾谈到伊朗的各种农作物。在粮食作物中，小麦、玉米和小米全国各地皆可种植，其中以小麦产量最高。麦子多被用来制作面包，它是我国人民的主要主食。

国家从农民那里收购小麦，廉价出售给私营面包坊，以便大量制作价钱便宜的面包，充足地供应那些收入微薄的国民。

伊朗生产的小麦可以充分地满足我国现时的需要。通过提高收购价格，鼓励农民增加生产，我们就完全能够用自己生产的小麦来保证国家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

大麦在伊朗多被用来作牲畜饲料，也向国外出口。这种作物在干旱地区亦可种植，因为它的根很长，能深深地扎入地下吸收水分和养料。

雨水充足的里海沿岸诸省盛产稻米，既可保证国内消费，又可销售国外。

随着伊朗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砂糖的消费量也在逐年增加。目前国内各工厂每年生产约十万余吨甜菜糖，这只能保证国内三分之一的需要量，其余的三分之二需要从国外进口。我们计划大力发展制糖工业，为此特在胡泽斯坦省恢复中断了几百年之久的甘蔗种植，以便大幅度地增产甘蔗。预计将来在胡泽斯坦省用甘蔗制糖，每年可生产一百万吨。看来不要很久时间，我们就不再需要进口砂糖了。

在整个里海沿岸到处是茶田，可是茶叶的年产量却只相当于我国需要量的三分之一。增产茶叶并不困难，为此我们业已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我们在里海沿岸诸省和阿塞拜疆省广为种植烟草，除保证国内消费外，还制成香烟出口。

伊朗许多地区盛产棉花，不仅能满足国内的需要，还可大量地倾销国外。我国各地到处生长着各种水果树、扁桃树和阿月浑子果树，其产量极为丰富。伊朗每年都向国外出口大宗的葡萄干、扁桃和阿月浑子果；植物树胶、特别是对于制药和生产其他化学用品很有用处的草生植物胶，亦大量地供应国际市场。

畜牧业在伊朗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伊朗拥有的绵羊相当于美国绵羊总数的一半；此外，还有几百万头山羊和其他牲畜。

牲畜的肉和奶可以食用，它的毛和皮可用于各种工业，特别是地毯工业。伊朗不仅出口地毯，每年还向国外输出大量的原毛、世界闻名的羊羔皮、肠衣和其他皮革等。

我国虽然修筑了不少公路和铁路，但目前运输货物还使用毛驴。在霍腊散省和俾路支斯坦善于驮运货物的骆驼是普遍的运输工具。骆驼的奶、肉和皮对于游牧部落说来具有很大价值。骆驼毛用于纺织，可生产贵重的毛织品。

伊朗的森林面积相当于美国的密苏里州，大部分密布在里海沿岸的厄尔布尔士山脉北麓，在扎格罗斯山脉

一带也有森林区。在波斯湾沿岸的小森林里，生长着各种热带树木。此外，在伊朗的乡村，白杨树、柳树和粗大的筱悬树举目皆是，它们生长在小河旁、花园和树林里，人们可以在树下乘凉小憩，还可以用木材作燃料和修盖房屋。伊朗森林里的树木种类繁多，有橡树、核桃树、桦树、榆树、冬青树、高加索棕榈树、柏树和枫树等。有些森林木材可用来做铁路枕木、火柴棒、门板和建筑木材；制作水桶和家具用的橡树木和核桃树木则大量地输出国外。然而事实上，国家每年采伐的木材绝大部分被用于烧炭和满足国内燃料的需要。

应该指出这个令人痛心的事实：在连续几百年中，伊朗人白白浪费了覆盖在祖国大地上的丰富的森林资源。我们对森林管理不善，缺乏长远的规划，以致森林区几乎变成了牲畜、特别是山羊的放牧场；幼树遭到践踏，根本长不起来。此外，由于人们随意砍伐树木、烧制木炭，大量宝贵的森林木材遭到破坏和浪费，致使我国广大地区严重缺少树木。在北部森林区，我们滥伐木材；而在其他森林区，由于缺少运输工具，又根本未进行采伐。

今天这种状况大为改观，森林面貌已有显著好转。在外国专家的帮助下，我们对农业部所属的森林局进行了改革，并正确而恰当地解决了烧制木炭和采伐木材等问题。

目前不少国营和私营工厂已能制造廉价的煤气炉，这样取暖、烹饪就不必再使用过去那种烧炭和木柴的炉子了。另外，用于制作铁路枕木和其他物件的森林木材，

可用化学药品浸泡,或者经过高压处理,而使之更加坚固耐用。凡是不符合经济原则砍伐的木材,森林局一律禁止外运。随着运输工具的增加,人们逐渐放弃了那些采伐过度的森林,转而去合理地开采边远的原始森林,以满足国家的需要。

里海和波斯湾沿岸的渔场是国家重要的水产资源。一八六七年纳赛尔丁王曾把里海的捕鱼权租让给一位俄国臣民,并在里海沿岸各重要港口建立渔业中心。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后,伊朗政府本打算将捕鱼权出让给俄国的一家私营公司,后因苏联政府侵夺了这家私营公司,便没有做成这笔交易。此后苏、伊双方根据协定成立了投资各半的苏伊联合渔业公司。这个协定实际上对伊朗不利,所以到一九五二年协定期满后,我们便没有再续订;同年,我们将里海捕鱼权收归国有。今天“国家渔业公司”掌管着全部渔业生产和贸易,以及它的对外出口。该公司的捕鱼量逐年提高,尤其在出产世界闻名的哈维亚尔鱼子方面,成绩显著。

我国大部分渔业产品倾销国外,其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哈维亚尔鱼和一半鱼子专门供应苏联,其余的则运往美国和欧洲。在里海捕获的鱼,种类繁多,其中的白鲑鱼在伊朗比哈维亚尔鱼更受欢迎。在注入里海的江河里可捕获大量味道鲜美的红鲑鱼。

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热水带,鱼类和其他海洋资源极其丰富,那里的水产业刚刚开始进行。

我父亲在位期间,曾在阿巴斯港建立一座鱼类罐头

厂。一九五九年在该地又建成另一座现代化鱼类罐头厂。为了贮存捕获的鲜鱼，又有一座鱼类冷冻厂和一座制冰厂在那里落成，交付使用。目前我们正在采取措施，用最新设备改装波斯湾的捕鱼船，并增加该地区的陆上运输工具，以便尽快地将鲜鱼和其他水产品运输到外地去。

伊朗的铁路运输虽然在不断发展，可是还需要增加运输鱼类用的冷藏车厢。在所有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都将修建大型的冷藏库，用以贮存水产品和其他易腐食品。

今后我们要更加充分地开发和利用伊朗的海洋资源，譬如打捞珍珠和可作牲畜饲料用的海藻，开采海底石油——后面有一章专门谈及此事——和其他海产等。

最近有一种水产品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是一种用鱼干制成的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联合国粮农组织”和“教科文组织”已批准它为消费品。这种鱼粉是用极便宜的碎鱼制成的，它没有鱼腥味，运输方便，适于保存，对贫苦人说来，乃是可取的食物。

话说回来，应该指出，虽然我们在大力开发和利用国家的森林和海洋资源，但我国的农业仍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它的发展条件比起其他的收入源泉来更加充分。为了取得农业的发展，我认为首要的工作是改革土地所有制。

目前伊朗全国的耕地分别属于地主、宗教慈善机构、国家、王室和小土地所有者，后者亲自从事农业生产。

地主占有的土地相当于伊朗全部耕地面积的一半左

右。对伊朗的地主发表笼统的看法是不适宜的，因为他们拥有的土地面积大小不一，在履行义务和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方面表现好坏也各不相同。但可以说，为数不足三十人的大地主，其中包括一些部落酋长，确实每人拥有一至四十甚至更多的波尔切^①土地。

大地主们一般不住在自己的庄园里，他们对土地的经营漠不关心，也无意改善庄园里种田人的生活。他们将地产交给自己的代理人去管理，这些代理人便乘地主老爷在德黑兰、欧洲或者美国寻欢作乐之机，肆意胡作非为，残酷无情地欺压农民，搜刮民脂民膏。

当然，作为例外，也有极个别的大地主能尽到自己的社会职责，但总的看来，这个阶级是社会的寄生虫。正如下面将要谈到的，他们花天酒地、作威作福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在大地主阶级之外，还有一般地主，他们每人拥有一个或几个村庄，大都同农民一起住在自己的农庄里。虽说有些一般地主非常吝啬和自私自利，但其大多数对于改善农民及其家庭的生活状况还是相当热心的，并能自愿地为修建学校、医院和清真寺捐献土地。伊朗繁荣富足的村庄多属于这些小地主。

我手头没有关于宗教慈善机构拥有的土地面积的准确数字，据估计全国约有百分之二十的可耕地归宗教慈善界世袭所有。这些土地的经营管理权大都操在宗教人士手中，但政府有权监督他们的工作。宗教首领一般指

① 波尔切：伊朗计算土地单位，面积很大，具体内容不详。——译者

定专人负责管理他们的地产，这些被指定的代理人大部分都是正直而善良的，但也有超越职权范围，滥用权力的事。

国家和王室的专有地加起来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国家专有地是在几百年当中，通过征购、没收、军事占领和接受馈赠等方式，或者由于土地无主而收归国有的那些村庄和耕地。这部分土地由农民耕种，国家可算是名义上的“地主”。国有土地经营管理不善，种田的农民的生活并不比大地主庄园的农民生活好些。

国家通过代理人征收的地租与地主的地租别无二致。有时国家将专有地租赁出去，这些租户则负责向农民征收地租。这种作法对农民极端不利，因为国有土地的租户对改良土地毫无兴趣，他们孜孜以求的只是个人私利。确保国家和农民真正利益的最好方法，是将这些专用地分配给小土地所有者。

王室的地产是我父亲购买的那些村庄，纯属我个人所有，现在由“巴列维基金会”负责管理。正如前一章所说，该土地的收入全部用于慈善和公共福利事业，为此正在实行一个广泛的计划，下面将会谈到。其余的耕地约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属于小土地所有者。他们或者耕种村庄周围的几块地，或者占有一个或几个村庄，从事农田耕作。随着土地分配计划的实施，这种小土地所有者的数量必将日益增加。

如前所述，从学生时代起，我就对伊朗农民的悲惨境遇深感焦虑，几乎每天都要考虑如何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这种想法日甚一日，终于在先王亡命国外之后，我决

定将自己的全部地产转交给政府。

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政府在经营这部分田地时能注意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为此，我规定将这部分土地收入用于慈善事业和为一般农民谋福利。

但不久我得到报告说，政府竟将土地收入当作了支付国家工作人员的薪金，甚至连一个里亚尔也未用在慈善事业上。经过一番考虑后，我决定收回这份地产，并以简单易行的手续出售给在当地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

光有善良的愿望并不一定能达到良好的结果。我知道，假如单是将土地分配给农民，那么他们的生活状况会更加恶化。使一个小土地所有者、即一个普通农民成功的条件在于，既要资助他，又要给他以农业技术指导。基于上述考虑，我决定用向农民出售王室土地所得的资金开设一家银行，以便能向刚获得土地的农民提供贷款和其他必要的援助。

我于一九五一年公布了有关分配出售王室所有的两千多个村庄的政令，又于一九五二年成立了“农业互助和开发银行”，简称“开发银行”。同年在德黑兰南部的瓦腊敏开始分配“巴列维基金会”管辖的田庄。正如我在第五章里指出的，这项措施实行后不久，土地分配计划便受到摩萨台的阻挠和破坏。他下台后，该计划又继续执行，到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便有二十万公顷的耕地分配给两万五千个农民。

据我所知，在一个国家里实行土地分配计划，并用出售土地所得的资金创办开发银行，以便向刚获得土地的

农民提供有力的财经支持，这还是第一次。这种别出心裁的作法，使某些人产生了误解，以为这样做是为了高价出售贫瘠薄收的瘦地。有人竟然错误地认为成立“开发银行”主要是为了牟取利息。还有些鼠目寸光的庸人，对我采取的行动满腹狐疑，觉得这事来得蹊跷，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对于在伊朗分配土地的设想与众不同，有些别致，因此，有必要进行全面细致的阐述。

实行土地分配计划的第一步是将大片的王室土地划分为若干小块，划分的标准是从农业经济角度看适于经营管理为宜，就是说，这块地的收获量要能够养活一个农民及其家庭。每块地的价格由内行的鉴定人加以确定，一般说确定的价格要比市场价格低。这些小块地只准向当地种田的农民出售，严禁卖给地主和投机商。

应该强调指出这一点，即我实行土地分配计划的目的是，绝不是把自己的土地免费赠送给农民，因为从心理学和因果关系来看，那样做效果并不一定好。

不是馈赠耕地，而是以低于市价百分之二十的价格向农民出售。购买土地的农民采取分期付款的方法，每年向“开发银行”缴纳部分购买金，在二十五年内全部交清。银行为保证必要的营业费，在头十五年里每年按百分之一的利息收取信托费。

“开发银行”原是一个不谋盈利的信贷机构，它的本金为九千七百五十万里亚尔，其中半数款项业已筹备齐全。虽然我本人也向这个银行投了资，但不论是我，还是

其他向银行投资的人，都不企求任何利息。

每年从土地购买者那里征收的分期付款的金额和银行取得的信托费，都使银行的资本积累增多，使它越发具备了向获得土地的农民提供援助的条件。我原来设想的“开发银行”是一个纯粹社会服务性的信贷机构，它和一般的银行不同，并不从事存款、贷款等信用活动。因此，在它营业的头几年必然蒙受巨大损失。为弥补损失和增强银行帮助农民的财力起见，该银行从一九五七年发始展开信贷活动。目前银行接受存款，开设往来账目，发放一般的贷款。这种做法使银行赢利颇大，它不仅弥补了初期的亏损，还增加了直接向农民提供的贷款数量。

到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巴列维家族的耕地已有三分之一左右分摊给小土地所有者。两年后，余下的王室田产中适于耕作的一半也将分配给农民。与此同时，还要采取措施，使另外上千公顷的王家土地变成可耕地，以便将来进行分配。

当然，土地分配的速度应和“开发银行”向农民提供贷款的能力和条件相适应。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假如不向刚获得土地的农民提供必要的农具，使他们能尽最大可能地利用地力，那么分配土地就只能给他们带来困难和烦恼。

在“开发银行”向农民提供的各项援助中，最重要的是在我监督下向农民发放的贷款。到目前为止，这家银行向新的小土地所有者提供的贷款数量还不够多。除了向农民提供对他们间接有利的贷款之外，该银行还出钱

成立了许多“农民互助社”，为农民获得贷款和其他援助创造了新的便利条件。

“开发银行”购买了大量的拖拉机和康拜因，挖掘了很多深水井，还选派了一百多名农村青年到德国去学习农业新技术。最近，一个名叫沙赫阿巴德的新村在离萨里市十一公里远的地方出现了，它是在“巴列维基金会”的资助下由当地农民及其家属建立的。村子里的每个农民家庭都住上了新房。

“开发银行”还另盖了一百二十间小房，可供租用。

我们在已经分配出去的村庄里开设了数百个成年扫盲班。内政部开发局向那里派出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官员，充任村长，以便更好地开发农村，完成诸如兴办学校、修筑公路、增添卫生设备、教育农民讲究卫生和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等工作。

所有这些措施只不过是个开端而已，然而从这个良好的开端里已可看出充满希望的未来。倡导新风气、采用新式农具和学习新的耕作方法等因素，使新获得土地的农民生产劲头十足，产量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左右，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我分配王室土地的计划是英明而正确的。此外，我认为这项土地分配计划不仅增加了农业产量，而且在开发农村方面为人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显示出它的伟大生命力。

这个计划的实施证明，在伊朗完全可以为农民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生活乐园，在这个生活乐园里，农民及其家眷感到幸福愉快，他们奋发工作，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改革伊朗土地所有制现状的第二个积极步骤，是分配国家所有的耕地，并向由于分得土地而进入小土地所有者行列的农民提供生产工具和经济援助。分配国有土地的法令于一九五五年获得议会批准和我的签署，但因这些土地从未进行过准确而细致的丈量，以致拖延了法令的执行。为了加快土地分配的步伐，我于一九五八年下令军队协助当地的官员进行土地测量，同年底遂开始分配国有土地。按照分配王室土地时规定的方法，地主和投机商无权购置上述耕地，只有在小块土地上从事耕作的农民才拥有这种权利。

出售国有土地也象出售王室土地那样手续极其简便，购地的钱在二十五年内付清，每年只缴纳一部分。“农业银行”通过向农民提供贷款和成立“农民互助社”承担顺利执行该项计划的主要责任。贯彻这项法令后，预计将有十万农户可以分到国有土地。

如前所说，地主约占有全国可耕地的一半，因此，我们所进行的农业改革主要是针对他们的。这正是伊朗土地所有制改革第三阶段的内容。几年前，若和地主们谈及大量分配土地的事，他们会火冒三丈，怒不可遏。但近来大部分地主觉察到他们占有的土地太多，为无可争辩的社会正义原则所不容，难以持久地保持下去。另外，在伊朗因投资已有了新的门路，所以不再有人象过去那样迷恋于拥有几个波尔切的大片土地。即使有人成了新地主，他也得不到过去那种高额利润、显赫地位和种种特权。因为多数大地主经营管理农田的方法陈旧而落后，

所以为了广泛采用新式农具他们就必须在自己的土地上花费大量的资金。可是地主们注意到，若向迅速发展的伊朗工商业投资，将会获得更多的利润。相比之下后者显然更为有利可图。我之所以分配出售王室和国有土地，不仅是为了使农民有田种，从而得到收益，也是为了给大地主们做出榜样。此法果然有效，有些大地主真的产生了愿意出售土地的想法。

勿庸置疑，单凭示范是改变不了所有大地主的思想的，在这方面还需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

为此我们制定了一项法令，根据这项法令，对个人或某个有共同利益的集团所拥有的耕地面积加以限制，多余的土地必须出售。政府在土地买卖中充当经纪人，就是说由政府购买某地主的大片土地，然后分成小块，以简便的手续向农民出售。政府也可能不付现钱，而将国营工厂的股份转让给地主，以使用这种方法减轻给国家带来的经济压力，同时还可以加速国营工厂向私营企业的转变。

目前伊朗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都在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我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为数甚少的大地主以老爷自居，任意摆布成千上万的农民——他们大都过着贫穷如洗的生活。正因为如此，除了分配出售王室和国家土地而外，我们还计划分配出售地主拥有的大量土地。购买土地的公道价钱是要支付的，但出售土地的这种作法则是不能改变的。大地主们虽然富有，但为数有限，他们知道与大多数国民的愿望相违抗是徒劳无益的。

为了改善伊朗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发展农业生产，我们要做的第二件大事是开展农业教育。后面将专门谈论教育问题，这里仅叙述与耕作技术有关的教育问题。毋庸置疑，从地主的桎梏下解放农民是适时而必要的，但一个自食其力的农民必须通晓农田管理的方法。随着伊朗农业逐渐地采用新机械和新技术，就要求农民必须学会使用和管理农业机器。总之，我国农民应当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做到熟习农业技术和田间管理事项。

有鉴于此，我们特别重视在伊朗开展农业教育。目前德黑兰大学所属的卡腊季农学院约有五百名学生，正在为掌握农业新技术而发奋学习，四年内他们要学完根据新的教学大纲制定的全部课程。该学院建立在离德黑兰四十公里远的一个风景秀丽、空气清新的地方，目前正在扩建。它将来能容纳一千名大学生，并全面开展农业科学研究和实践活动。除卡腊季农学院外，设拉子农学院也在从事农业技术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得到不断的扩充和发展。

目前我国有十二所农业专科学校和近二百所农业小学，后者在五、六年级时向学生和农民子女教授农活。我希望能伊朗普及初级和中等农业教育，大量开办农业技术学校，使农业劳动者不论年龄大小、学历深浅皆能学会新的耕作方法、农业技术和田间管理。毋庸置疑，通过这种作法，即使不识字的农民也能把地种得更好。我们将通过电视教学这种崭新的方法实现上述愿望。

然而，光有这项农业教育措施还不够，农民们还应该

学会从事集体劳动和互助合作。他们要在制定并实行农业开发计划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中彼此携起手来。完成这个任务需要领导，因为无论在哪里进行集体劳动，都要有领导人加以组织才能成功。互助和遵守纪律也是成功的重要条件。农民们应该在集体劳动中为公共利益着想，而放弃个人的私欲。

为了普及农业技术教育、加强领导和使农民熟悉集体劳动，需要采取许多措施和进行大量的工作。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做好互相合作的充分准备。一九五六年议会批准了关于成立“农村委员会”的法令，法令中指出该委员会是民间组织，并规定地主必须将其收入的百分之五缴纳给“农村委员会”；此外，委员会还有借贷权利。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有些大地主拒不履行法令为他们规定的义务，就象他们拒不缴纳收入税一样，对这个“百分之五”也置若罔闻。

然而，大多数地主还是尊重这项法令的，特别是那些住在庄园里的地主对这项有利于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的法令均表示赞助与支持。

负责执行该项法令的“开发局”约在二万个村庄组织了“农村委员会”，使数百名农民学会了农业管理技术，并实施了上千项地方开发计划，协助建立了数百个“农民互助社”。

“开发局”虽然作出极大的努力，采取了各种措施，但事情的进展并不理想，仍浮于表面。为国家的前途考虑，我认为最切实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将“开发局”现有的微不

足道的预算开支断然增加十倍。在伊朗农村，勤劳健壮的农民无不诚心诚意地接受根据民主原则而进行的生产指导，他们具有经营管理农业的才干，只是大都没有受过应有的教育和训练。可以说，农民们聪明才智的增长和提高将取决于有关农业生产的技术教育的普及。

我国各地农民要实现本地区的农业改革计划，必须因地制宜，创造条件；同时也需要各级政府机关的协助和提供技术指导。农民们为了筹备发展农业所必需的物资和生产工具，需要资金和贷款，而根据有关成立“农村委员会”法令的规定，农民们的要求是可以得到满足的，尽管根据法令提供的款项目前还十分有限。经验表明，一旦改革农村和发展农业所必需的物资和生产工具充分地予以供应，农民们便能出色地担负起诸如修公路、筑堤坝、盖浴室、架桥梁、办学校、开诊所、修建清真寺、挖掘水井和兴建专业作坊等工作。他们可以利用农活比较少的空闲季节完成上述任务。我们一九六〇年的原定指标是建立五百个“农民互助社”，目前已超额完成这个数字。这些互助社大都是信贷互助社，一般由二百至六百个社员组成。有的互助社还负责保管社员的储蓄金、分发化学肥料和其他农药，以及为农产品寻找销售市场等。有些互助社经营有方，其社员获利非浅；有些互助社则工作一般或者较差。总之，互助社办得好坏取决于社领导的水平和技术才能。由此看来，农业管理和技术教育的意义和必要性是十分明显的。

我坚信，伊朗将象印度和其他民主国家一样，随着农

民们自力更生精神的发扬光大，其生活定会得到显著的改善。正是这种愿望激励着农民们在创造自己未来的事业中艰苦奋斗；他们确信，一个繁荣富强、光辉灿烂的生活前景必将展现在眼前。

我们始终应该看到，修筑水坝、敷设铁路、建设港口等诸如此类的开发计划，虽然对于国家的繁荣和进步说来是非常必要的和有益的，但对于农民生活的改善却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在这方面，那些小村镇里付诸实施的小型建设项目却明显地包含着农民们的切身利益。

发展我国农业经济所迫切需要做的第三件大事，是以公平合理的条件向农民提供贷款。在过去，农民生活困难，为了养家糊口只好向地主借钱，打下粮食后再以实物偿还。

实际上，地主放债的年息高得惊人，一般是百分之五十，农民根本无力偿还，便永远成为地主的欠债人。个别农民本来有小块田地或耕畜之类，但为了还债，只好将田地和耕畜抵押给地主。

应该说，“开发银行”和“农业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这种可悲的状况。譬如“开发银行”在向分得王室土地的农民发放贷款时，就做到了既保持盈利，又不牟取暴利。它规定了很低的年息，这应该成为其他银行学习的楷模。农民若是直接从“开发银行”借贷，贷款的年息为百分之六，若是从“互助信贷社”借贷，则为百分之九。

“农业银行”在全国各地都设有分行。这些分行无需

征得总行的同意即可发放小笔贷款。“农业银行”还通过成立“信贷社”向农民提供大量贷款。此外，“开发银行”和“农业银行”还在全国推广发放农业贷款的新方法，使得地主和农民都称赞这两家银行发放的农业贷款年息十分公平。这两家银行的信贷活动使旧日高利贷者盘剥农民的真相暴露无遗。这两家银行促使我国的农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但是应该指出，目前我国小土地所有者所得到的贷款离满足他们的全部需要还相差甚远。随着获得王室土地的农民数量的增多，“开发银行”必须增加其发放贷款的数量，才能保证土地分配计划的成功。同样，国家专有地和地主土地分配得越多，“农业银行”越要扩大自己的营业范围。目前“农业银行”向农民提供的小笔贷款数量已经十分可观了，但还没有超过这家银行过去向地主提供的贷款数量。过去的地主其实并不真正需要贷款，他们经常把借来的钱用在与农业毫不相干的事情上。

伊朗私营银行数量的增多，对活跃国家的信贷业将有促进作用。我认为它们不必象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的私营银行那样，置身于农业信贷活动之外。当然，国家应该带头发放小笔的农业贷款。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发放贷款毫无必要，即使未因拖欠和拒不付债而蒙受损失，也应该废止的看法。每一笔贷款，不论数量多少，其手续和办公费用都是一样的。当我们以很低的利息向农民发放小笔贷款时，若想营利或者至少不赔本，恐怕是不太可

能的。

我这样讲并不是主张可以拒不偿还债务。在我看来，只要债户用钱的目的的是为社会服务的话，即使未能按期还债，政府仍然应该向他发放贷款。这种作法在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乃是屡见不鲜的。

我国农业所迫切需要做的第四件大事是解决水源。因为伊朗几乎被描绘成一个干燥缺水的国家，故保障水源乃是人们关心的大问题。

我国的水力资源主要是山区的积雪。积雪溶化的水量之多，超出了我们的需要。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事实确是如此。我国的平原地和山坡地便是靠雨水和溶雪进行灌溉的。多数河流的发源地和有长年积雪的山区，大都在我国境内。这种情况与某些国家不同，比如埃及，它所需要的水是由尼罗河提供的，而该河的发源地却在外国，因此不妨说埃及的用水是一项重要的进口。

有两个相互影响的不同因素使我国的水力资源遭到浪费。第一是水土流失，这种现象既是土地干旱的原因，也是必要时缺少用水的结果。因为我国的山区草木稀疏，春季从山上奔泻而下的水流畅通无阻，一泻千里，猛烈地冲刷着山区和平原的土地，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此外，对牧场和草地的管理不善，以及对森林树木的随意砍伐，更加重了这种水土流失现象，致使我国的水力资源不能尽其所用。

第二是土地的盐碱化。大家知道，雨水在流过农田时，便和地面的盐分混合，然后渗透到地里去。多数土壤

里本来就含有盐分,假如田里的水过多,又没有做好排水工作,那么地下的盐分就会增加,损害农作物的生长。如此形成的盐渍土,使世界上某些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和伊朗的部分耕地变得不适于种植。改造盐碱地,使之再次适于种植的方法是,让一定量的水从耕地的一端流入,冲洗地面的盐分,然后再从另一端流走。为了提高效率,可在放水前先犁一遍地或采用其他类似的办法。平整土地并不比灌溉土地省事,但这是完全必要的措施。我国的土壤颗粒间隙较大,只须简单地加以平整,收效就会很大。依我看,关键在于采用正确的灌溉方法,科学的灌溉方法既可避免土壤的盐碱化,又可使因管理不善变“瘦”的农田得到改良。

总之,伊朗并不缺少农业用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适量的水及时地送到地里去。克服这方面的困难有许多办法:

第一——植树造林,并注意保护,以免遭到人畜的破坏。用这种方法可减少水土的流失。

第二——修筑河坝,以防止季节性的洪水泛滥,造成水土流失;并可贮备必要的灌溉用水。

第三——修复、扩建和浚通地下灌溉网——我国的一种特殊灌溉系统——使山区的流水通过地下水渠流进农田。目前我国百分之八十的山区流水是通过地下灌溉网灌溉农田的。

第四——挖掘水井,特别是深水井,用电动水泵或柴油机水泵抽水浇地。

第五——尽量防止河水的蒸发和浪费，不输送过量的水浇灌农田。

第六——改进和完善平整土地的方法，以免土壤密度变大，容易形成盐渍土。

第七——广泛种植草本植物和蔬菜，诸如苜蓿、棉花、甜菜、龙须菜、芹菜、菠菜、各种草类，以及伊朗著名的甜瓜、哈密瓜等等，它们在盐碱地也能生长。

第八——用科学方法将咸水变成淡水，用以灌溉农田。

第九——适当改变用水的比例，以增加土地的产量，下面我将详细地阐述这个问题。

上述九项措施虽然在我国多少已付诸实行，但均不理想，离我为伊朗农业的未来所设想的指标还相差很远。

目前农业部森林局为复兴和发展林业制定和实行了广泛的计划。在采用农业机械的地区，农民们对保护和管理农田十分重视。

在第七章，我曾谈到一些正在施工的大型水利建设项目。“开发银行”、“农业银行”和“计划组织”为修复地下灌溉网、挖掘水井和安装水泵提供了大量贷款，并与农业部合作，共同承担起对农民的技术指导。农业部还在采用新式灌溉方法、平整土地和种植适于盐碱地的农作物等方面给农民以指导，并把有关这方面的科研工作与卡腊季农学院的科研工作密切结合起来。

改变咸水为淡水的问题，引起很多国家的关注。一九五八年在德黑兰大学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就

此问题和干旱地区的土地问题从科学上和技术上进行了探讨。目前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酋长国、科威特和卡塔尔的一些大城市采用蒸馏咸水的方法，每天可生产大量的淡水。这些水淡得出奇，以至不得不加进些盐，才能使之与自然界的淡水味道相同。

我认为变咸水为淡水是一项十分必要的事情，今后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科研工作。在象伊朗这样的国家里，人造淡水将作为农业等方面的用水得到广泛的使用。

现在就来谈谈，克服农田缺水和增加农业产量的最重要措施是什么。在我看来，问题的答案是推广新的农作物种植法，这乃是我国农业迫切需要办理的第五件大事。我想只要略微改进一下耕作方法，便能够显著地增加我国的农业产量。

我国现有的耕地面积只占全部可耕地的三分之一，这些耕地从不施厩肥和化肥。在伊朗象在某些亚洲国家那样，牲畜的粪便至今仍被用作燃料，而不当农田肥料使用。农民使用的农具是用木头和铁做成的。耕犁多是木制的，仅顶端铸之以铁，或者是铁把木尖犁，用毛驴拉着耕地；在里海和波斯湾沿岸，耕地时则以水牛代替毛驴。农民种田和收割庄稼完全是用手。为了把麦粒和麦秸分开，通常是在村边开辟一块场地，将麦秸撒在上面，然后赶着牲口在场上跑，把麦粒打下来。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必须实行彻底的变革。问题是采取什么新方法来代替它呢？又怎样才能促使千百万大都是文盲的农民摆脱他们祖传的习惯作法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对伊朗的农业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譬如，应当弄清楚，为什么每年有三分之二的耕地要以轮作为名弃之不用呢？究其原因，部分是因为缺水，但主要是因为土壤里缺少氮肥。农民犁了地，也不种植，一搁两三年，任其自流，不加过问，想让地里长的杂草腐败烂掉，变成农作物所需要的肥料。这种轮作方法极为有害，特别是造成时间的浪费。实际上，耕地废置不用，土壤里的水分和氮肥被杂草吸收，耕地越发变得贫瘠了。

克服这种浪费时间和地力的最好方法是使用农田肥料。尤其是化肥，不仅能迅速给土壤以必要的氮肥，而且能增加土壤的其他必要成分，如硫磺等。我国农民过去不了解硫磺的性质和用途，也无钱购买化肥；他们从未用过石油作燃料，而只知道烧牲畜的粪便。只要使用农田肥料，并按照季节进行适当的耕作，就无须乎再采用废置耕地的轮作制。这样，在充分浇水之后，每公顷农田的收获量将会大幅度地提高。

在伊朗的现有条件下进行的初步试验表明：假如在种植稻谷时，向田里施足肥料，其产量将增加百分之五十。有鉴于此，我国已开始生产化肥，廉价地供应农民。小土地所有者以现金或者以简便的手续从互助社借钱购买。我坚信，一定可以使伊朗农民了解使用化肥的好处，并掌握使用它的方法。

此外，假如用正确的方法使农田作好播种和种植的准备，也可以显著地提高产量。譬如种植棉花和甜菜需

要垄作。又如耕地时若用新式犁代替老式犁，便可提高产量百分之二十五。耕地之后，若使农田作好播种的准备，那么提高产量的幅度就会更大。

此外，农民现在是用手在平整得不好的田里撒种，这种播种方法使用的种子量，是用播种机在平整好的土地上播种所用的种子量的三倍。只要采取新式的播种方法，每年即可节省约二十万吨小麦种和七万五千吨大麦种。日本专家实验的结果表明，在伊朗假如稻田平整得好，有充足的肥料，又采用新式播种方法，稻米的产量可轻而易举地提高两倍。

此外，还可采用两项措施节约目前的农田用水：第一，是用农业机械平整土地，这样既可以减少水量的蒸发，又能提高农田的产量。换句话说，就是用较少的水，获得较多的收成。用这种方法节约下来的水，可用来灌溉那些由于缺水而置之不用的田地。第二，是采用新式农具耕种旱田，也能减少用水量。

早在几千年前，我国农民就懂得种植旱田了，但是用新式农具种植旱田却是另一回事。我们可以采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在比较干旱缺水的地区使用的那种农业机械，来耕种我国面积广大的旱田。种植一望无垠的旱田需要大量的水，也需要现代化的农业装备。伊朗农民现已开始使用新式农具种植旱田了。目前全国农村约有五千台拖拉机，其数量在日益增多。在较大的省份，特别是阿塞拜疆省、胡泽斯坦省、里海沿岸和德黑兰郊区肥沃的田野上，大型拖拉机、新式耕具、打谷机和其他农业机

械举目皆是。可以说，昔日那种富有东方特色的用木犁耕田的情景在我国农村已不多见了。虽然手工制作的农具还在使用，但其数量日趋减少，正逐渐地为农业机械所代替。

由于地里杂草丛生和各种自然灾害作怪，我国的农业收成每年都蒙受很大损失。譬如，阿塞拜疆省某些地区由于杂草蔓延滋长，造成危害，使当地百分之八十的农作物失收。蝗虫和其他害虫以及植物病等对粮食作物、棉花、蔬菜和水果的损害也很严重，尽管我们采取了防治这类灾害的措施，但做得还很不够，有待今后加倍努力。不注意选种是我国农业产量低的又一个原因。很多农民只是将去年节余下来的、并不茁实的种子留做当年播种用，这种不良种子自然不会带来好收成。近来我们在选种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农民们开始重视选择品种不同的良种了。试想在农民面前摆着两块地：一块播的是良种，另一块播的是一般或较差的种子，当他们亲眼看到这两块地收获量的差异时，自然便会理解选种的重要性。因此，增加这种有说服力的试验是十分必要的。选种的原则对培育水果树、阿月浑子果树和扁桃树等也同样适用。过去几百年中，伊朗在种植果树方面久负盛名，然而在园艺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伊朗的果木培植技术却显得落后了。它在种植果木的品种、使用肥料和喷撒药物等方面，均落于人后，以致每年要多损失成千上万吨的鲜果。伊朗虽然出产大量上等水果，但仍供不应求。市场上时常可以看到进口的

苹果和其他水果，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

我国的家畜品种优良而纯正。比如伊朗的肥尾羊，肉味香，毛细长，编织贵重而精致的地毯所用的就是这种羊毛。经过精心培育获得的这种品种优良的羊，使其他国家的羊相形见绌，逐渐地被淘汰。

当然，我们也应该饲养外国培育的优良家畜和家禽。目前我们大量饲养瑞士特产的咖啡色乳牛，并日益增加美国鸡、特别是那种红种鸡的购买量，这种鸡下的蛋比伊朗鸡蛋大得多。不言而喻，饲养这种鸡对我国农民更为有利可图。我们还应该逐渐采用机器来喂养家畜和家禽。我国农民应当了解种植大麦、黑麦、尤其是紫苜蓿的重要性，后者既有助于防止水土流失，又可用作牲畜的精良饲料。我们现已建立了设备优良的现代化兽医站，并责成它经常派人到全国各地去为牲畜看病。但我们在防治牲畜的疾病方面显然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农业部、文化部、德黑兰大学农业系和兽医系、“巴列维基金会”、“开发银行”、“农业银行”、内政部开发局和商业部统一度量衡管理局（标准规格局）为了发展我国农业，都在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和实际调查。后面我将提到的某些外国企业正在与我们携手合作，为完成这方面的任务而共同努力。

虽然我们进行了上述工作，但不可否认我们所做的努力不可能一下子改变伊朗的农业现状。我们不主张采取强制手段，因此农村里陈旧的传统习惯，特别是农业方面的传统习惯，改变起来就更加需要时间。另外，要解决

有关农业科研的新成果与伊朗特殊的农业环境相结合的问题，则需要进行一系列广泛的科学和技术上的调查与研究。伊朗有几万个村庄，要在全国的农村推广和普及科研成果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可以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农业研究将日益扩大，农业研究项目将逐年增加。

除了在增加产量方面采取措施之外，还应该为贮存粮食选择更好、更现实的方法，这便是我国农业所迫切需要做的第六件大事。在这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修建大型粮仓和各种罐头工厂（在第七章对此已有叙述），以及成立标准规格管理局（它在改进农产品出口工作中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应该说，为了提高我国农村贮存粮食的效能，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

伊朗农业所迫切需要做的第七件大事是，设法在五万个村庄与外界之间建立交通联系。试想一个本来粮食可以自给而略有节余的村庄，若因采用新式农具使其产量增加了两倍，那么除非它将多余的农产品运到市场销售，否则是得不到多少实惠的。假如我国农民因采用科学方法而实现了粮食增产，但由于缺乏运输工具，只好将收割下来打过场的粮食堆放在村子里，任其发霉腐烂，这对国家又有什么益处呢？

在前面我曾谈到为发展伊朗的交通事业所采取的措施，这里顺便提及此事，为的是提醒人们不要忽略发展农村交通运输业的重要性。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伊朗农业所迫切需要做的第八件

大事，即改变农民的生活状况。伊朗农村具有引人入胜的特色，这是尽人皆知的。每当提及它，在我眼前便会展现出一副郊外别墅的图象：四周树木环抱，小溪缓流其中，明暗交织，景色宜人；室内铺着五颜六色的地毯，壁上挂着熠熠发光的青铜器皿；花园里葡萄晶莹、果实累累，浓郁的香气沁人肺腑。老人在溪边小憩，妇女在闲谈家常，孩童在尽情玩耍。

我虽然为农民的贫穷、疾病和愚昧而感到不安，但是应该说，他们很少受到饥饿的威胁。农民生活的单纯朴实向来是他们的一种美德。农村生活自有它的特色。农村的社会基层单位是家庭，村民们的社交活动十分自然，不象城市居民那样矫揉造作。

农民的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做“培植”工作的，他们种植农作物，栽培果木，饲养牲畜和教育孩子。

我国其他行业的人肯定会认为农村的日常生活单调、沉寂而无趣，因为那里的人们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地里度过的。每当日落西山，夜幕降临之际，农民就返回村子。有时也到茶馆去逛逛，便回家上炕休息。清晨，他们随着公鸡的第一声啼鸣而起床。每星期五是礼拜天^①，农民们或者去清真寺聚礼，或者抽着烟袋晒太阳，热天则坐在树下乘凉。不管是谁若谈起天气、收成或者述说他所遇到的困难，或者讲述他去圣地朝拜的经历，旁边的人则会七嘴八舌地加进来，议论一番。妇女们要么

^① 每周星期五是伊斯兰教徒的金曜日，当天中午举行礼拜。——译者

与丈夫一起到地里去干活，要么留在家里作饭、洗衣、照看孩子或织地毯。冬天比较空闲，大部分农村都没什么活计，这时农民生活的车轮就转动得越发缓慢而平稳了。男人们总是泡在茶馆里，妇女和孩子则呆在自己的小屋里。

这种生活方式使农民变得有些粗野，我希望他们能享有更多的生活乐趣，变得更加聪慧和具有风度。这样，我国农民就能承担起新时代赋予他们的农业任务，成为民主社会中的先进成员。

关于在我国农村实行公共福利计划如建设发电站、修筑公路、开办学校和增添卫生设施等的重要性，前面已有叙述。采取这类措施，不仅在经济方面对提高农业产量有意义，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对改进农民的生活习惯也有极大的影响。在我国和其他国家进行的初步实验表明，农村有了电，就能彻底改变农民的生活状况；修筑公路，既可迅速地将农产品运到市场，又可加强国民的社会联系；开办学校，对农业增产有直接的影响，并能使农民的思想更加开展，视野更为宽广；增加卫生设备不仅能增强农民的体质，还能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

伊朗的多数农村，都有一台公用收音机。在农村收音机的数量近来还有所增加，对此我可以作证。当我驾驶飞机在祖国的上空飞行时，农舍屋顶上的无数天线时常映入我的眼帘。

发展电力工业会使无线电台的数量得以增加，并减轻农民和他们妻子的繁重体力劳动。他们可以用电动机

来带动磨面机、榨油机、纺织机和木工机械，做到事半功倍。在农村应该广泛地兴建和利用小型发电厂。总之，在农村扩大和普及使用电力对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重大的意义。

随着我国识字的农民人数不断地增加，我希望能在每个村庄，至少在人口较稠密的村庄开设阅览室，让农民看到有益的图书、报纸、杂志、文学作品和科学读物。此外，流动图书馆应该走遍全国每个角落，向人们提供各种书报杂志。在大村庄要鼓励兴建电影院。到过全国很多地区的流动电影队应该深入到边远的村庄去。每个大村庄都要建立少先队组织，并为青年人开办各种类型的俱乐部。我期望“农村委员会”和开发局的官员们带头完成这些社会服务工作，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国千百万农民有许多令人赞美的品德，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凡是与我国农民打过交道的人无不承认，他们禀性聪明而机智，对掌握精密技术和新的科学知识有浓厚的兴趣。我认为，我国城市居民的爱国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最大标志就在于，肯下定决心在这方面帮助农民，使他们能在短时间内做到独立自主地实行农村的技术改革。

在本章我详细地叙述了有关伊朗农业所迫切需要完成的八件大事：土地所有制改革、农业技术教育和指导、以适当的利息提供农业贷款、增加农田的用水量、改善农田的管理、采用科学方法贮存粮食、增加农村的运输工具，以及在全国农村加强智育和体育教育。我希望能阐

明这一点，即我国农业所遇到的难题决不是一团乱麻，而是完全可以理出头绪来的。

我为目前在我国涌现出来的农业改革热潮感到由衷的高兴。然而，光有改革的热情是不够的，还必须付诸行动。每个行动都应当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照正确、合理而全面的计划进行。

我时时刻刻都在为伊朗的农民操心，为他们的前途着想。每当我描述农业的未来时，一幅充满希望、美妙无比和令人神往的图景便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第十章 社会中的伊朗妇女

前不久，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士代表伊朗妇女界参加了在科伦坡举行的亚非妇女代表大会。回国后，她谈到科伦坡一家报纸为迎接大会的召开写了这样一句鼓励妇女的话：

“全世界的妇女们团结起来！请放心，在这种团结中，除了丈夫之外，你们什么也不会失去。”

另一家报纸发表了庆祝大会召开的社论，其中写道：

“到处都是妇女，在议会、政府机关和电视里，在汽车、摩托车的方向盘后面，全可以看到妇女。除了家里，没有妇女不到的地方；除了家务、照料孩子和丈夫，没有妇女不做的事情。”

从妇女的创造力及其特性之间存在的全部矛盾来看，引起世界各地争论的问题便是妇女适合做哪些工作。这个问题在妇女的社会状况发生迅速变化的伊朗，格外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本章我将首先谈及与我共同生活过的几位妇女，然后再叙述伊朗妇女的自由解放和她们所担负的任务。

如果我说，国王应该象普通农民一样享有家庭生活

自由的基本权利，这大概是无可非议的。众所周知，在有些国家人们是无权选择自己的婚姻生活的。值得庆幸的是，文明国家里的私人家庭关系受到普遍尊重，不允许对这种权利进行任何干涉。我愿意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也遵循这个原则。

正如第四章里指出的，我在瑞士学习的时候，很少有机会与小姐们接触。我的监护人根据自己的见解和修养，或者按照我父亲的指令，严格禁止我同妇女来往。

当我从欧洲回国后，在军官学校学习的后期，我已故的父王陛下有意为我挑选一位“门当户对”的妻子。父亲之所以有这样的念头，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他想为我娶一位出身显贵的国王女儿；二是他想使伊朗宫廷与另一个国家的王室结成姻缘，使我国同某个友邻国家的关系更加牢靠。

当时我父亲看到了芙吉亚公主的照片，感到满意，遂以他特有的坦率和爽利（这种个性对解决技术性问题要比解决与内在感情有关的事情更适宜些），开始探听这位漂亮公主的情况。我父亲在了解了她的家族出身之后，便指令伊朗驻开罗大使就有关事宜同埃及政府进行洽商。埃及政府立即去征求王室家族的意见，询问是否同意把芙吉亚公主嫁给伊朗王子。这件事很快就办成了。但直到一九三八年发表订婚消息时，我才得知事情的经过。因为我沒有见过未婚妻，不知道她的相貌如何，所以父亲安排我到埃及去一趟，住上两个礼拜，以便认识一下芙吉亚公主。在这期间，有关这次婚姻所涉及的法律上的

各种问题均得到解决，于是我便和芙吉亚公主正式在德黑兰和开罗登记结婚。根据伊朗宪法的规定，伊朗王储的父母必须是纯粹的伊朗人。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父亲想方设法让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根据这项法令芙吉亚公主加入了伊朗国籍。

我们的订婚仪式是在开罗一位尊贵的神职人员的主持下进行的。伊朗王室没有人出席这个仪式，仪式上只有公主的亲属和一些伊朗的达官显贵。订婚仪式之后，公主偕同我返回伊朗。

我们的结婚典礼在德黑兰举行。表面看来仪式虽然极其富丽堂皇，但实际上同在伊朗农村举行的婚礼相差无几。考虑到当时世界各地（包括我国）笼罩着一片令人不安的气氛，所以仪式进行得有些草率匆忙。

婚礼结束之后，我们先在大理石宫、即我父亲用耶兹德的绿色晶莹的大理石修建的那座优雅漂亮的建筑物里度过了一段时间，随后迁居到德黑兰市郊我父亲的一座别墅里，在那里一直住到我本人的市内宫殿建成为止。

婚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蔓延到我国的领土，德黑兰变成了外国军队的大兵营。我父亲被迫逊位，领导国家的重担便落到我的肩上。

应该指出：伊斯兰国家的结婚仪式与西方世界流行的婚礼大致相同，只在婚礼的时间安排上有细微的差别。伊朗的风俗习惯是这样的：从订婚到结婚这段时间拖得比较长，在举行订婚仪式之后，未婚妻和未婚夫通常不住在一起。订婚的时间一般要延续几个月，有时象在西方

流行的那样,也可能拖至两三年。订婚阶段结束之后,还要举行宗教的订婚仪式和结婚登记,然后再举行象在欧洲那样的结婚典礼。在宗教的订婚仪式和结婚典礼之间,一般要经过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在这段时间内未婚夫妻在一起生活是违反传统习惯的。

结婚典礼非常隆重,也很繁琐。在伊朗农村婚礼要持续十天,有乐队和歌手助兴,客人们可以畅怀痛饮。新婚夫妇会得到亲戚朋友送的羊羔、母鸡等各种礼品。婚后新郎和新娘住在男方的家里,假如他们的经济状况允许的话,也可以搬进自己的新居。

我和芙吉亚结婚的时候心绪不佳,不可能尽情地享受家庭生活的欢乐。德黑兰和整个国家的状况不允许我们有进行愉快的新婚旅行的念头。

那时的公共福利事业虽然不象今天这样发达,但我的妻子还是经常参与这类活动。在我和芙吉亚的婚姻中,唯一令人感到快慰的是我可爱的女儿夏赫娜兹公主的诞生,她生于一九四〇年(一九五九年她生了我唯一的外孙女美赫娜兹)。遗憾的是,由于医生们也不知道的原因,芙吉亚公主没能生育一个男孩子。

根据伊朗宪法,王位只能由国王直系的女性后代来继承,因此不仅我的女儿无权获得王位,而且我的三个姐妹也被剥夺了这种权利。宪法还规定,恺加家族的女子所生的男孩也不能继承王位,这样我的一些叔伯兄弟——他们的母亲是恺加家族的后裔——也被剥夺了这种权利。我的一位亲兄弟在一九五四年的一次飞机失事

中十分令人惋惜地遇难丧生了。知道宪法在继承王位方面有这么多的限制，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的顾问们那么重视我的妻子能否生男孩了。或许可以对宪法进行某些修改，但伊朗的社会舆论对于修改和更动宪法里有关王位继承人的条款过去从未同意过，而今也决不会同意。除有宪法规定之外，象我这样的年轻人总还希望能有几个男孩。因此，在医术高超的医生们作了最大努力仍然毫无结果之后，芙吉亚公主便返回埃及，我们决定离婚了。

离婚后，有两年时间我过着独身生活。这期间世界各国热心为男女亲事牵线搭桥的妇女虽然向我推荐了不少的小姐，但我心情沉重，无意马上结婚。直到一九五〇年我听到了索拉亚·埃斯范迪亚尔的名字，了解了有关索拉亚的情况后，我对她产生了好感。此后不久，我委托当时住在英国的姐姐莎姆丝·巴列维公主去伦敦与她相会。我姐姐将索拉亚的良好品德详细地写信告诉我。一九五一年初，索拉亚被正式选为我的未婚妻，成了伊朗未来的王后。

索拉亚的父亲是巴赫蒂亚尔游牧部落的一个大酋长，她母亲是个德国人。早先伊朗的游牧部落称霸一方，欺压掠夺百姓，所以我父亲时期曾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将其置于中央政府的监督之下。因此部落酋长和可汗失去了昔日的威风，有些以劫掠和叛乱而臭名昭著的酋长和可汗全被关进首都的监狱。但是，这些酋长和可汗在管理本部落的内部事务方面仍享有威望，而且他们大都拥

有富足的村庄和大批的牲畜。大部分游牧部落的酋长（包括他们的一些女人）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们多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去深造。

索拉亚的父亲埃斯范迪亚尔先生在青春华茂的青年时代曾留学德国，在那里结识了自己现在的妻子，并和她成了婚。据我记忆，这位妇女的父亲是德国人，沙皇时期他在俄国开办了几年工厂，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返回祖国。后来，埃斯范迪亚尔和妻子一起来到伊朗，定居在伊斯法罕省的首府。巴赫蒂亚尔人自古以来就认为这个省是他们的故乡。埃斯范迪亚尔夫妇的第一个孩子便是我当时的未婚妻索拉亚，她于一九三二年出生于伊斯法罕。几年后，他们又生了个男孩。埃斯范迪亚尔夫妇虽然将索拉亚送到伊斯法罕的德国小学读书，在家里也总是跟她用德语讲话，但她度过的童年时期与其他伊朗小姑娘的童年时期并没有什么两样。

在伊朗的大城市当中，伊斯法罕是最能体现古代伊朗风度的城市。年轻的索拉亚就在这座遍布着伊朗几百年文化遗迹的城市度过了自己的中学时代。她的父母曾先后几次带她到欧洲去，但给她印象最深的，还是在伊斯法罕的居住情景，以及她跟随父亲和其他部落成员在转移游牧地时走过许多村落的旅行。后来，父母送索拉亚到瑞士——我父亲曾派我去学习的那个国家——去深造，她在那里刻苦学习了两年时间。索拉亚熟练地掌握了波斯语、德语和法语，还懂点英语。为了把英语学得更好，她决定一九五〇年夏天到英国去住，就在这个时候，

我姐姐会见了她。相见之后,索拉亚返回伊朗,我们订婚的消息就宣布了。本来我们打算尽快地举行婚礼,可是不巧,我年轻貌美的未婚妻突然患了伤寒病,而且病势一天天地加重,使大家极为不安,不得已我只好同意推迟婚礼。待她病愈康复后,我们在同一天举行了十分简单的订婚仪式和结婚典礼。可怜的索拉亚是那樣的虚弱无力,甚至连自己的新娘嫁衣都提不起来,在订婚仪式上差点儿晕倒。

一九五一年初,我和新娘住在冬宫。在伊朗沒有度蜜月(这是欧洲人的用词)的习惯。伊朗人的作法是,新娘的亲属将她送到新郎家,就算万事大吉了。而我和索拉亚熟习文明世界的生活方式,都想进行一次短暂的蜜月旅行。可是命运的安排,打消了我们旅行的念头。国家的政局动荡不稳,哪里还有心思度蜜月呢。

正如第五章里谈到的,我们结婚之后沒几天,当时的首相拉兹马拉即遭刺杀身亡,摩萨台上台独揽大权,外国军队威胁着伊朗的安全。如前所述,非但蜜月旅行沒有成行,政局的恶化还迫使我和妻子不得不离开伊朗,出走巴格达和罗马。值得庆幸的是,这次出走粉碎了妄图拥抱新娘王后的摩萨台一伙的美梦。在我们婚后两年半进行的这次短暂的外出中,伊朗的爱国人民目睹了摩萨台政策的恶果,奋起推翻了摩萨台政府。

应该说,我们婚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国家形势的动荡不安对我们的新婚生活影响很大。显然,那些日子对于我和我的妻子、对于全体伊朗人民不会是称心如意的。起初,

大家都希望摩萨台能采取积极的政策，可是与我们的愿望相反，每月呈送给我的全是有关他推行消极虚无主义政策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的报告，这使我越发心神不安。国家经济和社会事业一蹋糊涂，人民悲观失望，惶惶然不可终日，各种危险组织渗透到政府机构中来，几乎控制了整个国家。特别令我焦虑的是，为了等待时机进行反击，我必须忍耐再忍耐。从全国各地不时地传来告急的电报，我密切地注视着危及我国安全的事态的发展。这时，我父亲传授给我的那种善于审时度势、当机立断的品质发挥了作用。我知道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倘若贸然过早地采取行动，那无疑是宣告正在走向毁灭的国家的死刑。

我知道，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和少数人的帮助是无济于事的。为了赢得面前这场斗争的胜利，必须争取全体伊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而为了使人民了解威胁着他们的真正危险，为了唤起人民排解这种危险的极大热情，则需要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月复一月地过去了，我看到在危及国家安全的活动的另一面，反对它的力量也在日益发展壮大，在真主的公正的天秤上，伊朗生存的砝码越来越有分量。一方面国家形势日趋恶化，确有亡国的危险；另一方面人民对我更加忠诚，他们与腐朽力量的一场对抗和冲突迫在眉睫。形势的不断激化，使我心潮起伏，思绪万端。据我观察，形势可能还会恶化，但拯救国家的时机也在日益成熟。一股强大的人民力量超过了危及我国命运的反动力量，正因为如此我才感到大有希望，越发

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毋庸置疑，我个人的命运也为这种逐渐壮大和成熟的力量所左右。我有责任履行永恒的真主赋予我的使命，但不能光是这样想，还要下定决心，大胆地采取行动。世界上有些君主和统治者将一切都寄托于命运的安排，自己则沉溺于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之中，这种处世态度为我所不取。因为第一，这种狂饮暴食会伤害肠胃，第二，我认为一个人若没有坚定的信念和积极的行动，那就无权期待真主的帮助。真主决不会赐福于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一个人仅仅笃信真主的意志和神意的安排是不够的，还应该在生活中为实现永恒真主的愿望而奋斗，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具体说到我自己，就应该设法解决伊朗的政治危机，以便重建国家经济，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

索拉亚王后对政治并不怎么热心，她所想的是能成为我生活的良好伴侣。伊朗政局恢复稳定之后，我同索拉亚有幸进行了几次出国访问。如前所述，一九五六年我们一起正式访问了苏联，在访问中，赫鲁晓夫先生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盛情款待了我们。此外，我们还访问了美国、印度、西班牙、土耳其、黎巴嫩等国。这些访问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巩固和加强与友好国家的关系，但同时也可算是我们期待了很久的蜜月旅行。

索拉亚同所有的家庭主妇一样，对房间的摆设和布置十分讲究。我们的市内王宫在我看来已经尽善尽美了，然而她还是不称心，想按照自己的心愿，重新加以布

置。她并不是要破费巨款，购置什么奢华珍贵的家什，她只是希望一切都干净整齐、舒适宜人。她的这种兴致同样表现在夏宫的修饰方面。在我们婚后的七年生活中，索拉亚对社会服务事业的兴趣与日俱增。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她视察了一家设备陈旧的教养院，那里孤儿们无人照料的悲惨状况深深地触动了她的心。回来后她眼泪汪汪地恳求我，立即采取措施改善那家教养院孤儿们的境遇。我当即指令“巴列维基金会”的负责人去接管这家教养院，重新加以修建。我还委托“巴列维基金会”的所属机构“索拉亚慈善协会”负责监管这家教养院。这样做了之后，效果很好，在很短的时间内，教养院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便得到了显著的改善。由此可见，我同索拉亚的夫妻感情十分融洽。后来当我出于国家的利益不得不同索拉亚离婚时，我们两人悲伤痛苦的心情便可想而知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在我们婚后的这些年里，没有能得到男孩子。而我越来越感到，为了维护伊朗的最高利益，有一个男孩作王位继承人是绝对必要的。有些人出于同情和怜悯劝我说：在人类的生活中，爱情是至高无上的。但我却认为国王的统治职责应该高于一切。最后我的顾问们也同意了我的意见。我和索拉亚终于在一九五九年二月办了离婚手续。

此后，我在德黑兰过着独身生活。虽然我很清楚，假如离婚之后，不去挑选新的王后，那么做这种令人伤心的事就是毫无价值的。可是我的精神状态不允许我匆忙地去这样做。当时人们向我推荐了不少小姐，世界各地的报

纸也就我的婚事纷纷进行猜测。对此我自有一番打算，想物色一位贤慧的妻子。她不仅能为我养儿育女，而且能在执行神圣的国家职责方面成为我的伴侣和助手；她应能了解我国人民的社会状况及其愿望和理想，并能以她所特有的女性情感，为改善国民的状况和确保他们的安宁、幸福而孜孜不倦地努力。

有一天，我女儿夏赫娜兹公主眼里闪烁着异常兴奋的光芒，来到我的身旁说，她和丈夫结识了一位名叫法拉赫·迪巴的年轻小姐，他们认为这位姑娘是取得伊朗王后地位的最理想的人选。我女婿热心于负责伊朗留学生的的事务已有一段时间了，在这期间，他认识了芳龄仅有二十一岁的法拉赫·迪巴小姐，她为了能到法国去留学，需要找他商量。

自然，我想了解一下这位年轻小姐的家庭出身、经历、教育程度和性格特点等等。后来知道，法拉赫小姐的父亲出身于大不里士一个过去很有名望的家族。她母亲是吉兰省一个受人尊敬的神职人员的女儿。她的祖父曾毕业于俄国的一个军事学校，在恺加王朝时期，他在伊朗军队供职。她父亲在俄国上了一段学后，到法国专攻法律，并获得副博士学位；后因想进军队服务，便投考法国成年人的军事学校，毕业后返回伊朗，在德黑兰一个军事法院所属的机构里工作。

法拉赫是他们的独生女，生于一九三八年。她是和与她同岁的舅舅家的男孩一起长大的，这两个孩子就象兄妹似的在一个家庭里成长起来。法拉赫非常喜爱父

亲。当她十岁的时候，父亲由于癌症医治无效而逝世了。母亲不愿意女儿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只告诉她父亲到巴黎治病去了。但她看到亲属们穿起黑服，便猜想父亲可能已不在人世了。家里的佣人透漏了真情，使她悲痛欲绝。

法拉赫小姐最初被送进德黑兰的意大利小学，她在那里读书到十岁。不久，母亲将她安置到德黑兰“圣女贞德女子中学”，她十六岁之前，就在这所学校就读。在学校里，法拉赫小姐热爱体育运动，她打了四年排球，担任了两年学校排球代表队队长，这个队在省市联赛时经常名列前茅。

法拉赫小姐在圣女贞德女中用大部分时间来学习美术。在一位教员的鼓励下，她对图画课、特别是水彩画很感兴趣。她的艺术才能逐渐地显露出来。由于老师的帮助，这位腼腆的小姐被培养成具有高尚品德、端庄而杰出的姑娘。她积极参加学校的试验室活动和集体旅游，学会了参加社会活动的本领。中学的严格纪律使她成为忠诚、老实和遵守时间的人。

法拉赫小姐毕业于拉兹高级中学。这所高中的大部分教师是法国人，除了波斯语言文学课之外，该校的其他课程全部用法语教授。在学习科目中法拉赫更喜欢数学和自然科学，她是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在学校里，她负责辅导另一个法国中学的少先队员小组。法拉赫小姐喜欢欣赏广阔的天空、大自然的美景，青山绿水、田园风光和碧蓝的大海使她陶醉。正是因为受了大自然景色的熏陶

和感染，她才对美术发生了兴趣。她的艺术才能逐渐引起当建筑工程师的舅父的注意。在舅父的鼓励下，法拉赫小姐越发倾心于艺术了。早先她曾想选学细菌学或医学，但在舅父说服下，她决心改学建筑专业。她终于进入了学习期限为两年的巴黎建筑工程学院。第一年的课程是铅笔画、素描和风景画，同时还要进修数学、建筑材料力学等课目；第二年要学习风景画和水彩画，临摹古典和现代的优秀建筑杰作。在校期间她参加了几个小型建筑项目的设计。

法拉赫小姐就读的那个系有二百五十名学生，他们大部分在学校寄宿。这个荷兰学生居多的系的纪律非常严格，她和同学们每天早晨——星期天例外——都要在学校考勤簿上签名报到。除了星期五的下午和规定的吃饭时间而外，每天午后五点钟以前学生不得外出，必须呆在校园里，而法拉赫却心甘情愿地呆到午后六点钟或七点钟。她的禀性和教师的鼓励使她每天都自愿地加班加点，发愤学习。学校的纪律虽然森严，但她的学习环境，特别是对于绘画，却是十分自然而朴实的，法拉赫小姐在这种气氛中感到舒适和愉快。法拉赫小姐喜爱音乐，在德黑兰上学时她就弹钢琴，从不间断练习，因此她对在巴黎举办的音乐会兴致勃勃。

法拉赫小姐一九五九年回德黑兰过暑假。这时我女儿和女婿便邀请她吃晚饭。显然，我女儿和法拉赫小姐是一对知心朋友，她们在许多方面观点一致。

在另一次邀请法拉赫小姐作客的时候，我女儿夏赫

娜兹有意让我也参加。几个月以前，我在巴黎接见伊朗留学生时曾见过法拉赫小姐，但因为留学生很多，印象不深了。后来这件事竟成了她和我开玩笑的口实。这次在女婿家里作客，气氛融洽，我同法拉赫进行了畅谈。

见面后的第一个星期，我便向她提出结婚的建议。新闻记者总喜欢编造新闻，在大多数国家的报刊杂志上刊登了这样离奇的消息：说什么我在带着法拉赫小姐乘飞机遨游太空的时候，向她提出了结婚建议。异想天开的记者们大概要把我对飞机和女人的热爱相互联系起来吧。事实上，结婚的建议是在我女婿家里提出的。此后我们又曾会过几次面。

法拉赫小姐打算到巴黎购买婚礼服。为了避免繁琐的礼仪，我们商定不宣扬这次巴黎之行，她以普通人的身分前往，回国之前也不宣布订婚消息。按预定计划法拉赫同她的伯父、伯母和舅母一同去巴黎。她返回德黑兰后两天，才公布了我们的订婚启事。三周之后，我们的结婚典礼按照伊斯兰教的传统习俗，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一下午举行，当天晚上在古利斯坦宫举行了盛大宴会。由于政事缠身，只好暂时推迟了蜜月旅行，但事后不久我们还是到里海岸边去了。

在向法拉赫小姐提出结婚建议之前，我就提醒她注意：婚后她所承担的职责与一个建筑工程师所担负的任务是有天壤之别的。结婚之后，她果然愉快地承担起王室的繁重工作，积极热情地为社会服务，这给我很大的安慰和鼓舞；与此同时，她从不忽略自己作为妻子的责任。

结婚不过几个月，法拉赫王后的私人医生传出了她怀孕的消息，这个令人振奋的喜讯立刻传遍四面八方。一家伊朗报纸以伊朗人特有的祝福话写道：“真主昭示伊朗人民的心灵，国王将得到一个男孩。”对我说来，真主赐予的孩子不论男孩还是女孩，都将是快乐和欣慰。

根据自己婚姻生活的经验和对妇女所作的研究，我想还是可以对伊朗妇女及其思想和贤慧的妇女为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所应采取的态度等等发表一些看法。从我父亲即位至今，已过去三十五个年头了。在这段时间里，伊朗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聪明人不难看出，其中最重大的变化之一便是妇女的解放及其社会地位的改变。现在的情况是，假如伊朗妇女想使自己和亲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富裕更美好的话，那就应该明确自己的社会义务，使之与现实的可能性结合起来。

据伊朗古老的传说讲，男人和女人本是从一棵树上均衡地生长出来的。长出来之后，他和她脑海里浮现出来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努力使对方过得舒适愉快。显而易见，占伊朗人口半数的妇女在人民中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就象普鲁塔克^①讲的故事那样，居鲁士大帝的军队在一次战争中被米底人击败，向后撤退，想躲进附近的一座城里去。当士兵们临近城门时，遇上了该城的一群妇女，她们大声斥责道：“喂，胆小鬼们往哪里逃？我们城里没有你们这号人的藏身之地！”妇女的讥讽激起败兵的勇气，他们重新返回战场，击溃了敌人。居鲁士大帝因此

^① 普鲁塔克：希腊历史学家，著有《名人传》。——译者

决定，每经过这座城市，都要向该城的每个妇女发一块金币。

阿拉伯人入侵伊朗之前不久，曾有一位妇女在短時間內登上了帝王的宝座。阿拉伯人侵入之后，伊斯兰教广为传播，但伊朗妇女对社会的影响仍沒有消失。妇女的作用和影响的大小取决于她们社会地位的高低。在历史悠久的伊朗，从古至今，妇女在家庭中的权力一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就是很好的见证人。我未曾见过比我父亲更固执倔强的人了，但即便如此，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母亲的威严还是占上风的。

在大多数伊朗家庭中妇女都是占主导地位。母亲特别对于男孩子有极大的影响，男孩子也总是同母亲商量应该做什么事。一位英国女作家在其一九三〇年发表的著作中写道：

“在整个伊朗，成年的男孩子都是文质彬彬、谦虚温顺的，他们对于自己的母亲有一种近乎敬神般的崇拜。”此话确实不假，并沒有丝毫的夸张。

勿庸赘言，我对母亲也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崇敬。前面说过，幼年时期我几次患重病，母亲总是眼睜睜地坐在我的身旁。她将古兰经放在头上，为我的健康向至高无上的真主伸出祈求的双手。母亲在世期间，帮助我选择正确的道路，鼓励我坚定信仰，毫不动摇，勇往直前。

伊朗妇女一向拥有与她们的社会地位相称的权利和影响，有时这种权利甚至会损害她们自己和她们的家庭。那种认为伊朗妇女沒有权利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事

实上，我国妇女拥有的特权是她们欧洲的姐妹们通常所享受不到的。譬如，伊朗妇女有权拥有财产和土地，她们自己可以任意动用它，而不受别人的干涉。维持每个家庭——不仅包括丈夫，还包括子女和亲属——对于母亲说来，乃是一种义务和道德上的责任。我下面将要叙述的短期结婚的妇女，人数虽然极少，但在其结婚证书上也有明文规定，可享有西方世界极为少见的经济权利，她们的孩子也与西方国家私生子的待遇不同，享有合法生的孩子的全部权利。

虽说如此，应该讲伊朗妇女过去的生活范围还是很狭窄的。多年以来在妇女当中就有一种怪现象，即社会地位越高的妇女享有的自由越少，受陈旧的风俗习惯的约束越甚。譬如，游牧部落的妇女从来不戴面纱，很多地区的农村妇女（特别是伊朗北部和西部各省的农村妇女）也不戴面纱；而伊朗上层社会的妇女和城市妇女却是没有面纱就不能出门，甚至在自己家的客厅里也要戴面纱，只是在内室才把它摘掉。农村妇女在简陋的小屋里与家庭其他成员一起生活；而城里的富有人家住在带围墙的院子里，房屋十分讲究，前面是客厅，里面才是妇女居住的内室，除了家长和近侍之外，其他男人一律不准入内。农村妇女可以自由地外出干活，彼此交往；而城里有钱人的妻子和临时娶来的女人却过着娇生惯养、奢侈豪华的生活，除了妇女的杂事之外，她们百无聊赖，整天说三道四、品头评足、拨弄是非。最糟糕的是，她们的子女就是在这种内室的不良环境中度过自己的童年的。那时来伊

朗观光的欧洲旅行者写过不少文章，谈到伊朗的小孩个个都是文质彬彬的。可是，这种家庭教育培养不出富有创造精神的、为社会所需要的年轻一代。

伊朗不同阶层的婚姻风俗也有些差异。一般说来，挑选配偶是由父母包办，可是农村姑娘与城市姑娘不同，她们在结婚前多年就跟自己的未婚夫认识了。我记得有一位农家姑娘，住在一个边远的村庄，在结婚前五年她便同未婚夫有来往，互相帮助，一起劳动。

城市上层社会中的情况是，一般在订婚仪式之前，女方是看不到男方的；订婚之后到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也不能有任何接触和交往。我有位朋友讲过一件事：某天，他的妻子假装不高兴地对他说，“结婚前我们彼此根本没有见过面。”他笑笑回答说，“结婚后不是见面更方便吗？”

我父亲上台执政后，决心把伊朗妇女从旧的传统习惯的沉重压迫下解放出来。他努力提高妇女的思想觉悟，以便为伊朗社会增添有文化修养的母亲和优秀的妇女人材，进而造就出具有优良品德和社会教养的年轻一代。

过去仅有少数伊朗妇女掌握一点文化知识，至于说相当于今天的那种科学知识，妇女是沾不到边的。她们只能在地方阿訇和外国传教士兴办的学堂里，或从自己的奶妈和家庭教师那里学到一些常识。这些有幸受到教育的妇女数量少得可怜，甚至不到伊朗妇女人口的百分之一。我父亲煞费苦心地创办了几所国立女子学校，因为有文化的妇女太少，以致招聘女教师竟成了巨大的困

难。他不得不创办师范学校，以便尽快克服师资的不足。

我父亲为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所做的努力，自然会遇到各种阻力和困难，但他以天赋的英勇气概和富有远见的精神战胜了它们，把这项事业推向前进。一九二八年我母亲到古姆去朝拜玛苏麦教长的圣墓，她及其随行人员都戴着面纱，只是稍微短小一点，便遭到宗教狂徒蛮横无理的谩骂和斥责。消息传到德黑兰，我父亲当即率领几卡车士兵赶到该城，亲自惩罚了肇事人。

我父亲决定首先废除妇女的面纱。在他的鼓励与支持下，一九三〇年上层社会的部分妇女开始在家里和宴会上穿起欧式女装，其中少数妇女甚至敢不戴面纱走上大街。一九三四年他下令禁止教员和女学生戴面纱，并规定军官不得与戴面纱的女人同行。最后，我父亲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七日颁布了摘除妇女面纱的法令。那天，我父亲要母亲和我的几个姐妹不戴面纱偕同他出席官方的一个重要集会，这是一次为庆祝师范学校女毕业生领受毕业证书的大会。我父亲认为这是宣布摘除面纱法令的适当时机。一向不喜欢长篇大论的我父亲在会上发表了简短演说：

“看到妇女们由于获得文化知识而认识到自身的地位和自己的权利，我感到无比的高兴。应该指出，在过去我国的一半人口被忽略了，国家的半数劳动力遭到了浪费。政府从来没有正式统计过妇女的人数，似乎她们是别的什么人，而算不上伊朗的人口。政府仅在粮食供应紧张，为了分配粮食而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才统计妇

女的人数。你们妇女们应该把今天看作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并利用你们将获得的地位为国家的进步效力。你们、我的姐妹和女儿们将是新一代的培养者，你们一定能成为优秀的教育者。在你们的抚育下，年轻人将成长为国家的栋梁。我希望你们摒弃奢侈和浪费，而推崇简朴。你们要做好男人的助手，在生活中以勤俭为荣，使自己不愧为一个有益于国家的人。”

据我所知，在伊朗近代史上妇女不戴面纱出席官方的公众集会这还是第一次。显然，这次伟大实践的成功应归功于我父亲的英明决策；在某种程度上，也应归功于我母亲和我的姐妹们的勇敢行为，她们在旧的传统风俗面前毫无惧色，也不怕多数国民其中包括不少地位显赫的神职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反对。

礼萨王知道，很多要求进步的人和有文化的神职人员，以及那些在国外或在德黑兰外国学校学习过的人，都是拥护他的英明决定的。

礼萨王终于成功地颁布了废除面纱的法命。根据这项法令，任何妇女都不得戴面纱。如果妇女戴着面纱上街，警察就会加以干涉，她若抗拒，也要强迫她摘掉面纱。我父亲执政时期，这条禁令在全国有效地执行着。

这样，伊朗便继土耳其之后成为第二个正式废除面纱的伊斯兰国家。每年的一月七日伊朗妇女界都举行庆祝大会，以表彰我父亲为全国妇女做出的巨大贡献。伊朗某妇女协会为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特命名为“一月七日协会”。该协会的纲领象美、英等国的类似协会一样，

主张提高妇女的思想觉悟，保卫妇女的权利。

一九三四年我父亲建成了德黑兰大学，它奉命也招收女生。我父亲鼓励伊朗女学生到国外求学，并支持妇女到中央各部门、政府和私人机关担任秘书等职务。妇女们对社会服务事业的兴致在日益增加。

礼萨王这样做并不是要割断祖国的历史，废除优良的传统，而是在进行社会改革。他希望伊朗的小姐们在完成学业和取得经验之后便恋爱结婚，以便更好地教育孩子们。他坚信受过教育的女青年必将成为贤妻良母和忠于职守的工作人员。

二次世界大战时，伊朗被外国军队占领，我父亲被废黜，流亡国外。这时他为了提高伊朗妇女地位而实行的各项计划便停顿下来。此外，由于某种原因先进分子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礼萨王提高伊朗妇女社会地位的作法有些强硬，明智的作法应该是以民主的精神推行改革，这样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从摘除面纱这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出些问题。我父亲的流亡国外，加之战争时期局势的混乱，有些妇女又照老样子办事，戴起了面纱。她们并不重视摘除面纱的法律规定。我和我的政府对此并不严加追究，我倾向于对这类事情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而不求助于强迫手段。今天，在伊朗的城市和乡村仍可看到戴面纱的妇女，但其人数却在日益减少。同时应该指出，与某些神职人员的想法不同，现在的妇女并不是为了维护旧习俗才戴面纱，而是觉得面纱也有方便之处，所以才喜欢戴它。有些贫穷

的家庭妇女，购置衣服不多，好衣服得留着在节日穿，因此当去市场买东西的时候，她们就戴面纱，认为这样更实在些，节省些。

我本人有很多理由不赞成妇女戴面纱。还应该指出，在美国的城市里，特别是在郊区，我看到一些妇女的衣装，比起一般伊朗妇女的衣装来还要难看得多。

历史上，妇女在衣着方面一向表现出独特的才能，因此我们可以期待在文明国家里残存的、不能显示人体美的面纱和裁制蹩脚的衣服将会逐渐地被淘汰，而不再令人看了难受。在这方面，或许男人们能以其好恶的表示来加速这个进程。

一夫多妻制现象在伊朗正逐渐减少，我看不要很久时间，将被完全废止。谈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石油危机时期，英国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伊朗谈判有关事宜，其中有一批女打字员住进了昔日一位君王的宫殿，她们下榻在君王妃嫔的寝室。次日早晨，伊朗的接待员问小姐们夜间睡得怎么样？她们回答说：“非常不好，一夜没有合眼，总觉得有个君王的幽灵在召唤自己的妃嫔。”

在我的夏宫附近，住着一位政府官员，他有两个年龄相近的妻子，人们经常看到他挽着两个妻子的胳膊上街蹒跚。据说，这两个女人相处得十分和睦。她们都生了孩子，当一个人去市场买东西时，就将自己的孩子委托另一个人照料。她们的丈夫是个有文化教养的人，对于社会服务事业十分热心，他的两个妻子都很尽心地帮助他。

我听说，美国“四点计划”组织的一位官员的妻子想

访问这个幸福家庭，有人悄悄地告诉她此人有两个老婆，她回答说：“这有什么关系，我祖父曾有过七个老婆。”显然，这位女士的家住在美国的犹他州，是摩门教^①信徒。

许多西方人大概忘记了，伊斯兰先知当初规定每个男人最多可以娶四个老婆的时候，他是为了限制当时广泛流行的一夫多妻制。伊斯兰先知特别规定：男人可以娶一个以上的妻子，只要他能完全平等和公正地对待她们。对于极其富有的人来说，能做到上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因此，事实上仁慈的先知便以这项规定宣判了一夫多妻制的死刑。

今天在伊朗也许还有为数不多的人有几个老婆和很多孩子，象德黑兰的一个家庭，有三十四个孩子，他们不论男女都受过高等教育。但是，由于经济等方面的原因，目前伊朗人当中有一个以上妻子的人还是有限的。在拥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德黑兰，一个月内只有七十二个有妻之夫讨了新妻，其中娶第三房的仅有六人，而没有人能娶得起第四个老婆。一夫多妻现象在省城可能比在德黑兰更严重些，然而就全国说来，这种现象确实在日趋减少。同样地，“短期婚姻”也正在逐渐消除。淫乱这种人类最原始的现象，在伊斯兰先知时期极为广泛地存在。先知为此而感到异常烦恼，遂决心在伊斯兰教里消除淫乱现象。这大概是出现一夫多妻制和“短期婚姻”的主要原因。在伊斯兰教初期进行的战争中，男人们死伤过多，

^① 摩门教：一八三〇年在美国创立的一个教派，初期实行一夫多妻制。——译者

妇女人数相对地增加。面对这种情况，真主的使者认为，让女人作为男人的临时妻子，受到他们的保护，以免出于无奈而陷入淫乱的泥沼，这对伊斯兰教徒更有利些。

几百年前，根据宗教法律的规定，“短期婚姻”由神职人员负责管理，为此还有详细的规定。起初，一个男人想临时娶一个女人，必须取得当地阿訇的批准。后来，神职人员规定男女双方必须签署婚约，男方若想临时娶一位姑娘为妻，必须征得姑娘的同意，当地阿訇在婚约里写明短期结婚的时间，以及数量不大的聘金。今天在伊朗“短期婚姻”还存在，它象正式结婚一样，其婚约以合法的形式出现，男女双方必须正式履行结婚手续。根据法律规定，这种女人生的孩子享有合法妻子所生孩子的一切权利。短期结婚的女人深得丈夫的欢心，进而成为正式合法的妻子，这种情况屡见不鲜。这种“短期婚姻”虽有某种吸引人的地方，但却容易导致风俗败坏。使我感到高兴的是，这类婚姻正在大量地减少。根据德黑兰的月统计，每月短期结婚的次数不超过十四起。短期结婚的时间至少要超过一年，事实上，有不少短期结婚的时间拖得相当长，有的竟长达十七年，每次期满就重新延长。“短期婚姻”同一夫多妻制一样在省城比在德黑兰更为盛行。此外，西方流行的“合理同居^①”在伊朗偶尔也可以看到。

由于实行民主改革，今天伊朗妇女的思想水平比过去大有提高。小学和中学的女学生数目大量增加。现有

^① “合理同居”或译“法外婚姻”，是一种未经法律手续但为社会所公认的婚姻。——译者

二千多名女学生在德黑兰大学深造，有数百名女学生在省城的大学受教育。伊朗全部大学都是男女同校，男女学生肩并肩地一起钻研功课。一九五八年德黑兰大学首次聘请了一位女教授给女学生上课，她将同男教授一起努力承担起教育学生的重任。

多年来女少先队员在伊朗一直非常活跃。每年都为中学和大学的女学生举办夏令营，她们在夏令营亲身体会集体生活和社会互助的原则。几乎每天都有不少伊朗妇女加入到教员、秘书和护士的行列中来。在我国有相当一批女医生、女律师、女作家、女诗人和女音乐家。

正如在第八章里谈到的，伊朗妇女社会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阔，她们积极参加在德黑兰和其他大小城市举办的各种妇女俱乐部活动。一九五九年我妹妹阿什拉芙公主成立了“最高妇女委员会”，以便协调全伊朗各妇女组织的活动。

我本人所关心的是，为妇女参加社会服务工作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更广泛的可能性。我的目的在于使妇女享有同男人一样的基本权利。关于妇女的选举权问题，应该指出，法国妇女在一九四四年以前一直被剥夺了选举权，然而了解法国妇女状况的人绝不会说，法国妇女的政治活动和社会影响是从那一年才开始有的。瑞士妇女至今无权参加选举，但这决不意味着她们不享有社会权利。

现在应该着重探讨一下关系到伊朗和中东妇女社会状况的关键问题。这里应该指出，在中东各国所谓的“妇女自由”、“男女平等”等词并没有体现出它们的真正含

义，正是这种误解使妇女的权利和理想蒙受损失和打击。应该弄清楚，“妇女自由”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某些自诩为妇女权利的支持者发表演讲时，常会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妇女自由”就是不嫁人，不要孩子，倘若有了孩子，也不必注意教育他们，简言之就是不承担任何责任。假如“妇女自由”是这样的话，那么每个伊朗妇女只要愿意，都可以照此办理，没有什么法律阻碍她们享有这种“自由”。然而，贤慧的伊朗妇女对这种自由嗤之以鼻，她们懂得自己具有某种天赋特质，这种特质要求她们履行特殊的职能和义务。

对于具有健康情操的人说来，上帝赐予男性和女性的特质早已将那种“男女平等”说批驳得体无完肤了。倘若妇女将“平等”和“机会均等”两者混淆起来，那将给女性带来无可挽回的损失。

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皆认为男人和女人是相互补充的，都否认那种视“男女平等”为男女在各方面都毫无差别的说法。神智健全的人都会接受这种明显的真理。我知道，有些心理学家和社会学者认为，男女之间产生的差异，多是由于人类社会按性的区别规定了不同的任务而产生的。但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它只注意到男女之间的部分差异。只要留心观察一下社会因素对之尚无影响的小女孩和小男孩的行为，我们便会发现这种片面观点的显著例证。譬如一位年轻姑娘，不管她出身富裕家庭还是贫穷家庭，也不管她是有名望的还是默默无闻的，只要发育成熟了，她身上就会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一种诱人的

美感。这是与社会条件毫无关系的，而是一种天赋的女性美。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女性的特征才赋予生活以乐趣。由此可见，那些赞成男女绝对平等的人是将词义混淆了，他们在妇女进步的道路上制造了巨大的障碍。

当然，男女的机会均等问题是另外一回事。假如某位小姐想进物理系学习，那就不应该考虑她的性别是什么，而满足她的要求。我认识一位在美国学物理的漂亮的伊朗小姐，她结识了一位在该校新闻系学习的伊朗青年，前不久他们结了婚。现在她有充足的时间搞家务，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

根据一九五九年通过的新的劳动法规定，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是一条确定无疑的原则，在这方面可以说男女之间没有什么区别。这种男女平等在政府机关工作中日益得到贯彻，譬如在邮电部出售邮票就是由妇女担任的。据说伊朗邮电部的女秘书和女打字员的数目比美国邮政局雇用的女职员还要多。

私营的企业和公司雇用的女打字员和女会计也越来越多。

勿庸置疑，从男女的体力上看，就不能强调这种平等原则，譬如，在文明国家里就不让妇女从事建筑业的重体力劳动。或许有人说这种作法就是不平等，然而有见识的人则认为，这是新文明根据平等原则进行的一种必要的安排。在伊朗的劳动法里也贯彻这样的原则，它规定了有关女工和童工工种的各种限制。

还应该从家庭生活的角度仔细地研究一下“妇女自

由”和“男女平等”等问题。有些人说，美国妇女在夫妻关系方面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妇女更自由些。我虽然十分尊重美国妇女，但我确实看到过她们脸上流露出的极为忧虑不安的神情。在世界的大国中，美国的离婚人数是最多的，平均每三对夫妻就有一对离婚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诚然，向美国可以学到很多科学知识，但我怀疑，在美满的婚姻方面能向那个国家学到什么东西。人们所说的“平等”一旦用到天性截然不同的夫妻身上时，就失去了它的真实含义。因为男人和女人是相互补充的，当由于结婚而使两者成为一体时，便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在大多数国家，丈夫是一家之主，以我的经验来看，世界上从西方到东方，凡是过着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的人都会同意这种安排。总之，我希望伊朗人民在结婚、组成家庭和妇女职责等方面不要盲目地仿效西方。我主张借鉴文明世界生活中的优点，但却应以不破坏家庭生活的牢固基础为前提，这种借鉴决不能割裂伊朗家庭生活中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有些轻浮和堕落的伊朗和外国女人错误地以为，“妇女自由”意味着她们自私自利的情欲和淫荡的满足。然而事实上，每当妇女获得一种新的权利，她们就要相应地承担一种新的义务。假如说在做姑娘的时候，她们不能拒绝承担这种义务的话，那么在结婚之后，就越发不能推卸她们应尽的职责了。

往日深居简出的伊朗妇女的职责是很简单和有限的。因为丈夫和佣人为她们提供了各种舒适的生活条件，她们根本用不着操持家务。而今天有文化的妇女却

肩负着繁重的任务，首先她们应该是丈夫的好妻子，就是说不仅要在一起同居，而且应该成为丈夫的情趣和精神生活的伴侣。她们负有的更重要的职责是长期地教育孩子，使孩子的性格、才智和道德得以发展。正是她们应该象炉火那样使孩子们得到爱情的温暖，成为孩子们聪明才智的源泉；正是她们应该将现今世界上那种把孩子们引进广泛的社会天地去的道德原则传授给孩子们。此外，伊朗妇女还应该参预国家新生活的建设，在公共福利和慈善事业中做出贡献。妇女们不论职位高低、尊贵与否，都应该心甘情愿地去这样做，要同情普通老百姓，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农村的人们。

我对于伊朗无与伦比的妇女的前途充满了信心。据美学专家们说，她们当中很多人称得起是世界上最标致的女人。我认为，伊朗妇女能够在保持自己女性特点的同时，使自己达到光辉的顶点：在现代伊朗社会的发展中做出卓越的贡献，使人们到处传颂她们的美德。

第十一章 教育与伊朗的未来

相传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公开传播伊斯兰教时，曾遭到有些人的敌视与反对，他们包围了先知的住宅，要杀死真主的使者。崇高的先知决定从麦加逃奔麦地那，到那里说服人们皈依伊斯兰教。可是敌人已经包围了他的住宅，要出去是非常危险的。一天夜里，先知的一位密友将他背在肩上，用纱袍盖住他的头，不慌不忙地走出屋子。当经过包围的人群时，有人问他背的是什么人？他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是穆罕默德。敌人把这句老实话当成了笑话，便没有检查那个蒙着头的人。于是，仁慈的先知安全地转移，脱离险地。

我所以要在本章开头叙述这个故事，是因为它包含着—个伟大的哲理。在谈到教育问题之前，我认为应该首先提及它。

伊斯兰教先知启示我们：掌握知识并不单纯是积累知识，还应该把所学到的东西用于实践，做到学用结合，为其他人谋福利。假如不是这样，那么满脑子都是知识的人与驮着成捆书的牲畜又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在现今世界上，有些人使用邪门歪道的知识造成的危害比益

处大得多。譬如，希特勒就用学到的知识修建集中营和刑室，惨杀千百万无辜的男女和儿童。毋庸置疑，今天社会所需要的教育，不仅应该使人们学到知识，而且应该使人们懂得什么是真理和正确的行为。

在古代伊朗，宗教是一门高于军事的职业。伊朗人素来是骁勇善战的，琐罗亚斯德教使战士们更加刚毅，并且胸怀大志。传授战斗技术是军人的天职，而琐罗亚斯德教祭司除主持宗教仪式外，掌管了全部教育事业。伊朗儿童要背诵三条重要的格言：“善良的语言、善良的思想 and 善良的行为”，还要学会骑马射箭。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把诚实作为自己的生活准则，掌握识别善恶的本领。

令人遗憾的是，古代教育为特权阶级所垄断，琐罗亚斯德教祭司只施教于帝王将相和部落酋长的孩子，普通老百姓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商人的文化水平也有限，只能满足一般的需要。因为古代伊朗人蔑视经商，把市场视为撒谎和诈骗的场所，所以不主张在市场附近开办学校。至于妇女，不论是那个阶级的，都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那时候，大祭司、高级军官和达官显贵把一般的科学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子女，这就算是“高等教育”了。在这方面，也有例外的情形。譬如，曾在今天黎巴嫩一带修建过大型医学院的景教徒内斯托利人^①，由于遭到东罗马帝国的敌视和劫掠，被迫逃奔叙利亚（萨玛特），后于公元四八九年迁至伊朗避难。伊朗国王胡斯鲁·阿奴希尔旺

^① 内斯托利人：第五世纪时君士坦丁（现名伊斯坦布尔）的大教主的追随者。——译者

盛情款待内斯托利人学者，对他们的著述极为重视。这些学者在甘地沙普尔(位于今天的胡泽斯坦省)修建了一所医学院，直到几世纪之前它还在开办。

这所大学及其信奉景教的教授们在伊朗深受欢迎，这充分表明我们提倡不同的宗教共同繁荣，并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良好的品德在胡斯鲁·阿奴希尔旺时期还表现在另外的事情上。譬如公元五四一年，为了能在幅员辽阔的帝国版图内就发展和普及医学知识等问题经常交换意见，国王特成立了“长老议事会”，委托信奉基督教的著名医生加布劳伊尔·达斯特维耶主持这个“长老议事会”。国王还鼓励编撰和出版医学书籍，扩建甘地沙普尔医学院，并赞助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希腊和印度著名学者的著作翻译成巴列维语^①。公元六三三年阿拉伯人入侵伊朗之后，伊斯兰教阿訇便开始掌管教育、法律和宗教等事务，他们在全国各地开设学堂或者男生小学（女孩子那时候是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的）。一般男孩子满了八岁，便与母亲和姐妹们分开，接受家里男人对他的教育；在有钱的家里，便由聘请来的家庭教师负责教育孩子。

凡是负担得起微薄学费的家庭，都将孩子送进学堂。他们在那里学习朗读和背诵古兰经的经文，再学点波斯文和算术课。可兰经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孩子们无法理解它的内容；老师们的知识有限，也不能胜任对可兰经韵文的讲解、翻译和分析。

^① 巴列维语：是现代波斯语的前身，当时的国语。——译者

小学生们围着老师席地而坐，摇头晃脑地一起高声诵读他们不理解的、甚至连老师也难以弄懂的古兰经韵文。老师为了维持学习纪律，常用木棍凶狠地惩罚偷懒的学生。

读完了学堂之后，孩子们就进中学读书，学习有关宗教、法律和医学方面的课程，学完全部课业之后，可得到毕业文凭。

早在一百多年前，文明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方法便逐渐传入我国。公元一八三六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乌鲁米耶市（今天的雷扎耶市）开办了一所中学，此后不久，它又在伊朗其他地方修建了一些学校。后来，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相继在伊朗开设学校，数千名男女学生在这些学校里接受高小、初中和高中的教育。其中最有名望的是德黑兰厄尔布尔士中学，我国现在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大名鼎鼎的商人都是该校的毕业生，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赞扬长期担任该校校长职务的美国人沙姆依尔·杰尔顿博士的高贵品质。在厄尔布尔士男校成立之后，又成立了“赛伊杰”女子中学。

一八五二年，即恺加王朝纳赛尔丁王即位五年之后，伊朗第一所官办的综合性技术学院在国王开明而智慧的宰相萨迪尔旺·密尔扎·塔吉汗的努力下在德黑兰宣告成立。这所官办学校是专为培养宫廷官吏、军官、医生和工程师而创办的。建校初期，它是由到伊朗来进行行政和军事改革的西方教授和法国军事顾问担任教课。它的课程包括拉丁语、法语、数学、化学、制药学、医学、矿物学

和军事学等，不久又增添了波斯语、阿拉伯语、伊斯兰教法律 and 一般法律等课程。到一八五七年该校学生总共有一百六十人，其中一百一十人获得正式毕业证书。

前面我曾提到纳赛尔丁王的欧洲旅行。显然，他的旅行促进了伊朗人的觉醒，引起人们对改进教学方法和借鉴新教育制度的关注。纳赛尔丁王选派一批青年学生去欧洲留学，他们于一八九六年结束学业回到伊朗。这批人在伊朗其他学者的合作下，举办了有关调整和改革学校教学计划的讨论会。一九〇二年在德黑兰成立了政治学院。一九〇七年宪法着重指出国家有责任普及和发展教育事业。一九一一到一九一二年国民议会批准了有关成立文化和公共教育部的提案。

这样到一九二一年，即我父亲发动政变后不久，全国已有国立小学四百四十所，小学生四万三千名；国立中学四十六所，中学生九千三百名；大学一所，大学生九十一名。我父亲认为这些学校和学生远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遂决心增添和扩建中、小学校。由于他的努力，一九三二年和一九四二年小学和中学的数目分别达到一九二二年的三倍和六倍，学生的人数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九三二年伊朗有三所大学，而到一九四二年高等院校——农学院、工程学院、军官学校、师范学院（其中包括第一所女子师范学院）和德黑兰大学等——的数量便增加了三倍。成立军官学校是礼萨王为培育新型军官而采取的重大措施之一，军校学生不但要掌握军事技术，而且要成为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聪明能干的人材。

在发展教育事业方面，礼萨王并不以兴建小学、中学，培养师资，选派留学生等为满足，他还彻底改变了国家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使国家教育机关的面貌焕然一新。

我父亲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在青年心目中培养和树立爱国主义精神，没有这样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改造国家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他看来，所谓借鉴新文化，绝不能单纯追求诸如兴建工厂、修筑铁路和敷设公路等表面变化，而应该彻底改变教育和伊朗人的精神面貌，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取决于进行基本变革的深度和广度。有鉴于此，我父亲一方面保护和维修古老的历史遗迹，使其恢复宏伟壮观的旧貌，一方面着手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方法，使他梦寐以求的伊朗的光辉未来能同其灿烂的过去相媲美。

为实现这种理想，我父亲实行了史无前例的教育改革。他将卫生、公民教育和家庭管理等课程列为学校的教学内容；赞助成立男女少先队组织；通过广播电台和其它宣传工具使青少年们认识到自己对祖国负有的职责，并懂得为改善生活状况必须付出艰苦努力的道理；并制定了教育成年人的计划。

从我即位的一九四一年以来，我父亲在教育事业中采取的各项方针政策仍然得到了贯彻和执行。

一九四三年议会通过了对全国少年儿童实行义务教育的法令。虽然这项法令对我国说来有些过早，我们的学校和教员的数量还不能满足在全国实行这项法令的要

求,但它却为我们明确了教育事业的远大目标,指出了我们必须完成的一项重大任务。

国家的教育机关从那时起日益发展,教育经费增加到国家预算的五分之一。这笔款项与先进国家的教育经费相比也是很可观的。

一九五九年伊朗国立小学的数目超过了八千所,即相当于一九二一年的十八倍;国立中学的数目达到一千一百所,是一九二一年的二十三倍。在不满四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如此的发展,若说是我国的重大成就之一,大概算不上夸口吧。伊朗现有的小学生已超过一百万人;中学生以及农业学校、技工学校、音乐学校和高等行政学校的学生人数已达到二万二千五百人;中、小学教员达到四万五千人,其中女教员约占三分之一。

在高等教育方面,除德黑兰大学有一万一千名学生外,各省市新建的大学还有数千名男女学生,军事学院也有数百名学生。德黑兰大学设有自然科学、数学、工程、医学、牙科、制药、农业、兽医、法律、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和伊斯兰教法律等科系。各省的大学,象大不里士、设拉子、马什哈德、伊斯法罕和阿瓦士等地的大学,虽然设有的专业比德黑兰大学少得多(譬如设拉子大学只设有文学系、农业系、医学系和自然科学系),但它们正以文化教育战线上先锋者所特有的气魄迅速地向前发展。

一九五四年德黑兰大学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增设了行政管理专业和贸易专业,专门教授有关行政管理的技术和培养从事商业工作的干部。这些专业对于象伊朗这样

刚走上发展道路的国家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另外德黑兰大学还增设了中东和考古研究、心理研究和试验、社会调查、防治恶性疟疾和原子研究等专业和研究中心。

在靠近德黑兰大学校园一带，我们还修建了其他一些高等教育机构。譬如德黑兰专科学技术学院，其学制为四年，该校毕业生可获得副博士学位；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开办的阿巴丹技术学院，教授学生有关石油工程技术方面的各种专业知识。又如德黑兰社会服务学院，培养学生具有管理公共福利事业的技能；卫生部开办的医学院教授年轻女学生医护技术，使她们懂得人道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原则。

除开办上述教育单位之外，我们还实行了旨在使军人和宪兵获得一定文化知识和掌握某种手工技能的计划。在第八章和第九章我曾谈到皇家慈善机构和开发银行开展的教育活动，以及国家实行大规模开发计划的情况。此外，政府还实行了有关扫盲和普及教育的广泛计划。

在村镇和省市举办的读书班里，成千上万从未受过教育的人正在从事学习。

但是知识、即书写和阅读能力就象工具一样，假如运用不当，其危害比益处还大。因此在普及教育时，我们的眼光要看得远些，所安排的初级教学计划要能使知识成为改善人们生活的有利因素。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应该充分利用我国人民当中酝存着的聪明才智。

教育部为了在农村实行初级教育，培训了大批教师

——多是成对的夫妻，他们时刻准备去农村小学任教。他们对这种有意义的工作十分热心，把自己的家看成是农村社会服务事业的中心。这些教师教农民写信、念书和算算术，他们安排的课程符合农民日常工作的需要。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叙述一下由教育部等单位合编的农村读书班教科书的标题和目录。教科书的总标题是“我们学习读书和写字”，教科书的目录是“家庭卫生”、“鸡和牲畜的饲养”、“农村公共卫生”、“森林树木”、“我们一起工作”等。这样农民就可以把读书与实习紧密地结合起来。譬如，农民不仅在书本上读到阿月浑子果树的管理方法，而且还在实际上学会剪枝技术和防治病虫害的本领；农民学了有关饲养蜜蜂的知识，便能更好地管理蜂箱。同样地，农民的妻子不但在书本里读到有关作饭、晒水果干和医治孩子眼痛的方法，而且能够实际操作。显然，这种教育对改善农民生活大有益处。

随着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在全国的迅速普及，神学知识的传播工作也跟上来了。目前在伊朗有二百所神学院和伊斯兰教科研中心，它们的部分经费是由国家提供的，但它们的内部事务和对学生的教育则由神职人员负责，一般地说来，它们培养为宗教事业服务的人材。

它们当中规模最大也最有名气的，要算古姆市的伊斯兰教研究院了。它一向被认为是神圣的地方，长期以来就有神学和宗教科研中心之称，迄今仍保持着它超脱凡尘的精神魅力。

除了官方的教育机构和宗教学校而外，经教育部批

准开办的私立小学和中学的数目也在日益增多。其中有设拉子医学院附属的护士学校，年轻的姑娘们在那里学习第一流的医护技术。此外，还有很多私人开办的幼儿园、初级小学、商业学校、外语学校和音乐学校等，它们为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九四〇年我父亲为了阻止外国势力在我国的渗透特规定，凡是有伊朗学生就读的外国人开办的学校一律改由政府管理。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规定多少遭到破坏，外国学校重新兴办起来。其中最有名望的是美国人在德黑兰开办的学校，它是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传教士团体经管的，每年约有一千二百名学生——其中大部分是伊朗学生——在它的小学部 and 中学部学习。这所学校的教育水平相当高，它的很多毕业生都能进入美国的高等院校深造。亚美尼亚人、信奉摩西教的犹太人以及伊朗其他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专门学校，一般说来这些学校的管理情况还不错。

近年来我国人民，从老年人到年轻人，都对学习英文发生兴趣，原因可能是世界上的强国多操用英语，许多重要的文学和科学著作是用英语写成的。但我认为还有一个基本原因，即人们逐渐地认识到英语已成为一种国际通用的语言了。比如苏联的许多宣传书籍就是用英文出版的。喜欢学习外语的伊朗人，对法语也非常感兴趣，在教授标准法语的伊法协会，在各中学和大学里，都有不少人学习法语。应该指出，教授英语的单位虽然越来越多，但仍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目前伊朗各国立中学都

设有英文课，各大学都把英国语言文学列为主课。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开办的各种英语学习班里有数百名学生。伊英协会设在德黑兰、大不里士、马什哈德和伊斯法罕等地的英语学习班向数百名准备当英语老师的人教授英语。伊美协会在德黑兰、马什哈德、基尔曼沙、伊斯法罕和设拉子等地开设的学习班里有数千名学生，正在按照统一的教学计划努力掌握英文。在阿巴丹市和产油区青年人学英语的风气也很盛行。

我们还采用广播和电视进行英语教学，在德黑兰和各省市开办了许多私立英语学校，并大量出售英语教科书和英文报纸杂志，供人们阅读。

由此可见，近年来伊朗的教育事业正在蓬勃发展。然而，我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知道：在教育方面要走的路还很长，离我们的崇高目标还十分遥远。至今我国仍有千百万人、特别是农村的成年人和青年人还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必须完成的扫盲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战斗任务。

我希望，中、小学生的人数每年能增长百分之十二左右，我这样说，当然是把全国人口每年增长百分之三点五这种情况考虑在内的。每年增加这么多中、小学生，所需要的教育经费将是十分巨大的，但是在这方面的任何投资和开销对伊朗的未来都是极为有利的。

为了实现我们的远大目标，仅仅增加教学设备，增加学校、教员和学生的数量是不够的，还必须对教育的含义具有真知灼见。正因为如此，我特别重视在本章的开头所

叙述的那个故事，在这方面我想坦率地发表些看法。

过去和现在凡是到伊朗来的外国旅游者都发现，有些伊朗人撒谎不脸红，习以为常。应该弄明白，为什么这些人要用撒谎手段谋取私利呢？

我国绝大多数国民是穆斯林，但是有些人却忘记了古兰经里说的撒谎是重大的罪行。

地主对佃户说谎，商人对顾客说谎，他们都对收税人或海关检查员说谎。在天书古兰经里找不到宽宥撒谎者的条文，相反，可以读到许多有关斥责撒谎骗人的内容。其中有一章记载着：在做买卖时弄虚作假没给足份量的人激怒了真主，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早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在伊朗撒谎骗人就要受到惩罚，古代的大流士说过：“要讲真话，不要撒谎。”在耶稣的福音书和摩西的圣书里——伊斯兰教认为它们是崇高天使的训示——也有许多关于斥责虚伪、赞扬诚实的教诲。

有些撒谎者恬不知耻地为这种极端丑恶的行为辩护，竟然为它寻找历史的依据。譬如，有人说在鞑靼人和蒙古人入侵时期，为了保全性命除了撒谎就毫无办法，因此撒谎才逐渐地形成了习惯。可是那个迫不得已而撒谎的历史时期与今天的时代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如今的撒谎者以此来开脱罪责是说不过去的。还有人搬出西方的作法来为撒谎辩解，说什么应该将“善意的谎言”与“恶意的撒谎”加以区别。令人遗憾的是，我国著名的诗人设拉子的萨迪在《蔷薇园》里也为这种所谓“善意的谎言”张目，他写道：“善意的谎言胜过害人的诚实。”

我认为，萨迪的这句话是不符合道德原则和生活准则的，因为撒谎不仅明显地违背了我们的宗教信仰，而且对生活带来恶果。撒谎在道德上应受到斥责，在实际生活中则是愚蠢的，一个人要掩饰谎言，就必须编造另外的谎言，于是谎言便象铁链一样束缚住他，使之丧失自由。

另一方面，诚实却能够拯救同志，打败敌人，正如本章开头叙述的先知的密友所表现的那样。诚实能使人心神安宁，摆脱灾难。对于国家和民族说来，诚实则是进步和发展的要素，因为它使社会生活建立在国民相互信赖的基础之上。

伊朗的家庭有其独到之处，外国旅行者总是夸奖伊朗的家庭关系十分亲密牢固，这不仅包括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叔叔、舅舅、姨母和女婿等亲属之间的相互关系。每个家庭成员，包括亲属在内，都能和睦相处，真诚相待。但应该指出，缺点是对孩子们的关照还不够周全。有的父亲偏爱女儿，有的母亲溺爱男孩，而对子女的思想教育却重视不够。

很多家庭没有培养子女具有个人和社会责任感，没有教育孩子为自己的未来制定规划，也没有发挥孩子的聪明才智，让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譬如去观察和了解大自然的奥妙，亲自动手进行试验等。由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缺乏应有的相互信任，以致在孩子幼小的心里产生一种无所依靠的恐惧感，缺乏自信心，对别人采取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有时孩子偶然打碎了一件东西，便不敢承担责任，而用说谎的办法加以应付。使我感到奇怪

的是，跟家里大人一起到田里干活的农村小孩，却比社会地位较优越、经济条件较富足的家庭的孩子更忠诚老实。

出于对国家进步和荣誉的关心与热爱，我认为有必要就怎样培养下一代的问题坦率地谈几点看法。

在我国，对孩子的教育父母负有特殊的责任。伊朗的儿童深感母爱是他们生活中的支柱，母亲温暖的胸怀是他们避难的栖身之所。对孩子说来，母亲有责任为他们的生活舒适辛勤操劳；在遇到困难时孩子可以求助于母亲，他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母亲的爱抚。

假如偶然的不幸使孩子失去了母亲，那么其他人就应该给孩子以温暖和爱抚。因此，我认为开设教养院和孤儿院具有重大的意义，在第八章我已从各方面叙述了增加和扩建这些机构的情况。

但是为了培养孩子们的社会责任感，光有母亲的爱抚和温暖还是不够的，每个孩子都需要在幼年生活中注意培养主持公道和遵守纪律的品德。母亲应该使孩子从小养成说实话和敢于承担责任的习惯，教育孩子不要推诿责任，老是讲“这不赖我”这句从大人那里学来的口头禅。

孩子们应该从小就敢做敢当，不规避由于粗心大意做错了事所应负的责任。在幼年时期，母亲应该在孩子纯洁的思想园地上撒下人道主义和敢于负责的种子。倘若做母亲的不挑起这副重担，那么孩子将会变得放荡不羁，有碍于社会的发展。

母亲应该为孩子制定明确的计划，让他们从事有益

的活动,做些有利于智力发展的游戏。

我十分重视儿童玩具的供应。我知道,伊朗儿童由于缺乏好的玩具而在智育和体育方面得不到充分的发展。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出产大量的轻巧而廉价的玩具,一如我在美国和欧洲所看到的那样。近来玩具生产业逐渐兴旺起来,这使我感到由衷的喜悦。

在男孩子度过幼年时期之后,就要为他们生产一些与机械建筑有关的玩具,以便在提高他们兴趣的同时,使他们熟习这类工作。我本人就在玩耍这些机械玩具当中度过了自己最有趣的少年时期。

这类玩具对孩子养成劳动习惯很有好处,至少可以清除他们那种认为体力劳动不体面的错误而有害的思想,使他们不把体力劳动者看作是卑贱的人。我们应该学习先进国家的一些好的作法,使少年儿童尊重由于进行体力劳动而弄脏的双手。

今天,在试验室里工作的学者总是要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这乃是现代人们活动的楷模,我们应该引为学习的榜样。

在伊朗,象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女孩子总是喜欢布娃娃,对之尽其“小母亲”的责任。无疑,这种天生的兴致对教育具有重大意义,应该向她们提供这类玩具。同样,还应该培养孩子们探索自然奥妙的兴趣。譬如,利用花园对他们进行有关植物学和园艺学的初步教育,培养他们爱好饲养鸟类、鱼类和牲畜等。

喜欢照料动物的孩子,自然会增强热爱人类的情感,

使自己养成善良和助人为乐的品德。

我们的教育机构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广泛的爱好和兴趣。譬如，我国有各种矿藏和很多文明古迹，应鼓励少年们去采集矿物标本和熟悉历史遗迹。孩子们应该从小参加体育活动，尤其要多从事集体项目的体育锻炼，以便增强他们的互助精神。同时，要教育他们在比赛时不计较胜负得失，因为那是毫无意义的；应该重视的是，在困难面前要表现得坚强不屈，充分发挥团结互助精神。

目前在伊朗为学龄前儿童建有数千所国营和私营幼儿园，担负着教育儿童的责任。应该说幼儿园在教育儿童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却取代不了家庭教育，也弥补不了孩子们缺乏良好家庭教育的不足。在家庭教育得到改善之前，孩子们在道德上的缺陷是难以避免的。

现在来谈谈小学和中学教育问题。毋庸置疑，目前小学的教育方法和学生的状况应该进行彻底的改革。

我们的许多小学教员，自己就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要完成教学任务，便显得知识贫乏，似乎难以胜任自己的工作。

在我们的初级小学里，孩子们只会鹦鹉学舌，死记硬背，教员不引导他们开动脑筋，独立思考问题，也不启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养成说老实话的习惯。我们的教员大都是富于理想和具有埋头苦干精神的，但因缺乏教学设备，手头没有好的教科书，所以不能把教学工作推向前进。再说，他们的工资微薄，还得经常为住宅、家具等困难伤脑筋。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一九五八年教育部成立了“初级教育事务管理局”，以便妥善处理教员遇到的各种难题。此外，还成立了“家庭业务管理局”，其职工全部是妇女，它负责制定适合国立初级和中等女子学校使用的有关家庭业务的教学大纲。为了使学生掌握农业和植物学方面的知识，在小学和中学均开设了植物课和农业课。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帮助下成立“教育统计局”，是我们为加强教育工作的计划性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这个局成立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关于教育状况的精确统计，因而影响了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般说来，注意统计数字是国家的基本任务之一。如今看得很清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不重视制定计划和没有精确的统计。因此，它们的改革方案不明确、不坚定，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们面临的另一个基本困难是缺乏优秀、称职的教员。假如我们为普及义务教育而修建上千所初级小学的话，那么我们不但要扩建现有的师范学校，而且还要另外修建数百所大型师范学校，才能保证所需要的师资。

一九五九年全国共有师范学校五十所，其中普通师范学校二十七所，农业师范学校十二所，体育师范学校三所，游牧部落的师范学校八所。后者专门培养在流动小学工作的教师，他们随同游牧部落一起四处迁徙，驻扎在某地后，就在帐篷里开课。在二十七所普通师范学校中有六所女子师范学校，数量少的原因是姑娘们对读

师范学校不感兴趣。

近年来成立的技工学校深受女青年们的欢迎。假如入学条件适当的话，必将有大批女青年报考这类学校。

我希望在初小学习的女生同男生的人数能尽快地取齐，为此，应该鼓励更多的妇女从事教育事业。当然，在我国并不是非得女教师才能教女学生，因为在小学和大学多是男女混班，教课的老师男女皆有，他们根据各自的专长开课，并不考虑学生的性别差异。可是中学男女混校的情况还不甚普遍，所以女校的师资就感到缺乏。根据现有的统计，目前四分之一的国立小学是男女混校，随着小学女生人数的不断增长，就需要越来越多的女教师。因此，我主张迅速增加女子师范学校的数量，最好达到普通师范学校总数的一半。

我还主张试办男女混班的师范学校，在这样的学校里，男女青年将一起被培养成为教师。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能促进男女青年的相互了解。假如这种了解导致他们结为夫妻，那他们便可以一同到遥远的农村小学去教书。他们因为有共同的爱好和志向，就会安心地完成崇高的教学任务。

随着国家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改善教学计划和提高师资水平便成为我们的一项艰巨工作。我们很多教师的知识水平只相当于中学六年级，有不少教师还达不到这个程度。因为我们迫切需要教师，所以教师的水平即使不高也比没有强。但为了使孩子们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则非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教师的知识水平不可。

提高师资水平的方法之一是组织暑期训练班，这种办法现已实行，应该予以发展。我们急需培养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教师，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指派经验丰富的优秀人员担任师范学校的教学工作，就是说，通过师范学校知识渊博的教员培养出我们所需要的师资来。

师范学校的教员大都是经验丰富的，然而，其中有大学毕业文凭的还只是少数人。看来应该迅速扩大德黑兰高等师范学院。我还认为其他城市的大学里也应该开设高等师范专科。另一方面，很多国家进行的试验表明，初级师范学校的优秀教员并不一定是高等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因此应该鼓励那些在德黑兰或外国的科技和文学专科毕业并通晓教育方法的年青人从事重要的教育工作。

为了迅速普及初级教育，应该强调发挥地方居民、父母和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他们应该下决心为做好这项有益的工作而努力奋斗。过去我们基本上是将教育事业的领导大权集中在德黑兰，这样做对于启发地方上的国民协助政府发展教育事业效果不佳。今天，我国各地人民对发展教育事业的意义有了深刻的认识，很多农民情愿节衣缩食，也要在自己的村庄修建学校，以便他们的子女能受到教育。

自从我们向明智的国民发出关心与支持教育事业发展的呼吁后不久，全国各地便陆续出现了在先进国家流行的那种“家庭与学校协会”。但我认为，对于象伊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说来，前进的步伐应该迈得更大一些。在第八章我阐述了关于政府和人民在教育、卫生和其他公

共福利事业方面进行合作的看法，在本章我只想强调指出，为了修建学校，教育部应该制定符合当地条件和地理特点的正确规划，提供地方上无力筹备的建筑材料，并监督建校工程的实施。而地方上的农民和庄园主则应当提供建校用的地皮、他们能够筹备的建筑材料以及工人等。

事实证明这个方法是行之有效的，目前由官方和民间合办的学校正在农村迅速地修建起来。我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看到除了应该在省、市修建的大型中学外，所有的小学校全是采用这种方式兴办起来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上述学校建成后应该采取怎样的管理方法和由谁来进行管理。在德黑兰市郊的一个村子里，有一所小巧玲珑的国立初级小学。它有若干教室和几个车间，男女学生们在那里读书，并学习木工和纺织等技术。这所小学有一个排球场和一个比较宽敞的运动场。虽说学校雇用了一位工友，但学校和运动场的清洁卫生主要是由孩子们自己负责。当人们走近这所学校时，会看到一个鲜花盛开的小花园，使校园显得很优美，在花园的后面有一块专用菜地，这菜地和花园全是小学生自己动手开辟的。在校园里还为教师修建了美观大方的宿舍，解决了教育工作者感到头痛的住宿问题。

这所设备简单然而齐全的学校是在一位前教育大臣的关怀和资助下建立起来的，他本人就住在这个村子里。显然，在别的地方同样也可以修建这种学校。

孩子们亲自参加学校事务的管理，这不只是一种极为有益的教育措施，还可以将节省下来的钱用于修建其

他小学。

现在来探讨一下有关我国的中学教育问题。关于伊朗近年来中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在德黑兰和许多城镇修建农业中学和中等技校等情况，前面已经谈过，这里不再赘述。总之，一九五九年我国有五千多名男学生在中等技校学习木工、管道工、电工和金属工等各种技能，有数百名女学生在学习缝纫和打字，另有两千多名男学生在农业中学学习农业新技术。取得这些成就还只是我们工作的开始，在象伊朗这样已走上发展道路的国家里，学有各种技术专长的青年人起码应该是现有人数的几倍。

专业技术教育的意义在象伊朗这样的国家里无论怎样强调都不算过分。许多伊朗人和到伊朗来的外国人大概以为我们头等需要的是工程师、经理和高级专家。毋庸置疑，我们确实很需要上述几种人，但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还不是这几种人，因为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国内外培养技术专家，目前他们中的一部分业已分配了工作。此外我们还可以利用到伊朗来执行援助计划的外国专家，或者聘请一些这样的专家。我们最迫切需要的也不是普通工人，因为我国的劳动力很多。我们感到最缺乏的是技术熟练工人和有经验的工段长。要发展工业、建筑业和农业，缺了他们是不行的。因此与其说我们需要上万的高级专家和工程师，毋宁说我们需要更多的中等技术人员、即技术熟练工人和工段长等。

要满足国家对高级技术人员的需要，我们可以从国

外聘请一批专家，但我们却没有足够的资金雇用大量外国的中等技术人员，这类人员只能在国内、在技工学校培养出来。

向日益发展的庞大的教育机构提供充足的师资，是我们遇到的一个大难题。没有教员，学校就办不起来；没有好的教员，好的学校也就不可能存在。目前我国的技术学校、农业学校的数量在日益增加，但由于师资不足，其教育水平并没有相应地提高。为弥补这个缺陷，就需要扩建首都和各地的工业学院，提高工科学生的业务水平，同时鼓励德黑兰大学技术系和阿巴丹技术学院的毕业生到技术专科学校去任教。还应该设法将在国外学习工程技术专业的伊朗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教育方面来，并迅速在各省市的大学里开设技术专科。为了加速完成这项重要任务，我们还得聘请足够的外国教员。

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中学教员、特别是教授技术科目的教员规定较高的工资，并提供舒适大方、租金便宜的新住宅。

教师能够与青年人在一起生活、学习，大概是最令人心情舒畅的社会职业了，但条件是不能因为孩子的吃穿问题使教师感到不安，也不能因为物质生活的困难而破坏他们的情绪。

为了促进中等技术和农业教育的发展，必须从全体国民的脑子里清除前面提到的那种轻视体力劳动的错误思想，使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个真理：创造性的体力劳动决不是醒瞇可耻的。有些小孩子，每当看到父母用铁锨

和镐头劳动时，自己就感到不光彩。还有些孩子把能穿上行政人员的制服和有一个政府官员的手提包（他们从来也不想那里面装着什么），作为自己最美好的理想。这些孩子总是极力逃避体力劳动，幻想着将来能在某政府部门工作，觉得那才是露脸的差使。

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富裕的孩子，从小“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这种思想就尤其严重。因为小孩子极善于模仿，喜欢学着家里大人的样子做。无疑，这种思想与今天科技界——人们奋发有为的场所——流行的思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结果，到他们进中学读书时，就会由于厌恶把体力劳动作为脑力劳动的辅助手段，而使国家丧失一部分能造福社会的劳动力。

到伊朗来工作的美国人引起我国青年注意的一点是，他们遵守道德原则。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们劝告人们要尊重体力劳动，这正是美国成功发展的原因之一。“四点计划”组织工作人员身体力行发扬这种优良作风，为我国青年树立了榜样。在我国青年的思想转变和使我国青年的思想与今天的时代相适应方面，他们的影响日益显著。兴办学校，以便传授行政事务方面的技术，是我国面临的另一项迫切任务。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遇到缺乏秘书、打字员等行政人员的困难。在我国，这种人员的缺乏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为教育部成立“行政学院”感到由衷的高兴。该学院五百多名男女青年分别在白天或晚上学习波斯文和拉丁文的打字、速记、英文、商业管理、档案管理、行政事务管理以及起草报告等专业技能。

该学院有部分学生只学习一门或几门课程，其他学生凡是全部学完三年课程的即可获得硕士学位。该学院的部分毕业生将被分配到中学去担任有关行政和商业课目的教学任务。该学院的学生自己动手修建食堂和其他娱乐场所，为自己创造了一种良好的学习环境。

目前大城市的中学已设有商业和行政专业的课程，我们将在全国所有的中学都开设这类课程。

“四点计划”组织和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也制定了教授行政管理技术的计划。虽然如此，我们仍感到十分缺乏行政管理人员，现有的国立和私立学校不足以满足我们的需要，特别是能熟练运用两国以上语言的翻译人员就尤感缺乏。国家的需要为女青年提供了良好时机，只要够条件，她们就能在陆续成立的国家机构里找到适当的职业。在这方面美国的私人企业和其他类似机构或许能同我们一道作出努力。

上述专业学校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应该大力发展；其他中等学校也应该做好自己的工作。中学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工作能力，并在家庭和小学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激发青年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培养他们成为忠诚老实的人。

过去的中学对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注意不够，只知道让学生死记硬背，学生们若是提出问题进行讨论，则被认为是愚蠢的和没有礼貌的。大文豪菲尔多西约在一千年前写的《王书》，竟被荒唐地列为中学的历史教科书。这部巨作虽说是世界文学名著之一，但却不适宜作为正式

的历史书，不能把它的情节视为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波斯语中“故事”一词的含义象世界各国的传奇故事一样，是讲述与神话传说相混杂的历史事件的。这些故事世代相传，流传下来，只能使人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一些历史知识，了解一些老祖先们的业绩，而不能把它们与历史等同起来。为改变上述状况，我父亲曾实行过教学改革，如今仍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譬如有几位教授编撰了五册供城市中学用的教科书，由教育部负责出版，现已分发到各中等学校。目前我国中学的教学计划逐渐与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的教学计划趋向一致。

但是那种把“故事”看得比历史事实还重要的倾向，以及只重视死记硬背的旧教学方法，至今仍然存在，这不利于启发学生的钻研精神，也不利于培养学生进行独立思考研究问题的习惯。克服上述缺点的方法很多，现将其中三个方法叙述如下：

第一，在中学开办图书馆。开办图书馆对初级小学也是必要的，但对于中学和大学来说则更加必要和有意义。因为中学生有能力对其爱好的学科进行研究，以便获得更多的知识。目前我国拥有现代化图书馆的中学还不多，其中只有几所中学把在图书馆看书进行个人钻研列为正课。

中学生大都学习英语或其他外国语，所以除波斯文书籍外，图书馆还应向学生们提供外国书报杂志。对于关心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慈善机构说来，若能为各级中

学修建些小型图书馆,那将是值得称赞的。

第二,改革现行的考试制度和考试方法。教育机关总是用考试成绩来衡量教师的业务能力和教学水平,这一点在教育部主持学校考试的伊朗尤其如此。我感到高兴的是,目前这种对考试的垄断现象业已有所削弱。然而,对考试方法还必须实行基本改革。考试不应该只注重学生的死记硬背,而应该考查他们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能力。事实证明,采用新的考试方法还能促进教师的教学工作,使他们的工作态度更加认真负责。这样下去,我们便能提高学生研究问题的能力,使他们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第三个方法最重要,即培养高水平的中学教师。目前我们很多中学教师只有高中毕业水平。当然,不少中学教师由于教学实践和个人刻苦钻研,水平有很大提高,还有些教师因参加暑期训练班或教学讲座,丰富了自己的知识。譬如一九五九年夏天就有一千五百多名中学教师参加了在德黑兰举办的教学讲座。

总的说来,中学教师为国家作出了宝贵贡献,但仍需采取有效措施,以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如前所述,我们计划扩建德黑兰高等师范学院,其目的不仅是为初级师范学校培养师资,而且还要为中学培养高水平的教师。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增加优秀中学教师的数量。譬如可以雇用数百名从国内外各大学的自然科学、艺术、文学和社会科学等科系毕业的伊朗青年,采取适当的方法使他们掌握教学业务,即可充当称职

的中学教师。如前所述，还可以通过在各省市大学开设高级师范专科，为中学培养优秀的教师。为鼓励女青年到中、小学去任教，我们正在付出极大的努力。

普通国民和大学生也能够发展中、小学教育事业中助政府一臂之力。修建中学要比修建小学花的钱多，因此不能光依靠国民的资助。可是，为了加速建设学校，必须鼓励地方百姓与政府合作。地方上可以提供地皮、建筑材料和适当的经费，还可以向教师提供膳宿和其他可能的帮助。学校建成后，要尽可能地让学生们参加学校管理，可向学生收取每月的检修费和其他必要的开支费用。这样做既节省了教育经费，还能使学生熟习管理事务，懂得什么是社会职责。

我认为，手工技术教育不应该只局限于技术学校和农业学校，而应该推广到全部中学中去。女学生对绘画和音乐可能更感兴趣，但此外还应该使她们学会管理家务，在这方面要给她们以实践机会。

在西方，女学生的家务活部分是在学校、主要是在家里从母亲那儿学到的。但在刚进入发展阶段的我国，情况则恰恰相反。很多伊朗家庭，包括那些有文化教养、经济富裕的家庭，在烹调、卫生和照料孩子等方面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伊朗女青年对管理家务和照看孩子感到十分为难，她们不得不在学校学会有关的技能，掌握必要的知识。由此看来，中学的家务课并不是为了消遣娱乐，而是一门迫切需要的正课。

我主张所有的中学生不仅要掌握各种自然科学知

识，而且要进行各项手工劳动。为此应该在每所中学设立工作间，使学生在接受教育的同时生产一些有益的东西。譬如可以生产些孩子们十分需要而市场上不能充足供应的简单玩具。还可以象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那样，出版载有科学研究和体育活动消息的校刊。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方面，最令人注目的是中东第一流的学府德黑兰大学的巨大变化。外国学者对于这所大学校园的优美、科系的完备及其科研活动的迅速发展总是称赞不已。德黑兰大学除拥有宽阔的校园而外，还有大片的空地和各种科研机构，在它的北部修建了几幢学生宿舍大楼和一些娱乐场所。显然，过去没有学生宿舍的德黑兰大学有了惊人的发展。

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教学上，德黑兰大学也取得了令人喜悦的进展。尽管这方面的进展速度不够那么理想，但由于采用了最新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在不断提高。关于这所高等学府，我想发表六点主要意见，这六点意见对于德黑兰大学和我国其他大学的未来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第一点，我们有些大学教授过分地自信和高傲，倘若有人对他们的见解提出异议，或者学生们想占用点时间提出疑难问题，他们均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

这样的教授在课堂上讲课时，假如某个学生对他已经表示看法的问题要求做进一步的论证，或者学生本人对问题做出另外的解释和分析，他就会认为是无礼的行为。这种教授有时不事先打招呼就不来上课，也不遵守

为解答学生的疑难问题而规定的质疑时间；除了上课时间外，在校园里难得见到他们的影子。幸亏这类教授寥寥无几，而且他们的错误作法和态度受到了同行们的斥责，否则实在令人伤脑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我相信教授们决不会推卸培养和指导青年的基本职责，也不会推卸完成这项职责的道义上的责任。

第二点，科学研究问题。真正高级的教授几乎全是科研人员，他们在奇异的自然界面前，在哲学、社会科学、艺术和文学领域里，是极为谦虚谨慎的。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象好奇的孩子似地热衷于探索科学和文学的奥妙，由于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和无数次的试验，他们的知识宝库越来越丰富。在他们看来，向学生们教授的那门自己非常熟悉的学科，并不是一大堆僵死的、枯燥乏味的材料，只须鸚鵡学舌一般地照本宣科就行了，而是一种生气勃勃、不断变化的学问。由于他们自己和别人进行的科学研究，以及深切了解他们工作价值的聪明学生的努力，这个学科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多彩。可是也有些大学教授总喜欢炫耀自己的知识和地位，殊不知正是这种自我吹嘘恰好说明他们知识的浅薄。他们当中有的人根本不做科学研究，专事抄袭外国书本里的东西，作为自己的教材；讲课时却又不指明出处和原作者。他们偶尔也写点东西，可是由于缺乏材料和科学的论证，所以总是抱残守缺，没有什么价值。他们使用的教材全是一成不变的死材料，从来不用文明世界的新发现和科研成果充实自己的教课内容，试问这样的教课有什么真正意义呢？

谈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天,两个研究人员,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伊朗人,就两国文明的历史地位发生了争执。中国人狂妄地说:考古学家在他的祖国挖掘出了电线,这证明中国人在古代就已经使用电报机,由此可见是中国人发明了这种通讯工具。伊朗人争辩说:在伊朗进行的考古挖掘工作中,没有人发现电线,这说明伊朗人在古代就使用无线电发报机!

在科学和工业高度发达的今天,诸如此类的荒诞论证是欺骗不了任何人的。然而令人诧异的是,有些教授在某些方面正是以这种论证方法来教育学生的。因此,有的学生虽然读完了自然科学某个专业的全部课程,但却连一篇材料丰富的科学论文也写不出来。

当然,在大学教授当中,也有兢兢业业从事科学研究,做出了发明创造的。譬如,德黑兰大学的一位教授从有机化合物中提取出了一种物质,经过德国一家重要实验室的化验,证明它是一种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发现过的新的化合物。大学教授们还在医学(特别是恶性疟疾)农业学、文学和波斯语诸方面进行了可贵的研究工作。目前,各大学计划让教授们自己分配授课和科研的时间,以便克服科研工作时间不足的缺陷。

第三点,建立设备齐全的图书馆,这乃是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最基本的条件。值得庆幸的是伊朗各大学、尤其是德黑兰大学有上万册古代的线装书,以及有关各方面的全套新书和杂志。可是图书馆的管理方法尚有待改善,如今还不能为教授和学生的科研工作提供极为方便的

条件。大学每个系都有自己的专业图书馆，但其管理方法十分落后。比如，它们按照书的厚度或者按照图书馆进书的日期排列藏书；最坏的是，出借给学生的书数量少得可怜。

目前，德黑兰大学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中心图书馆和一个负责各系图书馆业务的管理机构，这个管理机构将录用在国外学过图书馆专业的年轻人，办理各项业务工作。我想国际慈善机构大概会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

第四点，师生关系问题。那些毕业于美国和英国大学的伊朗学生都认为，他们的知识主要是通过教授的私下交谈和讨论取得的，正是这种私下的交谈与讨论鼓舞着他们从事科学研究。在教授家里作客，与教授家里人相识欢聚的情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希望，这种良好的作法在德黑兰大学和其他大学也能实行起来，教授能同自己的学生单独地或集体地讨论功课，解答学生们提出的疑难问题。教授应当经常地在自己家里接待学生，假如没有这种热情和愿望，那就不配称作教授。

第五点，应在大学里成立职业介绍所和指导机构。除了专业指导是教授对学生应尽的责任而外，青年学生应该有机会跟学校的专家就自己未来的职业和其他个人问题进行磋商，寻求指导。如前所述，一九五八年德黑兰大学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聘请了男女两位顾问教师。但是这还不够，应该使每个系都有一位经验丰富的顾问教师，担任指导学生的工作。目前，国家正在实行经济和工业发展的各项计划，作好大学毕业生的计划分配是一

件意义十分重大的事情。富有远见的指导不仅会给每个学生带来好处，而且对于满足国家需要和执行我们未来的计划也是完全必要和非常可贵的。

在伊朗象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大学生通常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或者参照父亲的职业，或者根据某人的建议，或者受优越社会地位的引诱，选择自己未来的职业和规划今后一生的道路。假如青年学生能得到劳动部有关工作分配的准确情报，并以此为根据选择自己未来的职业，那么肯定可以使自己的生活过得安稳，又可以为国家做出必要的贡献。

大学还应该成立一个职业介绍所，以便学生们能在学习期间得到必要的经济上的补助。

我认识一位伊朗青年，在美国学习时期，每年暑假都到底特律一家汽车制造厂工作。他的工作是安装汽车零件，拧紧汽车排汽管的螺丝。在这项工作中，他了解到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管理方法。现在他是“计划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当年在美国底特律学到的知识如今发挥了作用。这位青年回国后，向亲友们述说了自己在底特律汽车制造厂劳动的情景。亲友们告诫他不要谈这类事，那会有损于个人的尊严。但他毫不理会这种无知的劝告，依然为通过体力劳动改善了自己的经济状况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伊朗大学生同世界各国大学生一样，也会在解决吃、穿、住、行、用等方面遇到些困难。暑假在校外找点工作，或者为学校做些事情，得到一定的报酬，既能够帮助他们

解决些困难,又能够使他们得到有益的锻炼,这种作法应该提倡。同时我希望,美国男女青年在大学学习期间相识结婚的作法,也能引起我们的重视。事实证明:结婚的男女大学生仍能获得硕士学位,拿到这种光荣证书后,女方可保持学位,男方则继续自己的学业,以获得副博士学位。

值得重视的最后一点是,大学生的课外活动问题。在我参观美国的大学时,引起我极大注意的是大学生俱乐部。学生们与自己的朋友在俱乐部相聚,一起读书、听音乐、从事各种娱乐活动和讨论各种有趣的问题。大学的职业介绍所和指导机构就设在俱乐部。学生们常到俱乐部去,与它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家”。但愿这种俱乐部能在我国各大学建立起来。我还主张加强大学生的宗教精神生活,为此,几年前我下令在德黑兰大学修建了一座壮丽的清真寺。这座建筑式样新颖的清真寺,附带有长廊、花圃和草坪,学生们可以在那里聚会,在心旷神怡的环境中进行宗教活动。

我对各省新建大学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它们当中有的正在卓有成效地进行着教育制度的改革和试验。我极力反对这样一种错误思想,它认为教授们要确保自己的学术地位,就不应该离开德黑兰而到各省的大学去任教。事实上,各省新建的大学发展潜力很大,是获得学术地位的理想地方。这些大学为不同意上述错误看法而决定离开首都到外地任教的人打开了锦绣前程。

我赞助各高等院校之间开展竞赛活动,为了在从事

教育、科研和担任大学生指导工作的教授中间创造竞赛气氛,我们将全力以赴地进行宣传鼓动。

为了推进各高等院校之间的学术竞赛,我们应该仿照美国大学的样子,在伊朗修建一所新式大学,聘请一批美国教授担任它的教学工作。我想,具有独特地位的漂亮城市设拉子是修建这座大学的最适宜的地方,我们可按照上述设想改建现有的设拉子大学,或者在那里新建一所大学。

在伊朗开办一所美国式的大学,我国青年就不一定要到外国去留学了。一九六〇年伊朗有一万四千多名青年在国外学习,其中大部分是大学毕业生。在这些留学生中,约有四千人在美国,其余的分别在西德、英国、法国、奥地利和其他欧洲国家。一九六〇年中东国家留美的大学生中,伊朗留学生约占三分之一。这个相对多数令人十分振奋,但是应该看到,它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的是,有许多伊朗学生在美国大学的各个系科学习,这将有利于满足我国开发计划的广泛需要。在美国的伊朗留学生半数以上是在自然科学、机械和农业机械等系科学习,还有不少留学生选择了与我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农业、教育和商业等专业。

这里应该提一下“美国中东爱好者协会”这个慈善机构,它在选择学习专业、介绍各大学情况和报考等方面给予我国留学生以必要的帮助和指导。这个机构至今仍在做这项工作,几乎每年都有数百名伊朗学生到该机构设

在德黑兰的办事处去，征求有关上述各方面的意见，以便取得它的帮助。

我父亲极力主张选派留学生到国外去深造，我完全赞成这种主张。但是不可否认，有些到国外留学的伊朗青年不善于使自己与祖国的社会状况相协调，他们在国外毕业后，就不愿意回国了；或者他们回来了，还想再离开，住到国外去。

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发达的国家，在那里住上几年的伊朗青年自然会受到极为深刻的影响，偶尔也可能与美国女人结婚，而她们是不愿离开自己的家庭到伊朗来的（虽然有些美国女人熟悉伊朗的文化风俗，也能习惯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有些伊朗留学生在美国找到了诸如教员、机关工作人员等类似的职业，其薪水乍看起来似乎比在伊朗得到的要多。还有些留学生对我国行政机关的拖沓和紊乱，以及缺乏娱乐消遣设施——这在发展中国家当然不会象在美国那样丰富——感到不快。他们忘记了，即使高度发达的美国，在国家机关和私人企业里也存在杂乱无章和拖沓现象，也可以看到盗窃、凶杀、抢劫和违法乱纪的行为。

我认识一位青年人，留学美国几年回到伊朗后，对国家的状况感到十分悲观丧气，一个人闷在屋里几个月都不愿露面。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时在德黑兰虽然看到了国家事业的发展，但却认为是原始的、低级的。后来他想找点事情做，便给亲友们写信，并以到邮局寄信为借口，才算迈出了自己家的大门。过了好久，他才清醒过来，重

新认识到自己祖国的伟大，逐渐地习惯了本国的社会环境。目前这位青年在一个与社会福利事业有关的重要职位上为国家效劳。到外国进修的伊朗青年虽然对留学国家的文明很感兴趣，但其中许多留学生都能以坚强的毅力抵制留学国家的种种影响；遗憾的是，每年总有些学有所专长的伊朗青年顶不住留学国家的影响而不愿意回国，致使国家的科技力量遭到不应有的损失。

爱国的有识之士们长期以来就在寻找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其中有人建议，今后伊朗只向有现代化的教育设施却没有美国那种诱惑人的巨大财富的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国家派遣留学生。以我看这项建议还是值得考虑的，因为到这些国家去的伊朗留学生回国后比较容易适应本国的生活状况，能较快地恢复自己原来的生活习惯。还应该指出，美国之所以对我国青年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肯定有它的独到之处。因此明智的作法是，应该在国内创造某种适当的条件，使从美国或者欧洲各国回来的伊朗留学生不至于过分地感到烦恼和不安。有鉴于此，我在一九五九年指派我的女婿阿尔德希尔·萨希迪先生——他曾在美国学过农业机械，对于消除我国留学生当中存在的这种自然的烦恼有极大的兴趣——在这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以便采取必要的措施。他成立了一个由了解青年学生思想状况的老留学生组成的专门委员会，着手进行有关的工作。

阿尔德希尔·萨希迪先生于一九六〇年初出任伊朗驻美国大使。但愿他能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向有思想顾虑

的伊朗留学生灌输新的精神，通过他与留学生的经常的直接联系使他们摆脱悲观情绪的束缚，满怀信心地返回伊朗，为自己的祖国服务。劳动部也准备与留学生建立联系，以便在国外学习期间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并根据归国留学生的专长和爱好制定适当的工作分配计划。

劳动部的基本想法是，在烦恼不安的思想在留学生的头脑中扎下根来之前，就将其彻底铲除掉，这我是完全赞成的。譬如，一位学农业机械的留学生若能了解我国开发计划的进展情况，并坚信毕业回国后能找到适宜的工作，那么，即使国外有较舒适的生活条件，他也肯定会愿意回国的。我们应该鼓励青年人的爱国主义和积极进取精神，以加强我在第六章详细论述过的积极民族主义的原则。祖国灿烂的历史光辉照亮了我们的前程，只要我们为青年人提供必要的机会和条件，使他们得以施展自己的本领为先辈们生活过的地方效劳，那么他们的爱国主义是完全值得信赖的。

有关这方面的另一个建议是，尽快地发展国内的高等教育事业，以便青年人能在国内得到深造，而不必去国外进修。在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叶，美国的大学生在国内仅能获得硕士学位，因此大批的美国青年跑到欧洲各国去留学。但没过多久局面便改观了，美国青年为了取得硕士以上学位，不必再留学欧洲了。

目前伊朗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我国的高等院校迅速地向前发展，必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与此同时，想到外国留学的伊朗青年正在相对地减少，伊朗留

学生中那种烦恼不安的情绪正在逐渐地减弱。我一贯主张我国的青年学生和教师应该到外国去学习，但我的用意在于使这件事具有交换的性质，即伊朗的青年学生和教师为丰富自己的学识到其他国家去，而外国的学者和青年学生也到伊朗来分享我们的科学知识，从我国悠久的历史源泉里吸吮丰富的营养。前面指出的修建美国式的大学，就是为此而采取的一项措施，今后我国各高等院校都应该在这方面作出必要的努力。

我极为关心伊朗教育事业的发展，以至在这方面无论讲多少话，只能表达我内心愿望之一二。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正是这种高速度使我感到无比的快乐，因为我坚信伊朗的未来、伊朗青年的未来、世界这个地区的人民的未来是与科学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的。

第十二章 伊朗石油

石油工业是世界新型工业之一，它最初是在美国兴起的，在中东首先经营这种工业的则是伊朗。

美国的原油蕴藏量约为三百五十亿桶，伊朗的石油储藏量恰好也是这么多。

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石油及其副产品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性，但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知道，自由世界石油储藏量的百分之七十在中东，而其中的五分之一在伊朗。若把加拿大、委内瑞拉和铁幕以外其他国家的石油资源计算在内的话，那么自由世界石油储藏量的绝大部分、即百分之八十以上在美国和中东。当然，石油矿藏的新发现可能改变这个统计数字，可是不要忘记，石油专家们许多年来一直在勘探石油资源，每在一地发现油苗，就将其估计蕴藏量统计下来了。由此看来，假如自由世界各国骤然失去中东石油的供应，那么一些石油消费国和石油生产国的经济就将陷入极度的混乱。换句话说，在大自然把这种宝藏埋在中东地下深处的几百万年以前，就奠定了中东与自由世界其他国家相互联系的基础。人类发现了这种大自然的恩赐，找到了使用石油的

方法，并将其用于各种工业，这样，宝贵的石油资源便成为紧密联结中东与世界各国的经济纽带。

石油工业是在一百年前兴盛起来的，而使用从地下冒出来的原油则是几千年以前的事了。譬如古波斯人用它燃起祭火庙的圣火，埃及人用它烧制木乃伊，希腊人用它点燃奥林匹克火炬，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用它来照明举行篝火舞会。很早以前伊朗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便懂得把那由地下冒出的原油凝结而成的煤焦油用于盖房、铺路、修贮水池、弥合船只裂缝，以及铺地面、砌墙壁、盖天花板、安装自来水管、建筑堤坝、制做打火机等等。天然气在古时候也没有白白浪费，象胡泽斯坦省拜火教徒的寺庙便修筑在有天然气冒出的地方，以便燃火祭天。

在近几百年中，石油业逐渐形成一个工业部门。十八世纪末，在缅甸成立了石油贸易公司，它经营的全部油井都是手工挖掘的。使用机械开采石油是从美国开始的，埃德温·L·德里克上校在宾夕法尼亚州开凿第一口油井时，由于耗资巨大，他的公司几乎陷于破产。钻井之初很多人把他看成疯子，可是后来当他钻井成功，因而获得高额利润时，人们的看法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无不称赞他是具有远见卓识的聪明人。

德里克开凿的油井深度不过七十呎（目前伊朗和其他产油国开凿的油井深度一般均在一万呎以上），每天采油只有三十五桶（今天伊朗一些高产量的油井可以连续几年每天出油三万桶），但是他确实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他不愧为世界石油工业的奠基人。

德里克不仅找到了开采石油的方法，而且找到了使用它的方法。他开办的公司成功地用石油物质试制出一种膏药，对医治德里克本人腿部的风湿症和其他风湿症均有疗效。德里克还发明了提炼原油和生产煤油的方法，此后不久，煤油便代替昂贵的鲸鱼油被用于照明，其消费量日益增加。这时亨利·福特设计制造出汽车，于是汽油的需要量大幅度地增长了。稍后人们又制造出飞机，这样对汽油的需要量就更大了。这期间，与石油有关的轮船、蒸汽机、新式狄塞尔内燃机相继问世，化学等工业蓬勃发展，使工业界对石油及其副产品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在油矿附近发现的天然气也被用来取暖和发动机器，成为有使用价值的工业原料之一。沥青则被用来修建街道和汽车公路。

石油工业的利益一旦显露出来，欧洲的工业家、科学家和资本家便接踵来到中东勘查石油。关于废除一八七二年给予英国人路透的各种专利权，以及一八八九年再次给予他的有限租借权，在第二章已经谈过，兹不赘述。路透根据再次获得的租借权成立了“伊朗矿藏开采公司”，并着手勘探和开采包括石油在内的各种矿藏。该公司先在伊朗南部勘探石油未获成功。几年后，伊朗政府取消了路透对某些矿藏的开采权，该公司便于一九〇一年宣布解散。

应该指出，早在路透开始勘查石油之前，基尔曼沙总督就知道该省有石油蕴藏，并于一八九一年指令当时在伊朗的法国考古学家小组负责人雅克·杜莫尔根进行石

油勘查，这乃是对伊朗油矿进行的第一次科学调查。杜莫尔根写的调查报告发表在法国的一家科技杂志上，后来编纂成书。继这次调查之后，又有几个欧洲国家的勘查小组调查过我国的地下资源分布情况。

杜莫尔根的书和其他勘查小组的调查报告引起了英国人威廉·纳克斯·达尔赛的注意。此人因在澳洲开采金矿而发了大财。他于一九〇〇年派其助手到德黑兰游说，以期获得开采石油的特权。结果伊朗政府不顾俄国人的反对，于一九〇一年将为期六十年的石油、天然气、煤焦油及其他石油物质的开采权拱手出让给达尔赛。

根据协议规定，达尔赛将在两年内成立一家石油公司，该公司须交给伊朗政府价值两万英镑的股票和两万英镑的现金，以及该公司百分之十六的纯利润。上述石油租让权的范围几乎扩及伊朗全国，只有北方五省因考虑到俄国人的威势才没有包括进去。

达尔赛石油公司的总工程师里努尔德兹不畏艰难险阻，克服重重困难，在伊朗南部边远的炎热地区破土开凿油井。一九〇二年钻出的第一口油井一无所获，但他并未丧失信心，终于在一九〇四年一月钻探第二口井时见油了。该井每天喷油一百二十桶，这使当时陷入严重经济拮据的达尔赛稍微松了一口气；可是不走运，油井当年就枯竭了，达尔赛的资金几乎耗费净尽。

那时英国海军当局认为，将来石油肯定会取代块煤而成为海军舰艇的燃料。就在第二号油井干枯，达尔赛濒于破产之际，路德·菲什尔被任命为英国海军总司令，

他因极力主张建造以石油为燃料的军舰，竟被一些鼠目寸光的人称为“石油狂”。路德·菲什尔成立了石油委员会，负责研究解决向英国海军提供充足的石油燃料一事。该委员会对伊朗石油资源及其开采的可能性早有所闻，便建议达尔赛与缅甸石油公司合作，次年缅甸公司同达尔赛联合成立了石油辛迪加，保证了继续在伊朗勘探石油的经费开支。

勘探伊朗石油工作在新成立的石油辛迪加的指挥下继续进行，可是直至一九〇七年末，即经过五年艰苦的钻井工作之后，开采出的石油仍然少得可怜，看来石油辛迪加的前途并不美妙。里努尔德兹总工程师不甘心失败，决定在放弃伊朗石油之前，再作最后一次尝试。他和工人们一起在距阿巴丹一百五十公里远的马斯杰德·苏莱曼清真寺废墟附近钻探了一口新油井。

一九〇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里努尔德兹的努力终于获得成功，该油井喷出的油柱高出钻井塔五十多呎！这一天堪称是中东石油工业的开端，不愧为中东地区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性日子。

有时我想，究竟是什么动机激励着这些石油工业的先驱们不顾艰难险阻非要达到目的不可呢？显然他们艰苦奋斗、百折不回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为了名利双收，一箭双雕。但我很怀疑他们的主要动机仅仅就是为了牟取名利。我认为那些开拓石油工业发展道路的先锋战士，那些吃住在石油塔旁，成年累月与钻机的轰隆声作伴，同各种艰难困苦打交道的人们，是受到一种探险精神和开创

新领域的激情的鼓舞。我们国家为发扬这种精神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我相信勤劳勇敢、富有上进心的伊朗青年一定会把开凿第一口油井，从而奠定了石油工业基础的那些意志顽强、坚韧不拔的人们引为自己的表率。

马斯杰德·苏莱曼清真寺附近的另外两口油井不久也出油了，里努尔德兹经过长年的艰苦奋斗之后，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极其丰富的石油。今天那里仍然是富饶的产油区。

石油钻探工作的进展促使一家新的更大的英国石油开采公司诞生了。英国人必须首先同强大的巴赫蒂亚尔人达成某种协议，方能着手开采石油，因为这个部落统治着马斯杰德·苏莱曼一带地方，拒不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我父亲登基为王之前，中央政府极其腐败无能，国家的南部和其他地区掌权的实际上是封建领主和部落可汗。勿庸赘言，要发展石油工业没有安全保障是不行的，可是当时的中央政府显然无力维持全国各地区的秩序和安宁。因此，英国石油开采公司在试钻的头几年，只好依赖巴赫蒂亚尔可汗保障其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该公司在钻出石油之后，巴赫蒂亚尔可汗自然会提出更多的权利要求。结果一九〇九年四月巴赫蒂亚尔石油公司宣告成立，这样巴赫蒂亚尔可汗便享有从当地石油开采中获取利润的好处。与此同时，石油公司沿用英国人“分而治之”的老手法，极力支持地方可汗与中央政府闹对立。作为提供这种支持的报答，巴赫蒂亚尔可汗禁止其部落成员侵犯公司所属企业的利益，并确保采油地区的秩序和

安宁。包括上述内容的协定达成后，创办了英波石油公司，后称英伊石油公司，再后又改名为英国石油公司。

新建的石油公司制定了开采石油和向市场供油的积极计划，可是在兴建炼油厂和筹备石油运输工具之前，遇到了治安方面的一个麻烦问题。原来那时候哈兹伊尔或称穆罕默拉（今天的霍拉姆沙赫尔一带）的阿拉伯部落酋长，名义上服从中央，实际上大搞独立王国，俨然以土皇帝自居，根本不把中央政府看在眼里。部落酋长的华丽宫殿现已成为废墟，在船只往来的夏台阿拉伯河岸和霍拉姆沙赫尔港附近仍看到它的遗迹，昔日阿拉伯酋长就在这座东方式样富丽堂皇的宫殿里与妃嫔们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英国政府与这位阿拉伯酋长签署了协定，承认他是独立的统治者。

根据上述协定，阿拉伯酋长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承担下列义务：对英国石油公司采取友善态度，并把阿巴丹岛上一英里长的荒无人烟的平坦沼泽地划归公司使用，以便在那里兴建炼油厂。作为割地的代价，英国政府保证阿拉伯酋长的独立。从马斯杰德·苏莱曼至阿巴丹的油管铺设工程尽管遇到重重困难，还是于一九一二年完工了。到一九一四年末，阿巴丹炼油厂已能提炼大量的石油，并计划继续加以扩建。

伊朗石油总产量一九一二年为四万三千吨，一九一三年为八万吨，一九一四年达到二十七万四千吨，这样我国理所当然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国家。

这时间预示着世界大战的阴云可怕地笼罩在欧洲的上空。一九一二年英国政府对于战争期间的石油供应甚感焦虑，英国当时的海军大臣温斯顿·邱吉尔极力主张购买英伊石油公司百分之五十一的股票，以保证英国海军战时的需要，英国议会直到战争爆发前六天、即一九一四年八月才通过购买石油股票的法令。

虽说战争给伊朗带来了巨大困难，但上述法令还是发生了效力，使我国石油产量在战争年代仍有所增加。战争初期，与德国结盟的土耳其军队侵夺了英伊石油公司在巴格达和巴士拉的全部资产，土军气焰嚣张威胁着阿巴丹，后被派到伊朗的英军击退。德军曾企图在夏台阿拉伯河炸船，以堵塞这条海上运输线，也因受阻于英军，未能得逞。一九一五年伊朗的游牧部落在德国和土耳其间谍的煽动蛊惑下，切断了马斯杰德·苏莱曼和阿巴丹之间几处主要的输油管道，致使石油运输停顿了好几个月，后来才重新修复。虽然德军对远洋货轮的不断袭击妨碍了石油机械的进口和石油物资的输出，但伊朗石油的产量及其出口量依然有所增长，一九一五年、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我国的油产量分别达到三十七万六千吨，四十四万九千吨和八十九万七千吨。

我想专家们大概会一致认为，伊朗石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获胜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正如英国人洛德·柯尔逊所说：“事实上我们的后代将会说，协约国是在石油浪潮的推动下达到胜利彼岸的。”不言而喻，伊朗石油乃是这股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虽说如此，我

们同英国政府的关系仍然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形，因为直到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之前，英国始终是我国石油的主要股东。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伊朗石油产量继续增长，英伊石油公司改善了阿巴丹和产油区工人的生活条件。

一九二〇年英伊石油公司和伊朗政府缔结了条文繁冗的新协定，总的看来其内容对伊朗略微有利。根据该协定，伊朗政府可获得公司纯利润收入的百分之十六，这似乎与原先达尔赛答应过的条件基本相同，不过这个百分之十六还包括英伊石油公司的附属企业（如石油运输公司等）应该交付的款项。

虽然缔结了上述协定，可是我父亲对英伊石油公司的作法并不满意。一九二一年政变后，他立即聘请伦敦有名望的统计学专家威廉·麦克林托克爵士审查石油公司同伊朗政府之间的往来账目，看看手续是否完备。威廉爵士在账目中果然发现了一些“黑数字”，后来我父亲在伊朗政府对石油公司提出诉讼时，曾引用过这些数字。

一九二二和一九二三年间我父亲多次出兵征讨违抗政府的各游牧部落，当伊朗西部库尔德人、中部卢尔人和南部加什盖伊人表示归顺中央政府之后，他便打算降服巴赫蒂亚尔人。这时，英国驻德黑兰特命全权大使向伊朗政府发出照会，威胁说政府军若进犯英国的朋友巴赫蒂亚尔部落的话，他所代表的国家决不会袖手旁观。我父亲毫不理睬这种恫吓，继续进行讨伐的准备。巴赫蒂

亚尔部落酋长见势不妙，只好改弦更张，采取现实主义态度，对中央政府表示臣服。此后不久，我父亲又决定出兵征服穆罕默拉阿拉伯酋长，因为他长期以来投靠英国政府，公然违抗中央政府的命令。一九二四年秋，我父亲不顾英国人的反对，亲自率领二万二千名精兵向南方进发，他在一个月时间内，没放一枪一炮就平息了穆罕默拉阿拉伯酋长的反叛，这位酋长被押送到德黑兰。在首都酋长受到很好的礼遇，但却不得擅自行动，这样过了几年，他便在首都去世了。

我认为，平息阿拉伯酋长的反叛而兵不血刃这件事应归功于我父亲天生的大无畏精神。当时政府军驻扎在反叛酋长控制的城市周围，我父亲下令按兵不动，而他自已却孤身闯入城内。酋长的士兵在街道和屋顶上巡逻，清楚地看到他大摇大摆地穿过街道，走进市内一家公共浴室。这当儿若向我父亲开枪是十拿九稳的，可是没有一个士兵敢于这样做，因为他们被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惊呆了，以致丧失了开枪的勇气。

我父亲逊位之后，英国驻德黑兰特命全权大使里德·布劳尔德爵士有一天坦率地说：“英国政府从穆罕默拉阿拉伯酋长垮台一事中吸取了教训，决定今后再不介入伊朗游牧部落的事务。”

在远征伊朗南部地区的过程中，我父亲对本国石油工业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一九二二年，他正式参观了油城阿巴丹，受到隆重的欢迎和殷勤的接待。但他对石油公司的经营方式仍表示怀疑，因为有人告诉他石油

公司五分之一以上的职工是外籍人员，而且没有任何旨在将他们更换为伊朗职工的有效措施。我父亲亲眼看到，公司高级职员和普通工人之间的生活水平相差太悬殊，而且石油公司还经常干涉该地区的内政，特别使他感到不安的是，石油公司只根据国际市场行情的变化和同其他石油公司签署的协定来规划石油产量，而根本不考虑伊朗经济的需要。

有人说，一九三三年我父亲宣布废除石油租借权是盲目而轻率的，这纯粹是无稽之谈。礼萨王早在即位之前就对一九一九年英伊协定极为不满，他曾强烈要求石油公司在与伊朗政府打交道时采取更公正的态度。

一九二五年礼萨王政府表示对石油公司的作法不满，并于一九二七年向它提出抗议。此后双方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谈判，但未能取得任何成果。这期间发生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伊朗石油的销售量因之减少，收入下降。一九三二年石油公司通知伊朗政府说，一九三一年付给伊朗政府的特许税将要比头年减少四分之一。礼萨王认为采取措施的时机已到，遂决定废除该公司的租借权。国民议会批准了这项决定，全国人民倍受鼓舞，纷纷在各地举行庆祝聚会。我父亲通过这件事，激发了伊朗人民的民族主义精神。

石油租借权的废除，引起了石油公司和英国政府的哄动，几天后这件事便闹到国联。在国联会议上，双方各述己见，据理力争。最后国联决定，由伊朗政府和石油公司进行具体协商。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双方终于在一

一九三三年四月达成了新协定。

该协定的条款繁杂，内容有些含糊不清，但我认为比较前一个协定对伊朗政府更有利些。该协定规定英方的石油租借权将延至一九九三年，这是令人遗憾的；但从贸易角度看，当时确实不能缔结短期协定。此外，石油公司拥有的采油面积缩减了，其范围被限制在十万平方英里之内，这样任何外国石油公司便不再拥有在伊朗全国（北方诸省除外）任意开采石油的专利权。

根据上述协定，我们剥夺了石油公司在伊朗境内运输和分配石油物资的特权。协定还规定，付给伊朗政府的特许税不再由公司方面单独决定，也不再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协定规定的特许税额虽然未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但它却规定了伊朗政府每年应得利润的最低限度，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每年能得到一定的收益。此项规定在石油市场危机的年代对我们特别有意义。关于由伊朗工作人员接替外籍职工、加快钻井速度以及在基尔曼沙近郊建立炼油厂等问题，也是该协定的重要内容。

一九三三年协定签署之后，伊朗政府同石油公司的关系有所改善。公司为表示自己的诚意，在我国进行了新的巨额投资。除了签署协定前已有的三个采油区外，公司又开辟了四个新的大采油区和一个天然气开采区。公司采用地下储油的新方法，发展了储油技术，并扩建了阿巴丹炼油厂，使之更加完备。石油公司根据协定成立了子公司——基尔曼沙石油公司——以便开采基尔曼沙一带丰富的石油资源。公司敷设了通往基尔曼沙的石油管

道,长度为一百五十英里,还在那里修建了一座小型炼油厂,其产品供伊朗国内消费。

修建基尔曼沙炼油厂一事表明,我们同石油公司的关系并不总是称心如意的。我父亲当时要求石油公司修建一座年产十万吨的炼油厂,可是公司不同意,它硬说伊朗国内消费不了这么多石油。我父亲坚持按照他设想的规模修建炼油厂,并答应为全部石油产品提供国内市场。事实证明,我父亲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目前伊朗国内每年的石油消费量已达三百万吨,这个消费量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五,乃是我们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显明标志。一九三八年,石油公司的产油量超过了一千万吨,相当于十年前产油量的两倍。此外,公司为将外籍职工换成伊朗籍职工采取了某些措施,阿巴丹技术学校为培训伊朗工作人员提供了必要的方便条件。公司还以现代化的标准规划城市建设,努力改善阿巴丹市民的居住和卫生条件,增加了供水和供电设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运输和其他方面的困难,石油生产一度有些下降。但在石油产量最低的一九四一年,仍不少于六百六十万吨,这个数字恰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高年产量的七倍。

根据我父亲同英国人达成的协定,石油公司保证每年至少付给伊朗政府的特许税为四百万英镑,这与战前收益最多的一九三八年的特许税额相等。

石油产量在大幅度下降的一九四一年过去之后,又开始逐渐回升。一九四四年达到一千三百二十万吨,超

过战前的最高年产量，一九四五年达到一千六百八十万吨。

二次大战后，石油公司制定了发展石油企业的庞大计划。当时世界各地的大型炼油厂都在扩建，但阿巴丹炼油厂的规模仍然是首屈一指的。

一九四七年伊朗石油总产量为一千九百二十万吨，一九四八年为二千四百九十万吨，一九四九年为二千六百八十万吨，一九五〇年达到三千一百八十万吨。此后几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石油产量不及前几年。一九五一年的油产量不超过一千六百七十万吨，即略高于头年产量的一半，一九五二年的产量才一百万吨，即少于一九五〇年产量的三十分之一。正如我在第五章里所说的，摩萨台采取的政策不仅有损于石油公司，而且有损于他声称为之效劳的国民经济，正是摩萨台的政策使我国经济陷入了瘫痪状态。

在石油工业陷入停顿之前，伊朗的石油收入每年都有增加。石油公司原想以这种收入的增加作诱饵，使我和我国人民就范，对它言听计从。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朗被军事占领，以及战后苏联人的所作所为，导致我国人民产生了一种团结一致的伟大精神。我们十分厌恶外国人的盛气凌人态度，尤其不能容忍石油公司以施主的眼光看待我们。石油公司的某些负责人对于自己的伊朗下属，对于以礼相待他们的伊朗政府官员，态度极其傲慢，摆出一副老爷的架式，好象整个伊朗都是他们的附属品似的。

另外，我国和刚开始开采石油的其他国家都认为，过去的特许税是不合理的。那些外国的大石油公司在付出少量的特许税之后，便可以任意开采别国的地下资源，吞噬人家的自然财富，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我认为，沙特阿拉伯政府与美阿石油公司缔结的石油协定比较以往中东各国所签署的有关协定都更为公道，因为在我国石油工业国有化前一年缔结的这个协定中，规定了“对成分利”的原则。

在第五章我曾谈到，当时的首相拉兹马拉出席国王清真寺为一位阿訇举行的追悼会时不幸遇难的事件。事件发生的前几天，这位首相从英国人那里接到关于对半分配石油利润的建议。拉兹马拉的一位顾问表示，英国人的建议最好马上提交议会通过，以便缓和公众舆论。但拉兹马拉认为，最好先等待些时候，使国民的激昂情绪有所减缓，然后再向议会提出。也许正因为这个决定，才使拉兹马拉遭到杀害。不管怎样讲，英国人提出这项建议为时太迟了，那时伊朗人民的民族主义精神大为振奋，公众舆论一致主张立即实现石油工业国有化。

假如伊朗政府在石油工业国有化之后采取一项明智的政策，迅速增加石油收入的愿望或许能得以实现。那将是一种福气，我们会得到实行开发计划的足够资金。可是正如在第五章里提到的，事情的发展与我们的愿望恰恰相反。摩萨台与我父亲几次亲自视察阿巴丹炼油厂的作法相反，从来都不想去访问一下他喋喋不休谈论的石油工业中心，这一点或许能说明些问题。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看看摩萨台在执政期间是怎样对待国家石油资源的。摩萨台出任首相前不久的一九四九年，我们成立了“计划组织”，接着根据与之有关的法令，由政府投资创办了伊朗石油公司，以便着手勘探石油资源。一九五一年当宣布石油工业国有化时，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宣告成立，一九五三年伊朗石油公司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合并。

摩萨台上台执政的一九五一年，政府掌管的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拥有八个采油区、两座炼油厂、两座工厂，管理着输油管道、输油站、国内运输石油物资的交通工具、石油勘探设备、五万名职工，以及必要的福利设施等。石油危机时期，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妥善地维护和管理了采油区、炼油厂及其附属机构，料理了全体伊朗职工的生活，并且从未间断地供应了国内需要的石油，这对于弥补摩萨台造成的严重外汇匮乏具有特殊的意义。事实上，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因为经济困难不得不千方百计地紧缩开支，即使如此，它仍然成功地在国内发展了石油运输业。

除此之外，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便是一幅令人痛心的图景：作为世界主要石油生产中心之一的巨大炼油厂的产油量只能勉强维持本国——一个刚刚走上发展道路的国家——对石油的需要，这个举世闻名的炼油厂如今火熄烟灭，象废物一样被弃之一边，由此造成的巨大困难便可想而知了。一个国家甚至连勘探石油资源的能力都丧失殆尽，哪里会有什么未来工业的发展呢？

在第五章我曾指出，摩萨台政府倒台后，我们便立即着手弥补其错误政策所造成的损失，并成功地提高了石油产量。一九五二年油产量甚至低于一百万吨（几乎全部用于国内消费），一九五三年升至一百四十万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分别为两百万吨和一千六百万吨，而一九五六年则达到两千七百万吨。

一九五七年我国石油产量高达三千六百万吨，第一次超过了一九五〇年的产量——石油工业国有化以前的最高年产量。

一九五八年石油产量为四千一百万吨，一九五九年达到四千五百万吨，也就是说这一年的产量相当于一九五二年年产量的四十五倍，预计一九六〇年油产量可达五千万吨左右。还应该指出，目前我们获得的特许税是征税后石油公司纯利润收入的百分之五十，这笔款项比较过去大为增加了。

在这期间，为了充分开发我国的石油资源，在国际石油财团开采区（只占我国石油产区的一小部分）以外，我们还进行了其他的石油勘探工作。早在一九五一年下半年，由政府投资创办的伊朗石油公司便在圣城古姆附近开始筹备钻井，摩萨台时期的经济危机过去之后，钻井速度加快了，终于在一九五六年获得成功。该采油区第五号油井开始喷油，油柱高达三百呎，持续了八十二天，每天采油量约达十万桶，这是世界石油工业史上最高的单井日产量。

那些日子多么令人兴奋激动啊！石油象河水般在原

野上奔流，顷刻间汇集成一大片，望去恰似被微风吹起一片涟漪的湖水，平滑的湖面在阳光的照射下光彩夺目。为了控制住油井向外喷油，我们特邀世界闻名的美国油井消防专家米隆·肯纳里先生，请他立即乘飞机从得克萨斯州赶到伊朗来。这位专家在伙伴们的协助下，勇敢地担负起控制油井喷油的重任。在工作过程中，从井内冒出的天然气时刻都可能发生燃烧引起爆炸，造成不幸事故。但没过多久，古姆五号油井因地面下沉，而象过去达尔赛开凿的那口井一样停止了喷油。这口犹如雄狮般怒吼过的奇异油井，就象一头驯服的羔羊，平静而温顺地躺在那里。我们将湖中聚集成池塘状的石油拍卖出去，油湖便逐渐干涸了。

石油专家们普遍认为，古姆油田的迹象表明这里有大量的石油蕴藏。于是我们继续在该油田钻井，到一九五八年底钻井总深度超过了二十七公里。与此同时，我们在古姆以东五十五公里的萨拉杰地区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石油勘探，一九五九年初在那里发现了高质量的石油。同年，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绘制出第一幅国家地球物理地形图，掀开了我国工业发展史的崭新一页。

我一向赞助私营和国营的石油公司积极开展活动，正因为如此，我批准了议会两院在一九五七年通过的一项有关法令。在这项法令中，除了其他的规定外，还允许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与外国石油公司就合作开发伊朗石油资源问题进行洽商。一九五四年我们与国际石油财团签署的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协议书，而在新法令里则规定

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在必要时有权直接与外国公司缔结协定，条件是缔结的协定必须得到伊朗议会两院的批准。新法令通过后不久，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便邀请各外国公司来伊朗参加有关取得某些产油区开采权的投标。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在投标中提出的条件，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立即轰动了国际石油界。

那时我决心在开发国家石油资源方面采取新方针，具体地说就是，第一，取消以前那种单纯缴纳特许税的作法。根据石油工业国有化法令，凡是到伊朗来勘探石油的外国公司和企业，要么以伊朗政府代理人的身分从事活动，要么在实际工作中与我们携手合作，此外没有其他的形式。确定代理人问题在一九五四年的协议书中已经阐明，它规定国际石油财团有权使用原英伊石油公司的设施；合作的问题则在后来缔结的协定中得到了落实。

第二，凡是想在伊朗开采和生产石油的外国公司，均应对我国政府和我国石油资源抱有信心，它们在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石油勘探，其经费要完全自付。当然，在全国许多地区进行过地质勘探调查的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会给外国公司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可是每家外国公司首先要敢于承担一无所获的风险，在估计到这种可能性的前提下，自愿掏腰包提供勘探石油的全部活动经费。

第三，外国石油公司一旦获得商品石油，伊朗政府就要参与石油生产的财务和行政管理，我从伊朗的民族主义精神出发十分重视这一点。我向来不赞成外国公司和企业为所欲为地插手我国工业的要害部门，伊朗政府必

须有效地在这类公司企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外国公司应该相信我们会认真执行明智而正确的政策，因为我们同它们的利益是一致的，都希望管理好石油开采和生产。

第四，我决心增加伊朗政府所得的石油特许税。在我看来，“对成分利”也是不公道的，它不符合伊朗人民的民族愿望。石油收益的分配，必将朝着有利于我国的方向转化，这是肯定无疑的。在我们开始实行新政策时，有些外国的石油公司鼓噪反对我们，国际石油卡特尔说什么我们这样做是为小失大，只能取得暂时的利益，而使国家的收入源泉枯竭，它们在华盛顿极力地反对我们的新政策。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美国驻德黑兰大使也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同外国石油公司缔结含有新内容的协定。

某些外国石油公司象遭到失败的原英伊石油公司一样，对于我们的民族主义愿望采取了极端不友好态度。在一段时间内，美国政府似乎犯了英国人在石油工业国有化前三年内所犯的错误。但是，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它完全合乎情理。现在外国石油公司逐渐地明白了：它们无法协调一致，共同反对我们的主张；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态度也有了改变。

一九五七年八月，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与意大利阿吉普石油公司签订了第一个新石油协定，一九五八年四月又同美国泛美石油公司（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子公司）签署了第二个新石油协定，第三个新协定是同加拿大沙法伊尔石油有限公司共同签订的。意大利和美国的石油公司根据协定立即采取了行动，而加拿大的石油公司

却令人遗憾地没有象我们期待的那样展开工作。

上述三个新协定内容大致相同，三家外国公司的主要石油勘探区都规定在伊朗南部，包括波斯湾沿岸和沿海水域。其中只有美国泛美石油公司在初步的石油勘探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下面我们就以它为例，说明有关新协定的某些问题。

美国泛美石油公司同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合作进行石油勘探的地区是在海底。起初因为人们不大了解这种勘探石油的方法，所以感到很惊奇。其实，美国、委内瑞拉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早就进行这种工作了，它们都有巨大的海底油田。近年来开采海底石油资源的方法在科技上已有相当大的进展。

在与美国泛美石油公司达成的协定中规定，若在协定签署后十二年内，公司仍不能获得商品石油，那么所确定的勘探地段必须全部归还伊朗政府。假如公司在某地很快获得了商品石油，那么头一个五年结束时，所确定的勘探地段将减少百分之二十五，第二个五年结束后，将再减少百分之二十五，到协定满十二年时，缔约者只能保留生产商品石油的那部分地段，其余的则一律归还伊朗政府。只要将这个协定与过去同路透和达尔赛缔结的石油协定稍加比较，就不难看出新、旧两种协定之间的明显差别。

按照协定的规定，成立了伊朗泛美石油公司，在德黑兰注册备案。该公司的股份由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和美国泛美石油公司平均分摊，两家公司各任命半数董事，组成

该公司的董事会。伊朗泛美石油公司的职责是：第一，勘探石油，其经费全部由美国泛美石油公司一方承担；第二，生产商品石油，由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和美国泛美石油公司共同负责。

根据协定，美国泛美石油公司须在协定签署后的三十天内，支付现金两千五百万美元购买股票，并开始勘探石油。在此后的十二年内，它至少还要提供八千二百万美元的石油勘探经费。假如公司用少于这笔款项的资金获得了商品石油，那么结余下来的经费应与伊朗政府分摊；若在规定的十二年期满后，公司仍未获得商品石油，那么就将白白损失八千二百万美元，还得放弃它所拥有的勘探权。假如公司如愿以偿地取得了足以进行贸易的商品石油量（协定中对此有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就要正式通知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通知发出后，伊朗泛美石油公司作为一家联合公司将迅即着手采掘石油。

在此协定和其他新协定中，均对石油收益的分配方法作了明确的规定，我希望对石油工业感兴趣的人们能研究一下这些协定的内容。

根据与美国泛美石油公司达成的协定来看，石油总收益的百分之七十五将归伊朗政府所有，公司仅能得到其余的百分之二十五。为什么这样讲呢？理由十分简单：按照协定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和美国泛美石油公司将平均分摊所得的石油总收益，各得百分之五十。另外伊朗政府有权从公司所得的石油收益中征收百分之五十的所得税，就是说，伊朗政府又得到石油总收益中的百分之

二十五，加上前面提到的百分之五十，总共就是百分之七十五。

据我所知，此协定和我们同意大利石油公司缔结的协定是迄今为止石油主权国家与石油开采公司按照百分之七十五比百分之二十五的比例进行石油收益分配的第一批协定。

令人感到诧异的是，某些石油界人士极力否认上述协定与过去“对成分利”协定之间的明显差别，他们说过去的“对成分利”协定没有反映出真实情况，今天的七十五比二十五的分利原则实际上与“对成分利”原则相差无几。说这种话的人心里明白，他们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一旦他们有了求实精神就会承认，我们在分配石油收益方面所采取的新政策，正象目前在伊朗实行的那样，势必推广到其他国家去。至今死抱住“对成分利”原则不放的人忧心忡忡，生怕他们不能团结一致地维护这个原则而遭到失败。然而，问题在于过去的作法已失去它的魅力，该“寿终正寝”了。不久，本书的读者将会看到“对成分利”原则被石油生产国彻底地抛弃。

因为上述协定比较新鲜，所以有些石油界人士对它感到担心。可是只要看看新协定在伊朗的实行情况，就知道他们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我们从未打算为了取得暂时的巨额利润而牺牲自己牢固的经济来源，以致妨碍国家事业的发展。我们的目的是使收入源泉更加稳定而合理地造福于国家。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在新协定中做出了有些人感到担心的规定，其实这些规定只能导

致外国石油公司同我们更密切的合作罢了。

那些对于我们同外国石油公司（例如美国泛美石油公司）合作共事的做法感到担忧的人，忽略了下述两点：

第一，我们对石油利润的关心并不亚于我们的外国同事，因为实际上我们获得的利润比他们还要多，自然会加倍努力地促使石油公司获得成功。

第二，我们参与生产管理，应该使我们的外国同事更加安心，而不是相反。因为经验多次证明：外国石油公司单独地在某个国家进行采掘石油，总会招致该国人民和政府或多或少的不满和反对；但若有该国政府的代表也参加石油公司的管理，那么公司就有希望得到该国政府的支持与帮助，这对采油工作的顺利进展是十分重要的。当然，政府官员也会犯错误，但他们给予公司的帮助肯定比他们所造成的困难要多，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我们与美国泛美石油公司缔结的协定执行情况良好。石油公司支付了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储金；伊朗泛美石油公司作为一个伊朗公司宣告成立，并登记备案；向美国订购了下面将要谈到的重型机械设备；在协定确定的勘探地段内，花费二百五十万美元完成了一项地震波调查（使用灵敏度极高的录音机等仪器，把在海底进行爆炸时产生的声波记录下来，从而测定油床的位置）；为了查明勘探地段的地层结构状况，特用安置在船上的价值七十五万美元的精密仪器，测量出该地段的重力和吸力压强数据；必要的重型机器设备陆续运来，安装在施工地

点。一九五九年十月钻井工作正式开始了。

海底油井的钻探机械和设备十分引人注目。其中有个活动钻井台活象一艘大铁船，长二百呎，宽一百零四呎，高十五呎，连同安装在上面的附件一起，总重量为六千吨。这个钻井台有八根立柱，每根立柱高达二百二十五呎，它们被深深地埋入海底。立柱支撑的钻井台高耸在水面上，任凭风吹浪打，钻井工作丝毫不受影响。钻井台上搭起的钻井塔高一百四十呎，台面上备有直升飞机起落的场地，还可以安装起重机、抽水机等机械设备。在这艘“大铁船”的甲板下边设有现代化的船舱，可供六十人住宿，并装有三台发电用的狄塞尔内燃机，配有一些小型机器和一台每小时可把一千加仑海水变成淡水的蒸馏机，此外还设有修理车间和大型仓库。这个活动钻井台是用世界上最大的远洋拖轮从一万一千英里以外的墨西哥湾它的制造场运至波斯湾的，如今钻井台上正在日夜紧张地进行着钻井工作。

另一项设备是一艘供钻探用的大船，上面设有发电机、抽水机、油管箱、污泥池、备用物资仓库以及海员住房等。工程的中心是钻井台，它象小岛一样浮在水面上。钻井台不仅有上面提到的钻探船与之联系，还可通过小船和直升飞机与它取得联系。钻井台若是采出石油的话，则可通过海底输油管运到岸上来。

海上钻探油井每天的经费是一万五千美元，通常需要昼夜施工十个月才能打出一口井，这样每开凿一口井就需要大约四百五十万美元。当然也可能钻探几年而一

无所获,对此我们和我们的美国同事是心中有数,采掘石油蒙受损失的可能性相当大,这在世界各地都不例外。凡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一定要具有坚定的信心,就象一九〇八年在伊朗采掘石油的先驱者们所做的那样。既然他们能以坚定的信心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而获得成功,那么我们就应该信心百倍地努力奋斗,任何时候都不要灰心丧气。

应该指出,我们在国家未经开发的地区发展石油工业的同时,将继续在举世无双的石油中心阿巴丹进行大规模的采油工作。阿巴丹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是一个庞大的工业中心,而且是一座具有独特风格的城市。据我所知,象阿巴丹那样人口密集的城市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

凡是到伊朗来观光和想了解我国悠久的历史的人,必然会到阿巴丹去游历一番,到伊朗旅游若是不去阿巴丹,那将是美中不足的事。阿巴丹和德黑兰由一条行驶着现代化列车的铁路线联结起来,两座城市之间还有班机来往。乘车或乘飞机去阿巴丹旅游的外国人,可顺路到胡泽斯坦省其他城市去转转,以便亲眼看看那里实行宏伟的开发计划的情况——在第七章已有叙述。关心国家事业发展的伊朗人,同样可从到阿巴丹和胡泽斯坦省的旅行中得到教益,并感到愉快。

阿巴丹是庞大的工业生产中心,整个城市到处洋溢着一片生气勃勃的劳动气氛。阿巴丹的城市建设美观大方,布局恰当:大型炼油厂座落在市中心,紧挨着运输繁

忙的卡仑河，一排排的住宅楼整齐而美观。阿巴丹堪称是一座国际城市，世界各地的人都到这里来做买卖，运输石油物资的各国商船井然有序地排列在港口内，海员和船工们则在阿巴丹城里落脚休息。在阿巴丹美丽繁华的大街上，人们随时可以遇到各种国籍的经理、专家、职员、工人和他们的家眷，还可以看到在各机关工作的伊朗、英国、美国、法国和荷兰等国的女士小姐们。近年来，将外籍职工换成伊朗职工的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目前外籍工作人员总共不超过三百人，正是这些人及其家属赋予这座工业城市以独特的国际色彩。

阿巴丹的冬季气候舒适宜人，各种户外运动如足球、橄榄球、板球、排球、高尔夫球、网球、骑马、划船以及娱乐飞行等都适合开展。夏季天气炎热，人们蜂拥到具有现代化设备的俱乐部和剧院去娱乐消遣。有时我会想，大概是阿巴丹炎热的天气使得那里的各国居民互相合作，友好相处的吧。

在这座城市工作的经理和专家都认为阿巴丹是个令人鼓舞的好地方，正如他们当中一个人说的：“凡是从这所‘大学’毕业的人，具有到各地从事工作的才干。”

在阿巴丹完成的事业是伟大而有意义的。譬如那里的炼油厂拥有十个分解原油的大型蒸馏车间、十个煤油车间和四十多个其他的炼油车间。仅仅炼油厂，每天消耗的天然气就达六千多万立方呎。炼油厂所属的发电厂是中东最大的发电厂之一。炼油厂的两个水泵车间，为工厂和居民提供工业用水和饮用水，它们是日前建成的

设备最新、规模最大的水泵车间。

阿巴丹炼油厂的石油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地，其中主要的有飞机汽油、发动机汽油、汽油（内燃机、卡车用的）、石油、油脂和沥青等。炼油厂备有生产各种石油产品所需要的化学原料。阿巴丹市拥有两千三百多辆小轿车、公共汽车和卡车，三十台内燃机车，一百辆出租汽车，还有二十八只蒸汽拖船，五十六艘轮船和四十二只机帆船。炼油厂安装了十条自动电话线路和十五个交换台。该厂用无线电设备与飞机和轮船保持联系。长达一百六十英里的输油管道把炼油厂同各产油区连接起来，就是说，输油管从至今仍在出油的马斯杰德·苏莱曼第一口油井起一直伸延到各大油井，使它们彼此相互通连。

阿加贾里油田可以称之为世界上最富的油田。该地区的居民象阿巴丹一样是由各种国籍的人组成的，那里的住宅、商店、俱乐部和娱乐场所等的建筑式样也同阿巴丹别无二致。

阿巴丹的石油产品一部分供应国内消费，大部分则运往国外，换取外汇，以此保障我国开发计划的经费。比如在一九五九年就有八百六十艘油船驶离阿巴丹港，有一千二百五十艘油船从正在迅速扩建的马舒尔港开往国外。

从阿巴丹运出的石油产品多是经过提炼的，而从马舒尔港运往国外的则是原油。目前在离阿巴丹一百五十英里、位于波斯湾的哈尔克岛上是一片繁忙的景象，那里正在建设大型码头，以便十万吨级以上的大型油船能在

那里停泊和运油。

伊朗石油工业这些现代化的巨大设施是属于谁的呢？伊朗人民知道这些设施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为此他们感到光荣而自豪。当伊朗人民了解到石油工业摆脱了过去的停滞状态而大踏步地前进，目前已能生产大量的各种石油产品时，怎么会不感到无比的骄傲呢？

有时我想，应该在宏伟的阿巴丹炼油厂，在大型油船停泊的码头，在产油区和遍布全国各地的石油批发中心的上空，竖起醒目的标语牌，用两种文字写上：“伊朗人民所有”的字样，使我国的男女老少、外国工人和那些从世界各地来的人永远铭记这句话。

深刻地理解伊朗人民是大型炼油厂和各种石油设施的真正主人，这一点对我们说来意义极为重大。

然而，伊朗人民仅仅拥有石油资源和石油企业的所有权是不够的，还必须妥善地管理它们，才能造福于全体国民。谁都知道，石油生产是一项困难和复杂的工作，一定要由高级专家和有学识的经理来掌管才行。现在伊朗人民已把石油资源的所有权牢牢地掌握在手里了，我们计划将石油工业的生产管理权也逐渐地掌握起来，为实现这个目的，我们采取了两项基本措施：

第一，尽量地从伊朗人当中选录职员，为此，我们已敦促国际石油财团的领导人减少外籍职员的人数。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至今还有几位外国顾问和专家在工作；此外，为了执行堪探和开采石油的新协定，我们还聘请了几

位外国专家。但是在各大型石油企业里供职的外籍人员已经减少了许多，目前他们的人数总共不过几百人，我们计划还要加以缩减。

第二，启用伊朗人负责掌管和领导石油企业。在这方面我们要慎重行事，不能轻率地去做那些力不能及的工作。首先应该从简易的工作入手，然后逐步地将比较重要的职务交给伊朗人承担。

有关阿巴丹炼油厂的生产情况，前面已经谈过，这里不再赘述。目前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正在逐渐地从国际石油财团手中接过社会福利方面的事务。譬如，炼油厂职工的医疗卫生、住宅的建设和维修等，已改由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负责。此外，建筑市内大楼、铺设道路、增添住宅设备、维护炼油厂地区的秩序和安全、管理阿巴丹技术学校和发展炼油厂的教育事业等等，也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职权范围内的事。

到一九六〇年下半年为止，国际石油财团在阿巴丹的职员中已有三分之一的人直接接受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领导，这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和国际石油财团彼此谅解和合作的结果。在阿巴丹炼油厂管辖的其他产油区也实行了同样作法，伊朗国家石油公司担负起那些地区社会福利事业方面的领导责任。

然而，我们考虑的计划远远超过了这个限度。在第七章我曾指出，将输油管敷设到地中海的宏伟计划已经开始实行，在第八章我谈到，飘扬着伊朗国旗的油船正在远渡重洋。我们打算不久的将来，在国外建立贸易代办

处,以便向各国推销我们的石油产品。可以预言,在向全世界推销石油产品的过程中,我们将获得越来越大的收益。

今天伊朗的石油满足了几个国家的需要,我希望伊朗石油能以其出产国的名义驰誉全球,而不要以某个石油卡特尔或石油企业的名义闻名于世。

新型石油工业是建立在广泛的科学研究基础上的,因此,当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创办科研中心时,我感到由衷的喜悦。一九六〇年三月石油工程与钻探实验所宣告成立,法拉赫王后陛下亲自出席剪彩,这是我国在石油科研方面迈出的第一步。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要建立与石油生产有关的工程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和石油物理学等方面的实验所。我们的目标是,使这些实验中心在各方面都能与先进国家里类似的实验中心相媲美。

附带谈一句,上述的实验所恰好建立在列依城我父亲的陵墓附近,倘若这位伟大人物至今还活在世上的话,我敢肯定他会赞许这座体现着现代伊朗发展和进步的建筑物。

综上所述,我坚信伊朗人民有能力管理和发展石油生产,也一定能做好石油产品的批发工作。现在让我们看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对石油的需要达到了何等程度。

今天世界各国都在千方百计地寻找动力资源。英国在利用原子能方面一马当先,其他国家不甘落后,也在计

划修建原子能生产中心。美国的原子能潜艇遍布各大洋；苏联使用了原子能破冰船；一九五九年美国第一艘原子能商船下水，这艘船不必增添燃料，可连续航行三年半时间；德国、英国和其他国家为了打破石油的垄断地位，计划建造原子能运油船。不要很久，太阳能将成为石油的劲敌。与此同时，法国人在非洲大沙漠发现新的油田，在那里建立了大型石油企业。在利比亚也发现了一些新的油井。能量虽然在日益增多，但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却更加兴隆。因为动力燃料的消耗量增加得如此之快，即使发现一些新的动力资源，仍然难以满足世界日益增长的需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石油化学工业发展起来，因之需要更多的石油。石油化工产品在工业中用处很大，极为宝贵，以至用石油作燃料都觉得可惜。

专家们殷切地期望能用石油及其副产品和天然气制造出人类所需要的大量物资。几年前一位石油界著名人士说：石油化学工业使用的石油不会很多，充其量不过是石油大海中的几滴而已。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近年来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速度极快，据估计一九六五年美国这种工业的产值将达到一千万美元。

目前石油化学工业产品，如橡胶、塑料、尼龙、涤纶、化学肥料、杀虫药剂、防冻剂、建筑材料、玻璃钢、食器、颜料和上百种其他产品，每天大量供应市场。一九五九年世界各地建成和正在施工的石油化工厂有一百五十多座。毋庸置疑，作为石油化学工业原料基地的伊朗，对于世界这种工业的发展必将做出巨大的贡献。此外，正如

在第七章里谈到的，伊朗国内的石油化学工业发展也很迅速，一九五九年在法国专家的协助下建成的石油化工研究所必将有力地促进我国这种工业的发展。

总之，据专家们估计，在未来的十年内，全世界石油的消费量至少将比现在的消费量增加百分之七十五，天然气消费量的增加比这个数字还要大。

石油和天然气在工业界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点，对我们伊朗人极为有利。今天我们在石油工业中做出的努力将促使伊朗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通过对石油工业生产和分配两个方面的监督和管理，我们将更加巩固自己的石油主权。

第十三章 伊朗与世界和平

历史上中东地区从来没有稳定过，即便偶尔形势比较平稳，也只能看作是暴风雨前夕的寂静。比如，一九六〇年五月我到欧洲几个国家进行短期国事访问，归国途中再次路经土耳其时，我发现到机场迎送的土耳其官员全是刚上台的新人，老的一个也没有。显然这个国家发生了政变，却没有导致一场国内战争。

中东地区经常发生出人预料的事件，致使许多国家对制定明确政策以维持同这个地区的外交关系感到为难。同时人们注意到，中东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正在日益增强，这种联系的增强使人们在分析中东形势时愈加感到茫然。

专家们认为，中东问题本身已经非常复杂，再同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纠缠在一起，简直就成了一堆解不开的乱麻。

然而在我看来，解决中东的政治问题和保障该地区的和平问题并不困难。首先应该弄清楚，人们所谓的和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和平。我这样提出问题，并不是咬文嚼字，死抠字眼儿，因为热爱自由的人们不能为了争取和平

而放弃一切。比如蹲监狱也可以说是一种和平和宁静，有的囚犯甚至根本不愿意出狱；又比如精神病院常用“洗脑”的方法，使精神病人保持安静。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比如共产党大国的一些附庸国家不就是生活在某些人所说的“和平环境”之中吗？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什么减少国际冲突、巩固世界持久和平等等，其实心目中就只有上面说的那种和平。

明智的人们所渴望的和平，是真正而崇高的和平，在这种和平环境中，世界各国人民可以充分发挥聪明才干，搞好国家的建设。中东各国要想得到这样的和平，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要实行我在第八章谈到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我这样讲，不是要兜售一种纯粹的绝对的民主，而是主张实行有成效的民主，以便人们将这种民主同其他名目繁多的所谓民主加以比较和鉴别。以“人民民主”著称的所谓民主，其实质和内容与它引人注目的名字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第二个基本条件是确保国家不遭受渗透、破坏和侵略。我认为这两个条件是人民按照真主的意愿，发挥自己的才干，大踏步前进的基本条件。

然而，在居住着不朽人类的辽阔的中东地区，目前要实现这两个条件，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使自己具备这些条件，每当我们向这个目标迈进一步，都会增加我们的快乐与幸福。

现在让我们看看近些年来所发生的一些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为

共产党的渗透提供了良好时机。此后不久，“马歇尔计划”开始实行，它提供的外援数量之大是史无前例的。西欧国家借助这笔外援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很多项目的产量超过了战前的水平。

英国虽然相继丧失了许多殖民地，但它的国民收入仍超过了帝国时期的最高水平。法国在渡过战后初期的政局不稳之后，在工业方面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战后德国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希特勒专制政权被废除，代之而起的是该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政权。其他西欧国家也恢复了战争的创伤，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欧洲自由国家改善和加强了国防力量，这是它们的国民经济得以发展的基础。一九四五年联合国宣告成立，随后冷战的阴云笼罩了全世界。

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和第五十二条规定，为维护某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可以进行集体防御，因此在一九四九年大多数欧洲自由国家与美国和加拿大结成了联盟，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随后希腊、土耳其和西德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使北约组织的范围从北美一直伸延到亚洲。现在北约组织成员国总共有十五个国家：美国、加拿大、冰岛、挪威、丹麦(包括洛兰岛)、英国、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土耳其。

如今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只是一个军事联盟，而且体现着有共同理想的自由国家之间的一种友好互助关系。北约组织使自由欧洲人民精神振奋，它象一块盾牌

似的保护着他们,使他们在经济上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北约组织还为互助合作和共同承担责任树立了样板,它对于制定和实行欧洲地区的开发计划,就象铀原子一样具有巨大的推动力。

我认为几百年后,历史学家将会在其著作中把“马歇尔计划”誉为国际上无与伦比的慷慨援助的典范;同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将作为国际安全和互助组织的光辉楷模而载于史册。可是,总有些疑神疑鬼的人操着共产党的腔调,说什么“马歇尔计划”是蒙着一层薄薄面纱的美国帝国主义;稍后,他们又叫嚷什么美国参加北约组织是居心叵测的,其意图是想混水摸鱼,最终将欧洲置于其影响和控制之下。但是,我认为那些诽谤美国的人并不真正了解美国的历史和文明,他们对这个明智国家的切身利益,以及它的兴趣和爱好的判断,全是错误的。美国是有正确判断力的国家,它知道维持自己的繁荣与幸福乃至生存的唯一条件,是要有强大的、忠实可靠的朋友。

中东的具体情况虽然与欧洲千差万别,但从原则上讲却是一致的。西欧各国大都是经济发达的国家,而中东各国的经济却不够发达。战后欧洲各国迅速复兴,是因为新科学和新技术在那里有基础,而中东各国却要一切从头做起,这也是事实。但这两个地区的人民都强烈地要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步,都力图巩固和发展国防事业,以便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实现他们美好的理想。

杜鲁门总统觉察到先进国家与刚开始发展的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别,于一九四九年制定出一个新的计划,后来

人们把它叫作“四点计划”。由于这个计划受到我的热烈欢迎，所以杜鲁门总统把伊朗选为实施“四点计划”的第一个国家。联合国从一九四七年便开始向刚走上发展道路的国家提供为数不多的技术援助，到一九四九年联合国实行广泛的援助计划，伊朗也是受援国之一。

一九五〇年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制定了一个技术援助计划，叫做“科伦坡计划”，随后又将之扩大，把一些不属于英联邦的国家也包括进去。这样，在人类历史上，技术援助便首次被公认为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原则和要素。

目前许多国家都没有对外技术援助机构，它们直接地，或者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或者采取多种形式，向外国提供援助。在世界各国中，美国的外援规模最大，影响也最大，它向六十多个国家派出了执行“四点计划”的援外小组。联合国的技术援助机构在三十多个国家积极开展活动，它的专家小组跑的国家就更多。不少国家给走上发展道路的国家以大量的经济援助，向它们提供资金、粮食和工业设备等，在这些援助国当中美国是首屈一指的。

假如说旨在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后来扩展到中东地区，并给中东各国带来了巨大利益的话，我认为那是毫不夸张的。对此我们伊朗人是有亲身体验的。可以说这些经济和技术援助使中东地区各国人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关于在中东地区建立集体安全组织、即建立类似北

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样的组织方面，我们的工作进展得比较缓慢。前面我曾指出，冷战事实上首先是在伊朗、即在一九四五年发生阿塞拜疆事件时开始的，到一九五〇年末，共产党的渗透和颠覆活动便蔓延到整个中东地区。令人遗憾的是，在组织起来共同对付这种威胁方面，我们中东各国比欧洲国家落后了。

一九五一年土耳其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三年后东南亚条约组织(东约)宣告成立，巴基斯坦是其成员国。一九五五年，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后六年，才缔结了巴格达条约，这是战后在中东出现的第一个有效的集体安全组织。

自然的地理位置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相互连结起来。英国和土耳其都参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而巴基斯坦和英国又都是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成员国，由此可见这三个组织的关系非常密切。

在第六章我谈到伊朗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来改称中央条约组织(中约)——以及在巴格达条约组织问世两年后，我们又同美国签订双边安全条约的情况，我们为做了这些事感到十分高兴。这里应该指出，无论是中央条约组织还是我们与美国签订的双边安全条约，都不应妨碍我们与苏联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只要苏联人愿意，我们也可以同他们这样做。

有些人，特别是过激的左倾分子，不用说会对北约、中约和东约三个组织和其他任何旨在反对共产党侵略计

划的类似联盟极尽诬蔑攻击之能事。与这些被共产主义纲领迷住了心窍的人进行争辩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他们反对任何针对共产党的条约。但是我们还看到，有些极力否认拥护共产主义的人，也操着共产党的腔调，说些难听的话，我认为他们应该好生反省一下。我坚信，在最近十五年内，自由世界各国人民只要依靠我所说的国际集体安全组织的团结和合作，就一定能够免遭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在今后十五年内，自由世界各国也只能这么办，舍此是没有别的出路的。

如果硬要说在上述的可行办法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的话，那就是自由世界各国在共产党人的进攻面前甘拜下风，向后退却，让他们不放一枪一炮地侵占自己的大片领土。但是这种作法——假如可以把它称做“和平共处”的话——并不足以制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共产党人的入侵将使自由世界各国的力量逐步削弱，最后他们就能采取激烈的武力行动，给自由世界以致命的打击；假如自由世界各国被迫采取抵抗的话，那就有可能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国际集体安全组织从未偏离过联合国的基本目标，恰恰相反，从两个基本方面说来，它是依靠联合国的。一方面，联合国技术组织通过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为各国的开发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对于加强集体安全说来是非常宝贵的；另一方面，联合国有义务维护国际集体安全，这乃是加强集体安全的必要前提。比如，联合国为阻止共产党人对朝鲜的入侵而采取

的果敢行动，就是令人难忘的。同样，联合国为解决阿拉伯同以色列争端所做的工作，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在经济技术援助方面，因为联合国缺少充足的资金，所以它提供的援助还不能满足加强国际集体安全的需要。此外，我从来不同意在进行援助时眼睛只死盯住某一地区，我认为应该在各种援助机构之间开展友好的竞赛，这样才能使它们更出色地完成任务。

我们感到满意的一种援助是美国的“四点计划”援助。有些人认为人们忽略了四点计划的基本目的，即帮助刚走上发展道路的国家确保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他们说什么，美国政府近年来调整了自己的基本目标，把“四点计划”援助专门用来遏制共产主义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对“四点计划”精神实质的歪曲。据我所知，“四点计划”从一开始便具有阻止共产主义扩张和改善民主制度的性质，杜鲁门总统在其回忆录里说的话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写道：

“四点计划”乃是我们为了表明对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国家的态度，而采取的一个现实步骤。

这个计划是与我们遏制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的扩张政策相一致的。我们应该帮助自由国家，使之能向国民提供充足的粮食、住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进而找到发展国民经济的正确方法。这个计划可称作一种努力，它不仅要使世界人民理解民主制度和民主纲领，而且要在改善人们生活状况的过程中具体地显示出明智的共同努力的好处。”

难道这番话有什么不适当的地方吗？我看没有。今天美国向政治色彩不同的国家提供援助，甚至连共产党国家南斯拉夫和波兰也得到数量可观的美援。若不如此，难道可以完全根据各国的政治制度来确定是否给予援助吗？假如援助的目的在于使新兴国家得到发展，那又怎么能够改变它们的政治色彩呢？这种乐于帮助别的国家，使它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实现真正民主的作法，难道不是完美无缺的人道主义吗？

还有些人的论调更加荒诞不经，他们胡说什么外国援助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涉及国防建设问题，而只应该以满足国民的生活需要为宗旨。如此的荒谬绝伦，足以说明他们的愚蠢无知。人们最重要的基本需要之一便是创造和平安宁的环境，以便能够安心地进行建设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对安全的需要甚于对吃住的需要，因为安全乃是生产粮食和修建住宅的前提条件。

我希望将来能够有一天，所有的国家都不再需要军队来保卫国防，只要联合国或者另一个权威性的国际机构承担起维护国际和平、安全和秩序的责任就行了。象今天各国公民依靠本国政府维持国内秩序那样，将来每个国家则依靠一个世界性的权力机构来保障国际和平和安宁。到那时候，所有的国家都没有海、陆、空三军，世界人民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而不必担心遭受什么侵略。这一天的到来虽不是虚无飘渺的幻想，然而实现这种无限美好的日子，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刚走上发展道路的国家应该

竭尽全力保卫国防安全，这乃是它们头等重要的大事。多数经济上不发达的国家在军事上也是比较落后的，对于这一点，热爱自由的人们有时会忽略，而共产党人却异常地关注。共产党人不仅善于利用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弱点乘虚而入，而且还利用这些国家军事力量薄弱的弱点牟取私利。假如某个国家不注意加强国防力量，那么共产党人就会象猫对待老鼠那样同它打交道。

在阿塞拜疆事件中，在摩萨台执政时期，我们伊朗人就是处于这种“老鼠”的地位。从那以后，我们就下决心再不能象老鼠似地提心吊胆过日子。

应该记得，我父亲曾极力主张奉行中立政策，并以伊朗可能拥有的全部力量支持这种中立。象礼萨王那样真正热爱祖国的人，在伊朗是绝无仅有的，但是，他的中立政策为伊朗和为他自己带来了什么后果呢？这就用不着我讲了。

目前，我国已经用积极的民族主义政策取代了中立政策，我们的这种政策与摩萨台的消极虚无主义政策有天壤之别，对此在第六章已有叙述。这里应该说我们的新政策充满了勇敢战斗的精神。

从维护世界和平出发，积极的民族主义引导我们得出四个必须遵循的重要的基本原则：第一，我国作为首批参加联合国的国家之一，将全心全意地支持联合国。我们充分肯定联合国技术组织进行的各项活动，并将为它们在我国开展工作提供方便条件。我们满腔热情地赞助

联合国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努力。

第二，我们将遵循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和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原则。读者大概还记得，第五十一条讲应该尊重个人和集体的权利，尊重联合国会员国的集体防御措施；第五十二条讲：本宪章的任何条款都不妨碍旨在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地区性组合或地区性组织的存在，也不阻挠符合该地区利益的任何活动，条件是这些组合或组织以及它们的活动要与联合国的目标和原则相一致。我们不仅承认联合国宪章的这些条款和其他规定，而且还要照着去做，在中东建立区域性集体安全组织。

第三，我们将积极地参加有关集体安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诸方面的活动。我们非但不反对各国日益增长的广泛联系，而是欢迎这种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联系。我们将通过各种渠道争取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技术和经济援助，依靠同友好国家的共同努力，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日益强大起来。

第四，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加强国防力量，为的是能够做到：在遵守和尊重集体安全条约的同时援助友好国家；维护伊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国内安全，以免伊朗遭受侵犯。

现在让我们看看，遵循上述四项原则有什么现实的依据。

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容易的。伊朗人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已证明，他们能够建立本书前面提到的那种完美

而生动的民主制度。可是经验告诉他们，必须始终对国内外敌人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因为敌人总是企图使我们为建立民主制度所付出的劳动付诸东流，这正如一个愚蠢的农夫要将邻居花园里的健壮树苗连根拔走一样。

聪明智慧的伊朗人民完全懂得，必须保护自己免遭国内外破坏捣乱分子的伤害。他们知道，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才能集中全力为建设一个繁荣的伊朗打下良好的基础。

强盗们总是成群结伙地四出活动，心地善良的人们则应该针锋相对地团结起来。只要我们同国内外值得信赖的朋友携起手来，共同努力，那么我们的事业就会取得更迅速更健康的发展。我之所以主张在中东地区实行互助和共同安全原则，就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

有些人虽然承认现在各国的交往会越来越频繁，但仍反对我们与其他国家建立牢固的友好关系。他们说，与某些国家建立暂时的友谊和一般的信任还是可取的，可是若要深交，则可能后果不妙，会落得个失恋者的可怜下场。他们特别强调说，与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法国等遥远的国家建立亲密无间的友谊是相当危险的。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后一种论调。在第七章和本书其他一些章节里我说过：我们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文化来往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决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在这几百年当中，西方人大量地借鉴我国的文化，我们也吸收了不少西方的新文化。今天我们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这种理想的一致使我们和西方国家都感

到光荣。

自由世界各国都表示愿意向伊朗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近些年来它们很少干涉我国的内政。比如,英国的对外援助额按人口平均计算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值得高兴的是,我们也享受到它的援助。还有许多国家以各种方式援助我们,其中有美国、法国、西德和奥地利。这些援助不仅对我们大为有益,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彼此的友好关系。

我认为,使我们同西方民主国家的友好关系得以加强的最重要因素,还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发展大大缩小了各国之间的距离。

广播、电话和无线电传真等现代化通讯工具,使伊朗与西方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距离大为缩短了。特别是国际航线的开辟,使旅客们象潮水般地涌进我国,住一个星期、一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假如你有时间到德黑兰机场去呆一会儿,便会看到各国的人熙来攘往,仿佛自己进入了一个国际文化交往的中心。

在每个大型机场上,当一架飞机降落时,总会有些交通工具驶上前去为它服务,使之做好下次飞行的准备。有位聪明人说过:古时候当大的商队抵达某地开始卸货时,也有些运输工具前去欢迎它,为商队的骆驼“服务”,使它们作好下次旅行的准备。然而有些怀疑派却不相信这些话,他们硬说骆驼不需要“服务”。

不管怎么说,一九六〇年初当中央条约组织在德黑兰开会时,确有一架美国的军用飞机仅在十二小时内便

把本国的代表从华盛顿直接运到德黑兰。我相信不久欧洲和美国设计的新式超音速客机将会使这次历史性飞行相形见绌。

科学的迅速发展对于保卫国防和文化交流影响极大。比如一九五八年黎巴嫩和约旦在危急时刻相继得到美国和英国的援助，伊朗的爱国者不会忘记美、英两国军队是以何等的速度开进上述两个国家的。

在人类征服宇宙的时代，用不了多久时间，我们最遥远的盟国的洲际导弹将会瞄准侵犯世界这一地区的任何国家。有鉴于此，我们才决定依靠东、西方朋友们的帮助，来确保动荡的中东地区的安全与和平。

谈到这里，我便对某些美国评论员的知识贫乏感到吃惊。一九五九年，一位美国著名的评论员准备了一个详细介绍伊朗情况的电视节目，我听说有几百万美国人观看了这个节目。节目中有些不符合事实的地方，比如说伊朗是飞机汽油的最大生产国，而实际上在这种特殊石油产品的生产方面我们远远落后于美国。节目中令人费解的一点是，从头至尾很少谈到极端重要的“四点计划”，以及它给伊朗人民带来的好处，也很少谈及联合国向我们提供的十分有益的技术援助。

事实上，“四点计划”组织对伊朗的援助计划不仅是它的第一批援外计划之一，而且是它实行的最宏伟的计划。负责执行这个计划的工作人员到一九六〇年为止已达三百人。朝鲜也是接受“四点计划”组织援助的一个国家，我们将伊朗和朝鲜两个国家近年来的历史加以比较，

是很有意义的。正如本书读者所了解的那样，自从共产党人发动入侵几乎占领南朝鲜以来的两年中，摩萨台时期的伊朗险些坠入共产主义的深渊。南朝鲜人民依靠美国和联合国的帮助，经过流血牺牲付出了重大代价才得以挽救祖国，把共产党入侵者赶出国土；而我们只进行了小规模的战斗和微小的牺牲便拯救了伊朗。

在德黑兰某些建筑物的墙上，至今仍可隐约看到“美国佬滚回老家去”一类标语的痕迹，那是摩萨台时期共产党分子涂写的。说到这些标语使我想起了一幅漫画，那是在美军应黎巴嫩政府的呼吁开进贝鲁特之后，在一家美国杂志上发表的。画面是一个美国士兵，手里拿着毛笔，在贝鲁特美军住地的墙上正涂写“美国佬滚回老家去”的标语。摩萨台时期，在伊朗出现的大多数反美标语都是针对“四点计划”工作人员的，因为共产党分子害怕他们开展的有益活动。那时，“四点计划”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临危不惧，表现得非常勇敢，他们并没有放弃工作，而是坚守自己的岗位。

“四点计划”的技术顾问和专家，从工作开始到今天对我们的帮助确实是很大的，当然他们也有些不足之处。前面我曾指出美国工作人员在某些方面的错误作法，在必要的时候我还会这样做。

在伊朗的“四点计划”组织的官员多数是认真负责的，但总有些人工作不够主动，方法不甚对头，这种情况在基层的工作人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有些官员被召回美国了。同样，“四点计划”组织的某

些方案制定得比较粗糙,还有些方案对伊朗不太适宜,因此没有实行。但总的说来,“四点计划”组织在我们为建设新伊朗而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中,还是帮了很大的忙。

我认为,伊朗人民对“四点计划”组织怀有友好的感情,这绝不是偶然的。应该讲这个组织所执行的很多方案都是直接有利于人民的。“四点计划”组织的基本目标是改善受援国家的农业状况,因此它十分重视实行农业、教育和卫生等方面的计划,并力求满足当地农民的需要。有些人连家门也不出,只知道挑剔指责,胡说什么“四点计划”组织搞的那一套对一般老百姓没有用处,与人民的切身利益毫无关系。但我认为,伊朗人民从这个组织进行的活动中得出的结论是与这种说法恰恰相反的。

“四点计划”组织的活动没有、也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农业,因为各项福利开发计划必须彼此相互协调。水利灌溉计划、交通运输计划和国家机关的改革计划等等,都对农业发展有极大的影响;此外,发达的工业对于我国农业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随着农业机械化的逐步深入,个体农民的数量将日益减少,就象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美国有成千上万的农民改行从事工业生产一样,在伊朗迟早也会出现这种局面。伊朗人口增加得很快,我们又决心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为此除了实现国家工业化之外,是别无出路的。“四点计划”组织应该使自己的活动与我们的这个目标相符合。

有时共产党人的一些奇谈怪论使我感到好笑,比如

他们说美国极力阻挠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以使这些国家永远听从它的摆布。老实说，我们在长期与美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这种企图，相反，美国总是帮助我们制定和实行各种工业发展计划，其中有些计划并不利于美国工业争夺商品市场。美国人在经济贸易方面是很精明的，他们喜欢结交富有、强大的朋友，因为他们懂得，最有利可图的贸易伙伴并不是贫穷落后的国家，而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

技术援助活动一般都没有进行大肆宣扬，因此，很多人并不完全理解它的意义。正如一位聪明人所说，技术援助被用来作标题并不那么吸引人，但用它作文章的内容却非常恰当。大家知道，文章的内容要比标题重要得多。有些人一味追求激动人心的消息，就象鸦片烟鬼四处寻找鸦片一样。那些没有激动就不能生活的人看刺激性消息津津有味，而阅读技术援助之类的报道便觉得枯燥无味，不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比如，“四点计划”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伊朗国家机关进行技术改革——就是在无声无息之中进行的。在第七章我曾谈到美国专家帮助我们编写了一本简单实用的小册子，以指导税务局的工作。但那些总是埋怨税收状况的人却没有耐性阅读，因为它并不激动人心。事实上，这正是“四点计划”组织默默地进行的重要的技术援助，该组织在很多方面都是这样做的。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有时接受东西比赠送东西还要困难。我多次注意到这种情况：一些刚独立的国家在接

受外援时非常小心谨慎。我知道，在摩萨台时期伊朗人民曾对外国人产生过一种肤浅的厌恶感。但是总的说来，古老悠久的历史使我们心胸开阔，思想成熟，而有些国家就不具备这种美德。人们称赞伊朗人是中东的“优秀民族”，这大概不是没有原因的。当外援问题出现之后，我就认为应该表明态度：可以落落大方地接受援助，并合理地加以利用，同时对授援国表示感谢。

另一方面，我认为在援助问题上应该牢牢记住谁是授援国，谁是受援国。

我父亲聘用过大批的外国专家，他总是提醒这些专家只能在伊朗行政机关进行的工作中起帮助作用，任何时候都不要幻想，他们中的某个人——顾问或者经理——能够在幕后操纵我国的一个官方行政机构。

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我父亲也曾将政府的某项工作交给外国人办理。但后来他觉得这样做不妥，便改变了这种作法。今天我们对外援的政策是礼萨王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从他那时候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好多个发展阶段了。

我们有时自称是“落后国家”，这可能使某些人对我国的发展程度产生误解，以至在他们心目中留下错误的印象。

我们是建设自己国家的主人，我国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高兴地看到，外国技术专家是理解这一点的。他们知道，只有我们有权在自己国家发号施令，任何外国人都没有这种权力。

我们应该高兴地指出，“四点计划”组织的官员在农业和教育等方面确实给予我们不少援助，这种援助我在第九章和第十一章曾叙述过。在公共卫生方面，“四点计划”组织的医护人员与伊朗专家合作共事，态度严肃认真而且十分热情，即使在遥远的偏僻地方也是如此。

谈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发生在某个刚走上发展道路的国家。“四点计划”组织的官员在当地展开防治鼠疫病的工作。因为老鼠身上带有满是鼠疫苗的虱子，成为传播鼠疫的媒介，所以“四点计划”组织的官员鼓励人们交出活的或死的老鼠，并根据数量的多少给予不同的奖励。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老鼠的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后来才查明原来有人乘机大量增殖老鼠，以此作为谋财之道！

伊朗的卫生工作进展得很顺利。比如“四点计划”组织协助卫生部在里海沿岸一带与恶性疟疾展开斗争，取得了显著成绩。这项工作使该地区克服了严重缺乏强壮劳动力的困难，简直可以说是一场革命。几年前里海沿岸一带多数居民都患有慢性疟疾，深受折磨，而今天这种病几乎根绝了。该地区人民体质增强，完成的工作量也在增加，再不存在人力缺乏的问题。目前那里的工人数量猛增，不仅可以满足当地各种工业部门的需要，而且还可以支援外地。

上述的例证远不足以表述“四点计划”组织在伊朗做出的杰出贡献，它还完成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工作，其中每项工作对我们说来都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四点计划”组

织帮助我们发展工业和改善交通运输状况；资助数百名伊朗青年到国外留学；拍摄了一百多盘科教片，用来传授有关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的基本常识，这对全体国民、特别是对农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前面我曾指出，伊朗人的民族自豪感是很强烈的，但从心理学角度看，这并没有使伊朗人产生拒绝接受不附加条件的援助的想法。事实上，我们希望“四点计划”组织今后能增加援助数量，因为这样做将有利于授援国和受援国双方。

在高度评价“四点计划”组织的活动时，我希望本书的读者能够记住：在德黑兰市郊高耸入云的厄尔布尔士山脚下，竖立着一块普通的石碑，那是为了纪念“四点计划”组织第一任主席亨利·吉·班特先生的，他的工作是从伊朗开始的，后来逐渐扩展到全世界。一九五一年十二月的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国际知名人士班特先生由于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在那块石碑附近与世长辞了。我经常想，班特先生的死不就是联结美、伊两国友好铁链上的一个环节吗？

联合国在伊朗的技术援助也是我们工作中的一种鼓舞力量。联合国象“四点计划”组织一样在伊朗实行了最庞大的援助计划。一九六〇年联合国在伊朗的工作人员有一百名之多。一般地讲，联合国提供的财经和物资援助没有“四点计划”组织提供的多，但联合国在采用新技术和满足人民需要方面却做得同样出色。

上述两个组织另一个相同的地方是，它们从展开工

作起，便把农业放在自己活动的首位。比如联合国在伊朗的专家，有四分之一以上从事与农业有关的下述工作：土地的合理利用、提供农业用水、改良种子和农作物、粮食和棉花生产、畜牧业、提高牛奶产量、林业、农产品的统计和销售等等。两个组织对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都十分重视。联合国对我国的教育方法进行了实地考察，帮助我们制订出新的教学计划，每年还给我们五十份奖学金，资助伊朗青年到国外学习科学技术。

联合国派到伊朗的医学专家在培养助产士和护士、药物分析、防治恶性疟疾、沙眼以及我国南部地区特有的病虫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我们的要求，联合国专家在发展工业和改革经济的广泛活动中在下述各方面与我们合作：培养行政干部和组织劳动力、恢复和发展小型工业、制陶工业、纺织工业、机器制造业、地质勘探、金属和矿物分析、矿山机械、矿石研磨、钢铁冶炼、铁路、通讯、社会经济调查和统计，以及公路的铺设和维修等等。专家们从事的工种之多，其专业技能涉及的面之广，充分说明我们建设国家的计划是极其宏伟的。还应该指出，联合国的工业和农业专家分别在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从事工作。

向我们提供援助的另一个外国机构，是简称 K.R. 的美国世界互助组织，它在二十五个以上的国家里从事活动。这个组织对伊朗的援助是从一九五七年基尔曼沙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时开始的，当时它向灾民运去了必需的生活物资。自那以后，它便在伊朗设立了一个办事处，

这个办事处在我国农业地区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个组织的援助主要是向收入微薄的人们提供面粉、奶粉等食品。比如一九六〇年，它在伊朗分发了大约四百五十万公斤的面粉，其中绝大部分是通过国家慈善机构分配出去的。这个组织打算制定一个向大学生提供食品的计划，我们希望这项计划能尽快地付诸实现。

这个组织最近打算筹办一个提供劳动工具的机构，这项措施对于我们的开发计划将是一个补充，因此是十分可取的。它的设想是：在伊朗各地兴建一些工具仓库，人们可以象从图书馆借书那样，从工具仓库借用所需要的劳动工具，用完后归还。

每个工具仓库可筹备上百件农具和其他机械，还可以在美国制造些适合伊朗土地特点的耕犁等，以供农民使用。这样，用简单易行的方法便可满足农民的需要。

这个组织还将一些有益的教科书和其他教学器材——这是我们的教育计划所十分需要的——运送到伊朗各地。一九六〇年拉尔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时，这个组织当即向灾区运去了援救物资，正是这种迅速而及时的援救，使它在伊朗出了名。

美国政府根据“富布赖特法案”^①和其他有关规定，用交换科技人员的办法，向我们提供科学技术援助。

根据美国政府按照“富布赖特法案”制定的计划，伊

① 富布赖特法案：系指美国参议员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1905—）于一九四六年提出的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美国同许多国家相互交换留学生和教师。——译者

朗学者可以去美国进行科学考察，伊朗教师可以去美国观摩教学；作为交换，美国学者和教授也可以到伊朗各大学参观访问，这使得我们的院校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伊英文化协会、伊法文化协会以及自由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协会都有类似的文化交流计划，它们都设有专门机构负责传授本国语言和举办本国的文化成就展览，事实上，这就是对我国青年学生的一种文化援助。

前面我曾谈到有关“美国中东爱好者协会”的活动，以及它给予留美伊朗学生的有益指导。伊朗留学生毕业归国时，在了解国家机关的雇用情况和筹备必要的生活设备等方面，均可得到这个协会的帮助。

在这本书里，要想叙述全部有益于伊朗的外援活动是不可能的，我只想再举几个小例子来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先说“福特基金会”，它派出技术专家协助我们制定第三个七年计划，并在我国实行了技工教育和农业开发计划，它还打算将美国大百科全书翻译成波斯文。奥地利政府在推广技术教育工作中给了我们可贵的援助。此外，比利时、法国、意大利、瑞典和西德等国向我们提供了各方面的技术援助。英国、美国和德国的专家小组对我国的盲人帮助极大，他们表现出良好的人道主义精神。

“英国中东开发组织”在统计、林业、牧场管理、农村互助、土地保护以及防治蝗虫害等方面给予我们宝贵的技术指导。很多国家在拉尔地震的困难时刻向我们伸出友谊之手，给灾区运去了大量的生活物资。

外国的私营贸易机构向我们提供了各种贷款，并以

自己的专长给予我们以技术指导。

一九五六年我访问了莫斯科，与赫鲁晓夫先生及其同僚进行了友好谈判。此后，我们从苏联人那里得到了有关防治蝗虫和浚通里海沿岸一个伊朗港口的有限援助。尽管苏联电台广播了一些旨在反对伊朗领导人和伊朗政府的不友好言论，我心里还是充满了对于苏联人民的友好感情。

苏联的普通老百姓比他们的统治阶层大概会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任何热爱自由的国家决不肯向一个帝国主义表现得极其露骨的邻国要求提供援助。

如前所述，中央条约组织是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维护伊朗安全的一个有效工具。这个组织的军事性质虽然很重要，但从广义上说，它的目的无非是以共同努力来维护国际安全。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在中央条约组织帮助下完成的伊朗和土耳其铁路的连结工作是明显的例证。凡是了解现代战争奥妙的人都知道，在战争爆发时这种铁路将会遭到破坏。既然如此，那么伊朗和其他“中约”国家为什么还决定修建这条铁路呢？问题的答案在于我们所关心的是国家的复兴和繁荣，而不是准备打仗。这一点在修筑战争时期肯定会遭到破坏的公路线一事上也得到反映。中央条约组织成员国知道，修筑公路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还是推动其他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这种发展正是所有中央条约组织成员国的目的和愿望。为了阐明中央条约组织的这种意图，还可举出另一个例证，即中央条约组织计划在其成员国之间建立

通讯联络。假如读者面前有一幅世界地图或地球仪的话，那么他就会想象得出，在安卡拉和卡拉奇之间将要修建起来的、相距四十公里的许多无线电收发报站的情景。神智健全的人心里清楚，一九六二年初将要完工的这个复杂的通讯网在遭受军事进攻时会被击得粉碎。但我们还是这样做了，因为我们是为将来的和平与幸福着想，并不是为了战争和准备被战争所摧毁而修建这个通讯网。

中央条约组织成员国十分清楚，事情的发展可能与我们的主观愿望相反，就是说世界大战可能爆发。但我们决不能让这种可怕的悲观思想妨碍国家事业的发展。

我认为，中央条约组织所属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研究机构是表明我们思想信仰的显著标志。一九五九年三月我在德黑兰大学自然科学系主持了这个机构的开幕式。它的设施是英国政府提供的。这个机构的专家、教授来自英国、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伊朗，中央条约组织成员国的大学生均可到这里学习。该机构教授有关利用各种元素不稳定放射线的课程，简称为“放射性同位素教学”。学完一年的全部课程之后，学生们便可将学到的知识用于解决本国遇到的有关问题。该机构的教学质量堪与英、美等国的教学质量相媲美。

放射性同位素用途极广，对中东各国的发展大有好处。在医学方面，假如病人喝一点无害的放射性碘，其大部分就会集聚到病人的甲状腺里，经过检验即可发现腺体的任何震颤，便于医生进行治疗。同样，假如将放射性砷注入人体，它就会集聚到人体、甚至脑的肿胀部位中

去,这样肿胀的部位便清楚地显露出来;假若肿瘤切除手术做得不干净,肌肉纤维里残存了什么东西的话,便可用原子仪器将其探测出来。还可以利用放射性磷来治疗红血球增多的疾病。

在农业方面,可利用放射性同位素准确地测定出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施肥量,并可了解农作物吸收肥料的过程,因此,这种科学对于伊朗和其他中央条约组织国家合理使用化肥帮助甚大。利用放射性同位素还可以细致地观察除草和杀虫药剂如何发生效力。通过放射作用还可以发现害虫,进而研究和掌握害虫的生活规律及其迁徙情况。甚至可以使雌虫与经过放射作用处理而变得更健壮的雄虫相交配。美国科学家利用上述方法在本国某些地区成功地消灭了病虫害。

中央条约组织成员国在工业和商业方面刚刚开始利用放射性同位素。它们利用放射性同位素测量极薄木板的不平之处、金属镶面的厚度和金属传送带的磨损程度,并用它来发现电焊或冶炼时发生的毛病。它们还用放射性同位素测定水流或其他液体的流速,发现堤坝和水管的裂纹,了解船坞和河流淤泥的冲积情况,以及各种石油物质的流动情况。

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可能性极大,范围极广,因此中央条约组织成员国应该建立各自的放射性同位素研究中心,以便同德黑兰放射性同位素研究中心合作进行更多的基本研究工作。

中央条约组织各国间的技术合作并不限于和平利用

原子能，它们还在农业、教育、公共卫生、贸易和旅游业等方面实行了各种技术合作计划。其中有些计划是在中央条约组织的西方成员国家帮助下实现的。比如，美国派出一名专家指导中央条约组织各国防治牲畜疾病的工作，英国为中央条约组织各国的大学生提供了三十三份奖学金，以使他们在兽医科学方面得到深造。

我认为，在上述各项计划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中央条约组织各中东国家之间的技术援助和合作。比如，我国欣然接受土耳其政府的要求，在培植和管理阿月浑子果幼树方面为它培训了两名专家；而土耳其政府在帮助我们执行某项计划时，教会了我们区分干果的科学方法。同样地，巴基斯坦把防治蝗虫灾害——对农作物的损害极大——的最新技术传授给我国和土耳其。

我希望，中央条约组织的中东成员国在达到科学技术的成熟阶段后，仍能继续这种合作。目前，这种合作正推动它们走向科学技术的高峰。

除了有关和平建设的计划之外，中央条约组织更加注重防务问题。我们直言不讳地这样说，心里并不感到惭愧，恰恰相反，我们为能携起手来共同捍卫自由而感到自豪。中央条约组织在联合国是备了案的，我们为和平事业所做的一切都向联合国和世界人民作出了交待。就连一些友好的共产党国家也承认，要想找到证明中央条约组织是个搞军事阴谋的、侵略性的、威胁中东和平与安全的组织的证据，那是比登天还难的。

根据中央条约组织最高委员会的命令，有关它的防

务与安全事宜交由以下三个附属机构负责。第一个机构是“常设军事代表小组”，它从一九六〇年初开始在安卡拉办公。这个小组由中央条约组织各成员国和美国的高级军事将领组成，它负责详细调查中央条约组织各成员国的军事计划，并经常研究由“军事计划联合委员会”制定出来的各种方案。据我所知，这个小组乃是迄今为止中东各国在集体防务与安全方面进行密切合作的第一个组织。第二个附属机构是“反颠覆委员会”。前面我曾指出在中东地区广播战中发生的一些荒诞不经、卑鄙无耻的事情，“反颠覆委员会”的任务就是与诸如此类的颠覆破坏活动展开斗争。第三个附属机构是“联络委员会”，它将为中央条约组织各成员国提供设备优良的通讯工具，以便它们能迅速而有效地相互交流与本地区安全有关的各种情报。

中央条约组织的发展虽然不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样迅速，但最近两年来，它的发展还是引人注目的，在某些方面它的活动范围甚至超过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比如在组织经济协作方面，中央条约组织各成员国通过执行科学技术合作计划，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提高了中东地区各国人民的技术水平，为将来的迅速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础。在安全问题上，为了与共产党人竭力推行的“和平共处”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对付可能发生的对世界这一地区的公开侵略，中央条约组织制定了详细计划，并在陆、海、空三军的联合军事演习中加以检验。

一般说来，中央条约组织各成员国司令部的作战计

划和军事训练都是相互协调的。它们团结一致如同朋友和兄弟，它们都热爱自由，而厌恶危及和平的阴谋诡计。

近几年来伊朗军事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军事人员成倍地增加，士兵的战斗素质显著地提高。我们十分重视军队内部的教育。许多服兵役的农民起初没有什么文化和专业技能，而到服役期满时，他们便具备了今天在民主国家生活所必需的知识和本领。

最近，为了使一般国民了解军队内部的情况，我们提倡人们去参观军事基地，数以万计的家长亲眼看到了自己孩子受军训的情景，这样做的效果很好。

我们为了维护和加强农村的社会秩序和安宁，早就建立了宪兵队。我父亲执政时的宪兵队为稳定全国各地的秩序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的宪兵队是由一千名军官和三千名宪兵组成的一支武装力量，他们分别驻扎在全国二千多个哨所。这些哨所多设在山区隘口、公路交叉点和其他边远地方，每个哨所有六到十八个宪兵值勤。这些宪兵几乎遍布全国，他们是宪法的执行者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其任务是逮捕强盗、走私贩、杀人犯、逃避兵役犯和其他罪犯，执行法院的各种判决，并负责禁止种植鸦片和监督游牧部落的移徙。宪兵管辖的地区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伊朗两千万人口中约有四分之三居住在这些地区。宪兵队拥有现代化的无线电通讯网，通过各个固定的和流动的哨所可使德黑兰与最遥远的边区迅速地取得联系。目前我们正用轻武器和直升飞机等装备这支宪兵部队。

宪兵队是联系中央政府和广大农村地区的桥梁，因此人民中流传的这样一句话是完全正确的：“善良的宪兵是善良的政府的标志，腐败的宪兵是腐败的政府的体现。”值得庆幸的是，我国大多数宪兵和宪兵军官是勇敢而正直的人。我希望那些呆在屋子里专事挑剔指责的人，最好能同宪兵们一起在边远的哨所里住上几个月，以便了解和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和担负的艰巨任务。应该承认，过去的宪兵经常滥用职权，欺压百姓。象我父亲那样极其严厉的人，虽然采取了激烈措施以消除宪兵队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但也未能完全奏效。礼萨王是不会轻易受骗的，对这些事他了如指掌。记得有一天，我父亲和几位大臣一起去视察某个宪兵哨所。当他走进哨所时，便将手放在自己的衣袋上，对随行人员说：“小心你们的衣袋。”从那以后，宪兵队的状况有些改善，近两年来，宪兵的态度确实有了显著的好转，如今宪兵队的功德在伊朗各地是有口皆碑的。我们从两方面入手采取措施对付可能发生的腐败现象：一方面细心地调查宪兵队内部的情况，另一方面妥善处理国民向政府机关和皇家调查组织提出的各种申诉。

土地分配计划的实行对改善宪兵队的状况大有裨益，因为过去宪兵队之所以发生腐败现象，多是由于大地主控制了宪兵，肆意鱼肉百姓所致。

今天的宪兵队在道德品质、为人民服务以及维护公共卫生方面，已经成为各地区人民的表率。我希望城市居民和那些到伊朗来观光的外国人能看到宪兵队取得的

进步,目睹一下宪兵们的值勤情况。

我国除步兵之外,还有一支不大的海军在里海和波斯湾一带执行任务。没有人会说,我国海军相当于世界二等国家的海军力量,然而正是这支海军卓有成效地保卫着伊朗的海岸线,制止了海盗和走私贩的骚扰,给遇到危险的海员以及及时的援救。假如有一天,我们迫不得已投入小规模战争的话,那么我国海军定将能够和盟国海军进行有效的合作与互助。但应该指出,因为伊朗是控制波斯湾的最大国家,所以必须迅速加强自己的海军力量。

我国还有一支小规模空军,其任务主要是在范围有限的作战行动中,向陆军提供必要的空中支援。近几年来,我国空军和海军的训练水平均有很大提高,我国喷气式战斗机驾驶员的技术在各种飞行表演中给专家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除了口蜜腹剑的人之外,谁也不会说,我国的空军乃至我国整个的武装力量能够抵御某个相邻大国的军事威胁和进攻。我国的空军力量实在太单薄了,必须大大地予以加强。

我们感谢美国对改善我国武装部队状况所给予的援助。早在一九四二年,便有一个美国军事顾问小组指导我们的宪兵队工作。一九五〇年在伊朗驻有一个美国军事顾问团,在军队组织和训练方面给我们以宝贵的指导。通过这个顾问团,我们获得了无偿的军事装备。这样,便减缓了我国的财经困难——这是每个刚走上发展道路的国家都会遇到的。但是,从美国提供军事援助之初起双

方就很明确，美国军事顾问在伊朗只有参谋的任务，决不能干涉我们的军事行动。

勿庸置疑，美国的军事援助使我国有限的武装力量得到加强，有效地保卫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此外还应该指出我们从美国军援中获得的间接利益。为了保卫祖国，即使得不到美援，我们也要建设一支象样的军队，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由此看来，美国的军援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把大部分的国民收入用于前面提到的建设项目中去。假如没有美国的军事援助，我们显然不可能把国家总预算的五分之一用于教育事业。

在充分肯定美国的军事援助和非军事援助直接或间接地给伊朗带来了巨大利益之后，如果我说，比起美国给其他国家的援助来，给伊朗的援助是微不足道的话，想必不会有忘恩负义之嫌吧。

在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之前，我应该首先谈谈伊朗的战略地位。野心勃勃的侵略者完全明了我想要说的是什么，因为这已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尽人皆知的常识。

一位有识之士说过，“在现代，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具有战略意义”，这句俏皮话非常接近于事实。比如，澳大利亚表面看来似乎与其他国家相距遥远，但它同样可以成为苏联导弹的射击目标；对于发射导弹的一方说来，情况也是如此。在今天的原子时代，导弹、远程轰炸机、军舰、潜水艇和人造卫星等战略武器，就象流浪汉和沿街叫卖的小贩似的，很难找到它们的准确地点。人造卫星虽然在一定的轨道上运行，但并不象多少世纪以来就处于

世界某个角落的国家那样，牢牢地固定在一个地方。

话说回来，从地理位置看，伊朗历来是商路的枢纽和军事战略要地。在今天这种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在商队从西方到远东进行旅行的古代，是著名的“丝绸之路”把东西方连结起来，伊朗曾是商队的必经之路；而今天把世界各大洲联系起来的航线大都经过德黑兰，这难道不是事实么？

历史上中东发生的许多重要战事要么是从伊朗开始的，要么便是直接针对伊朗的。今天从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上看，若说伊朗是中央条约组织的中心，恐怕并没有言之过分。中央条约组织位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中间，因此，我国可算是这些组织的支撑点和基轴。

假如伊朗垮掉了，那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其他成员国的侧翼就将受到威胁。勿庸置疑，倘若伊朗受到来自北部或者来自北部指挥的其他方向的攻击，而又不能加以阻止的话，那么侵略者就将如获至宝，他们将控制伊朗热带水域各港口、石油产区和其他的丰富资源，这时，侵略者就打开了一条通道，他们会象钳子一样展开兵力，一方面进军阿拉伯半岛，另一方面经苏伊士运河向非洲挺进。这种情景正是那些口念和平经而实际上并不真正主张维护世界和平的人所梦寐以求的。我们若从另一面来研究这个问题，便会发现：伊朗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支撑点，同时也是联系这些组织的链

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不错，伊朗是有光辉灿烂历史的国家，享有民族统一和政治稳定，并亲身体验过共产党人侵略的滋味；但是它的武装力量、特别是空军极其薄弱，缺乏最新式的军事装备。

在这方面，我想把伊朗同伊拉克这个我们希望与之建立最友好关系的国家比较一下。伊拉克的人口仅相当于伊朗人口的四分之一，它的面积只有伊朗五分之一那么大。可是这个国家的空军却比我国空军强大得多，伊拉克空军是用最新式的喷气式战斗机装备起来的，而我们使用的却是已经过时的美国飞机，相形之下，伊拉克空军占显著的优势；此外，伊拉克拥有的新型喷气式轰炸机我们也没有。

一般说来，伊拉克军队比我们的军队装备优良。他们的军火武器是由英国和苏联提供的，我们的军火武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是由美国直接供给的。我们十分感谢美国给予我们的军事援助，但应该指出，美国的军援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也不能满足自由世界在这个重要地区的需要。

还应该进一步指出：尽管伊朗是美国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的主要受援国之一，但若将这些援助同美国给予其他国家的援助加以比较的话，便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差距甚大。

在这方面不适宜进行公开的议论，因为美国政府一向对提供给各国的军事援助额严加保密。然而，我想只须简单地说几句，事情也就一目了然了，当然美国国会议

员和政府官员可以调查一下它是否属实。

根据现有的对美国对外馈赠和贷款的统计可以看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向苏联直接提供的非军事援助额比美国向伊朗提供的援助数量还多。

说也奇怪,世界上的事有时是相反的。美国给苏联的援助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那时苏联几乎要垮台,但它同美国的关系还没有恶化。如今二次世界大战过去许多年头了,伊朗作为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忠实盟友,在这段时间内所得到的援助竟比苏联还少,岂非咄咄怪事?

又比如,在这段时间内美国给共产党国家南斯拉夫的援助额是给伊朗援助额的两倍多。对于南斯拉夫,美国不但提供非军事援助,还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军事援助。美国政府虽然没有公布军援数字,但我认为我们的美国朋友可以作证:南斯拉夫从二次世界大战到今天所得到的美国军援要比我们得到的多得多。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美国向南斯拉夫提供援助,而是觉得这种事实在令人费解。

现在让我们把一个属于自由世界的国家拿来比较一下,这个国家就是台湾^①。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今天它得到的美国非军事援助比伊朗得到的多四倍。虽然不能公布美国军事援助的数字,但美国官方将会证实,在这段时间内,美国向台湾提供的军援是给伊朗军援的许多倍。

^① 伊朗政府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六日承认我国,已不再把台湾看作一个国家。——译者

勿庸置疑，台湾在远东具有战略意义，但我认为，伊朗在中东的战略意义并不亚于台湾。

我并不是说台湾、南斯拉夫、甚至苏联一定要得到较少的美援，我是建议美国领导人更多地思考一下伊朗在保卫自由世界事业中负有的责任。我认为，他们经过一番思索之后，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伊朗应该获得头等的援助。

增加美国对伊朗和中央条约组织其他成员国的援助，仅仅是巩固中东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措施之一。长期以来我就有一个想法，即西方国家应该用原子武器和非原子武器来阻止共产党人的扩张和侵略。我认为，应该明确这样一点：在中东必须建立一种特殊的遏制手段，这种手段的成功与否将取决于其实力的大小，假如组织得当，肯定会奏效的。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我想在这里简略地提出三项紧急措施。

第一，美国应当成为中央条约组织的正式会员国，长期以来我就支持这样做。我认为，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把美国拒之门外，特别是在美国已经参加中央条约组织全部主要的委员会后，就更没有理由这样做。

第二，中央条约组织全部有关安全与发展的军事和非军事计划都应该予以扩大。依我看，假如中央条约组织的西方成员国除了承担现有的义务之外，还能增加它们对本组织的财经义务的话，那么对它们自己和自由世界都将大有益处。

第三，如前所述，中央条约组织应该做出适当的安排，使它的“常设军事代表小组”能够建立起代表全体成员国真正的统一指挥。

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在中东爆发，有人还可能希望这场战争首先在具有战略地位的伊朗打起来。但是，不管在伊朗，还是在其他地区，都应该竭力阻止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今天千百万共产党人都在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根据他们的主张，与非共产党世界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有些共产党人或多或少地注意到，新的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以及原子武器的存在，已经使共产党的原则及其奠基人的思想和学说黯然失色。

根据我对赫鲁晓夫先生的了解，我认为他比其他具有共同信仰的人较少地受到僵死的马克思学说的限制。倘若赫鲁晓夫时期是暂时的话（因为马克思流派的领袖象其他人一样也是要死亡的），那么在苏联仍然会有更加深刻的和平因素生长出来。可以说苏联人一年比一年更加保守了，那个国家的人民，不论是政府工作人员、细菌学家，还是公共汽车司机和建筑师，都希望他们在非共产党国家的同事靠着幻想过日子。然而，苏联科学家和学者的观点却比以前容易改变些了，并逐渐地注意到他们真正的敌人可能并不是受到他们敌视和攻击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那个在远东的、住在他们背后的、不断地“扩张”领土、增加人口的可怕的“魔鬼”，那才是他们的主要敌人。

苏联内部的变化，在它与自由世界的关系方面将发

生微妙的影响。在目前这个变化不定的时代，原子进攻的危险、威胁恫吓、逐步渗透、颠覆和其他侵略行动，以及以侵略相要挟等等，无时无刻不存在着，而且将日趋明朗化。为了遏制共产帝国主义，必须有强有力的措施。

我并不排除这种预见：苏联人总有一天会注意到事实的存在。今天中国的人口比他们的苏联同事的人口多得多，两国人口之间的这种差距正在不断增加。中国人不管苏联人愿意不愿意将会以导弹和原子武器装备起来，他们将全力以赴地把自己的政治纲领和军事领导权强加给整个共产党世界。根据尚不明显的征候看来，中、苏两国之间的原则分歧必将变得激烈起来。西方国家虽然将其意识形态与先进的社会状况协调起来，但新的意识形态斗争还将会出现。

苏联人虽然在向他们的中国同事高谈永久性友谊，但他们逐渐地会被迫与非共产党国家取得谅解。非共产党国家也许会与苏联建立友好的关系。世界大多数国家将不遗余力地阻止中国势力的“扩张”，并帮助那些放弃过激政策转而采取友善和温和政策的国家。发生这种变化将需要很长的时间。在发生这种变化之前，热爱自由的人民应该坚信自己的信仰，并牢牢地记住：有些人所谓的“和平”是没有真正价值的，只有在“精神病院”里的病人感到快慰的时候，人类最优秀和最神圣的思想才能被包含在他们所谓的“和平”之中。

第十四章 国王与国家

国王的日常生活是怎样度过的？他的工作与别人的有何不同？工作时会不会感到孤寂？本书读者大概会期待我回答这些问题，以便能够了解作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新兴国家的国王肩负着怎样的重任。

我的日常生活是有一定安排的，当然随着情况的变化也会有所更动。我一般早晨七点半起床，边洗浴、刮脸，边思考某个问题，或盘算一天的工作。洗漱毕，我独自进早餐，吃得非常简单：一点水果汁、一杯咖啡和一块烤面包。早餐只需二、三分钟就够了，可是我常在餐桌旁停留三刻钟，以便翻阅伊朗所有的重要报纸，美国、英国、法国的各种报刊，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的报刊摘译。

大约九点钟，我在办公室开始工作。先是听取宫廷大臣的汇报，决定晋见者和需要接见的来宾的名单。然后审批呈文，处理各种事务。首相和外交大臣在认为必要时即可进见，其他大臣和政府官员也常向我直接汇报工作。

我因为是武装部队总司令，所以每周专门安排两个上午接见军队首长和从全国各地来禀报军情的军官，为

使他们做到畅所欲言，我总是进行单独接见。

此外，德黑兰和各省市还有不少人可获准晋謁。其中有些接见并没有什么要事可谈，似乎是浪费时间。可是考虑到伊朗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多不胫而走，我还是尽可能地多接见些人，以便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各种谣言，掌握社会动态。我这样做并不感到厌烦，反而觉得挺愉快，因为我喜欢与人交谈胜过阅读各种文件报告。

虽说如此，我的文字工作量还是很大的。每天上午我都要把办公室主任叫来，一起处理成堆的公文、信件和上报材料。一般是由我向他讲明应该批复的要点，有时我也亲自口述回信和批示。

波斯文书写简单，平常用不着录音机或速记员。有时我也亲自动笔，比如给伊丽莎白女王的复信，就是我自己写的。当然因为国事在身，需要阅读大量的外交文件，所以这类私人通信并不很多。

下午一点半钟我离开办公室，与王后、有时也与王戚或国内外要人共进午餐。午餐一般是伊朗饭菜，或者用西餐，有时两样兼而有之。与大多数伊朗人的习惯不同，我主张中午少餐；午餐也好，其他时间也好，我都不喝白酒。

饭后我通常要看四十五分钟的报纸；如果可能的话，就再休息三刻钟。午休后回到办公室，继续审批呈文二、三个小时。每周星期一下午我要出席“高级经济委员会”和内阁的例会，会议要持续几小时。

每月我都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参加的人有报社经

理和国内外的新闻记者。每月我还要去视察德黑兰卫戍部队，出席新落成的工厂、医院和教养院的剪彩仪式等。此外，我还经常到各省去视察，了解开发计划的进展情况。有时也到国外旅行，多属国事访问。

假如得闲的话，我喜欢在下午锻炼一个半小时。晚饭多是西餐，我单独地或者与王后一起用餐。

晚上听听音乐，或者去王宫大厅看电影。就寝时间一般比较早，睡前向真主做祈祷。

礼拜天和假日朋友们来访，大家一起打排球或做其他的集体锻炼。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也要花费半天时间批阅文件，处理各种事务。

或许有人认为，这种生活是单调而乏味的，但我却十分喜爱自己的工作。在第七章曾谈到，我对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和其他麻烦事情很感兴趣。与各种人物交谈给我以乐趣，每天接见一批人使我感到十分愉快。此外，如查看国家开发计划执行情况所做的短期旅行，以及出席为发展生产和繁荣国家而兴建的工厂落成典礼，更使我感到由衷的喜悦。

每当向农民发放土地证时，每当为建设新工厂奠定第一块基石时，每当按动新建工厂的电钮时，每当为新落成的诊疗所剪彩时，我心中总是洋溢着无比的欢乐。

或许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些礼仪性的工作，但在在我看来，这却是建设新伊朗的创造性劳动的标志。

我同父亲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关心伊朗和伊朗人民的繁荣和进步，这种思想给我以向上的力量，激励着我奋

心,而我最欣赏的还是纯正的古典音乐,以及音乐大师肖邦、贝多芬、舒伯特、李斯特等人的杰作。有时我想,今天大概再也创作不出如此动人心弦的音乐来了。然而这只是一种假设而已,怎么能够断言世界文化和音乐的黄金时代不会再现呢?

为了消除疲劳,我还有其他的娱乐方法。譬如我在萨德·阿巴德夏宫饲养了些牛和鸟类,当我在那里休息时,总要去观赏它们。有时我会象孩子似地玩耍从瑞士买来的电动小火车。在中学读书时,我学过一年木工,如今空闲时,我便做些木匠活,换换脑筋。此外,与谦虚朴实毫不造作的普通老百姓交谈,使我感到非常惬意。

近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的发展十分迅速,所以我很少产生过去那种惴惴不安的感觉,当然各种各样的困难还是存在的。其中最大的困难,也是最令我烦恼不安的,是人们的懒散和怠工,以及缺乏有经验的专家和熟练工人,什么时候克服了这些困难,其他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从这一点出发,再去看第十一章里所反复强调的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以及把培养教育年青一代视为伊朗将来发展的必要条件,其道理就不言自明了。

我多次指出过,与国家机关的腐败现象进行不懈斗争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充分保障工作人员的生活费用,以免他们为生活所迫,去做那些不体面的事情。可是实际上,有些最腐败的工作人员恰恰是那些不愁吃喝的有钱人,他们并不是因为缺少什么才贪图贿赂和赠礼,而是他们本性的卑鄙和道德的败坏使然。这些社会败类有碍于

我们事业的发展,使我感到愤慨;可是我犯不着对他们大发雷霆,耗费自己的精力,而应该与之进行切实有效的斗争。

邻国广播电台的造谣污蔑和恶意诽谤,很容易使人感情冲动,火冒三丈。那样做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应该采取明智的作法:对它的胡言乱语嗤之以鼻,而对其宣传内容却要仔细地加以分析,严肃认真地对待。

到此为止只是简略地介绍了一下我的日常生活和我在各种困难面前所采取的态度。若不是我以耐心和理智战胜这些困难,恐怕早就被搞垮了。下面我想略谈几句自己解决困难、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态度——在我执政期间所取得的每次成就皆来源于此。据说,有位聪明人象演算数学题那样,为“烦恼”列了个比例式。对此我只能讲,本人的烦恼与国家所取得的发展成反比。我想多数伊朗人大概会有此同感吧。我的工作方法是与伊朗特有的文化风俗相符合的,因此某些外国读者可能感到迷惑不解。然而经验表明,我的工作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它起码可以减少烦恼和不安。

我主张在工作中加强行政领导和管理,做每件事都采取“替换方法”。比如某官员由于愚笨无能,懒惰懈怠,贪图私利,不能按要求做好工作,那就将任务交给另外的人去做。这样,既能使工作得以圆满完成,又可使工作不求进取的人丢脸。我经常通过下级官员把有关任务及其完成方法和时间的指示转告给他们的上司,以便能简化手续。比如当我视察一个新建机场时,觉得在四周铺

设草坪比较适宜，便当即命令身旁的官员把我的指示通知他的上司。有时我故意这样做，为的是杀一杀那些自命不凡的高级官员的狂妄气焰。

如前所述，我注意了解各种人的意见和通过不同的渠道掌握国家机关的工作情况。比如我参观某个工厂，顺便会向开机床的人询问有关生产和他孩子的学习近况；在出席新建学校的开幕式时，我就会打听一下教员们的生活及住房安排得怎样；我会从农民那里知道地方政府和宪兵的工作态度；我经常深入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及其精神面貌。

我在工作中一般不使用顾问，我认为那样做对国家元首来说是有危险的。我父亲的错误之一便是过分地依赖少数几个顾问，他们由于害怕礼萨王发怒，而不如实地向他反映情况。这些顾问专门阿谀奉承、献媚取宠，不是廉洁奉公的人。他们虽然学有专长，但却常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此外，他们总想垄断上报的各种消息，这样便会堵塞我的耳目。因此我采取了另外的作法，不是从私人顾问那里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地获得情报，然后进行分析研究，作出完全符合国家利益的决定。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智慧和真理的宝库，相反，我总是力求得到各种情报，并广泛征求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的意见。

假如我发现问题非常困难、十分复杂，便迅即扩大我的情报网，通过不同渠道尽可能地了解情况，搜集意见，以便找出问题的正确答案，然后向有关部门和负责人下

达任务。由于我广泛地征求了各种意见，并经过了一番精心思考，所以采取的决定总是有益于国家，特别是有益于普通国民。

对某个问题一旦作出决定，我立即责成首相、某个大臣或某个独立机构的负责人去贯彻执行。一般说来，接受任务的官员能够迅速而坚决地执行我的命令，但也有的官员做事拖拉、敷衍塞责。发生这种情况，我就要负责人作出解释，说什么“这不是我的过错”之类的蠢话是过不了关的。我很少大发雷霆，犯错误的官员从我的眼神和说话的声调中即可猜测出我内心的不满程度。失职的官员理应受到法纪的制裁，予以革职，政府将另外委派称职的人去接替他的工作。需要进行改革的国家机关也应该这样做，及时地把那些不称职的人撤换掉。

为了获得情报研究问题和分派任务，我需要与各种渠道保持联系，并召见一至数名通晓情况的人共同进行研究，这只是一种形式。此外，前面提到的两个官方机构、即内阁和“高级经济委员会”，也在上述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我想谈谈由首相和各部大臣组成的内阁会议的情况，这或许有助于说明我的工作方法。内阁会议通常在大理石宫一个宽敞舒适的专门办公室里召开。首相及其他内阁成员各就各位后，待我一到，会议马上开始，无须乎作正式宣布。我从来不用敲桌铃之类的方法掌握讨论，而只以眼光和脸色的变化来主持会议。每当我想起某个问题，觉得有讨论的必要，便把内阁成员们召集起

来，由首相或某个大臣宣读我事前让他准备好的文件，或者由他就某个问题做出必要的说明。我允许并鼓励阁员们对每项议题自由地发表意见，可是讨论必须做出明确而肯定的结论，不能议而不决。有时我可能对某件事给予原则性的指示，或者直接下达命令。

譬如在一次内阁会议上，我强调了上演新闻记录片对国民了解开发计划进展情况的重要性。我在提醒需要大量能培养儿童智力的玩具之后，严厉批评了那种禁止进口玩具的建议。关于对一家国营商店进行调查的问题，我表示应该主要着眼于降低商品的零售价格。随后我强调要增加雇员的薪金，以使他们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能够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平。我要求交通大臣明确某铁路线竣工的具体日期。关于在伊朗修建钢铁厂的问题，我指示应该加快速度进行。

在一次研究来年预算计划的内阁会议上，我对于从石油收入中拨款支援开发计划一事，做了原则性的指示。我提醒要尽快增加政府工作人员和宪兵的薪水，并增加文教卫生事业和国防的预算开支。为保障这笔经费，我补充说，应该进行关税改革，还要特别注意节省公共开支。我同意授权市政府监管初级教育事业，并要求教育大臣想办法提高教育界的威信。我下令增加茶叶和砂糖的产量，以满足国民的需要。最后，我责成几位内阁成员研究一下出售本部所属的部分土地以筹备资金，解决政府工作人员住房的问题。

在另一次内阁会议上，我就北方某省有关鸦片走私

的报告发表了意见，并命令立即取缔这类非法活动。我提醒卫生大臣注意关于一家托儿所恶劣情况的报告，要他采取措施迅速改善它的状况。我强调应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薪金进行调整，还指示内阁将这笔款项列入预算之内。我要求内阁立即开始调查国家的税收状况，在不违背社会正义的前提下，尽量增加国家的税收。我可以引证很多事例来说明，政府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和各项决定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正义的。我多次提醒内阁要注意贯彻社会正义的五项原则（见第八章）。有关执行这些原则的方法，在我向内阁发出的所有指示和谈话中均得到充分的反映。我曾指示一个有一百多名工人的工厂，要它切实地执行政府有关的法令，为工人修建符合今天生活水平的住宅。对国家的工业发展计划我发表了下述意见：最重要的是修建一些其产品为收入微薄的人所必需，而又可以降低他们生活费用的工厂。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兴办了前面提到的制药厂和新式机制面包厂。

在另一次会议上，我命令内阁加速推行在全国修建大量技工学校的计划。我指出这项计划将为青年们提供新的学习机会，而又不增加他们的家庭经济负担，同时还可以弥补我国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不足。有鉴于此，我指示政府要欢迎外国人帮助我国执行技术教育计划。我下令将皇家组织和政府的奖学金主要给予那些有志到外国学习技术而家境又不富裕的大学生，并增加奖学金的数量。我指示要尽量鼓励医生到边远地区去工作。因为在伊朗也和在其他先进国家那样，医生总是留恋大城

市，所以我极力主张为那些自愿离开德黑兰到边远地区工作的医生提供各种方便条件。

我多次指示农业大臣要大量征购小麦，以便增加农民收入和国家的粮食储备。我责成农业大臣扩大德黑兰郊区的水田和耕地面积，以便为首都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丰富而廉价的农产品。为了帮助农民提高生产量，我还命令“农业银行”在全国各村镇增设分行。

我决定在全年中宣布某一天为全国植树日，并积极采取发展森林业的其他措施，以便使农民不缺柴烧，有建筑材料用；同时茂盛的树木、潮湿的土地和小河的流水会使气候变得清新宜人。我们还参考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正在进行人工降雨的研究和试验。

综上所述，只不过是给内阁大臣的许多指示和命令中的少数例子而已。应该指出，下命令与监督命令的执行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大生产所造成的纪律性的加强，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消除我国人民的懒惰和不遵守时间的坏习惯；但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和某些人还应该进行监督，以促使国家工作人员努力工作。

为了顺利地推行各项计划，需要有适当的严厉措施和监督，因此，我同各阶层的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有些西方政治家和企业家认为，对事务的监督应有一定的限度，作为领导者至多可与八至十二个具体负责人直接联系，手伸得太长就不好了。但这种主张不符合我国的教育状况；再者，假若我所依靠的情报来源受到限制的话，

那对国家将是危险的。我的情报网应该非常广阔，只有这样才能对人民的需要和困难了如指掌。这一点对于我督促开发计划的执行也是非常重要的。

应该指出，伊朗宪法没有规定国王承担任何具体的责任，这是非常英明而富有远见的。其用意在于让国王凌驾于议会之上，不必象内阁诸大臣那样对议会负责。

宪法虽然不要求国王承担具体的责任，但这决不意味着国王是个没有任何职责的人。恰恰相反，他应当出色地行使在第八章已简略提到的那些重大权力。假如国王确实是热爱人民和关心人民生活的，那么他就应该成为制定和实行国家各项政策的真正领导人。

当然，在国家的迅速发展中国王所起的领导作用还是有限度的。如前所述，我国与刚进入发展阶段的所有国家一样，面临着种种巨大的困难。我们特别缺乏推行开发计划的工作人员；我们也沒有足够的资金购置必要的机械设备，以进行大型的建设项目。但是为了加速伊朗的发展，我和全体爱国同胞一起正在信心百倍地努力奋斗。无数的事实表明，我国人民的努力即将接近于成功。

亚伯拉罕·林肯和许多国家元首都曾指出社会地位给他们带来的孤寂感。一般说来，伊朗古老悠久的帝制传统更容易使国王产生这种孤寂感。虽说人们可以较多地与我接近，我也不象礼萨王那样严厉，可是王位本身自然而然地使我与人民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在内阁会议上，在接见时，我可以笑容可掬地讲些风趣话，但是，这远

不足以填补这道鸿沟。我又不愿意聘请顾问，而喜欢象其他国家首脑常做的那样，独自对事情作出决定，这样似乎孤寂感就会更加强烈。再者，除了琐碎的小事而外，我甚至和至交的亲友也不商谈国事。那么，这是否会使我感到寂寞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对妻子的情愫，对伊朗人民的热爱，以及观赏自然风光给我的乐趣，将这种孤寂感驱散得一干二净。

另外，我倾注全力于自己的工作，它时刻在召唤我与各种困难进行斗争。我巡视祖国各地所目睹的各项建设成就——它说明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使我感到由衷的喜悦。我从不愿意表现得感情冲动，但是应该承认，年青女学生漫步街头、有说有笑的情景确实使我心头的孤寂之感烟消云散，油然而生的是一种极为欢快的心情。假如你知道我希望有一天国家能为每个到了规定年龄而想结婚的伊朗女青年准备好嫁妆，那么就不会对我产生这样的感情大惊小怪了。目前我国有不少女青年由于经济困难而被迫推迟婚期，在我看来这是不公道的。同样，我还有一种设想，就是为所有贫穷的无家可归的老人修建宽敞整洁的新住宅，让他们安心地度过自己的晚年。一个人到了老年，犹如夕阳西下，显得沉静而安详，理应为这些花甲之年的老人提供舒适安逸的生活环境。

在国王的生活中，另一个使我摆脱孤寂感的重要因素是依靠真主的庇佑。如前所述，我深信自己的每件工作都得到神意的帮助。

这种信仰并未使我飘飘然忘乎所以，相反，它使我产

生了这样一种信念：在这个世界上，必须兢兢业业，努力奋斗，才能完成领导的重任。我除了作每天例行的祈祷之外，还更多地向万能的真主乞求帮助。这并不是说，我与天国有什么不寻常的联系，但是应该坦率而毫不夸张地讲，我的虔诚的祈祷总是十分灵验。正因为如此，孤寂之感才很难在我心中滋长。在本章里，我不打算长篇累牍地述说王位和我为之献身的这个国家悠久的文明传统。因为在前面各章我对自己的各项主张和工作计划，以及为实现这些主张和计划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均已有所叙述，所以只要再简略地谈谈伊朗的帝制，便可以搁下笔来，结束这部著作了。

我完全懂得，应该以公正的态度对待王位和自己的职责。假如目前伊朗的帝制由于延续已久而失去作用的话，那么我会高高兴兴地引退，并帮助国民去推翻它。可是，当真理的光芒象初升的太阳一般普照大地之际，我看到伊朗的帝制是行之有效的，正如它在昔日昌盛的年代有益于伊朗人民那样，今天在原子时代它仍然保持着美妙的青春，继续造福于伊朗人民。

如前所述，伊朗王国已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有人说这个数字不确切，那是因为计算方法不同的缘故。反正居鲁士大帝是在两千五百零五年前登基为王的，他仅用了几年时间，便统一了全国，巩固了自己的王位。在居鲁士大帝之后的几百年中，伊朗遭受过异族的入侵，它也侵占过别国的领土，然而无论是那种情况，伊朗的帝制均得以延续，从未中断过。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伊朗各朝代的宫廷使动乱变为安宁，使分裂变为统一。在伊朗始终存在着民族的隔阂、宗教信仰的分歧，以及政治和经济上的矛盾，只是由于帝制发挥了作用，这些分歧和矛盾才转化为以国王为象征的完美的统一。

现在我要说，在伊朗的历史上我是第一个充分利用宪法权力的国王。乍一听来，此话似乎令人诧异，可是稍加思索，其正确性便无可怀疑了。

一九〇六年以前我国沒有一部完善的宪法，因此伊朗国王的宪法权力似有若无，不甚清楚。从一九〇六年到我父亲夺取王位止，恺加的国王们视伊朗宪法为儿戏，沒有认真对待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力。礼萨王虽然对伊朗做出了伟大而宝贵的贡献，可是他把议会看成是国王的附属品，这样就使他丧失了自己对议会行使的宪法权力。此外，当时宪法虽然规定要成立参议院，可是在我即位之前，并未能予以实现。综合上述，难道还不能说我是伊朗第一个按照宪法制定者的愿望，充分利用宪法权力的国王吗？如前所述，伊朗人民认为应该修改一九〇六年宪法，以便扩大我行使法律的权力。

有些外国记者把我描绘成一个有专制主义倾向的立宪派国王，可是又有些外国人和伊朗人却希望我在工作中态度更加严厉，能象我父亲那样独揽大权才好。我认为，这本书能够清楚地表明我在上述两种态度中所努力采取的折中作法。我想由于伊朗各政党的成立，我一定能够把古老的帝制传统和今天新的作法有机地结合起

来,加以运用。

在历史上,我国既有伟大而杰出的君主,也有昏庸无能的国王,这后一种情况今天已不可能再出现了。在现代,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政党的出现,一位英明的国王可以比过去更有成效地造福于人民,而腐败低能的国王却不能再加害于人民,因为有知识的人民决不甘心忍受国王的欺压,他们将迫使国王或者改邪归正,或者交出王位。恺加王朝的统治引起人民大众的不满,结果被推翻了;公众舆论赞助礼萨王上台执政,才使他获得成功。将来这种为各政党所支持的公众舆论定会对国家产生更大的影响。

当政党的活动构成我们工作的基础时,国王便是一个包罗各种各样个人目的和愿望的统一体的中心。伊朗人是一个以个性自由为其特征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伊朗人的行动表明,一旦祖国需要他们做出最大牺牲时,他们就会坚决地放弃个人自由。我相信有朝一日在表现这种令人称赞的品德方面,我们这一代决不会比先辈们逊色。

今天世界上政局的演变异常迅速和激烈,一个国家会轻而易举地被消灭。我认为近年来伊朗取得的惊人发展充分表明,我们既欢迎变革和进步,同时也坚定不移地维护我国古老的文明传统。我们对祖国的一草一木,它的诗歌、文学和家庭生活,以及它素有好客之称的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为有如此整洁的国家、为有多雪的群山和肥沃的原野的大地而感到骄傲。我们对



2 030 0061 6

绚丽多彩的家园，它的松树、篠悬树和多汁的水果，它的湖泊、河川和溪流，它的橙子树、红蔷薇和夜莺，充满了激情。我们为自己的社会政治结构感到无比的自豪。

封面
前言
目录
正文